

統一編號  
006339890156

教育家的話

# 教育家的話

國立教育資料館

編印

國立教育資料館 編印  
林 天 祐 主編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ISBN 957-01-4888-8



9 789570 148886



# 教育家的話

國立教育資料館 編印

林 天 祐 主編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 教育家的話

## 目次

(依姓氏筆劃排序)

序.....	許志賢
◎篤實而務本的比較教育學家.....	王家通 .....1
◎創意天使與特殊教育的守護神.....	毛連塏 .....17
◎幼兒教育理論的實踐者.....	王靜珠 .....27
◎懷本而踏實的教育尋根者.....	伍振鷺 .....45
◎繼往開來的教育掌航者.....	朱匯森 .....61
◎時代青年的導引者.....	李 煥 .....73
◎人文理念化成行動的實踐者.....	郭為藩 .....81
◎博愛之謂仁.....	彭蒙惠 .....95
◎兼容理想與實際的教育實踐家.....	黃昆輝 .....109
◎開啓教師在職進修大門的先鋒.....	葉學志 .....131
◎愛與真理信仰的標竿.....	賈馥茗 .....141
◎播植台灣教育根基的教育家.....	劉 真 .....155
◎竭忠盡智為教育.....	潘振球 .....167
◎深耕童軍在台灣.....	謝又華 .....187

# 序

---

在知識爆發的時代，知識的產能增加了，智慧的傳承卻逐漸凋零，教育工作者經驗與智慧結晶的發掘及保存為當前重要課題。「教育家的話」這一本書的構想，就是在分享與傳承教育資深工作者的經驗與智慧，作為後進教育研究與工作者的參照，期能達到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目標。

台灣地區經濟發展被譽為世界奇蹟，教育所扮演的人才培育功能居功厥偉。由於所有教育理論與實務工作者孜孜不倦的投入，創造充沛的人力資源，奠定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堅實後盾，在台灣的教育人，是值得肯定與驕傲的，而在教育園地各個角落默默奉獻、引領發展的教育家，更是創世紀的教育舵手，其言行值得吾輩景仰。

「教育家的話」為本館前館長毛連塹博士所提議，目的在於採用口述歷史的精神，探討教育發展的關鍵事件，瞭解早期教育工作者的體驗，發掘資深教育工作者的智慧結晶，以及分析比較不同年代教育活動的始末。編輯計畫由本館與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共同合作進行，經過多次討論，決定訪問教育學術主管、教育行政、學校校長、特殊教育活動、教育事件、教育方法、教育方案創始者，目前完成訪問的資深教育工作者計有王家通等十四人，編成首冊，並將陸續訪問其他人員，持續編輯。

實際訪問工作由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劉春榮教授、陳明終教授、鄭玉卿教授指導助教魏利祝、研究生簡惠閔、陳怡親、邱鈺惠、蕭佑梅、吳美玲、梁淑惠進行，訪問的內容包括生平、座右銘、重要事蹟，訪問初稿經受訪者確定之後，再輔以相關報導，最後彙集成冊。

本書之完成，首要感謝所有參與受訪的資深教育工作者，對於他們分享經驗與智慧的意願與真誠，表示由衷的感謝；其次要感謝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林天祐所長及師生，謝謝他們在課餘之暇抽空去挖掘寶貴的教育智慧，讓這麼有意義的工作得以完成。

教育的成長與發展是經驗與智慧累積的成果，本書付梓之際，深感知識萬能、智慧無價，特別要叮嚀讀者在閱讀此書時，用心去體會教育前輩為人、處世的態度，以及教育思維的智慧結晶，一讀再讀之餘，如能體會「話中之話」，必能終生受用無窮。

館長 許志賢 謹識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 篤實而務本的比較教育學家

——王家通

(訪問及資料整理：鄭玉卿、吳美玲、梁淑惠)

## 壹、生平簡介

---

王家通先生，出生於民國二十年八月十日，台灣省桃園縣人。民國三十八年進入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學校就讀，自此與教育結下一生之緣。畢業後於國民學校擔任教職，民國四十四年進入省立台灣師範大學二年制國民教育專修科就讀，民國五十三年赴日深造，期間曾先後於桃園縣小、中學任教。赴日求學期間，在師長的啓迪之下，奠定日後投入比較教育研究領域的意向與興趣。民國五十五年，取得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育學修士，並於民國五十八年完成博士課程回國。歸國後在師長的引介下，進入新竹師範專科學校任教，並在民國六十一年獲得慶應義塾大學第一個教育學博士學位。民國六十三年起，又先後歷任高雄師範學院教授及教育研究所所長、屏東師範學院院長等職務。民國七十九年回任高雄師範大學教授，至民國九十一年二月退休。現任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教育資訊學研究所教授，繼續為教學及學術研究奉獻智慧與熱忱。

## 學歷

台灣師範大學國民教育專修科畢業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育學修士、博士

## 經歷

中小學教師

新竹師範專科學校講師  
新竹師範專科學校教務主任  
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系副教授  
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教授  
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所長  
屏東師範學院院長  
高雄師範大學教授

## 現職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教育資訊學研究所教授

## 座右銘

~寓休閒於工作、學習之中~

對於王家通先生的景仰，從閱讀他的著作開始，他淵博而融貫的學識，字裡行間可見。初見他，是去年所上邀請他來專題演講的時候（筆者案：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五日，王家通先生受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之邀，講演「從日本教育革新談我國教育改革」。）印象中，他的態度平易自然，笑容溫藹可掬，論事說理持平而肯切，對於聽者們的請教，也總是耐心地正面以對。因此，這回我們一行人，可說是懷著殷切的孺慕之情而來，希望能藉此機會更進一步地，與這樣一位德慧術智兼備的長者分享他的人生體驗、他的教育理念。

## 貳、早年求學生涯

.....

王家通先生真誠、不矯情的言談與態度，讓我們感受到自在而融洽的談話氣氛，他首先與我們分享了自己早年求學的經過。

過去台灣在日治時代裡，學制與課程內容都與現在有所差異，他回憶著當時在國民教育階段的學習環境，說道：

「當時台灣人念的小學叫『公學校』，日本人念的叫『小學校』，我是念公學校。那時候有一種叫做高等科，就是小學畢業再念兩年，我兩年還沒有念完，大戰就結束了。不過，因為日本的學校是四月開學，我就一直等到暑假再去考初中，所以就比人家多了兩歲。」

他笑了笑，接著說：

「說到高等科，是一種兩年制的學校，是給不升學的人，有多兩年的教育機會。我家離南崁較近，那裡有個兩年制的、大致相當於高等科的『農業專修學校』，於是我便就近在那裡讀書。這個農業專修學校，戰後改名為初級農業學校，五十七年以後變成南崁國中，最近又改制成所謂的完全中學，就是南崁高級中學。

我初中念的也是農業學校，就是現在的桃園農工，那個時候有初級部、高級部。我是去考初級部一年級，初級部念完之後，就跟著同學去考台北師範學校。」

進入師範學校就讀，對王家通先生而言，是一個生涯的轉捩點。從此，他便與教育工作結下一生的緣分。

## 參、職場歷練與升學意念

王家通先生認為自己後來選擇教育領域，並以教育為終生志業，其實並不是一開始便立定的志願；他笑稱自己像是一個半路出家的人，從此便成虔心向佛的和尚。正如同王家通先生後來所比喻的，他對教育的熱忱與堅持，是所有教育工作者有目共睹的。

他談起師範學校畢業之後，在職場上的歷練，以及後來萌生出國留學意念的經過：

「師範學校三年畢業之後，到台北縣汐止國民學校當老師，一年之後就調回桃園，在自己生長的地方，又教了二年書。這期間很多同學都準備去考大學，我也是這樣跟著人家跑。因為師範學校的課程與高中差異很大，我記得當時分發在台北市的同學，很多就到補習班去補習，準備考大學。我一直都沒有在台北市待過，也沒有上過補習班，所以大學當然考不上啦！

後來有個機會，是師範學校改成師專的一個先期作業，當時在師範大學辦理一種班，叫做『國民教育專修科』，是兩年制的，以小學老師為招生對象，目的是希望小學老師能夠提高一點學歷。我後來就考進了國民教育專修科，在頭份的師大分部就讀，兩年之後，就去當兵。當兵的時候又碰到一些同學，因為師範學校畢業的學生也蠻用功的，上進心很強，後來有的就去留學。由於小學是念日本人辦的學校，日語沒有問題，有些同學就去日本留學，我就跟著去，到日本唸書。就這樣一路走下來，原本只是小學老師，後來再升學，就開始研究學問起來。」

王家通先生幽默地表示自己一路走來，似乎始終是「胸無大志」，並無特別高遠的理想，都是跟著人家跑，不過也總是隨遇而安。莞爾之餘，我們也感受到他率真、直爽的樸實性格，以及達觀、淡泊的人生態度。但是，踏上學術研究之路後的

他，治學之勤謹，卻讓我們看到他在研究學問上篤實而務本的一面，更加由衷地崇拜他在處世與治學上拿捏得宜的智慧！

### 肆、赴日求學體驗

---

王家通先生於民國五十年代，負笈前往日本攻讀教育修士與博士學位。五年的留學生涯，不僅豐富了他的識見，也奠下了日後從事學術研究的基礎。他也與我們分享了當時在日本求學的點滴回憶與心得。

#### 一、日本留學始末

王家通先生對於當初到日本留學的緣由與經過，作了簡要的說明：

「當時，第一個，因為大學考不上；第二個，因為兩年制的專修科畢業，那個時候規定比較嚴格，也不能考研究所，所以就跟同學一起到日本去。到了日本，各自走不同的路：有的從大學一年級念起、有的改行，而我則直接進研究所就讀碩士班。這在當時的台灣是不行的，在日本好像不那麼嚴格，我用書信聯絡的方式，向學校申請。後來學校也同意讓我考考看，考試通過了以後，就正式進了他們的研究所。就這樣一路下去，碩士班念兩年、博士班念三年，五年之後回國。」

王家通先生學成歸國之後，在師長余書霖先生的引介下，到了當時由熊光義先生擔任校長的省立新竹師範專科學校任教，開始了他另一段的教學生涯。

#### 二、邁入比較教育研究領域

王家通先生在赴日求學期間內，奠立了他日後投入比較教育研究領域的意向與興趣，他談道：

「去日本念書以後，就慢慢覺得比較教育這一門比較有趣，並不是發現日本的教育特別好，而是覺得比較教育念起來就是比較有趣味，這可能是受到一些老師的影響吧！記得有一個教日本教育史的老師，對於中國文化蠻喜歡的，就常常會講到日本教育跟中國文化的關係，一比較起來，就覺得中國和日本很多地方都不相同，受文化的影響很多，有可能是因為這樣，讓我對比較教育產生了興趣。我的指導教授，他是研究教育行政方面的，不過他對於比較教育也是很有興趣，喜歡到國外到處看。另外，還有一個研究教育思想的老師，上課有時會說，他是比『腳』教育！他就是喜歡到處跑、到處看，而研究比較教育，這方面就很重要啊！」

由於在日本受到了許多師長的啓迪，王家通先生逐漸傾心於比較教育的研究領



域，並樂此不疲。對於過去在這方面豐碩的研究著作，至今依然熱衷不減的他，將重新作一番檢討修正、歸納整理，計畫於不久的將來完成一套系統闡釋教育制度的專著。在感佩之餘，也祝福王家通先生的著述計畫能早日實現！

### 三、教而知困

正如王家通先生所言，透過四處的閱歷、各方的遊走，來豐饒識見、增加體驗，對於從事比較教育研究，有莫大的助益。不過，由於他當時赴日留學期間，受限於經費之短絀，以致於無法有到各處參觀、遊歷的機會，他感慨地談到：

「我幾乎沒有離開過東京，因為不是公費出去的，所以忙著打工，賺取學費、生活費等等。由於很少離開東京，也很少去參觀學校，後來在教比較教育的時候就發現，那個時候怎麼不多去看看日本的小學、中學呢？因為『教而知困』，慢慢覺得那個時候應該多用點時間去參觀學校，才不至於現在變成有點書呆子的感覺，沒有廣泛地去吸收知識！」

王家通先生的話，同時也提醒了我們，在盛讀萬卷書的同時，行有餘力，也要記得踐行萬里路，相信在兩相輔成之下，必能成就知識與經驗交融的智慧！

## 伍、人生態度——寓休閒於工作之中

無論是從事教學或學術研究工作，對王家通先生而言，都從未曾感覺厭倦，而是樂在其中，甘之如飴，且多年來始終如一。對於此番的心境與態度，他也與我們分享了這箇中的奧妙道理：

「我的感覺是，一個人的工作如果與他的興趣相符合，工作就是休閒啊！就像小孩子，他的工作就是他的遊戲，他要搭個房子，邊玩邊蓋房子，因為這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遊戲，小的時候工作跟遊戲是一體的。但是長大了以後，遊戲跟工作往往就分開了，工作變成完全是爲了要生存、要生活，於是就會感到疲倦，就需要有休閒的時間。假如你的工作跟興趣是一致的時候，遊戲跟工作是一體的話，應該就不需要休閒了，因為你的工作就是休閒啊！

具體一點就是說，像是唸書、寫文章，對你而言是樂趣的話，就不需要休閒了；倘若你把他當成苦差事，你就會抱怨要休息、要去爬山什麼的。同樣，因為你把工作當苦差事，所以要休閒；如果你把工作當作遊戲的話，工作本身就是休閒了！不工作而去做了其他的事情，反而會覺得是在浪費時間。這個道理在當了大學老師之後越來越覺得是這樣，因為大學老師從事研究、教學，可以算是他的興趣，

也是他的工作。」

因此，與其形容王家通先生是堅忍自持地肩負教學重任、為學刻苦而勤勉不懈，不如說他是「以教學授課為志趣，視追求學問為樂事」倒更為貼切點吧！如此般寓休閒於教學與研究之中，無怪乎王家通先生何時看來，皆顯得態度從容而自若、神采奕奕而煥發！

## 陸、治學心得

.....

除了比較教育之外，王家通先生在其他領域內，舉凡課程、教育制度、教育行政、教育財政、師範教育等方面也多有專研，著述鉅豐。而閱讀王家通先生的文章可以發現，其言語淳實樸質、持論謹嚴肯切，不僅灌注我們知識，也啟發我們思維。如此的風采文筆，非得要有滿載的學識，以及對於事理的深切洞察，才能成就。因此，我們也透過這次的訪談機會，對於從事學術研究應秉持的為學態度、治學之方，向他請益。

### 一、先做幾年書呆子

王家通先生告訴我們，每一位有志於從事學術研究者，首要之務，皆須廣博涉略、窮究知識，藉以充實涵養、琢磨器識，他以成爲一個「書呆子」爲喻，闡明勤勉篤學的重要性：

「我是覺得，不要怕讀書讀多了會變成真正的『書呆子』，依我的經驗，應該是不會。我想真正的『書呆子』是說，有讀進去，但是沒有讀出來，反而思想變得很刻板，不容易改變。可是我的感覺是，讀書應該不會讓人變成這樣，而是讀越多，越會增加你的批判力，越會提昇你對問題的看法。」

王家通先生所謂之「書呆子」，絕非要我們變成一個只會死記死背，不知靈活變通的人，而是藉由博覽與深究，一方面涵養自己的學識，一方面培養自己批判事理的態度與方法，逐步奠定日後從事學術研究的基礎。此外，他又打趣的說道：

「所以，我常跟學生半開玩笑說，過去我們中文書的內容都是直寫，所以一邊念，一邊點頭；而西方人的書不是這樣，他們是橫著寫，所以西方人唸書，邊唸邊搖頭。可能搖頭搖慣了，就變得比較會批判，不像中國人唸書，就是一直不停的點頭，所以變成真正的書呆子。」

短短數語，像是句不經意的玩笑話，但當中其實有著對於現今學術研究風氣更深的諷喻與反省。

## 二、批判的態度

王家通先生對於國內學術界缺乏批判態度的現象，有感而發的表示：

「最近看到有個小學老師在報紙上面，寫了一篇文章，說是有位學者，有一次到學校專題演講關於九年一貫課程，演講時總是說到美國的誰怎麼說，誰又怎麼認為，都只有單純的介紹。包括一些很有名的學者也是這樣，都只是介紹某個課程專家怎麼認為，如此而已，好像都沒有批評那個專家講得對不對，我也很少看到這樣的文章，難道我們沒有資格批評他嗎？……包括批判理論在內，就只有『介紹』批判理論，很少有人去『批判』批判理論，許多人好像只是把他在美國看到的書拿回國內，念給大家聽一樣。」

王家通先生的一席話，確實對於當前學術研究風氣有當頭棒喝的喚醒作用。批判態度的重要性，可以讓身處在現今知識爆炸、資訊龐雜社會中的我們，不至於迷失其中，或是毫無選擇、良莠盡收，而是能更進一步以洞澈的思維，去蕪存菁、擷取智慧。

## 三、旁徵博引，深入淺出

閱讀王家通先生的文章可發現，儘管內容兼攝多種學科、中西貫穿，但字句中卻充滿了由博反約的樸實與明朗，予人一目了然之感。這樣的寫作風格，絕非是一個對於知識未經消化、囫圇吞棗，便冒然下筆的人可以做到，由此也透露出王家通先生對於知識窮究之透徹，而能將事理深入淺出地傳達予人。他用一個簡單的生活實例，來告訴我們在敘事說理時應有的態度與方法，他說：

「最近一些人寫作文章，總是讓人看不懂，我想可能是沒有把引用別人的資料消化過，常照用別人所使用的字眼，沒有將它變成自己的話。我是認為，如果有句話可能說了，人家會不太懂，你就可以簡單舉個例子來說明，讓人家能夠聽得懂。事實上，很多事情的道理都不是很難，只是說得太過抽象罷了，所以很難去了解，如果這時候用個具體例子來說明，就會變得很好懂、很清楚了。」

就像我聽過一位長者說的一則笑話：有個小學三年級的孩子，做數學的應用題，題目是：『媽媽從銀行領了五千元，到菜市場去，買雞肉花了二百元，買菜花了一百元，……最後還剩下多少錢？』這個孩子看不懂這個題目，其實他不是不會計算，而是他不曉得什麼叫做『銀行』。於是他跑去問姊姊，念商學系的姊姊便告訴他：『銀行是調整金融的機構。』，這樣一來更糟糕了，『調整』他不懂，『金融』也不懂，『機構』更不懂。本來就只有『銀行』兩個字不懂，現在變成八個字

都不懂！他只好再去問哥哥，哥哥指著附近的一家銀行，告訴他：『媽媽常常帶你去領錢的那一間就是銀行啊！』，於是他就知道什麼是『銀行』了。有些人就是不會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講道理給人家聽，我一直在盡力做到這一點。」

因此，寫作文章、講事論理要避免言詞詰屈聲牙、語焉不詳，讓人霧裡看花、摸不著頭緒，如能適時地旁徵博引、化抽象為具體，即能收深入而淺出之效。從王家通先生的言談中，處處可見他引喻說理的精心與巧思，所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如此可見矣！

### 四、閱讀經典，昇華智慧

對於時下的教育議題、著作，王家通先生雖也關心、覽閱，但並非抱持著喜新尚時的心態，而是帶著批判的眼光，省察的態度來看待。不過，雖然他對於學習研究總是孜孜不息，但面對愈來愈多新興議題的崛起、大量學術著作的出爐，也令他有無法迎上變遷、無法窮盡冊牘之感。對此從事學術研究的困境，他感觸良多的說：

「我最近有這樣的感覺，就是新的學者一個一個出來，書也出了很多，可能一個晚上印製出來的書，就讓你一輩子都唸不完！那麼多的書該從哪裡看起呢？我都來不及看。……大家都在追求新的、時髦的東西，可是新的東西又不曉得是不是都真的很有價值。」

對於此，他也提出了新的體悟與想法：

「所以，我最近常回過頭來看那些比較有名的、古代流傳下來的經典。例如，中國像是老子，西方像是蘇格拉底這些有名的人的思想，讀起來反而比較有啟發性。或許有人會覺得：『哎！都是些老古董！』，但是我卻覺得以前的人思想好像比較有內涵，現在的人相較下卻好像膚淺了點。現在很多人所提出來的一些想法、理論，事實上是老調重彈，以前的人早講過了，只是他現在用了新的方式，變成一個新的學說提出來。所以，我是覺得經典應該要多讀才對！」

王家通先生的話提醒了我們，事實上，許多前人知識、經驗所累積並流傳久遠的著作，皆是豐盈我們心靈、啟迪我們智慧的寶庫。因此，他勉勵我們，要求學識之淵融，在「知新」的同時，更應「溫故」，能珍視並博覽前人薪傳的寶貴經典！

## 柒、對教育現象的體察

.....

觀諸國內的教育現象，王家通先生也與我們論及了他的感觸與想法。從談話中，

我們感受到了王家通先生對於國家基礎教育的重視，以及對於中小學教師的關切。

## 一、國民教育的重要性

王家通先生認為，國民基礎教育乃國家之根本，社會之基石，因此，它的理念、制度完備與否，與國家、社會之興衰振靡關係密切。他以日本的教育特色為例說了這一段話：

「戰後日本經濟復甦快速的原因，有人認為，是受到韓戰的影響，美國在韓戰時期給了日本很多的機會，像是經費投入、軍事用品的製造等等，使得日本經濟能很快地起飛。有人則認為，日本戰後的經濟會這樣奇蹟式的發達，跟教育也有很大的關係。談到日本的教育，有一點很特殊的就是，日本很注重國民教育、基礎教育，比起我們重視得多。拿經費的投入來講，我們中央的經費好像主要是拿來辦理高等教育，但是日本不是，文部省（註：相當於我國的教育部）預算裡大約百分之五十五是用在義務教育。用來作什麼呢？支付老師的薪水，以及學童的書籍費等。所以，日本的教育就我看來，像是座金字塔，基礎很穩固。而我們呢？教育就好比像找幾個運動明星訓練奧運會選手一樣。一味地追求卓越的高等教育，要讓幾所大學成爲重點大學，以爲這樣就會變成國際水準的高等教育。其實，我覺得這是不容易達成的目的，這就好比只找幾個運動明星來訓練奧運選手的左營模式一樣，事實上，見微而知著。奧運的訓練方式是這樣，找極少數特別頂尖優秀的人才悉心培養，其他的呢？什麼都差很多，追求卓越的高等教育就是這樣啊！所以，對於基礎教育的重視，日本做得應該是比我們好。」

常言道：「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因此，有健全的國民教育環境，才能培育出心智體魄皆健康的兒童，將來逐漸長成，也才能成爲社會良好之公民、國家優秀之棟樑。因此，重視國民教育，建立紮實而穩固的教育基礎，應是我們刻不容緩的目標！

## 二、「辦教育者」與「背米人」

王家通先生認為，當前教育風氣充斥著形式主義，目標與手段置換，許多人置身其中卻渾然無所知。他以「背米人」爲喻，語重心長的談道：

「現在辦教育的人，常常像背著一袋米，而事實上，教育的工作是很難的，會讓你背不起來。以中小學老師來講，雖然負擔不了那麼多的責任、背不動那一袋米，卻還是得背，因爲如果不背，學校的聘書就不給你啊！所以就只好口頭答應要背，但是因爲背不動，於是便在米袋上面挖一個洞，讓米慢慢掉、慢慢掉，來減輕

負擔。抵達目的地後，就發現只剩下一只米袋，米通通掉光了。

譬如說國中老師，要做什麼事情呢？要培養學生成爲一個健全的國民，可是到最後培養出來的卻不是健全國民，而是許多的不良少年。爲什麼？因爲老師沒有辦法背起這袋米，只好挖洞放掉米，到最後米袋帶來了，但是學生卻不是健全的國民。所以我是希望說，明知道教育的擔子很重，老師背不起，就不要給老師太多負不起的責任。像美國行爲目標的理念就比較好、比較清楚，例如美國教師的聘書，就是契約書一本，那裡頭講得很清楚，比如什麼時間作什麼事情、做哪些工作等等。所以老師只要做這些工作，抽象的責任不談，只要做規定的具體事情，這樣不是比較合理嗎？我可以做得到的，我答應你；我做不到的，就不答應你。可是中國人的教育觀念不是這樣，希望老師要能負起無限的責任，如果不負起，學校聘書就不給你，所以也只好答應下來，可是到最後就只有把米袋帶來了。所以，我認爲給老師無限的責任，這樣的體制應該要改，要把老師要負的責任具體化，不要聘書裡頭只寫著一兩句話，然後把無限的責任交給老師。」

這般現象在許多學術研究報告中也可以看到，先生繼續感慨地說道：

「我們也是常常跟那個背著米袋的人一樣。就是說，實際上沒有那麼大的能力，只好把米漏掉一些，表面上做做樣子，最後研究報告還是可以趕得出來，不過事實上，那份報告的內容已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了。教授沒有完全負起責任，自己沒有親自寫，而是讓研究生來寫，然後很快就交差了事，他只負責看一看。」

咀嚼王家通先生以「背著米袋的人」爲喻所引申的一番話，細細地體會其背後所蘊藏的涵義，讓人不禁擔心形式主義對教育的斷害。一個簡單的例子，卻是寓意深遠而發人省思，相信這對於在教育崗位上的任何一位工作者而言，無論是擔任教育主管、教師、或是從事學術研究者，都能帶來深切的反省與惕勵作用。

## 捌、教育改革的省思

---

國內近年來驟變的教育改革風潮，無論在政策或制度的研擬、推動與落實上，皆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而改革所投注與動員的人力、物力，也甚爲可觀。事實上，教育事務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每一項理念與決定在付諸實行之際，皆應審慎權衡其間的利弊得失，務求萬全之準備。否則，思慮不周，但求急功近利的結果，或是造成顧此而失彼，或是因此事倍而功半，甚或是招致殃及國本，禍遺子孫之憾。職是之故，王家通先生對於國內的教育改革現況，亦滿懷關心與憂心之情。

## 一、他山之石——日本教育改革經驗

王家通先生對於日本教育的研究鞭辟入裡，因此在訪談中，也請先生由日本教育出發，分析國內教育改革，以為借鏡。先生援引日本教育改革的例子作說明，語重心長地談道：

「我覺得日本的教育改革，特色是按部就班，一件事情要改革，得經過很長時間的討論。譬如說，他們的週休二日制度，就是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再從一個月只休一日開始，到一個月休兩日，最後才從今年四月份開始，每個禮拜都週休二日。但是國內的做法卻常常像在趕時間一樣，沒有很慎重的設計，就付諸實施。譬如國內週休二日要實施之前，課程標準中有關上課時數的規定，並沒有加以配合。以致於週休二日之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所規定的上課時數，沒有辦法配合週休二日的制度，兩者之間出現了落差與問題。但是日本的周休二日則不同，是把課程標準都放進去考量，以配合週休二日，等一切都準確地安排妥當後，才開始實施。」

王家通先生對於日本教育研究之通徹，原本讓人有高山仰止之歎，但在他具體而微的援例闡述之下，卻令我們有如被智慧的露滴均霑的小草般，心靈一下子通透澄淨起來。先生的舉例看似無奇，但卻是一個對於台灣與日本的教育改革，在態度、政策推動上，很精闢且見微知著的例子。他指出，台灣與日本就教育改革的理念與實際作為來看，存在著許多的差異。然而，我們應能自他國經驗的優點與長處中學習，對於自身在教育改革上所出現的問題與困境做更深切的反思與省察。

## 二、談中小學課程改革

王家通先生認為，我國當前的教育改革，由於欠缺周詳的整體考慮，以致策略措施顯得不合理，在實際執行時便呈現步調紊亂、各自為政的窘境。他說：

「由於提出的教改措施不合理，做起來有困難，因此就變成說，大家把做不到的擺在一邊，做得到的才做。」

他接著又以現階段九年一貫的課程改革為例，提出了目前教育改革實際面臨的一些問題：

「關於九年一貫課程，教育部有出了一本『問與答』(Q & A)，那裡頭提到的事情可能很多是做不到的，譬如所謂的『基本學力測驗』部分。新課程裡頭很強調實際的能力，而不是考試的成績。但是，基本能力測驗是不是真的可以測量到學生的能力呢？我認為基本學力測驗所代表的，事實上還不是真正的能力，還是一個考試成績，所以在『問與答』裡強調說現在亟欲發展出能夠真正代表能力的評量，可

以測得帶得走的能力，而不是考試成績。可是，究竟有沒有人真的在發展這個評量，或是在研究怎麼樣把基本學力測驗的考試成績變成真正的能力呢？」

他首先質疑「基本學力測驗」評量的真實性，並且指出以測驗的形式來衡量學生的真實能力，不但不易達成，也會因此帶來更大的問題。此外，針對學生真實能力的部分，他接著又談到了當中的複雜性，以及訂定所謂「能力指標」所帶來的問題：

「新的課程綱要裡面有所謂的『能力指標』，條列的項目內容和行為目標看來類似，是不是真的能夠用來代表能力呢？要說什麼是『真正的能力』有時候真的是很難哪！隨便舉個例子，譬如能力指標上寫著：『能夠說出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或是『能夠瞭解不同文化間的差異』，這個項目困難可以難到寫十本博士論文也寫不出來，簡單可以簡單到一句話就講出來，例如要指出平地人跟原住民間的文化的差異，倘若有人說：『原住民喜歡喝酒，平地人懂得儲蓄』，這是差異吧？一句話就講出來了；假如要研究平地人跟原住民的文化差異，那人類學家研究幾年都研究不出來！什麼是『說出』或『瞭解』文化差異呢？學生用一句話說出差異，就可以代表他有這個能力嗎？如果說不能只看表面的文化差異，而是要求學生能夠說出本質上的差異，那要做到什麼樣的情況才能代表本質？由誰來判斷呢？

再者，把這種智性的能力變成像是運動、體育方面的能力指標，譬如說呼拉圈搖幾下，能跳幾下，游泳游幾公尺之類，體能方面的能力較具體，還可以這樣做，但是智性方面的就很難用這樣的方式來代表真正的能力。更複雜的是，各種能力之間其實還互有關聯，譬如一個社會關係很好的人，講話很得體，所以語文能力也不會差到哪裡去，這之間怎麼去區分也是蠻困難的。」

九年一貫課程之初衷旨在破除傳統智育導向的教育型態，以培養學生具備「帶著走的基本能力」為鵠的，然而，此番良善美意卻因缺乏通盤而審慎的考量與規劃，以至許多的相關措施與制度難以通過學理思辨的檢視。或許，教改之路走來，之所以倍感艱辛，問題的癥結即是在此。王家通先生今日的一席話，讓我們明瞭在為教育盡「力」之餘，更應盡「心」為教育改革從理念到落實面的每一個環節，做謹慎而深入的思考，讓教育改革在穩健踏實的基礎上，逐步付諸行動，真正成為開啓教育至善之門的一把鎖鑰！

### 三、教與學的困境

王家通先生認為，站在教育第一線的中小學老師，在一波波教育改革政策的大力推行下，所擔負的壓力頓時遽增，然而，很多壓力似乎並無益於實際教學工作，



他描述到：

「中小學老師，被給予太多的壓力了。但是有些壓力，事實上並不是必要的。也就是說，讓老師們像無頭蒼蠅一樣，一天到晚忙東忙西，可是卻沒有因此為教育或學生的學習帶來很好的效果。」

依據王家通先生的觀察，教育改革之後讓老師愈發無所適從，壓力雖是源源不絕，但是在實質的教學上，卻未能因此獲得良好的成效。先生一語道破現今老師教學的困境，並且也再次印證他以「背米人」為喻所引申的一番道理。

再者，王家通先生認為教育改革所帶來的另一項隱憂，出現在學生的學習方面，每位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與其學習成果之間，將有更密切的關聯。先生憂心忡忡地表示：

「譬如說，一份學習單所安排的習題要求家長幫忙的地方很多，學生的家長如果有時間，知識也夠，當然可以做到；但是如果學生來自一個破碎家庭、單親家庭、做生意的家庭，家長自己工作都忙不過來了，還要配合孩子的各項要求，真的很難！這樣學習單因為家長配合程度不同，完成的結果就會差很多。倘若老師沒有認真指導，將會造成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每每表現得都很好；來自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則表現得不好，如果老師又沒有好好的去瞭解原因，盡力的去教導，導致學生之間的學習落差愈來愈大。以前我們做老師的，常責怪家長，認為家長把小孩子交給學校後，就好像一點責任也沒有，責任都讓老師來扛。部分家長有這樣的想法固然不對，但是，也不能因此本末倒置，要求家長負起很多的責任，老師們則負較少的責任，把教導孩子的責任太多給家長，老師不管學生的家庭狀況，不瞭解家長能配合的程度，最後導致學生的學習成績因為家長能力的不同，而形成很大的差異。」

此外，針對教育改革所要求的繁複評量，王家通先生也提醒我們要注意可能招致的問題：

「近年很多試辦九年一貫課程的小學，好像花太多時間在評量上面了。評量的表格設計得很複雜，老師光為了填表就得花費許多的時間，似乎新課程強調的是，沒有評量就沒有教學，可是照理說教學應該是比較重要的。但是現在卻變成一天到晚忙著評量，要求學生培養十大基本能力，沒有從教學做起，反而要從評量上來看，想法好像有點不合情理，我們的教改應該再對課程做更透徹的研究。」

正如王家通先生所言，教師若花費過度的心力在評量上，相對地，往往會因此排擠掉教學品質。事實上，學生到學校最重要的是由教師的諄諄教誨中獲得學識、陶冶品德，因此，倘若其他的措施反客為尊、本末倒置，將對學生的學習與成長造

成莫大的傷害。

### 四、創造名實相符的研究環境

王家通先生在提及國內教育的研究環境時認為，即將成立的國家教育研究院與各大學本身的研究單位，應做功能上的釐清。教育研究院應著眼於政策的可行性研究，而大學的研究單位則應強調基礎研究，他說：

「我是覺得，將來教育研究院成立以後，應讓大學的研究單位回歸學術領域。教育部的政策若要付諸實施，應該透過教育研究院來研究其可行性，如果教育研究院認為政策沒有問題，就可以實施。大學不要充當教育部的御用學者，才會具有獨立性。師範大學不要做這方面的工作，而應該要做一些基礎研究。如果大學的基礎研究跟教育研究院的研究結果不同也無妨，這樣互相批判，教育研究院才會有所進步。我想將來的研究環境，應該讓大學能夠獨立地來做批判性的研究，能夠這樣是最好的。教育研究院應該像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將來經濟的趨向，提供政府做參考。如果教育研究院將來也做這些工作，同時也要賦予它一些責任，即若做得不好，將來教育政策施行出了問題，教育研究院要負責。因此，教育研究院做的研究就要客觀、要科學，才不會在政策實施的時候發生問題。這樣，教育部就可以不用再委託大學做研究，自己有一個研究單位可以做研究，委託的經費就可以節省起來，從事其他更有意義的建設。」

先生強調學術研究必須保有其獨立性與批判性，讓學術歸學術，政策歸政策，也唯有讓學術研究機構維持其專業自主性，才能真正對國內教育研究環境有所助益。

### 玖、勤謹務實的教育典範

.....

訪談王家通先生就如同參與一場知識的饗宴，在場的我們都為先生言談中不時展露的獨到、精闢見解所吸引。然他對於教育實事的批判，並非只是為了一展教育專業的長才，而是對於整個教育大環境，存著一份感同身受的情感，為的是讓教育環境更好。王家通先生所秉持謹嚴的學術研究態度，以及對於教育事務的盡心與奉獻，永遠是教育界勤謹務實的典範。

### 主要著作

美日中三國之國民教育財政制度比較研究。台中縣：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 比較教育學導論（編譯）。高雄市：復文。
- 高等教育制度比較研究。高雄市：復文。
- 教育行政學（翻譯）。高雄市：復文。
- 日本教育制度——特徵與趨勢。高雄市：復文。
- 中日中小學師資培育制度比較研究。台北市：師大書苑。
- 初等教育（主編）。台北市：師大書苑。
- 兩個類型的高級中等教育。台北市：台灣書店。
- 教育導論（主編）。高雄市：麗文。
- 日本、韓國中小學教育的基本研究（合著）。台北市：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 中等教育（合著）。高雄市：麗文。
- 比較教育論叢。高雄市：麗文。



# 創意天使與特殊教育的守護神

——毛連塏

(訪問及資料整理：劉春榮、簡惠閔、陳怡親)

## 壹、生平簡介

---

毛連塏先生，臺灣省台南市人，民國二十七年生。

### 學歷

民國四十八年省立台南師範學校畢業  
民國五十二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  
民國五十九年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特殊教育碩士  
民國六十四年美國田納西州畢堡德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博士

### 經歷

民國五十二年任台南師範學校教師  
民國五十九年任台東縣教育局局長  
民國六十二年任高雄市教育局局長  
民國六十五年獲第十四屆十大傑出青年  
民國六十五年任高雄師範學院教授  
民國六十七年任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司長  
民國六十九年任臺灣省政府副秘書長  
民國七十年任臺北市教育局長  
民國七十五年任台北市立師範學院院長  
民國八十三年任國立教育資料館館長  
另擔任：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創造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協會理事長  
世界資優教育學會亞太地區主席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傑出校友

## 勉勵後進的話

身體健康很重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擁有一切。

## 貳、重要事蹟

.....

### 一、力贊「盲生就讀國校計畫」的推展

過去對盲童的教育採取隔離方式，在傳統的住宿學校受教，導致盲童無法適應現代生活。盲生走讀國校計畫將盲童引入普通學校中受教，開啓我國特殊教育的新頁。

盲生就讀國校計畫實施的目標在提供較多的教育機會、促進盲童的正常發展、增進大眾對盲童的瞭解、調適盲童的心理適應、開拓盲人就業機會、增廣盲童學習經驗及達成教育普及之理想。

民國 55 年政府制定「臺灣省盲生就讀國校計畫實施辦法」，以為推展此計畫之依據。盲生就讀國校計畫的推行步驟分別是：設立盲生走讀國校計畫師資訓練班、盲童調查、鑑定評鑑與安置、成立教材教具出版中心、舉辦盲生就讀國校計畫行政座談會、分區舉辦研習會及教學研討會、翻譯並出版盲人教育叢書、組織點字研究會及成立諮詢委員會等。

盲生就讀國校計畫由於受到政府的重視與支持，因此相當有成就，經美國海外盲人基金會之評價，臺灣實施本計畫之成功，為亞洲各國之冠，日韓各國相繼派員前來考察。毛老師針對這一項讓盲生受惠良多的政策，說明了推動的背景與理念。

「民國 52 年我到台南師範學校服務，55 年開始推行盲生走讀國校計畫（後來稱「混合教育」），當時美國海外盲人基金會派遣顧問卜修博士 (Dr. Stanley E. Bourgeault) 前來南師協助、訓練師資。當時盲生多住校，畢業後就回家、躲在家

裡，因此特殊教育界就推動此計畫來改善這種情況，希望讓盲生從住校變成住在家裡，然後就近就學。由於這個計畫在美國推行的相當成功，因此便將其推廣至亞洲，但菲律賓、泰國及馬來西亞都沒有成功，臺灣因為受到政府的支持，再加上卜修博士很熱心，所以推行的相當成功。」

「卜修博士很熱心，首先訓練了 16 位老師，接著開始到各地找盲童，一開始因為父母不想讓人知道家中盲童，所以盲生都躲起來，找到盲生後便將盲生安置在學校，學校的態度一開始也很怕，但計畫實施一段時間後並沒有問題，立委鄭龍水就是盲生就讀國校計畫的受惠者。當時所培育的師資，現在都相當有成就，在各縣市特教界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此外，現在盲人的領導者多是當時的混合教育培養出來的。因為盲生就讀國校計畫成功，所以，國北師辦理啓智教育時，比照這個模式；後來北市師辦理資優教育、嘉義師院辦理啓聰教育等，也採取本模式推動，以培養特殊教育所需的師資。」

## 二、參與延長十二年國民教育的規劃

根據教育部規劃，12 年國教將在 91 年底完成可行性評估，且 92 年起不再增設高職，現有高職朝綜合高中發展，推動高中職社區化。5 歲幼兒納入正規教育體系的目標，可望於 93 年底以前完成。現行大學招生機制也將完成改善，落實大學招生自主精神。

推動十二年國教是大家都有的共識，也是為國家做教育投資。前任教育部長曾志朗說，欲實施十二年國教，在財源上與經費排擠效應上須深入研究如何解決，也有許多制度上的問題亟待解套，因此，十二年國教絕對不是一個「宣布」的動作就可完成。未來若是實施延長國教，學生要怎麼分發？學制要如何訂立？學校資源要如何分配？政府教育經費造成財政上的龐大負擔又要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均有待放遠眼光，去做宏觀的機制規劃才行。

毛老師在擔任國教司長時，對於十二年國教的推動便有所辦理的想法，其間的過程與遇到的困難，毛老師為我們加以說明。

「民國七十年左右我擔任國教司長時，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交代教育部長朱匯森先生研究辦理國教延長為十二年之事宜。對此議題有些人反對、有些人贊成，反對的原因很多，其中經費問題為主要考量，因為國民教育延長為 12 年將需要花費一筆可觀的經費，所以最後有一新名詞——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出現，是國教司與技職司合作。延長為 12 年國教所待克服的事項太多，所以此一計畫後來並沒有進行。」

「稍後，郭為藩博士擔任教育部長時，提出十年國教的政策，因為國中畢業生大部分到高中、高職、補校以及特殊學校去就讀，因此，尚未接受第十年國民教育的學生，就是那些未入學的，這些學生所佔的名額很少，所以只要讓這些學生入學唸書，那麼所有的學生都有接受十年國民教育，其中第十年教育免費。當時我擔任臺北市教育局長，參與規劃與推動。」

「郭為藩部長認為十二年國教應從特殊教育開始的，當時我擔任教育部教研會執行秘書，參與決策與規劃的工作。現在又開始談十二年國教，我想延長國教為十二年的路到底如何走，需要解決與克服的事項仍然很多。」

### 三、提出推薦甄試的構思並試辦

#### (一) 推薦甄試

近幾年來，大學及高中的入學方式日益多元，以大學入學進路為例，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甄選入學制」，包括申請入學及推薦甄選兩管道，第二類是「考試分發入學制」，藉考試篩選學生。以下茲舉大學推薦甄試為例，說明推薦甄試發展的歷史脈絡。

台灣的大學校院聯合招生始於民國四十三年，當時參加的學校有國立台灣大學、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前身）、台灣省立台中農學院（今國立中興大學之前身）、台灣省立台南工學院（今國立成功大學之前身）四院校，其他如私立東吳大學法學院及三個專科學校，還有國防醫學院，則採單獨招生。四十五年以來，聯合招生經過多次分合；演變至民國八十年時，所有的四十七所大學暨獨立學院均參加聯招，聯招幾乎成為大學入學的唯一管道，經由其他管道進入大學的人數甚少。

大學聯招施行以來，影響至為深遠：一方面公平的入學制度，使得用功的青年人人有希望；另一方面不只中學教育，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均受到牽連，甚至扭曲。由大學聯招引發的缺失則有：只用少數考科來評量學生能力，因此考生表現的成績只限於部分的智育領域，其餘的智育能力及德、體、群、美各育的表現均無法顧及，學校教育的五育均衡發展因而受阻，甚至產生五育失衡的現象。成績至上的設計影響所及，分分計較的心態自然形成，導致考試及教學都過分注重制式答案的追求，學生缺乏主動求知的態度，只準備聯考科目，不會主動尋求課外知識。

因此，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在民國八十一年提出一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此方案有三個主要管道，分別是推薦甄選、改良式聯招、預修甄試，此三管道的對象和目的均不同，其中推薦甄試只有應屆畢業生可參加，適合有特殊才能與特殊性向的學



生，推薦甄試第一階段由大考中心統一辦理學科能力測驗，第二階段考試有指定項目甄試，如小論文、實驗等，由各大學自行辦理。

## (二) 科學資優生培育計畫

至於「科學資優生培育計畫」作法是依教育部與國科會所通過「基礎科學資優生培育計畫」，將從民國 91 年起試辦由大學傑出教授以「師徒制」帶領高中學生進行實驗或從事研究，希望能培養出頂尖且具潛力的優秀人才，初期先選擇數學、物理、化學、生命科學、地球科學等五個學門試辦。

國科會科學教育發展處表示，教育部與國科會已遴選出五個學門各十位研究表現傑出且有意願服務的教授，這五十位教授將在每年二月挑選一到兩名高一學生，每名學生從高一暑假到高三結束的兩年期間，利用周末、寒暑假及課餘時間，到實驗室跟隨教授學習。這項計畫將試辦五年，每位教授共會帶到四屆學生。談及科學資優生培育計畫，毛老師說道：

「高中、大學推薦甄試的濫觴是民國 70 年，我擔任國教司司長時，甄選優秀的科學資優生參加暑期「科學資優生培育計畫」的培訓，當時想法是一個暑假的訓練，回學校後老師跟資優生一起作實驗，每個暑假都這樣舉行。因為當時各個學校的科學實驗作的並不成功，於是利用教育部的力量把好的學生集中起來，聘請最好的師資加以培訓。推薦甄試的方式就是從這個概念與作法發展形成的。」

## 四、臺北市教育局長任內創新的教育活動

### (一) 台北燈會

「台北燈會現在大家看起來很漂亮，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其由來。當時我擔任臺北市教育局長，看到小學生將他們製作的燈籠掛在教室外面，於是，我便提議他們可以提燈遊行，帶著他們製作的燈籠到學校附近轉一轉，一邊轉一邊唱歌。第二年，便製作更大型的燈籠掛在車上，到學校附近繞一繞。第三年以後，我就邀起企業機關及廟宇贊助，坐大燈車從國父紀念館出發，後來文建會覺得很有意思，便接手辦理，因此燈會便越辦越大、越辦越漂亮。」

### (二) 街頭畫家

「街頭畫家起源於楊金叢、許水德任臺北市市長，我擔任臺北市教育局長任內。過去台北是不能在街頭作畫、賣畫的，但巴黎的聖母院外，就有許多畫家在作畫。楊金叢、許水德市長都贊成我所提出街頭畫的構想，並要求教育局規劃辦理，於是在我擔任臺北市教育局長時，首先允許畫家在建國高架橋下，及當時的省立博物館這兩個地方作畫，街頭畫家這個活動，方開始為社會大眾所接受，而形成都會特色。」

### (三) 假日表演廣場

假日表演廣場是源於將「通俗藝術精緻化、精緻藝術通俗化」的理念，精緻藝術應搬到外頭來表演給群眾欣賞，如將室內樂搬到戶外。我們的原則是往人多的地方去，這樣就有人欣賞了，表演結束後就離開，因此不會打擾市民生活。假日表演廣場也就愈來愈受社會的重視而蓬勃發展。

### 五、試辦學校造產

大學預算改為校務基金後，學校需自籌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經費。學校自籌經費的方式包括募款、推廣教育收入、學校造產、產學合作等。對於學校造產的概念，毛老師提出他的想法。

「我擔任臺東縣教育局長時，提出了『學校造產』的觀念，這是當時省政府的「實驗示範計畫」選了兩個台東縣的學校實施，如：學校種植木瓜，賣錢後的所得歸學校所有。以這類的方式，做為學校辦學的經費來源。」

### 六、師範教育改制

民國四十九年起，相當於高中程度的「師範學校」改制為「師範專科學校」，乃是近代中國師範教育史上的一項大事。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七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在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一日，將國內現有九所師範專科學校一次改為師範學院，更是創舉。改制後的師範學院將招收高中畢業生，修業四年後授予學士學位，以提昇國小師資水準。

當年行政院院會中，有關師專改制師範學院的決定，其要點如下：(1)世界先進國家，都規定必須大學畢業才有資格擔任小學教師。因此，決定將現有九所師範專科學校一次改為師範學院，畢業後授予學士學位。(2)改制後的師範學院招收高中畢業生，而且師範學院畢業的國小教師規定薪級跟中學教師相同。(3)制後的師範學院隸屬關係不變。仍是省立與市立。(4)改制後的各師範學院都可附設進修部，現職國小教師都可以進修，取得大學畢業資格。

師專改制為師範學院，旨在提昇國小師資之素質；要培養出健全的國民，就要先有優良的師資。所謂優良的師資，並不是具有高學位的「學」教育人罷了，而應該是具有兒童心理、輔導、國小課程、教學法等各方面基本專業知識，以及某方面專精的專門知識，並具有高度教育愛身心健全的學「教育」的人。

「我認為一位教師必須以愛心、關懷、尊重對待我們的學生。師範學校改制成師專時，我開始參與師範教育；師專改制成師院時，我剛好擔任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院長，參與師範教育中的多項改革。透過這些改革過程中，讓我的教育理念，得以落實其中。」

## 七、教育資料館的再造

國立教育資料館自民國四十五年五月一日成立以來，至今已有四十多年。毛老師接任館長，為適應現代化教育環境，在組織編制修訂不易的情況下，加強組織人員再造，配合終身學習要求。首先，設置電腦工作站（主機房），將機構資訊化；其次，以任務編組方式，加強人員進修，進行人員工作資訊化，改造工作進行相當順利。

全館同仁匯集共同智慧，研擬出教育資料館經營理念，作為教育資料館中長程發展之指導方針，該理念係以「建立虛擬教育資料庫」為目標，並以滿足讀者需求和推動教育進步為導向，為決策者、教學者、研究者、學習者以及社會大眾，提供有效的服務。在有限人力、經費的情況下，推動學習型組織，透過共同願景，人人發揮貢獻與服務精神，並訂定「建置全國網路教育資源中心中長程計畫」，已建立了中華民國教育資料展示中心、教學媒體服務中心、大陸教育圖書資料專室、交通安全資料展示中心、全國教育資訊中心 (ERIC,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 (MOD, Multimedia On Demand) 等，透過終身學習網路系統，提供各界教育資訊，教育資料館已成為我國重要的教育網路窗口之一，又配合教育部班班有電腦政策，將媒體資料經過「主題化、數位化、網路化」後，便利遠距地區教學者運用，此將造成教學革命性的影響。回想起帶領教育資料館的改革過程，毛老師告訴我們教育資料館「重生」的歷程。

「我剛接任資料館館長時，教育資料館主要的工作是錄影製作及剪報，我覺得這樣太消極了。我接任館長後，開始架設網站，當時館內沒資訊人才（只有一個技工是這方面的人才，他雖只是技工，但我讓他負責網站規劃，他因受到高度的尊重，便積極籌畫），我要求同仁在職進修、互相學習，我有時上網發信問候大家，如果同仁沒有打開電腦便不知道這件事。教育資料館可說是教育界第一個『行政電腦化』的組織（電算中心除外），將業務與現代科技結合，藉由『數位化』，教育資料館組織再生，彷彿有了新生命。」

## 八、出版中華民國教育年報

國立教育資料館自民國 88 年起，開始發行教育年報，發行教育年報的目的是希望在教育發展的過程中，留下年度中教育發展的種種事項。教育年報的敘寫，不

僅忠實的反映教育事實，也對教育現象客觀的給予論述，並提列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針對教育年報出版的理念，毛老師談到：

「原來十年出一本『教育年鑑』，但十年太久了，因為十年後很多東西都變成歷史了。所以，我就決定每年出一本教育年報，年報中除了『報導』的部分外，還有針對事件的「評論」，同時提出一些對未來的看法。教育年報已連續出刊四年，即時反應教育現象，提出反省與建議，對教育革新作了基礎的工作。」

### 九、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

民國八十四年教育部規劃了「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作為展望二十一世紀教育遠景的第一冊，目的在提供關切教育發展的有心人士有關教育行政部門教育改革的想法與作法，也向民眾回答我們教育改革該何去何從的問題。「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的原始圖像是民國八十三年六月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的主要結論，教育部據以組成九個專案小組，就所提較關鍵性的主題深入而密集的研討。稍後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與教育資料館，再敦請專家學者根據這些研討結論，併同各有關司處提供的初稿，彙整成這本報告書，並略作體裁與文字的潤飾。整本報告書分成十二章，除了第一章緒論在檢討現狀外，其他十一章分別就不同領域討論今後五、六年間教育發展的方向與策略，全書的經緯係以「紓解升學壓力」與「教育自由化」為主軸。

「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內容包含幼兒教育、國民教育、高中教育、技職教育、大學教育、社會教育、師資培育、體與衛生、訓育輔導及文教交流等方面，針對上述幾方面提出現階段所面臨的問題及因應策略；最後並提出對於彈性學制建立、教育機會更為均等、教學科技普遍應用及教學實習完全落實等教育遠景。除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外，教育部又公布中華民國身心障礙報告書及中華民國原住民教育報告書。

在「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教育報告書」方面，民國八十四年五月教育部召開全國身心障礙教育會議，是年十二月依會議的結論與建議，由教育研究委員會及國立教育資料館，邀請學者專家彙整提出了「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教育報告書」，宣示了政府辦理特殊教育的政策方針，內容包含：健全行政措施，提供特教服務；建立彈性學制，實現終身學習；平衡教師供需，提昇人員素質；改進鑑定評量，強化多元安置；調整特教課程，活潑教學方法；重視技職才藝，促進潛能發展；加強特殊體育，增進身心健康；鼓勵家長參與，提高教學效果；善用支援系統，增進教育成效；整建輔導網路，分享特教資訊等二十項。

在「中華民國原住民教育報告書」方面，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五年四月十七日至十九日舉辦「全國原住民教育會議」，期能建立原住民教育體制，提昇原住民教育品質，並期能不再只是消極地推動弱勢族群的補償教育，而更應重視多元文化的積極推展。「中華民國原住民教育報告書」是依據教育部施政方針，並參照「全國原住民教育會議」的結論及建議，由各相關司處研提實施策略，並交請教育研究委員會及國立教育資料館，邀請專家學者與相關原住民人士審閱潤飾。報告書中首先探溯原住民教育的發展背景，次則申述「發展」的理念，此乃教育部制定原住民教育政策的主軸，復就分從行政措施、課程教學、師資培育、人才培植、衛生保健、社會教育等六方面探討原住民教育發展的主要課題，並據以勾勒未來願景。

談及這幾本教育白皮書，毛老師提及這些白皮書對於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郭為藩部長很有理想，教育白皮書的規劃是郭部長希望可以留下教育的紀錄，讓教育理想與想法可以延續下去，因此由我帶領教育資料館與學者群，共同規劃與執筆，教育白皮書共有三本，分別是：普通教育、特殊教育及原住民教育。」

「當時教育改革同時在進行，面對教育改革有很多不同意見及反對聲浪。教育白皮書的影響力很大，後來許多的教育改革政策與教育白皮書的內容非常接近，郭部長之後的多位教育部長也都參考白皮書的內容進行教改，就像林清江部長規劃的終身教育一樣。」

「教育白皮書當中多是大原則的宣示，很多地方不敢寫的太過（力求中肯可行），如：『5年後班級平均人數30人以下』，因為班級人數平均少一人，經費就要增加很多。」

## 十、創造思考教學

早在柏拉圖時代，人類就已經重視創造力的價值；許多人類學家、歷史學家也都承認創造力對於歷史文化發展的貢獻。

要實施創造思考教育，要包含以下幾個要素：1.提供有利於創造的環境、2.發揮創造潛能、3.激發創造的慾望、4.培養創造的人格、5.發展創造思考技能、6.鼓勵創造行為及7.珍視創造成果。

教育工作所要努力的是營造一個「創造性的環境」，孕育創造者的創造動機、培養創造者的人格特質、發展創造者的思考技能，以助長創造行為。

創造力可藉由刻意的培養產生，且與人類長遠的福祉習習相關，藉著創造力，人類的文明才能不斷的成長及延續。因此，對於教育而言，學生創造力的激發與培養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有鑑於此，毛老師提出「創思教學」。

「我擔任高雄市教育局長時，開始推動「創造性體育教學」之實驗，擔任台北市教育局長時才推動『全面的創造思考教學』。創造思考教學當時遭到部分人士反對，主要原因是因為違反傳統，但日積月累到今天，創造思考教學已成為教學的一部分，現在雖然沒有人談創造思考教學，它已被普遍接受，接受多種答案、多種方式及變化，所以現在若不進行創造思考教學，反而會被批評為保守。」

「改革教學，要先改革考試方式，因為考試領導教學在所難免，要改變考試方式，老師才敢放手教，家長也才能接受教法的改變。創造思考教學要先從改變教師及家長的觀念，放棄標準答案做起。除了教育界外，企業界、政治界及行政領域都相當重視。」

「創造思考教學不只改變課程，也可以改變學生的情意。教師是改革的關鍵，要老師跟家長合作改革才能成功，考試方式的改變（在各科推動）使學生活潑、敢發問。」

「我擔任台北市立師範學院院長任內，學校成立全國唯一的『創造思考教育中心』，推動創造思考教學頗有成效。後來，我又成立了創造學會，並擔任了兩屆理事長。」

## 參、後記

.....

在二次訪問會談中，毛老師身體微恙，當談及教育仍可在其炯然有神的眼光與神情昂然的言談中，看到毛老師對教育的熱愛與關注。

毛老師不僅導引提攜諸多教育後輩，其為人誠懇謙和，為事理想堅持，為志高瞻遠矚，在教育領域中所播下的種子，均已日漸結實壯碩，是仁和的長者，也是影響深遠的教育家。

# 幼兒教育理論的實踐者——王靜珠

（訪問及資料整理：陳明終、邱鈺惠、蕭佑梅）

在一個晴朗的上午，我們將近三小時的車程後，由台北來到台中，當我們抵達王靜珠老師的家，感受到的是溫馨的氣氛、充實又忙碌。因為我們電話聯絡後王老師已有準備。在她的書桌上，已經擺滿了她出版的書，和一篇篇厚厚的論文及剪報，正是她數十年來在學報、年刊及報紙上曾經發表過百餘篇的文章。我們頓時間，深深感受到被譽為台灣「幼教之母」美名的教授，的確彰顯了她對幼教工作的熱誠，以及對台灣幼兒教育的貢獻。

## 壹、生平簡介

王靜珠先生，祖籍河北省饒陽縣，民國十三年七月十日出生於山西省汾陽縣。

### 學經歷

民國十九年：入山西省汾陽縣崇德女子小學

民國二十六年：入陝西省漢中正德小學

民國二十八年：陝西省漢中正德小學畢業

民國三十四年：國立西北師範學院附中畢業

民國三十八年：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

民國四十年：應聘實習教師在台灣省立台中師範學校

民國四十一年：應聘於台灣省立台中師範學校教師至民國四十九年

民國四十九年：應聘於改制後的台灣省立台中師範專科學校

民國五十一年：應聘省立台中師範專科學校講師

民國五十四年：應聘省立台中師範專科學校副教授

- 民國五十九年：應聘省立台中師範專科學校教授
- 民國六十三年：榮獲“台中市優良教師獎”及“模範婦女獎”
- 民國六十七年：榮獲教育廳頒“推行國語二十年有功人員獎”
- 民國六十九年：列入台灣省教育廳「杏壇芬芳錄」優良教師
- 民國六十九年：當選台中市好人好事代表
- 民國六十九年：榮獲全國教育學術團體選為“優良教育事蹟獎”
- 民國六十九年：赴美國加州聖荷西大學教育研究所幼兒教育專題研究
- 民國七十年：應聘東海大學社會系兼任教授
- 民國七十一年：榮獲教育部張雪門先生“幼兒教育研究獎”受獎著作「幼稚教育」
- 民國七十一年：榮獲教育部頒發資深優良教育人員“八德獎”
- 民國七十三年：榮獲中國國民黨頒“忠黨愛國獎”
- 民國七十三年：榮獲全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頒發“優良學術著作獎”（木鐸獎）受獎著作「幼稚教育」
- 民國七十四年：榮獲行政院頒發一等服務獎章
- 民國七十四年：榮獲台灣省政府社會處頒“推行兒童福利有功人員獎”
- 民國七十六年：應聘於改制後的國立台中師範學院教授兼幼兒教育師資科及幼兒教育中心主任
- 民國七十七年：榮獲“台中市特殊優良教師獎”
- 民國七十七年：榮獲教育廳“教學研究教授甲等獎”
- 民國七十八年：榮獲“教育部大學暨獨立學院教學特優教師獎”
- 民國七十八年：八月自國立台中師範學院退休，退休後繼續兼課。
- 民國八十年：榮列社會科學人才名錄
- 民國八十一年：榮獲 OMEP-Hongkong Trist Conference “專題演講獎”
- 民國八十二年：榮獲財團法人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護幼楷模獎”
- 民國八十五年：榮獲教育部張雪門先生“幼兒教育研究獎”受獎著作「幼稚園行政」
- 民國八十六年：榮列中華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溫馨一百芬芳錄」
- 民國八十七年：應聘於私立中台醫護技術學院兼任教授
- 民國八十七年：榮獲教育部張雪門先生“幼兒教育研究獎”受獎著作「全方位的幼兒教育」
- 民國八十七年：榮獲中華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護幼楷模獎”
- 民國八十八年：榮獲香港婦女基金會主辦幼兒教育家「陳鶴琴·陶行之·張雪門」教育理論及實踐研討會“講座獎”



民國八十九年：榮獲中國幼稚教育學會“熱心服務獎”

民國九十年：榮獲教育部第四屆“教育行政研究發展獎”

## 貳、重要事蹟

### 一、熱誠平實及勤勞儉樸的人生觀

王靜珠老師生長在基督教家庭，由於耳濡目染父母熱心奉獻、無私助人的精神，從小就懂得「施比受更有福」。時時不忘與他人分享，至今仍不改這樣的性情，常常爲了助人忽略自己。王靜珠老師告訴我們說：

「我出生在山西省的汾陽縣，祖籍河北省饒陽縣，但卻沒有回過老家。父親是位牧師，常到各地鄉間去傳道。大陸的西北常鬧旱災，許多家庭窮困，孩子連溫飽都成問題，更談不到受教育。不少的女孩被賣掉做富人家的丫頭，是常見的事。我父親常到陝北綏德一帶傳道，就發現許多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都沒有機會受教育，他想盡辦法，每次都帶幾個女孩子回到汾陽，送他們去讀書，記得學護士的最多，小時候家裡護士阿姨好多好多。從小雖家境小康，母親鼓勵勤做家事，養成勤儉、樸實的生活習慣。對於吃、住從不講究，回想多年前畢業的學生見到我時都會說，老師你爲甚麼老穿那幾件衣服。記得有一班學生，在他們畢業時送我一套旗袍。有一天鍾情旗袍店的老闆，撥電話來通知我，要我去量身做旗袍，告訴我布已買好，工資也付了，這件旗袍是你畢業班的學生們送給你的禮物。他們還說因爲送老師布料，她會轉送人，所以我們請她去做旗袍。這套旗袍非常漂亮，至今還掛在衣櫥中，可惜因爲長胖而穿不下了，我非常珍惜這份禮物，因爲那是代表我可愛學生們的愛心。每當我看到這套旗袍就會喚起許多的回憶，非常想念他們。」

### 二、對長輩、親友及學生的照顧無微不至

王老師對求學時代的師長非常尊敬，常常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有多位作古的教授，晚年生活都曾得到王老師的關心與照顧，談到與長輩的相處，王老師說：

「當時中師的崔蘊蘭教授慈祥仗義，就像我的父親一般熱心助人。很不幸他在民國六十九年車禍過世，留下患有心臟病和糖尿病的崔老夫人，孤苦無依，我習慣上稱他爲崔大娘，並且常常去探望她，定期陪她上醫院看病。有好幾次三更半夜崔老太太心臟病發作，我騎著老舊的摩托車從家裡趕去，爲他老人家掛急診。住院期間爲她服侍湯藥，準備食物等等。後來老太太病情嚴重，辭世之時爲她安排了後

事，還聯絡了一些崔老師的故舊及學生為崔大娘送葬。」

除了對長輩的細心關照外，王老師在她五十多年的教學生涯裡，對於學生的慈愛也是不曾間斷：

「四十多年前，中師普師科有一位學生在畢業考前突然高燒生病，我騎著破腳踏車送她到醫院急診，第二天才順利的趕上了畢業考試。這位同學品學兼優，畢業後保送師大，師大畢業後赴美深造，修得數學博士，目前仍任教於美國大學，我永遠分享她的成就。還有一次，學生宿舍後面曬的制服被人割破，十多位同學第二天升旗就沒有制服好換，訓導處通知導師，我就立刻將割破的十多件衣服全部收過來，立刻帶回家，因為我有縫衣機很快的一件一件縫好，又送回學生宿舍，第二天升旗他們都有制服可穿，內心深感高興。」

「那些年中師有各國的僑生來台求學，遇到寒暑假不回家的時候常會到我家來住。擔任導師責任重大，學生生病我會騎車載他們去看病，畢業後升學進修我幫他們繳學費、伙食費，這都是常有的事。一九七八年在一次大專院校教授團訪問菲律賓時，我的僑生陳玲玲預備了四十串茉莉鮮花花環迎接全團老師，他高興的對大家說：『老師媽媽來了』。學生不喊我王主任，卻喊王媽媽聽來很有趣。民國五十八年起我有機會擔任中師專六三級丁班五年的導師，與班上同學們相處情感深厚。班上有一位交男朋友心理受創的學生，不但代她填寫服務縣市的志願，送她到國小去報到，並請校長多予照顧，正因為那所學校的校長也是我的學生。才使她能順利的服務國小三十年，目前已退休。但是這位學生的心理始終未能正常，三十多年來我一直輔導她，收到她數百封的信，她在信中常說只有導師才接納她，做導師是有責任的，所以我只有不斷的覆信安撫她。」

### 三、熱心協助慈幼敬老的社會救助工作數十年

王老師除了認真授課，照料學生的生活作息外，也積極帶領學生參與社會公益事業，鼓勵學生勇於幫助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培養學生大愛大智的慈善觀念。最令她難忘的是帶領中師學生「仁愛工作隊」專訪高雄縣六龜鄉私立基督教山地育幼院的故事：

「謝東閔先生任台灣省主席（民國61年至民國67年）時，台灣的經濟仍在萌芽時期。謝主席提出『小康計畫』主張『家庭即工廠』。同時在各學校也組成『仁愛工作隊』，鼓勵學生多了解社會與發揮愛心。當時中師專的『仁愛工作隊』是由林王椅和王木榮兩位同學，先後擔任兩屆的隊長，由我擔任指導老師。我們先由學校師生共同努力捐募衣物，非常感人，很快的一箱箱舊衣物經過整理後就寄往育幼

院、老人院。記得我曾帶中師專的『仁愛工作隊』到六龜鄉楊煦牧師的『山地育幼院』，雖然僅是一些文具、玩具以及舊衣服，但都是表現了中師專師生的愛心。記得有一次到南投一所老人院時，我們發慰問金給老人，老人涕淚交織，我們同學也都被感動的落淚，這一幕幕的情景永遠令人難忘。我們的『仁愛工作隊』被選為中師專最好的社團，民國六十九年我也榮幸當選了台中市好人好事代表。」

「除此外，我又想起九二一大地震，家中的擺飾稍有損壞，但是顧不得去檢查就跑出家門，只擔心隔壁一位八十七歲患有心臟病孤苦無依的老婦人，她是我的大學同學，也許這是從小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使我樂於助人而無所求。當九一一恐怖份子襲擊美國紐約世貿大樓時，在大樓中八十八層上班的長子幸運的逃生，毫髮無傷，里鄰親友們都說是祖上有德。」

#### 四、熱心輔導中師學生參加國語文競賽

王老師在學校擔任教育課程，但是她卻負責指導學校學生的國語文競賽工作；其原因是因為她自己擔任導師班的學生，參加了全省國語文競賽，榮獲師範生演講組第一名，她自己的兒子也獲得全省高中生演說組第一名，所以參加演說、朗讀和作文的學生多來找王老師指導。最令她高興的是多年由她指導的學生，畢業後很多位有能力參加校長、主任或教育局國語指導員的甄試順利入選，正是因為他們在學校就練得好口才。王老師告訴我們說：

「過去帶領師範、師專的學生參加國語文競賽，不但在學校指導，課餘時還把他們全帶到我家裡來，當我在廚房為他們準備餐點時，他們也跟我到廚房裡朗讀四書，就是這樣爭取時間，認真訓練。在多次的比賽中，贏得不少的師範生團體及個人冠軍。很榮幸我在民國六十七年榮獲教育廳頒發“推行國語二十年有功人員獎”。其後也獲得全國教育學術團體“優良教育事蹟獎”。」

#### 五、旅美來鴻感戴恩師 杏壇史頁添佳篇

一位目前在美國擔任醫生的留學生黃鴻明特地從千里迢迢的異地寄來一封信，向教育廳「杏壇芬芳錄」編輯小組推薦他的恩師—省立台中師專教授王靜珠老師，愛護學生、幫助學生的情形。黃鴻明說：「王老師自任教以來，即以金錢資助學生，並代學生找工作，一一解決學生的困難。」（節錄民國六十九年「杏壇芬芳錄」第七十三頁）

正因為王老師對學生如此的關愛，與她高度的教學熱誠，使王老師在民國六十九年榮列「杏壇芬芳錄」。最使她難忘的是，國畫大師呂佛庭教授為她作詩慶賀，

詩的內容是這樣：「桃李滿園手自栽，春風化雨時深培，繁花碩果人稱羨，錄入芬芳應占魁。」這首詩是由呂教授親寫並裱成字畫贈送，詩的旁白還有一行小字是這樣寫的「王靜珠教授溫良恭儉，品端學粹，春風化雨，教澤普被，名列芬芳與有榮焉。」王老師又說，她的學生李威熊教授，當時任國立政治大學國文系系主任為慶賀王老師榮列杏壇芬芳錄，特撰文並題詩道賀，這首詩是這樣寫的「春風沐雨忘年華，桃李徧栽萬萬千；絳帳流芳堪足範，杏壇史頁添佳篇。」

### 六、愉快教學生涯的開始在中師

從大陸來台後，王老師在當時的台中師範學校獲得第一次任教的機會，她以無比興奮的口吻說：「能得到省立台中師範學校（現改制為台中師範學院）的這一張聘書，將是我開始教學工作最大的心願。」

「民國四十一年六月，有一天中午，當時台中師範學校的教務主任，也是我就讀師大教育系的測驗統計學老師侯璠教授，侯主任頂著大太陽，騎著中古的腳踏車，趕到我家告訴我有機會在台中師範學校任教，並要接任畢業班的『教育行政』。我在北平師範大學念書時，選修的是『實驗心理組』，現在要改教『教育行政』，使我非常緊張，擔心自己無法勝任，但老師告訴我這是很好的機會千萬要把握。當時台中師範學校的校長是黃金鰲先生，他是我就讀北平師大教育系時的訓導長，當我到校長室拜訪他時，黃校長也鼓勵我機會難得要我試試看。就這樣一試，教了十年教育行政課程。為了教好這門課，勤跑書局大量購買行政法規的書籍。潛心研究『教育行政』課程的精義，教育行政這門課程，主要的教育目的在於教導學生有正確的行政觀念，學得科學的處事方法和熱忱的服務精神。我常常鼓勵學生要努力用功，畢業後要盡心盡力在國民小學服務，同時不要疏忽充實自己，有機會還可以參加高普考，多一個發揮潛能的機會參與教育行政工作。有不少的師範學生服務期滿後，繼續到大學深造，或者轉入教育行政機關工作，都有非常傑出的表現。」

「民國四十九年教育廳為提升師範生素質，特將師範學校改制為師範專科學校，省立台中師範學校是第一所改制為師專的學校，當時由教育廳第四科科長朱匯森先生兼任台中師範專科學校校長，同時鼓勵全體教師齊手編寫師專教科書。朱校長接掌中師是由民國四十九年至民國五十六年，那段日子中學校充滿濃厚的研究氣氛，一本本的師專用書都出版了，民國五十一年我寫的第一本『國民小學行政』也出版了。」

### 七、寫書的動機和動力

民國四十八年由於教育部重視師專學生修習「學前教育」課程，特在師專開設「幼稚教育」課程一科，邀請王靜珠老師編寫「幼稚教育課程綱要」，由於編寫「幼稚

教育課程綱要」使王老師一生五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有四十年都致力在幼兒教育。

「當我編寫『幼稚教育課程綱要』後，就預備寫一本幼稚教育的書。為求立論正確、內容充實，曾到北投請教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的幼教專家張雪門教授。張教授在北平時是北師大的家政系教授，當時我是教育系的學生，雖然沒有機會上過張老師的課，當我請教張老師時，張老師很高興的給我好多的指導與鼓勵，也賜贈許多幼稚教育相關的資料。在幼稚教育書稿付印前曾得到張老師審閱指正全稿，並惠賜序文。嗣後又常以幼兒教育的問題請教，得老師殷切教誨，耳提面命，深感榮幸而沒齒難忘。民國六十二年四月雪門師臥病和平醫院，趕去探望時師已昏迷，然眉宇間仍流露著清和剛毅的神情，緊握老師的手不禁眼淚滿眶，不意竟是永別。每憶起雪門師以翳弱的目力，藉著一塊邊緣殘破的放大鏡，上下移動著指正這數十萬字的『幼稚教育』時，內心就隱隱作痛，感愧萬分。雪門師一生盡瘁幼教，晚年常說：『我老了！希望你們能為我國荒蕪的幼教努力，多為下一代的兒童謀幸福』。我除謹遵師志為幼兒教育努力外，並不斷的修訂『幼稚教育』一書內容。目前已由第一版的三百八十五頁，增訂至七百餘頁，第十版三印。」

王老師的「幼稚教育」曾於民國七十一年榮獲教育部“張雪門先生幼兒教育研究獎”。民國七十三年榮獲全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頒發“優良學術著作獎”（木鐸獎）。王老師退休後仍不斷的筆耕，民國八十一年再編寫「幼稚園行政」，此書於民國八十五年也榮獲教育部“張雪門先生幼兒教育研究獎”。民國八十七年由世一書局出版「獻上育兒妙策」及「全方位幼兒教育」，其中「全方位幼兒教育」也榮獲教育部“張雪門先生幼兒教育研究獎”。王老師獲得的獎金全部捐獻幼兒教育事業。民國八十七年王老師應聘私立中台醫護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科，講授「托育機構行政管理與實務」一科，由於該科缺乏教科書可供學生參考，王老師遂積極蒐集資料，編寫講義，民國八十九年王老師又由華騰書局出版「托育機構行政管理與實務」一書，民國九十一年已增訂三版再印。王老師說：「寫書不為甚麼，只為上課時有新穎的資料提供學生」。

王老師特別告訴我們，她在民國四十九年至五十四年間曾以幼子喬生璵的生長發展，做了詳實的觀察及記錄，費時六年於民國五十四年編寫「幼稚教育」一書問世。該書供師專、師院學生及幼兒教師參考與閱讀，至今已增訂至第十版三印，先後出書六萬五千餘冊。由於王老師的書是以自己的兒子做實驗，耗時六年才完成。寫書的動機是希望以自己育兒的經驗，用分析、比較等方法，印證中外幼兒教育家，對幼兒教育理論之主張有何不同。其用心之苦，無人能出其右。

王老師的書暢銷國內外。有留學生曾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中文部見到王老師的數本著作，早年僑委會也曾多次購書送海外僑校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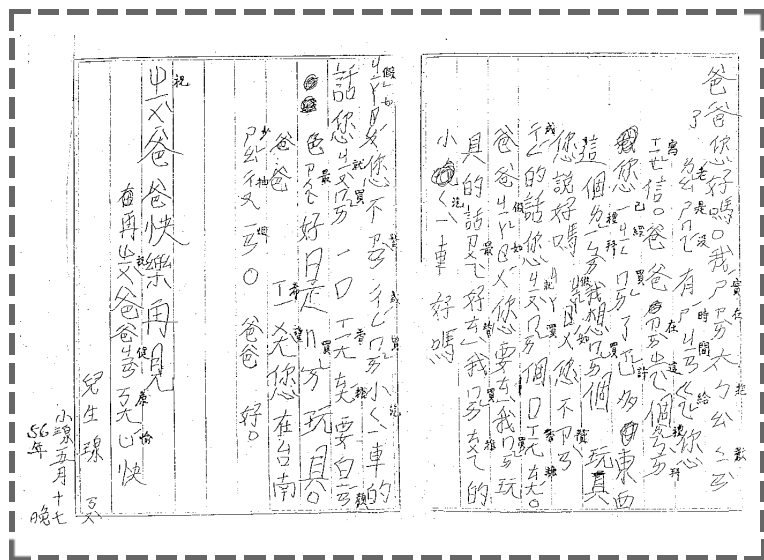
### 八、接受幼兒語文教育實驗的喬生琮

王老師鑽研幼兒教育多年，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是將次子的出生與成長作成記錄，並收錄於民國五十四年出版的「幼稚教育」書中。有關語文實驗的故事，王老師特別興奮的告訴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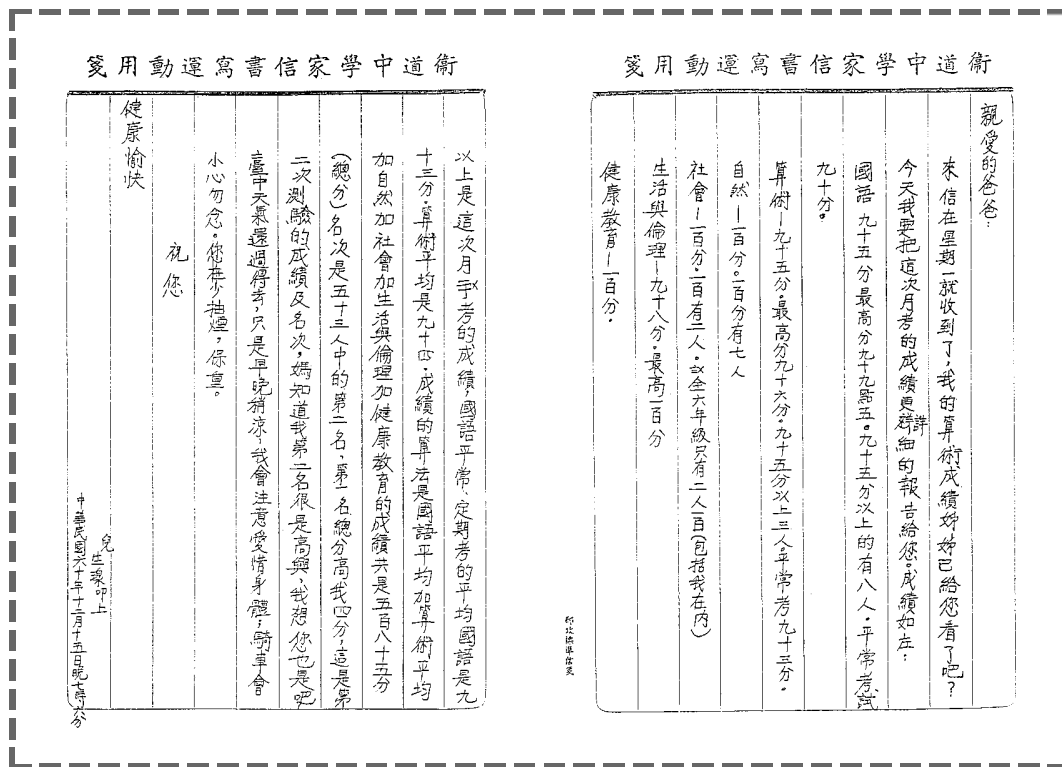
「喬生琮於民國四十九年出生在省立台中醫院，那一年我已是三十七歲的高齡產婦。記得孩子出生後，我立刻向護士小姐要孩子的身高、體重、頭圍等資料，當時護士小姐很納悶的看我，從來沒有這麼囉嗦的媽媽，要這些資料做甚麼？其實我所以決心勇敢懷孕生子，正是因為國內有關幼兒教育的資料較少，而能參考的資料多為外國學者的研究結果。從那時起我開始每天觀察記錄孩子生長發育的情形，經過六年的時光，將所有的資料整理後，編列『幼稚教育』書內，還為他拍了一百多張的幻燈片。這些可貴的寫實記錄，正是我教學最能印證一個人一生中，幼兒時期的發展與輔導是最重要的時期，而早期的發展也充分的奠定了將來發展的基礎。」

王老師打開了她厚厚的卷宗夾，裡面存放的都是幼子生長的記錄。王老師告訴我們，在喬生琮三歲時就開始了語文實驗。其實工作很簡單，每天她利用閒暇唸國語日報的「看圖說話」，從不計較孩子能聽懂多少，只是鼓勵孩子樂意聽，有的時候也唸一些簡單的小故事。到了六歲開始學注音符號，就把唸故事的工作交給孩子。就在這樣的誘導下，喬生琮非常喜歡閱讀。在他二年級時又增加一項工作，就是給他在台南服務的父親寫信。王老師從資料夾中取出了兩封信，分別是喬生琮七歲和十一歲時寫的，王老師希望我們把信唸出來與她分享。這兩封信依原信全錄，王老師說她準備將喬生琮生長的故事，再寫一本書，並將他的許多原始資料照像列印在書內。

喬生琮七歲時寫給父親的信，信中把不會寫的國字均以注音符號代替，看上去非常有趣。信上注音符號旁的國字是他父親看信時加註的。



喬生琮十一歲時寫給父親的信，這封信中的注音符號已經很少了。



看完了這兩封信的內容，令人驚奇的是十一歲孩子的敘事與分析能力，竟是如此的優異，且文詞流暢，條理清晰。

王老師告訴我們，四十多年來她一直訂閱國語日報，不但她的三個孩子每天都搶著看國語日報，就連王老師個人也由國語日報的國民教育版，引導了她編書的正確方向。王老師又告訴我們說：

「喬生琮在國小時代，曾多次投稿國語日報，也多次遭到退稿，但他從不灰心的繼續投稿，終於以『歡迎七虎隊歸國』一文入選，之後他陸續投稿，幸運的被譽為『小作家』。在國中、高中及大學時期，屢次參加國語文競賽、演說、朗讀和作文都獲得優勝。民國七十四年喬生琮在『金門列嶼島』服役，退役前夕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數千字的『列嶼札記』一文，還得到當時國防部長蔣仲苓先生的召見與獎勵。由喬生琮寫作能力的表現，已使我肯定重視兒童時期閱讀、寫作能力的培養，是育兒生長輔導工作中，非常重要的課題。」

## 九、幼兒教育理論與實踐

談到王老師最專長的幼兒教育及幼兒教養問題，王老師認為所有知識與技術的

教導，都不及生活教育重要；而生活教育的第一步，便是從孩子幼年時期開始，建立起良好的習慣。王老師特別強調幼兒的生活規範是父母及教師共同的責任：

「幼稚園裡最重要的是生活規範教育，不少的家長和教師將『放任』誤認為『開放』。幼稚園固然應當著重在主題教學開放的教育，但卻不可忽略孩子最基本的生活習慣。培養幼兒的生活習慣必須堅持原則，例如我的三個小孩，都是從八個月左右開始附加食物，在孩子吃飯的時候一定要坐在嬰兒椅上吃，離開坐位就沒有東西吃。孩子一旦養成習慣，只要將食物往椅子上一擺他就很高興的開始進食；如果父母親或保姆不堅持孩子吃飯的習慣，那就很容易變成遊戲式的吃法—媽媽端著飯滿屋子追著餵。所以最要緊的是，掌握教養孩子的關鍵點，幫助孩子建立習慣或能力。唯有把握關鍵年齡培養習慣才容易成功。」

王老師特別強調孩子社會行為關鍵期的重要性，教師及父母首先應當協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社會生活行為，對於指導幼兒適應社會生活，王老師在「幼兒社會行為的輔導」這篇文章裡提出幾項要點：(一)協助建立自立與自尊；(二)培養公德心；(三)培養自信力；(四)輔導領袖能力；(五)訓練禮貌態度；(六)幼兒「社會化」行為的輔導。王先生感慨的說：

「今天我們的教育就是缺少了這些教導，在『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時，把國民小學『生活與倫理』課程取消了，社會如此脫序，正是疏忽了學校道德教育。我們知道法律只能約束人的行為，卻無法約束人的心和意念。所以加強道德教育是今日各級學校刻不容緩的任務。社會行為的關鍵期是在嬰幼兒階段，在幼兒發展的過程中，最重要的輔導，就是要幼兒能適應他所生存的環境，使他的飲食起居合乎社會的習慣，行為動作合乎社會的標準，待人接物能保持適當的態度，然後幼兒才能獲得美滿的團體生活。父母師長如果能在幼兒期給予孩子適當的社會行為輔導，這樣才能奠定幼兒身心健康的基礎。」

### 十、家庭教育的重要 首在親職教育的推行

王老師認為當前教育的缺失在於家庭教育的疏忽，因此各級學校首應加強家庭教育的輔導。欲加強家庭教育的功能，首應由加強親職教育做起。推行親職教育最適當的場所是幼稚園和托兒所，最適當的對象是幼兒的父母。更具體的說加強家庭教育最容易展現效果的方式，便是「親職教育」的實踐。關於親職教育的定義，早年王老師在接受中華日報訪問時曾提及：「親職教育的『親』，就是父母親，『職』就是責任；父母親責任的教育是親職教育。教育下一代，不單是爸爸或媽媽一個人的責任，而是兩個人共同的責任；在父母言行一致、態度公正的指導下，才能教出



健康的下一代。」

由於幼兒早期的發展，是幼兒日後發展的基礎，幼兒期的教育被視為人生各階段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而父母親正是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因此王老師認為父母親在培養孩子人格發展的過程中應注意幾項原則：

「父母對幼兒的人格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所有的父母必須時時注意到『統一原則』，就是父母親共同為孩子建立教導的原則。其次是『慈愛關懷原則』，嚴厲中不忘慈愛，教誨時不忘關懷，恩威並濟是很要緊的。三是『行動原則』，父母言行一致，身教重於言教，多和孩子接觸、多陪他們談話。最後是『公平原則』，父母的態度公正，不但能減少孩子嫉妒行為的發生，更能促進孩子的正義感與責任感。」

王老師在平時授課及各種研習會中，特別提醒家長，父母親的行為正是孩子模仿認同的對象，若要孩子品德良好，惟有父母親以身作則，才能收到身教的效果。王老師語重心長的說：

「父母親生活行為的表現，就是給孩子的教育，因此父母的一言一行、思想觀念都是孩子學習的模式，我們絕不能把教育孩子的責任，全推給學校和社會。父母才是孩子最早的導師。如果每位父母都能認清自己的責任，相信社會會減少許多的犯罪事件和暴戾風氣。」

## 十一、為幼兒教育師資的培育奉獻心力

為了提昇幼兒教育品質，王老師多年來在幼教師資的培育和提昇方面，投入了無數的心血與努力。多年來的研究與實務經驗，讓王老師對我國幼兒教育的過去與現在瞭如指掌：

「台灣光復後，各師範學校設置三年制幼稚教育師資科，培養幼稚園教師。民國四十九年師範學校改制為『師範專科學校』，使得幼師科逐年停辦最後就中斷了，結果幼稚園師資也跟著減少。到了民國六十年，當時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發現問題很嚴重，為了彌補幼稚園師資的不足，於是就在省立嘉義家職成立幼兒教育科，招收國民中學畢業生，念了三年之後就可以取得合格幼稚園教師的資格。後來由於受限於民國六十八年頒布的『師範教育法』第三條規定：『幼稚園師資必須由師範專科學校培養』，所以省立嘉義家職的幼兒教育科，在民國七十二年改為幼兒保育科，只負責培養托兒所保育員，不再負責幼稚園師資的培養。但是幼稚園師資還是缺乏，民國六十六年起教育廳便在師專辦理幼稚園教師進修班，民國六十七年又開辦了托兒所保育員進修班，專門招收那些幼稚園及托兒所，還沒取得正式保育員

資格的現任教師和保育員，讓他們利用選修學分的方式取得正式資格。接著又在五所師專成立二年制幼稚教育師資科的暑期部或夜間部，讓幼稚園及托兒所教師可以進修。由於老師們在進修期間，一方面要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兼顧進修的學業，負擔實在太重了。所以對於培養優良的幼教師資而言，光靠著進修的制度，實在不是理想的方式，更非長久之計。在那段期間可以說是幼稚教育師資培育的摧折期。」

有鑑於當時缺乏專為培育幼兒教育師資的機構，僅靠調訓現任教師的方式，非師資培育的長久之計，因此王老師積極推動成立「二年制幼兒教育師資科」：

「民國七十年，由我個人以專案申請的『陳情書』，請求教育部准許設立培養幼稚園教師的『二年制幼兒教育師資科』。在陳情書中建議設立日間部二年制幼師科，主要目的有兩個：一是培養優秀的幼教師資，其次就是為幼兒保育科畢業生提供深造的機會。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匯森先生認為的確有其需要。因此在七十二學年度開始，由台中師專、台北市立師專、台北師專、及嘉義師專等四所學校，試辦日間部二年制幼稚教育師資科。只是沒有想到第一屆招收的學生當中，百分之八十是普通高中畢業的，剩下百分之二十的高職學生當中，竟然沒有一人是從幼兒保育科畢業的學生，與當初希望提供幼兒保育科畢業生深造機會的目的可說完全相背。因為這個緣故，在教育廳的補助之下我花了兩年的時間完成『二年制日間部幼兒教育師資科制度之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我們才發現原來幼兒保育科的學生過去在學三年期間，主要學的是幼兒保育課程，所以在英文、數學等這些科目的實力遠不及一般的高中畢業生，造成幼兒保育科畢業生參加幼師科考試，很難和高中畢業生競爭。為了保障幼兒保育科學生的就學機會，從民國七十八年度起，各師院二年制幼兒教育師資科才分為甲、乙兩類。甲類是招收高中高職畢業生；乙類則招收幼保科或綜合家政科畢業生，這樣才保障了幼兒保育科畢業生進入幼二專繼續深造的機會。整個幼兒教育師資科從日間部慢慢擴展到進修部，以暑期或夜間來上課，開始大量的培養幼稚園合格教師，這對於提昇幼稚園師資有非常大的貢獻。」

經過一番努力後設立的「二年制幼兒教育師資科」，雖然培育了不少優秀的幼稚園教師，但在提高幼教師資學歷的前提下，於民國八十一年停辦，對此王老師難掩失望的說道：

「『二年制幼兒教育師資科』在民國八十一年度停辦，我努力了這麼多年，才爭取到這個讓幼兒保育科畢業生繼續深造的機會，就這樣消失了，實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為了師資的培育，我不知道呼籲了多久，目的就是強調師資培育的重要。」

基於對幼兒教育師資問題的重視，王老師不斷為文呼籲，期望各界共同體認，

培養優良幼教師資的重要，特別是在民國九十年「落實我國幼兒教育師資培育制度之我見」這篇獲得教育部“第四屆教育行政研究發展甲等獎”的文章中，王老師詳細闡述了我國幼教師資培育的演進、重要性及可行途徑。

## 十二、走遍中部的幼稚園、托兒所落實輔導

王老師對國內幼稚園、托兒所發展非常關切。除了學術的理論研究外，也投入實務工作。她馬不停蹄的到各園所，實地進行訪視與輔導，協助解決教學與行政的困難問題，因此幼稚園和托兒所都非常樂意接受她的輔導。

「惟有深入幼稚園、托兒所，才能真正了解幼稚園、托兒所的狀況。在訪問的過程中，常常發現最大的問題在於師資水平不夠，園舍建築不合標準，加以負責人的理念偏差，以致不少的幼稚園不能通過教育局的立案手續。記得『幼兒教育基金會』理事長施金池先生曾要我做一個『未立案幼稚園原因調查之研究』，一般而言，未立案幼稚園多半不願接受評鑑和訪視，但是經我打電話告訴這些未立案幼稚園的園長，強調我之所以來訪視，是希望了解你們為甚麼不能立案，我最大的願望是要幫助你們立案。這個專案在台中師院張菡育教授全力參與協助主持，和未立案幼稚園的通力合作下，使專案能順利的完成，這項落實的輔導工作，對於今日未立案幼稚園進行立案工作的推動，提供了很大的貢獻。」

## 十三、熱心兒童福利保育事業 憂心社會脫序現狀

王老師除了師院教學工作外，也積極投入內政部兒童福利工作，民國六十二年起擔任台灣省社會處「兒童福利促進委員會」委員，策劃托兒所保育員的培育及進修工作。民國六十七年起社會處為提高托兒所保育人員素質，曾委託省立台中師專辦理「托兒所教保人員進修班（簡稱托進班）」，培育托兒所保育員，托進班畢業後，可考入師專二年制幼兒教育師資科。在台灣省社會處以五年長期計畫下，全省師專參與托進班保育員進修業務，五年間共培養五千餘位保育員，藉以提升保育員素養，這些托進班及二專畢業的保育員至今仍服務於托兒所，對我國托兒保育工作的貢獻深受肯定。「托進班」的業務在羅人杰校長指導下，全部培訓業務均由王老師負責，王老師於民國七十四年榮獲台灣省政府社會處頒發“推行兒童福利有功人員獎”。

民國七十三年擔任中部兒童之家「小甜甜諮詢中心」顧問，定時在中華日報「小甜甜信箱」專欄發表，目前已寫了百篇以上的文章，內容多為家庭主婦、幼兒教師提供兒童身心問題輔導之參考資料，頗獲社會人士讚許。

民國七十七年獲「財團法人中華福利基金會台中家扶中心」，榮聘為「兒童專業諮詢委員會」委員。協助家扶中心策劃優生保健及兒童受虐，處理雛妓輔導等工作。

由於王老師熱心參與家扶中心的慈善工作，民國八十二年及八十七年兩次榮獲財團法人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護幼楷模獎”。

王老師在民國八十八年曾撰寫「導正社會風氣首重規範電視媒體」一文，提出關於媒體對社會風氣與道德教育的影響，她非常感慨的說：

「我們規範提昇電視媒體的工作，真是刻不容緩。電視新聞的內容，看不到振興國力、挽救社會亂象的有效政策。我們迫切的希望電視的畫面，媒體記者們須要自我規範，凡是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的畫面，不應當過度拍攝，重覆播放，因為不但對社會造成不良的示範，直接影響我們的教育，尤其是對幼兒教育。」

「矯正社會不良風尚，最重要的是家庭、學校和社會三方面的合作，學校方面尤應加強學生的法治教育。我曾在美國參觀一所小學附設幼稚園，正好趕上他們午餐，小朋友都輕輕的拿出自己帶來的飯盒，吃完後立刻舉手，我看到一個個小朋友都在舉手，才知道是他們吃完了需要告訴老師，已做好清潔桌面的工作。當老師點頭，小朋友才離開坐位，走向遊戲場，這是訓練小朋友守法重紀的開始，養成自己負責任的態度。如果人人都有守法觀念，相信我們的社會就會安和樂利了。」

### 十四、對目前教育改革的建議

教育改革工作自民國八十五年就啟動，但是多年來因為缺乏完整的配套措施。教育改革工作從制度、課程及教科書等，均呈現了空前未有的混亂。王老師提出她的看法：

「幼稚園和國民小學銜接應先由課程設計做起，近年來不少的學者研究『幼小銜接』專題，我曾在民國七十七年中師院幼教系的『幼教年刊』第二期，發表『幼兒教育與國民小學教育銜接之探討』一文。如果幼兒教育系的課程能重新設計，即由目前四歲至六歲的幼兒階段課程，改為四歲至八歲兒童階段的課程。換言之，幼兒教育系可培養四歲至八歲兒童的師資，幼兒教育系畢業後，可任由自己興趣，選擇教學幼稚園或國民小學低年級，由師資的自然銜接是比較合適的辦法。我認為幼稚園收托幼兒的年齡不宜下降至三歲，因為三歲幼兒的生活訓練適合在托兒所。如果能培養幼兒教育系學生教學國小低年級，不但使幼稚園和國民小學低年級課程有良好的銜接，也因此提高了幼教系學生的學習願望，相信可收雙贏的效果。」

綜觀世界許多的國家，托兒所和幼稚園的設立，都是「公立」的比「私立」的

多，而我國目前托兒所和幼稚園的設立，卻是「私立」比「公立」的多。因此政府的政令多難按期推行，自然影響幼兒教育品質。王老師認為國民教育向下延伸，首先應由普設公立幼稚園做起。

「我國獨立設施之公立幼稚園，全國僅有十五所，而目前所指之公立幼稚園，主要包括國民小學附設。為使師範學院幼兒教育系畢業學生，能適才適用，且久於其職，刻不容緩的政策，便是普設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普設國民小學附設之幼稚園，不但鼓勵優秀青年人投入幼教行列，更積極的產生幼兒教育培養健全幼兒的正面教育功能，其原因有三：

1. 公立幼稚園擁有優質的教師可以新穎的教法、正確的理念進行教學，無形中提昇幼兒教育的品質。
2. 公立幼稚園設在國民小學學區內便於幼兒家長接送，也免除乘坐娃娃車的危險，有位仰慕明星幼稚園的家長說：『她的孩子每天乘車的時間，在一小時以上。』直接剝奪幼兒遊戲學習的寶貴時段。國民小學因為學齡兒童的減少，可以利用空的教室，大量招收五歲幼兒。縣市政府若經費不足，可由幼稚園自給自足，既可減輕家長保育費負擔，又能接受正常的生活化學習。
3. 公立幼稚園可導正私立幼稚園的濫設才藝教育。幼稚園應以幼兒的生活為課程內容，以幼兒的興趣、需要、能力為編製課程的起點，以幼兒的活動為學習的方法，使幼兒從自己直接經驗中，去解決其實際生活上的問題。依『幼稚園課程標準』已徹底打破學科界線，以主題方式進行教學。但是目前除公立的幼稚園及少數優質的私立幼稚園能正常教學外，私立幼稚園大半都採用分科教學，設有才藝課、美語課、電腦課，所請的教師是繪畫專家、舞蹈專家，但是有正式教師資格者，懂得幼兒心理輔導者少之又少。」

隨著社會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品質的提昇，家長多願將孩子送進優質的幼兒學校。托兒所和幼稚園就如雨後春筍日有新增，托兒所和幼稚園都是培養學前幼兒的教育機構，但由於主管機關的不同，幼兒年齡的重疊，衍生了政令及管理上的困擾，也因此產生了托兒所和幼稚園功能整合的需求。幼托整合的方案，王老師的主張是這樣：

「關於幼托整合的方案，非常值得我們慎思謹行，托兒所和幼稚園雖然對於培養幼兒有共同的目標及相同的任務。但是由於主管機關不同，師資任用資格有異，且『兒童福利法』明文規定，托兒所收托嬰幼兒的年齡為零歲至六歲，自然強調了學前嬰幼兒保育的整體功能。但是民國十一年幼稚園就列入學校教育制度，規定四至六歲的幼兒接受幼稚教育，其施教機關是幼稚園。由此可知托兒所和幼稚園管理

是兩個不同的系統，所以從「修法」到「制法」，以及林林總總的改革事項，肯定是龐大的業務。絕不是目前社政單位或教育單位的人力資源所能負荷，爲了安定社會，節省資源，我覺得應在現行制度法令規章下，穩定中求改進。至於托兒所和幼稚園年齡上的重疊並不重要，提高師資素養才是重要的工作。」

目前社會上最熱門的教育課題，就是在各級學校加強外語教學。尤其強調自幼稚園和國民小學就開始教學外語。有關這個問題，王老師說：

「首先我要聲明，我不反對學外語，我深信多學一種語文就多一種和別人溝通的能力。我非常贊同學習語言愈早愈好的理論，特別是語言的發音，愈大愈難掌握。但是幼兒期若無聽說外語的家庭環境，學習效果必定很差。幼兒時期若無正確發音的外語教師，將會影響幼兒終身學習。世界各國可以說啓蒙教育都是用母語教學，幼兒必需先將母語學好，才能適應自己國家的社會生活。我們期盼教育部能有明確的政策，指示各級政府重視母語教學，充其量托兒所和幼稚園可以用遊戲或欣賞的方式進行幼兒外語學習，千萬不可將外語列爲正式的課程，更不可以用全外語教學幼兒。報載教育部爲加強外語教學在師資不足的情形下，特重金聘請外國教師教學，我們認爲實在無此必要。如果我們要加强外語教學，教育部應先有詳實的計畫，在大學中培養外語教師，有了優質的師資，再開始外語教學。我們認爲實在沒有必要搶先開始教學外語。」

目前我國托兒所和幼稚園師資的培養，向以女性爲主，若以幼兒身心發展而論，女性教師是比較合適。但就整個幼兒教育輔導工作而言，則似乎應有男性教師參與爲宜。有關這個問題，我們又請教王老師：

「民國七十四年開始，全省師專二年制日間部幼兒教育師資科開始招收男生，這項措施在我國培育幼兒教育師資制度上，卻是一項創舉。記得當時台中師專只錄取男生七人，在我分析我國幼兒教育師資培育制度上，必需加強男性幼兒教育師資的培養後，這七位男生才安心的修習課程順利畢業。多年來我們一直希望更多的男生投考幼兒教育系，主要的原因，第一，培養幼兒教育行政人才。第二，使幼稚園教學正常化。第三，促使幼兒人格正常化。有關這個問題希望大家能多多宣導，以便更多優質男性青年加入幼兒教育的行列。」

訪問活動中，我們在王老師的家中，見到牆壁上掛滿了家人的合照，從相片上兒孫喜悅可愛的樣子，頓時感受到他們家庭中充滿了天倫之樂。王老師是三個孩子的母親，養育、教育、細心關注。如今兒女都已成家立業，服務社會。王老師雖已退休十多年，但仍孜孜不倦的寫書。王老師告訴我們，這一切都要感謝他的外子喬萬森先生。喬先生曾任空軍航空單位，復留美深造，自軍中退伍後，受聘於逢甲航

空系，擔任「航空工程學」課程。他們伉儷情深，彼此關切，更是學生津津樂道，樂於思齊的榜樣。

王老師平日為人總是和顏悅色，自得其樂。她以耐心、熱誠化爲行事的準則。欲於無形中表現了教育家的那股無所求的風範，她時刻叮嚀她的學生「每個人一生中要對事有持久的敬業精神，珍惜每一分鐘」，王老師生平最服膺「人生以服務爲目的，助人爲快樂之本」的哲學。她認爲多年來深深影響她的力量，是一段名人語錄：「在人生奮鬥的過程中，成功的條件就是對工作樂趣有持久的敬業精神，並認爲每一天都是重要的日子。」這段話錄自中央日報的副刊晨鐘專欄，多年來她執著這份教學工作「上課」、「讀書」、「寫稿」、「傳播幼教」都是她的興趣。年事愈高，她愈是珍惜每一天、每一時，甚至是每一分鐘。王老師告訴我們如果說對教育還有一點貢獻，應當全部歸功於父母的栽培，恩師的教誨，長者的鼓勵，國家的厚賜。她更激動的告訴我們要惜福！要感恩！結束訪問，踏上歸途，我們三個人都有同感，王老師真是一位幼稚教育理論的實踐者。

## 參考資料

王靜珠（民 75）。幼兒社會行爲的輔導。親子教育，6，三輝出版社。

王靜珠（民 84）。給幼教朋友的一封信。載於台灣省教育廳國民教育巡迴輔導團（主編），幼教科教材法研習資料。台中縣：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王靜珠（民 88）。社會風氣首重規範電視媒體。兒童問題與輔導，12，內政部中部兒童之家。

王靜珠（民 90）。由幼稚園遊戲課程領域論幼稚園課程標準修訂。幼兒教育年刊，13，1-32，國立台中師範學院。

王靜珠（民 90）。落實我國幼兒教育師資培育制度之我見。

王靜珠（民 91）。國民義務教育向下延伸一年應有的準備。幼兒教育季刊，266，4-5，中國幼稚教育學會。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民 69）。杏壇芬芳錄。台中縣：作者。

黃定宜（民 73 年 3 月 4 日）。孩子各種壞習慣多由父母養成一言行一致才能教出健康下一代。中華日報。





# 懷本而踏實的教育尋根者

——伍振鷺

(訪問及資料整理：鄭玉卿、吳美玲、梁淑惠)

## 壹、生平簡介

---

伍振鷺先生，字毅夫，出生於民國十八年九月七日，江西省九江縣人。出身書香門第，自幼至中學階段接受良好的教育。早年歷經戰亂時期的顛沛流離，民國三十八、九年間，在好友協助下隻身來台，進入台灣師範大學就讀，並繼續攻讀碩士學位。研究所畢業後，於台灣師範大學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從事教學及行政工作。民國五〇年間，赴英國倫敦大學進修，在生活體驗與學術研究上皆有所心得，歸國後擔任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系主任、教育研究所所長等職，為教學與學術研究奉獻心力。曾編著中國教育思想史等重要教育專著，並參與教育大辭書之編輯工作。民國八十六年，於中國文化大學創立教育學系，兼教育學系主任以及教育學院院長，延攬名師，認真辦學，頗受到讚譽，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名譽教授。

###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  
英國倫敦大學研究

### 經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助教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講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系主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  
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理事長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兼教育學系主任  
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 座右銘

~誠實、規矩、踏實~

~從事教育工作或學術研究，都要一步步的、踏踏實實的~

## 貳、家世及早期教育

.....

初見伍振鷺先生，和藹的笑容，親切的態度，與這樣一位氣度雍容的長者深談，實是人生一大樂事。

伍振鷺先生首先與我們談到了他年少時期的生活與求學經歷。戰亂時代的顛沛流離，對我們而言，只是歷史教科書上的片段，但卻是他生命中的沉重記憶，他談道：

「就家庭背景來講，也算是書香門第。我家在鄉下有很多田地，等於說是地主，將田地交給佃戶種。可是戰後就不行了，第一個是原來的體制被破壞了，另外就是收租也比較困難。尤其到了勝利以後，大陸上鬧國共戰爭，大家認為是共產世界，那更是收不到租，後來只好將田地賣掉了。從七七抗戰一直到民國三十八年撤退到台灣這段時間，生活非常的苦，不過雖苦，至少我們還是有機會上學，家裡總是排除困難，讓我們有機會能夠受一點教育。」

從他對自己在大陸求學時期的敘述裡，可以感受到先生家人對他在接受教育方面的重視，使他有機會能受到良好的初等與高中教育，他談道：

「我從小學到中學都是念教會學校，這些教會學校類似英國公學的傳統，是屬於私立學校。當年來講，大抵公立學校不如私立學校，好的中學都是教會學校，大

學也是，好大學都是私立學校、教會學校。那時公立學校不像台灣，到了台灣以後才是公立學校超過了私立學校。過去大陸上教會學校都有很長的歷史，學校的水準也很高，像我念的教會學校，在清朝同治年間就設立了，已經有一百四、五十年的歷史了。」

伍振鷺先生高中畢業那一年，大陸正爆發國共戰爭，那些日子對他而言，可說是一段輾轉流離的苦難遭遇，也是一連串不得已的抉擇，他回憶著說道：

「戰爭爆發後，我們就撤退。我們家在江西，靠長江以南，就往江西南部走，走到贛南，那時候家兄說：『解放了，回不去了，怎麼辦呢？』，就往廣州考學校好了，到廣州……又回不去了，是一步步逼著我往前走。」

伍振鷺先生這段用血淚交織而成的年少記憶，是許多年輕的學子們所不曾體驗過的，我們是何其有幸的一代，更是應該懂得惜福與感恩的一代！

## 參、大學生活

民國三十八、九年期間，伍振鷺先生在高中同學的幫助下，隻身來到台灣。當時台灣到處是層出不窮的亂象，生活條件也很差。他回憶起自己初來台時所面臨的難題與想法：

「那時候之所以選擇師範學院，原因是戰亂關係，我一個人流亡到台灣，受教育要有一些條件。當年師範學院，有公費，也可以住在學校，畢業以後，工作有保障。」

對於自己後來進入師範大學的求學經驗，他則感嘆地說：

「當年到師大來，條件都很差，師大圖書館書也不多，你想借書，大家也都想借，常常都借不到，所以大部分上課都是靠作筆記。而且那個時候，生活都很窮困，所以有的時候要去做做家庭教師，才能維持生活，可以說是生活非常地艱苦。條件也不好、生活艱苦，因此我覺得大學四年，事實上自己事後檢討的回憶，實在是所得很有限，那些筆記記完後，因已多年，之後便遺失了。」

伍振鷺先生打趣的說，自己大學生涯是「混」過去的，真正體悟到要專心研究學問，則要到研究所階段。

## 肆、感懷師恩

伍振鷺先生與我們分享他在師大研究所求學，以及擔任行政工作的經驗時，提

及了四位日後對他有深遠影響的師長。

### 一、師大教育研究所求學階段

憶起求學生涯，伍振鷺先生認為大學四年所得有限，直到進入研究所，才真正開始學作學問、投入研究。在這段期間內，他最感念的是黃建中先生的教誨，黃建中先生的博學廣識，以及嚴謹的治學態度與方法，皆對他日後在研究學問方面有很大的啓迪。他在描述黃建中先生時，讚嘆與堅定的語氣，流露出他對黃先生的景仰之情：

「黃先生的專長領域是在中國哲學，還有倫理學。他研究中國哲學，並接受西方的啓迪，他在愛丁堡、在劍橋，受過西洋哲學的訓練，所以他研究中國哲學，也懂西方哲學。因此，他不像有些人研究中國哲學，卻沒受過西方哲學的訓練，概念不太清楚、架構不對、方法也不好。我們的確有很多研究中國哲學的人，缺少西方哲學的思想。不可否認的，西方哲學的方法比我們好，人家有它的架構，概念也很清楚。事實上，即使你站在中國哲學裡面，卻沒有西方哲學的基礎的話，也搞不清楚。黃先生在大陸上就已經是名教授了，他的比較倫理學當年出版真的是轟動一時啊，比胡適的中國哲學史還要叫座！……當年馮友瀾寫中國哲學史，那篇論文沒人敢審查，他那個時候剛好在教育部作高教司長並代理次長，他對這個論文寫了八千字的審查報告，值得你們去看看！」

接著，他回憶起黃建中先生指導他寫作論文的情形，提到：

「黃先生指導論文是很嚴格的，有毛病必改，有寫錯的地方他都會一一勾出來。書查得不對，他會告訴你再查；假使你查不到，他再告訴你。其實他也知道你應該查什麼書，但是他先不告訴你，叫你查，你說查不到，他再跟你講，他就是這樣，很耐心地指引你直到完成論文為止，他的基礎深厚啊！所以，可以說我在整個求學過程當中，深受黃先生那種精神和方法的影響！」

伍振鷺先生稱道黃建中先生深厚的學理知識、融貫中西的眼界，以及求真求實的為學態度，也提到了自己從黃先生的教導中所獲得的啓發與心得。後來，黃先生去世後所留下的許多論述與文稿，在他的編輯彙整下，而成「文教與哲學」、「教育哲學」等專著。

### 二、行政歷練階段

在師範大學從事行政工作及任教期間內，也有三位跟伍振鷺先生關係密切，在做人做事的態度上值得稱道與學習的師長，一位是楊亮功先生，一位是田培林先

生，另一位是劉真先生。他稱許楊亮功先生對待晚輩的用心、謙和態度時說道：

「楊先生做人真是非常之周到！他很多事情大部分是我替他辦的，替他改了卷子、出了題目、監了考，他一定要請吃飯，吃完飯後還開車送我回家；他寫的任何文章、出書，他一定會送一份給我，而且一定是非常客氣的，雖然他是老師的身分，還是一定在題詞中寫上『振鷺兄』。」

田培林先生判斷事理的正確與效率，也在他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田先生他是德國式的訓練出來的，所以他在學術上很嚴謹，不太輕易的下筆，要寫就是要準備能夠真正傳下去的東西，所以他不太肯寫，而且也不要人家代筆，除了應酬性的文章叫我代個筆外，學術性的文章就很少。……田先生對事情判斷非常之快，而且分析得很正確，什麼問題，只要跟他談了，不作聲，想一想，他馬上就能夠有答案，而且很正確，分析得很好，他是受過很嚴格的思想方法訓練的，而且他又做過很多的行政職務：做過黨部主任委員、中央黨部組織部的訓練處處長、河南大學校長、教育部次長，所以他對很多事情都分析得非常正確。」

劉真先生勤奮辦學的態度，以及對待晚輩的周到，也讓他相當地感念：

「大學實習完以後，回來當助教。當助教很忙，因為是當劉真劉校長的秘書。劉校長都是來得很早，而且常常是下了班以後，他還不走，待到晚上六點多才要走，當秘書要跟著他，所以很忙很忙。……劉校長也一樣，任何時間碰到我就要順道送我，那個時候我住在師大旁邊，我說：『校長，你不要送我好不好？到你家門口你先下車，叫司機送。』，但是他總是說：『不不不！』非得要把我送到家，他才回家。……，老先生們待人真是周到！」

聽他娓娓道來師長們的風範與智慧，無論是在研究學問方面，或是待人處世方面，相信每位讀者跟筆者一樣，雖然沒有直接受教於這些師長的門下，也會有如沐春風之感。尤其，看到伍振鷺先生雖然有今日學術上的地位與成就，卻沒有因此而志得意滿，對於當初在各方面給予他教導或照顧的師長們，至今依然是滿懷孺慕與感激之情，如此的胸襟與氣度，更是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 伍、赴英留學瑣憶與省思

民國五〇代，受限於當時的社會政治因素，伍振鷺先生無法赴美進修，只好轉往英國倫敦大學。他憶及當年負笈英國的原因，也談到了求學期間愉快的生活點滴。

「我那個時候考了夏威夷的中西文化獎學金，以及傅爾布萊特獎助金，都正

取，後來哈佛燕京獎學金又是備取第一名，但是領事館不給我簽證，三次都出不了國，因為他怕我出國去不回來。後來田先生就說，這條路走不通，那就申請國科會出國好了。所以我後來就到英國去，不到美國。」

他感慨地說著當時無法赴美的緣由，但是在英國進修的期間，卻也帶給他不同的人生體驗。他用爽朗而愉悅的語調談起了這段回憶：

「我住在 Lilian Penson Hall，是一個人住一間，那個時候在倫敦算是最好的外籍學生的宿舍，有咖啡，有電話，尤其一個人住很好。所以，那些到英國去的留學生常跑到我那兒來，第一個可以打地舖，第二個可以洗熱水澡，然後我一定會請他們吃一頓飯。……我因為是教授進修，沒什麼壓力，所以後來就是到處去參觀。當地的從前舊大使館留下的人員，如鄭大使，還有自由中國中心主任請客，都是我作陪，所以大家都很羨慕我，天天吃中國餐館。但是也很浪費時間，為什麼？當導遊啊！他們一來就是要參觀牛津、劍橋，所以我一星期都要去一、兩次牛津、劍橋或者溫莎。」

在英國的生活體驗對伍振鷺先生而言是愜意而美好的，不僅與當地留學生們相處融洽，也有許多四處遊歷的機會。在學術研究上，他也有所成果與心得。在倫敦進修結束前，依規定須繳交報告給當時修業的學校，他利用六個星期的時間完成共六個章節的報告。這份利用短時間所完成的報告，後來順利地通過審查，讓人不禁佩服他的學識涵養。

伍振鷺先生在英國進修完成的報告，題為「英國教育的新趨向」，後來刊載於師大學報，內容旨在介紹當時英國的綜合中學 (comprehensive school)。一九六〇到七〇年代，那時綜合中學在英國正是熱門的關注焦點，他因此為文論述此一制度。當時英國教育體制正急遽改革，他歸國後也多有相關論述。然而，隨著作品與經驗的累積，伍振鷺先生也道出了這一段他在從事學術研究時所發現的問題：

「英國公學、英國大學、英國職業教育等，我都寫過，當時這些文章的時間性很強烈，一過時了就不行了，所以後來也沒有發表的價值了，而且我也沒有把它整理成一套體系。就是說，本來也是想一個個寫，將來寫一本介紹英國全部教育的書，可是事與願違，沒有繼續下去。」

伍振鷺先生所提及的困境，相信也令許多從事學術研究者感同身受。他提醒我們，目前許多為人所關心的子題，常是具有強烈時效性的，因此，學術研究若一味追隨流行、目光短淺，恐怕一下子便會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沒，而失去價值。他接著提出了自己對於這種學術困境更深層的省思，由此肯定歷史研究的價值，也勉勵我們要具備「宏觀」的態度與精神，他說：

「學術研究就是要宏觀，學歷史的要培養這種態度，學那種技術性的，像課程、教法，尤其美國式的，天天變，趕也趕不完。尤其行政上的政策，像九年一貫、教科書開放等，這些東西都沒有什麼是非，也構不成學術，譬如像國立編譯館的存廢等議題也是，這只是政治上的意識形態，都不是學術，是不能存在久的，過了就沒價值了。」

從伍振鷺先生的談話中，隨處可見他對於學術研究問題的深刻體察與殷切期許，以下在先生論及現今的教育改革與研究風氣時會有更精闢的論述。

## 陸、從事學術研究與著作之心得

伍振鷺先生於教學研究之餘，曾編著中國教育思想史等重要的教育專著，皆是後學者必讀之書。此外，他所發表之教育性論文甚多，散見於各種學術性刊物，持論平實嚴謹，皆獲有很高的評價。

他對於教育領域的學術貢獻，早已為大家所推崇，尤其是在教育史的研究領域方面，他與我們分享了寫作「中國教育思想史」所獲得的感想：

「中國教育思想中，先秦、兩宋是重點階段，兩宋、先秦的部分整理出來，其他的就比較難了。第一個資料的份量不夠、零碎，而且也沒有系統，所以其他的後來就沒有動了。而且後來也沒時間，因為課太多了，所以也就一直沒仔細再做。研究是這樣的，創造力大概是四、五十歲的時候，是黃金時段，過了六十歲以後，…特別是眼力就很差了，所以學術界後進要努力，並且要趁早啊！」

史學研究者常會面臨到的一個難題，即是史料的殘缺，以致於缺乏足夠的理據，伍振鷺先生在寫作「中國教育思想史」時也有這種感慨。另一方面，他也感嘆自己過去因為教學事務繁忙，而錯過了從事學術研究的巔峰期，因此他期許與勉勵每一位有志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們，想要有所成就，便得即時把握與善用時間。

## 柒、在文化大學的經驗談

伍振鷺先生透過在文化大學設立教育學系的經驗，一方面比較了公私立大學間的差異，一方面也道出了當時的甘苦與人生態度，他以一貫爽朗的語氣回憶道：

「從表面上的感受來講，公立學校有的時候就是比較散漫，而且效率比較差、比較浪費。師大本來跟台大、清大比就是比較窮，但是跟文大比還是富得多，資源還是較豐富，那邊真是什麼資源都沒有。我到文大成立教育系，又成立教育學院，

從開始的開辦費、增班費，什麼都沒有，師資名額也少。好在因為我在師大的關係，還可以找得到人上山去兼課，否則的話那真沒有辦法。……所以現在我想離開，他們一直不肯讓我走。原因是他們知道我走了以後，運作可能有困難。」

他接著提到了自己對於整個過程的想法，以及未來的計畫：

「今天我已退休了，人家會覺得你還可以再盡點力、做點事，但是我一向是這樣的，能做多少算多少，不強求，順其自然，不一定非要有一個什麼樣的目標，達不到會覺得很有挫折感，其實無所謂。人家以為我那麼有興趣，好像永遠在那邊擔任行政助理，……我自己沒有什麼，就是有這麼一點方便，就撐一撐，但是不能長期是這樣，總是應該有一個想法或是作為，換個人就是另一個想法、另一個作為，而且，任何一個人都有走到終點站的時候，不能說非要死而後已啊！」

伍振鷺先生憑著強烈的使命感，使得文化大學教育學院在課程、人事與設備上逐漸步上軌道，運作順利。但是，他並不因此而自豪，或有所戀棧。他對於曾在過程中給予幫助的人心存感恩，對於自己未來的去留，更是展現一派灑脫、淡泊的精神與器度。

## 捌、對現今教育現象的體察

---

伍振鷺先生對於現今的教育現象，無論是在理論或實務面，皆有其獨到的見解。他持平而睿智的言論，明確地道出了國內教育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相信這正是他從事學術研究時「宏觀」思維的展現。

### 一、談大學教育

伍振鷺先生對於大學教育有其獨到的想法，他從各種角度來剖析國內大學的現況與問題。

對於台灣近年來廣設大學的現象，他憂心在「量」與「質」之間的落差，首先，他認為大學既是研究學問的場所，圖書設備便須力求充實。他說：

「當年師範大學的前身是日本高等學校，籌備期間，由長官公署（註：現省政府）把接收日本的一批圖書，撥到作為圖書設備的基礎。成立以後，又派人到大陸上去採購，當年師大圖書館裡面大概有二十幾萬冊書，在台灣大學裡面來講，恐怕師大圖書館的藏書量還算是第二個，第一個是台大。……後來那些新成立的大學、技術學院的圖書館有些一萬冊都不到，實在令人憂心其教育的品質。」

再者，他從美國與大陸來闡述未來大學設立的趨向，將從獨立、分化走向綜合



大學的模式，由此點出了目前國內大學的困境：

「雖然美國的大學，早期並不好，但是校園面積大，建築又宏偉，而且數量多，世界上哪個國家有三千多所大學？大陸上現在最多也不過九百多所，最近合併的也不少，因為他們一度過度的分化。像台灣的小學校已經不行了，所以現在美國、大陸上也有很多大學合併成綜合大學，從前把它拆散了，工學院、理學院……各學院都分開，現在把它再合併起來。過去浙大號稱東方的劍橋，後來中共改組把它拆散，那是受蘇俄講求專業化的影響，現在大陸還是回頭走綜合大學。大學要大，然後多，可是我們條件不夠，台灣可以設一百所大學嗎？當然每個大學都很差，因為都很小，資源分散，師資設備都很差。」

他也以美國大學在資金獲得上的優勢為例，說明了台灣與美國國情上的差異：

「美國的工商界或者私人，很願意把錢捐給學校。另外他們大學跟我們不一樣，我們的大學是非營利機構，美國的大學可以出賣專利、產業合作，學校可以在這個中間抽取利益。」

他提醒我們，由於種種教育條件與環境上的差異，因此，日後台灣大學教育若有所變革，想要在質量上求均衡之發展，便須有更深層的歷史與文化考量，否則一味效尤，跟著美國跑，恐將帶來更大的危機。

## 二、Power is Knowledge?

伍振鸞先生認為目前國內教育界瀰漫著過度泛政治化的現象，以至於形成追求真理的障礙。

首先，他談到了過分去中國化所帶來的學術上的危機，他語重心長的論道：

「國中小的教科書把對於國家的認同都抽離了，這當然是危機。今天政治意識太濃厚了，似乎是權在我手上，歷史都要改寫，聽說國史館要研究日本近代史，公務員考試要考日本史？真荒謬！……教育不要太過分的政治化，台灣現在整個情勢都在去中國化，要把『中國』兩個字拿掉，看到『中國』這兩個字就刺眼，可是，台灣把中國去掉以後還剩什麼？而且我們現在是要拿日本的歷史來代替中國的歷史，這點我是覺得不能接受。」

接著，他指陳了當今社會政治領導學術的亂象：

「其實，台灣人要獨立，政治上你可以有這個權利要求，就如同美國人爭取獨立一樣，但是你要說：『我不是中國人，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這話說不過去。而且你說自己與日本的關係比較密切，或是像臺大醫院的一個教授講的：『新台灣人是原住民加上荷蘭人跟日本人雜交成的一種新民族。』，這簡直是太過分

了！……，今天問題很簡單，儘管我是外省人，但在台灣已住了五十多年，在台灣已生了根，實質上就是台灣人，也不願意被共產黨統治。雖然我認為我還是中國人，台灣和中國不可分割，但那是從歷史文化、從學術的觀點來看，此外，就政治立場來講，我也反共。」

伍振鷺先生認為政治與學術有其各自的訴求與目標，而學術乃為追求真理而存在，應是講求「knowledge is power」，但是政治勢力過度介入學術領域的結果，卻往往招致「power is knowledge」的危機，學術反成了當權者散播意識形態的工具，他對這樣的現象實在憂心忡忡。

### 三、改變與堅持之間

「教育大辭書」是伍振鷺先生與多位學者共同完成的一部教育經典。這部克服了人事與經費困難，歷經十年所完成共十二冊、蒐羅古往今來各類教育辭目的重要參考書籍，當年由劉真先生擔任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賈馥茗先生擔任總編輯，伍振鷺先生與楊深坑先生分別擔任副總編輯工作，並集結了許多位在教育各領域學有專精之學者，一同付出心力，才得以成就此番事業。他在闡述這部叢書之於教育界有重大意義的同時，也指出了許多人對於教育的錯誤觀點：

「過去很多人也許覺得教育界，好像什麼事情都沒做，也沒什麼好做的，但是現在他們看到，我們在幾年之內拿出這樣的一個成績出來，才知道我們不是如人所想像的。像他們那些學科學的人會覺得說：『教育有什麼？誰都會，誰沒受過教育！』，尤其那些在美國學科學的人，作事情有效率，也懂方法，馬上就可以有結果出來，他們基本上是對教育有所誤解，他們用科學的態度，要快、有效率，像作實驗一樣；有問題，失敗了再來。但是，我們學教育的不是，所以他們就批評我們學教育的保守，可是做事情就是要有擇善固執的精神。我們對教育問題要很慎重，為什麼？因為人不是白老鼠，人不可以做實驗，你無權把人當作實驗品。」

他認為當教育面臨「改變」與「堅持」的抉擇時，「慎重」是絕對必要的原則，因為教育的對象是「人」，因此主張改變時，絕不能只憑孤注一擲的激情，而盲目的群起效尤。他以法國對於自身傳統的堅持為例，提醒我們：

「法國有他們的一套，而且會堅持他們自己的一套，不像我們，法國一直覺得他們有自己的文化、傳統，他們一直在堅持，絕不受美國人影響、受德國人影響。像他們的高等師範，被認為好，就一直保持。高等師範是法國的精華，也是世界的精華，高等師範對法國的影響、貢獻真是大，我們卻輕易的就放棄掉了，所有的師範院校都要廢掉了。高等師範是法國的命脈，所以絕不改，是法國文化的精華，…

…，自然就有自尊心、自信心，台灣就是缺少這一種堅持與自信。法國人雖然戰爭打敗了，但絕沒有說我不如人家，……，法國人以爲他們自己的文化是最寶貴的，也是世界的精華，法國人就有這種自信。」

接著再以英國的教育改革爲例，指出英國最近在看似頻繁的變動之下，卻仍有他們一定程度的堅持與立場，他說道：

「英國人現在重新調整了，他們最近調整很快。英國人知道從前那一套已經不行了，現在不是人家學他們，現在是他們要跟著人家走，所以他們反而變動得很快，而且看到合適的領域，馬上就採取這個方式。爲了提昇國家競爭力，所以規定國家考試，而且在義務教育階段要四次會考，還要排名；還有教育標準局，從前是皇家督學，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都放棄，改成教育標準局，那個制度非常功利化，並且有效率。學校接受視察，不行就告訴你要改，還是不行的話，就停止招生，再不行的話，政府接管。從前英國是尊重地方行政自主權，現在全部由中央政府掌控，因爲他們發現過去的制度不行了，國家沒有競爭力了。」

他相信有許多人見到英國的改革，會迷戀於這樣的表象，認爲進步是改變的必然結果，但是他以嚴正的語氣駁斥道：

「英國不像我們是跟著人家改，卻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改！英國人至少知道，爲什麼改，能掌控、主導自己。我們卻不是，我們的全部跟著美國學：廣設高中大學、大學要擴大容量、獎勵私人興學，我們現在私立高中都招生招不到，大學兩年以後也招不到學生了，沒有競爭力了！」

伍振鷺先生認爲，在「改變」與「堅持」之間，無所謂絕對的對錯，但是所作的最後決定，卻絕對需要經過更深層的思維。因此，他認爲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教育界絕不能缺席，因爲一個摒除了專業、欠缺周詳思慮與計畫的改革、一個只爲改變而改變的改革，絕對只是個未開始就注定失敗的改革。

#### 四、不要讓人家牽著鼻子走

伍振鷺先生對於現今的學術研究風氣，也沉痛地表達了他的憂慮：

「今天，世界潮流大勢所趨呀！不可否認的，我們是邊陲，人家是核心，你不跟著他走不行。今天台灣就是說，什麼都美國化了，學術也是美國化了，我們是自然而然地走上那條路。但現在問題就是，你走上那條路以後就變成什麼？一個大機器在動的時候，你就是小螺絲釘啊！停下來也不可能，想停下來也不行，要不動更不可能。但是我們又沒有辦法學成美國這個樣子，人家是高度開發的國家，我們還在發展中，所以我們最後會就像我們的工業一樣，只能做人家的代工！」

他的話一針見血地道出了國內學術研究的問題，正如同在工業上對美國的依賴般，許多從事學術研究者也落入了相同的窠臼，成了他口中所謂的「學術代工」。因此，他引用胡適之先生的話，提醒我們：

「當年胡適之先生講說，我們不要讓人家牽著鼻子走。而我們今天台灣是什麼？自己把鼻子圈好了以後，把繩子送給人家牽，這是最痛苦的。所以，很期望我們學術界，能走出一些自己的天地來。現在似乎不可能，就好像我們的工業一樣，我們只能做美國的代工，美國不給訂單，我們就沒飯吃。我們的學術也一樣，你的文章不拿到美國去發表，誰承認你的學術地位？所以，我是希望我們能夠走出自己的一條道路來，當然這是一個很高的理想。不過就是希望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到有我們自己本身特色的部分，不要一輩子看著人家的臉色，讓人家牽著鼻子走！學術界總是希望說自己是第一流的，不要是第二流、第三流的，不要說自己把鼻子圈好以後，還把繩子送給人家牽著走。希望能夠做到，但是很難就是了。」

他認為國內學術界必須嘗試找出屬於我們自己的特色，才機會擺脫「學術代工」的現況，但是，他也同時道出了這其中的艱難：

「但是我們自己本身又沒這個條件哪！我們的學術界不景氣啊！誰肯捐一大筆款，說我們來做點自己的事情。就說我個人，假如有一筆錢，我就很希望可以，舉個例來講，成立一個教育史研究學會，辦一個有水準的刊物，讓人家承認你。所以你必須要有一筆錢，然後又能夠做一點成績出來，並且讓人家知道，……個人的力量雖然很有限，但是至少應該有一種認識，不是像有些人根本沒這種想法，覺得只要能夠變成美國人，被美國人牽著鼻子走，就很甘願、很光榮。」

許多人一定和筆者有相同的期望吧！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伍振鷺先生能有機會將他這樣一份理念付諸實現，讓國內的學術界能真正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儘管這條通往理想之路窒礙難行，但是他提醒我們至少該有如此的體認與反省，因為惟有這樣，我們的學術領域才有精進與自主的可能。

## 玖、對教育學術與實務界的期勉

---

由以上伍振鷺先生對於國內教育問題的評論中，我們見到了他對教育的一股赤忱與投入，也惟有懷著這樣的一種精神與態度，才能道盡現今教育界的種種沉痾。但正如同一位誨人不倦、力求莘莘學子們能有所成就的師長般，嚴厲指陳問題的背後，是更多對於教育的關懷與期許。經過了大半輩子的行政歷練與學術研究工作，伍振鷺先生將自己豐富的人生閱歷，透過這次接受訪談的機會，分享予在教育界的

每一位工作者，希望能透過更積極的思考與作為，讓台灣的教育界，無論在理論或實務上，皆有所展進。

## 一、先找到自己的定位

伍振鷺先生告勉我們，要對教育奉獻己力，首先不能不對自己所處的現況有更深的自覺與反省，他說：

「第一個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哪裡，定位在哪裡。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再來看看自己現在的位置在哪裡，才會發現原來自己這麼慘啊！能不能想辦法改進？至少我們應該有這種認識、這種覺悟。……美國有兩百萬留學生，這些人將來回國以後都是精英、是領導份子，一定會把美國的主流思想帶回自己國家去，他要民主、他要人權，這是自然的，而且他也把美國的那種主流文化帶來了，牛仔褲、吃漢堡、喝可口可樂。美國人的文化征服世界，你不用英文寫文章、不用英文發表，管你是用拉丁文、希臘文，都白費！中文也是一樣，人家不認識，所以不承認你。現在就是說，我們中國也有這麼雄厚的文化背景，我們能不能自立自強？我們第一個要先有這個自覺，有了自覺才能夠自省，然後才能自強，才能自立。假如沒有的話，就是一輩子讓人家牽著鼻子走！靠我們的政治界或者其他方面，都是沒有辦法的，假如學術界不能從這條路開始的話，那我們將來是萬劫不復啊！」

我們先要有找尋自己定位的自覺，從中自省，然後自強，最後才能自立。伍振鷺先生深切地期盼著國內學術界能凝聚這般共識，並將它化為一股追求自主與獨立的力量。因此，他又這樣說道：

「第一個，能夠從自己做起，做一點算一點，不可能一下子期望太高，而且我們從事教育工作，不可能有赫赫之功。就是要累積，慢慢的來，假如大家有共識，都說從我自己做起，慢慢地做，也許總有一天會做出一點成績出來。」

教育理想非一蹴可幾，因此，伍振鷺先生但求每個人首先皆能反求諸己，為教育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

## 二、從歷史尋根

伍振鷺先生認為現在談論教育問題、從事學術研究，許多人面對一波波的教育潮流，追求時興、隨波逐流的結果，卻也往往迷失在其中：

「我們中國近代就是學人家，而且常常改。今天來講的話，其實研究什麼課程啦、教法啦，跟著美國人走，那是天天變，而且那東西過兩天就過時了。基本上來講，還是要研究歷史、哲學，才是真正的根。你談中國古代的教育，為什麼是那種

教育？英國爲什麼從前有雙軌制？這都有它的時空背景啊！沒有擺在時空的背景下你會不了解，而且那個才是根！否則的話，像今天（台灣）的改革，今天改，明天改，說不定過兩天又有人要改變它了。」

所以，他告訴我們一定要先從歷史上去找根，追本溯源，如此才能在變動不居的時潮中，洞見問題的癥結，找到自己的出路：

「所以我們今天學歷史的，一定要弄清楚時空，這其中的因素我們一定要把它掌握正確。你不掌握正確，窮究知識的結果，就等於是用自己甚至別人的觀點來解釋。你一定要把它落實在時空裡面去解釋。所以我想歷史總是個根，這個根不能用你自己的主觀因素就把它否定掉，這是沒有辦法的，因爲這是真理啊！台灣從歷史上來講，跟大陸就是有很密切的關係，但這密切的關係不代表政治上主從的關係，那是政治上的事情。台灣自己本身有自己政治系統，在政治上有權要求獨立，但是不能因爲政治上要求獨立就要否定歷史，我想這就不符合真理。所以我說，你要台獨你就台獨，我不是你，我們的政治立場不一樣，我不能說是你錯，但是你要說自己不是中國人，台灣跟中國從來就沒有關係，這個是錯的。」

伍振鷺先生的一席話，處處是令人激賞的智慧結晶！的確如此，面對現今的教育，因受到各種意識形態與利益衝突所引發的問題與對立，惟有回歸歷史、真正的學術研究上來檢視，才能摒除掉各種加之於外的意圖與干擾，還原教育真正的面貌。

### 三、理解變動的時空因素

伍振鷺先生除了告訴我們歷史研究的價值，提醒我們須從歷史尋根的重要性之外，更進一步地依此理念，分析了中外教育現象背後的歷史脈絡，他首先提到了英國近代教育急速變革的時空背景，他說道：

「我想教育它的變化，是有它的時空跟因素。你一定要去理解這個時空交錯的背景之下，否則的話就是漂浮在上面，看它的變化很快，反而眼花撩亂。英國來講，變化快是因爲與過去的背景不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人才發現自己已經不是世界的主流，現在反而要去跟別人、趕別人，從前都是別人跟著英國，從前世界最先進的都是英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對英國人刺激很大，從世界第一流的強國，變成世界第二流的國家，就是因爲這樣的歷史背景，所以在教育上必須要改。雙軌制已經不適合民主潮流了，假如英國再繼續抱殘守缺，那更慘！因此必須要改，而且速度都要加快，像從前那樣慢慢來不行了。」

他接著又再針對中國的教育現象加以剖析：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這個時空背景。我們中國古代的教育，為什麼是那樣子？它有它的時代背景。像上古時期的學校，教育本身有階級性，社會本身也有階級，尤其周朝封建制度，那社會階級是非常之明顯，所以它必定有教育制度的階級性。舜設教育官，司徒是教一般平民，夔典樂是教貴族子弟，是兩套；周朝也分得很清楚。所以一定要把這個時代背景、時空因素掌握住，若不了解時代背景，就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們中國近代的教育，之所以老是變來變去，而且常常是大量的改，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根，把中國過去的全部都改，然後來學人家。第一個學歐洲，歐洲學了以後，學日本，民國十一年又一下子改過來學美國，變動頻繁而且非常快速，包括我們這次台灣的教改也是。這次教改是要脫胎換骨，連精神上都要全部要學美國，但是缺乏對中國歷史文化背景的了解。我們跟美國比，怎麼比？所以我就常常講說，我們學美國，學得好嗎？學得像嗎？不可能。我打個比喻，為什麼我們不能學美國：英國人跟美國人關係很密切，我們的關係有沒有美國跟英國的關係密切？當然沒有。可是美國人獨立以後，他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教育制度，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學美國？……即使學得像，也只有永遠讓美國人牽著鼻子走。」

藉由這番話，他語重心長地提醒我們，倘若繼續欠缺對於歷史文化背景的反思，我們將永遠只能作為時代潮流的追隨者，想要真正主導自己，則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 拾、尋根探源，作教育的掌舵者

伍振鷺先生的言談，對現今學術界而言，雖是一記當頭棒喝，卻也讓我們看到了通往夢想與希望的一條路。他期許我們：要從找到自己的定位開始，自我反省，體察時艱；進而，由歷史的脈絡去探尋根源，藉以洞澈思維，瞭解事件變動的時空因素，真正認清我們的問題與需要。這條路或許走來困難重重，卻是達成理想的必經之路。期望大家能一同共勉與踐行，因為，唯有經歷如此深切的自我覺察與奮鬥過程，才能在變幻莫測的時代潮流中，掌舵我們自己的教育、文化與學術生命！

### 主要著作

旅英散記。台北市：台灣商務。

教育概論。台北市：華視。

先秦諸子教育思想。台北市：偉文。

兩宋理學教育思潮。台北市：偉文。

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台北市：三民。

亞洲大學的發展——從依賴到自主（主譯）。台北市：師大書苑。

中國教育思想史（先秦部分）。台北市：師大書苑。

中國教育思想史（兩宋部分）。台北市：師大書苑。

教育行政專論（主編）。台北市：南宏圖書。

英國的公學。台北市：五南。

教育評鑑（主編）。台北市：南宏圖書。

教育哲學。台北市：師大書苑。

中國教育史論叢。台北市：師大書苑。

教育哲學（合著）。台北市：師大書苑。

新教育概論（合著）。台北市：五南。



# 繼往開來的教育掌航者 —— 朱匯森

(訪問及資料整理：劉春榮、簡惠閔、陳怡親)

在透著灑滿陽光的午後，我們來到了朱部長在潮州街的住宅中進行訪問，初見朱匯森部長和藹的笑容，親切的態度。我想與這位長者長談定是件人間樂事。

朱部長首先跟我們分享他的求學過程與教育行政經歷，之後就部長任內的教育政策與我們詳談。那種學者風範，讓我們如沐春風。

## 壹、生平簡介

---

朱匯森先生，江蘇省南通縣人，民國前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生。

### 學經歷

民國二十年通州師範畢業，在故鄉及南京市任小學教師、校長，共六年。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發生，參加教育部戰區教師服務團，後又調任教育部臨時幹事。

民國二十七年考上中央大學師範學院教育系，民國三十二年畢業後，當中學教師，又轉任教育部科員。參加高等考試及格，後分發教育部任薦任科員。

民國三十七年來台灣，任省教育廳秘書。

民國四十一年到台南師範學校擔任校長六年。

民國四十五年赴美國考察社會中心教育，兼研究小學教師培育及在職進修課程。

民國四十七年由台南師校調到教育廳任第四科科長（主管地方教育、師範教育、小學教育）。

民國四十九年任台中師範學校及改制後的台中師專校長，共七年半。

民國五十六年擔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長，次年調任主任秘書，又升任常務次長。

民國五十九年任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組主任。

民國六十一年，擔任教育部政務次長六年。

民國六十七年，擔任教育部長六年。

民國七十三年，擔任國史館長六年，於民國七十九年退休。

朱部長就自己從事教育行政工作的生涯，發表感受。自嘲自己並沒有什麼優點，不過誠如其同僚葉楚生司長所說的：「優點只是認真負責，做任何事的成就都比其他的人好一點。」

## 貳、勉勵後學的話（座右銘）

「我服務公教界有六十年，從一陣陣的憂患挫折中，開闢一片教育報國的生涯。多年經驗使我在立身、處人、做事等方面，抱持某些比較穩健的立場，也可以說是我的座右銘。如下：

### ◎立身方面—「堅苦自立，忠實不欺」

這是我母校通州師範的校訓。只要自己立定腳跟，便能經得起任何困難與考驗。

### ◎處人方面—「容人而嚴自責，嘉善而矜不能」

與人相處，若是斤斤計較，便顯得很低級，對自己沒有益處，只像在原地打圈而已。

### ◎做事方面—「謀事之所當為，盡力之所能為」

考慮事情要有遠見，很周詳。但是，執行計畫要顧及實際情形的輕重緩急，再盡心力，才不會勞而無功。

至於對青年朋友的期盼，我願引述一位美國學者 Henry. Ward Beecher 的一段話：『我們有生之年，應該努力不懈。使得我們手中的種子，能在下一代開花；收到的花朵，在下一代結果。』人生的真義，本是永無盡止的追求和貢獻。青年朋友，你們也有如此“樂育為懷”的使命感嗎？」

## 參、重要事蹟

由朱部長的生平中，我們可以得知朱部長盡畢生心力於教育工作，為我國教育做

出卓越的貢獻。以下將他對若干教育事項的理念、主張和感想，提出來加以說明。

### 一、對於中華民國教育宗旨的看法

朱部長告訴我們做任何工作，一定要對該工作背景、理念、目標有所瞭解，在教育行政上亦然。朱部長就以中華民國的教育宗旨為例。民國十八年四月，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其內容為：「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旨在求教育目標與建國方針密切配合。但這樣教育宗旨的文字是很空洞，好像泛論我們建國理想的一段短文。倘若我們將文中「教育」兩字拿掉，換上「經濟」、「國防」等其他字，豈不也可作為經濟、國防等政務的宗旨嗎？

「我以為憲法第十三章基本國策之 158 條『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與科學及生活智能。』如以此作為教育宗旨，具體的提示德智體群四育為教育的重點。而且引用憲法條文，具有最高的地位與效力，明訂為教育宗旨時更為適當。」

### 二、獎助私立學校，並舉辦私校教職員保險

朱部長很為人稱道的一部分是：對於高等教育推動的貢獻。說到這部分，朱部長馬上說：高教司是教育部最重要的業務司，因為它順應高等教育的未來趨勢與動向，對於高等教育的擴充與評鑑都有極大的影響力。民國六十四年，蔣彥士部長任內，在這一年頒布了「私立學校法」。私立學校法的制訂是為了鼓勵私人興學，因為只用政府的力量辦學是不夠的，所以要鼓勵私人興學。該法第四十六條：「私立學校辦理完善，成績優良，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對學校董事會、校長或有關人員予以獎勵。」教育部據此擬訂「私立學校獎助辦法」草案，當與財政主計等機關聯繫時，那些主管都不贊同，理由是：政府的財政力量不夠，私立學校本應自籌經費來辦理。後來當行政院討論草案，其時朱部長還是政務次長，代表蔣部長出席說明：「學校有公私立，但青年都是國家的，政府鼓勵、幫助私立學校是理所當然的。」並舉例說：「目前清華大學加上政治大學的學生總數約等於一個中國文化學院的學生人數，這些大學都是為國家培植青年人才。但是，清大、政大的經費都由政府負擔，中國文化學院是自籌經費。政府應該獎助輔導私校，使能健全發展。」當時行政院長是蔣經國先生，他大力支持，裁定通過獎助辦法。以後政府對私立學校的補助就年年增加。

朱部長又談到擬訂「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一事。民國六十年代私立學校老師沒有公保，福利不好，以致私立學校聘不到好老師。因此蔣經國總統曾有將私立學校教職員也包括在保險範圍內的提示。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朱部長到北投政治作戰學校參加軍校聯合畢業典禮，蔣經國總統問朱部長，「為何私校遲遲未能參加保險？」朱部長說是受到財政與人事方面的反對，認為公保制度受保人限於公務員和公立學校的教職員，私校參加於法不合。蔣總統說：「現行法規既然不行，何不另行立法？」即提示有關部門配合，由銓敘部、教育部會同研擬「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草案，報經行政院通過，送會考試院。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六日由行政院、考試院聯名向立法院提出，討論通過，呈奉總統於同年八月八日公布，定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十日起實施。在蔣總統的支持下，私立學校教職員的生活獲得保障和改善，而私校延聘優良教師，也有和公立學校相當的有利條件。

### 三、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年限

朱部長在任內有感每年約有五萬名國中畢業生未繼續升學，缺乏就業專長，提出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年限。這個制度的意義很重大。補習教育法第九條規定：「國民中學畢業未繼續受教育者，得實施部分時間之職業進修補習教育，至十八足歲為止。其實施辦法，由教育部定之。」於是引用這條為本案的法源。

先說明本案為何用如此議題與字句。在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之後，政府有意將再提高國民素質一項，列為「復興基地重要建設方針」。教育部在研擬作業時，一方面吸取實施九年國教的經驗，如再延長國教年限，必須有充分的準備時間，做好配合措施；並要有彈性的過渡階段，使教師和學生、家長能適應新制。一方面參考外國推行義務教育，大多採漸進方式，一次延長一年。而且義務教育指兒童青少年在某年齡以前，應在學校受教，並非要學生須完成高一級學校的教育。由於這些考慮，發現補習教育法第九條有十八歲前實施職業義務教育的規定，因此建議「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列入重要建設方針，採行補習教育的方式，逐漸達到延長國民教育的目標。

其次，再說明本計畫的幾項要點：

1. 延教班受教學生數不會太多。那些已在高中職、五專、補校就學的學生，即視為接受延長的國民教育，可排除在本計畫之外。只有國中畢業未繼續求學，尚不滿十八歲的青年，才進入延教班。
2. 延教班盡量利用現有的教育資源，參酌地方需要，規劃招生。採行甄試或登記入學。

3. 延教班設科及所用教材，力求符合「適性」、「實用」、「連貫」等原則。
4. 延教班授課時間力求彈性（如夜間部、半日制、隔日制、週末制等）。教學多用媒體補助工具，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5. 修業年限依課程性質，修習一年至三年不等。
6. 修業階段期滿，依「補習教育法」第十六條的規定，舉辦結業生資格考試。及格者具有高職畢業資格，發給資格及格證書。

行政院民國六十九年指示教育部規劃「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實施計畫」。教育部延聘專家，會同有關行政院主管，經過三年的研議，擬就計畫草案，於民國七十一年九月報院。行政院於同年十二月三十日院會通過本案，准自七十二年八月起試辦三年。試辦若有成效，再擴大辦理，全面強迫實施。

#### 四、推動師範學校改制師範專科學校

在朱匯森部長擔任教育廳科長時，推動師範學校改制師專，對於我國的師資培育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朱部長回憶道：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教育部訂定『提高國民學校師資素質實施方案』，就規定將小學師資由高中程度提昇到專科程度。但是，其時國家財力困難，而省教育工作重點還在提高義務教育的就學率，無力將師範學校改制為師範專科學校。民國四十五年八月，我正擔任台南師範學校校長，被派到美國考察社會中心教育，並進入密西根州立西部大學，研究小學師資培育課程一年。民國四十六年七月結業，到美國教育署向主管辭行時，那位主管說：『社會中心教育美援計畫，在兩年後將會結束。如果中國政府另提出提高小學師資素質的計畫，美國願意繼續提供援助。』民國四十七年二月，我調任省教育廳第四科科長，主管師範教育業務，就將師範學校改制為師範專科學校可能獲得美援的意見，向劉真廳長報告。劉廳長很高興，轉報周至柔主席，獲得其同意。」

於是劉廳長將師範學校改制師範專科學校一案，由教育廳第四科主辦，專案報請教育部核定。教育部於民國四十九年二月核復：四十九年八月起將台中師範學校改為師範專科學校，仍以培養小學師資為目的。次年，其他師範學校也次第改制。朱部長像是師範改制師專的催生者。

後來，由於政府愈來愈重視師範教育。民國七十六年八月，所有師範專科學校都升格為師範學院。民國八十年七月，台灣省屬的師範學院一律改為國立學校，歸由教育部管轄。

#### 五、專科畢業生可報考研究所深造

在朱匯森先生擔任教育部長任內，開放專科畢業生可以同等學歷報考研究所深

造。問朱部長這樣遠瞻的做法最大的原因，他說了一句：「外國可以，爲什麼我國不行？」

朱部長認爲教育政策應該鼓勵學生，給他們希望，並且減少限制。學生的潛力無窮，我們應該積極的鼓舞學生，讓他們可以充分發揮潛能，這是教育上很重要的一點。

「我國高等教育階段，包括大學與專科學校，辦學宗旨不同。大學辦學宗旨是『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畢業生可得學士學位；專科學校的辦學宗旨是『教授應用科學與技術，養成專業人才』，畢業生不能得到學士學位。大學得設研究所，只招考大學畢業生，將專科畢業生排除在外。專科畢業生如果要繼續深造，只好自費留學，在外國大學同樣可以取得碩士、博士學位。多年來，專科學校的師生和家長都反應這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教育部決定要改革，使專科畢業生在國內也有從事研究深造的機會。教育部首先和大學校長交換意見，再和幾位政務委員溝通，得到有條件的支持，即專科畢業生以同等學力可以報考大學研究所，但須有兩年以上的服務經歷，並加考兩門與所選研究有關的主要學科。本案提報民國七十二年二月十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實施。雖然對專科畢業生報考大學研究所增列的條件太嚴苛，但終於打開了專科生在國內深造大門，激發更多的專科畢業生積極上進的精神。」

### 六、公布中文常用字、標準體及書寫方式

文字是傳承文化、溝通意見的工具，隨時代的演變，字數由少而多、字形由繁而簡、由一致而分歧，書寫方式或縱行或橫行，雜亂無章。爲了適應新時代的科技發展，發揮中文資訊的功能，教育部自民國六十三年著手進行字體整理的工作，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負責研究。關於字數方面，康熙字典國字字數有四萬多字，但在日常生活中，三千左右的單字即可應付裕如。常用字應是編寫中小學教科書和研發中文打字的重要參考。民國六十七年初，完成研訂常用字 4,808 字，其後還有次常用字 10,740 字，罕用字 18,480 字，異體字 1,8609 字。關於字形方面：爲了文字使用方便，資訊作業也要一字一體，至少常用字須訂定標準體。師大國文研究所先完成了「常用字體標準字體表」，後來陸續完成「次常用自字體標準字體表」等，各表於民國六十八年五月七日公告用三年，期滿後，重新訂定公布啓用。關於書寫方式方面：教育部委請專家研究的結果，縱書者每行字自上向下，行間次序自右而左；橫書者每排字自左而右，排間次序自上向下；傳統書畫中的題字、一般匾額、報刊的橫標題等，屬於縱書「一行一字」的性質，各字可以由右而

左橫書等項。教育部擬好「中文書寫及排列原則」一案，報備行政院核定，於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院會通過施行。

## 七、資賦優異學生從寬報考升學

我國教育過去沒有明文規定資賦優異學生可以跳級或提早升學。雖在法令上規定：入學報考資格有同等學力一項，但是主管者往往重視防弊，如將報考大學的同等學力嚴格限於：修畢高中高職兩年以上，因故休（退）學，自行進修滿一年等項。這些規定將一扇活門堵得死死的。即使是資賦優異學生也非得要按步就班，一年一年爬上去。

「民國七十一年有一位在數理方面表現優異的學生，要求跳班報考大學，未被允許。這件事經由報紙的報導，同時間，在美國有一位華裔兒童 12 歲就獲得美國大學許可入學的新聞。兩相對比，成為熱門話題。對於同等學力的限制是教育部自己扣上的手銬，當然可以自行『鬆綁』。民國七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宣布輔導資賦優異學生升學，放寬同等學力的限制。又其在學年限，每一階段可以縮短一年，自小學至大學，最多可以縮短四年。另外，對於有特殊才能表現的學生，則採甄試的方式，分發升學。」

「教育部將這些措施條文化，訂入草擬中的『特殊教育法』第 13 條：『資賦優異學生經學力鑑定合格者，得以同等學力參加高一級學校入學考試，或保送甄試入學，其辦法由教育部定之』。第十四條：『縮短修業年限之資賦優異學生，其學籍及畢業資格，應由學校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本法於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布實施。此外，自民國七十一年起，教育部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辦理高級中學資賦優異學生甄試保送，及提早升學之學力鑑定等事宜。又自八十一學年度開始，中等學校學生參加國際數理奧林匹克競賽，及亞太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優勝者都能保送進入大學就讀。」

## 八、遷建國家圖書館的現址

國家圖書館的前身是國立中央圖書館，於民國四十三年在台北市復館，館舍借用台北市南海路日據時期的建功神社。四十五年雖然將舊建築物改造擴充，實在不合新時代圖書館的需求。民國六十六年九月，蔣經國先生在行政院長任內，宣布十二項重要建設計畫，有「遷建國立中央圖書館」一項。朱部長有一次到館視察，發現收藏十二萬本珍貴的宋代善本書的庫房，和民家的廚房僅一牆之隔。如果民家廚房失火，可能延及善本圖書庫房。爲了要保護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朱部長決定將

中央圖書館優先遷建，編列十億元經費預算。但是在台北市區尋找一片公有地來建館舍，實在不易。教育部曾經過幾番選擇與波折：

首先和台北市政府接洽，請提供市有地為新建館址。承市政府同意，在信義計畫中撥用三千坪土地。這原是好意見，後來瞭解信義計畫區內土地整理有困難，而中央圖書館的遷建工程不能久待。因此要另作打算。

其次，和中正紀念公園管理負責人接洽。據告，園內預定要建築兩廳院，已無多餘的空間可以撥用。聽說公園對面中山南路西側，原為台灣省政府職員宿舍區，已為台北市政府收購。除其中一部分撥給弘道國中外，尚有餘地未決定用途。

館長乃赴台北市政府接洽，說明市府以前同意撥用市有地三千坪供遷建中央圖書館之用。現中山南路一段有一塊市有地，另請核准撥用，以便提前動工。市府主辦人員簽報市長，蒙核定照撥。因為撥給中央圖書館遷移的新址，原是省府職員的宿舍，住戶不肯遷出，並拒絕進入丈量土地，僵持不下。後來住戶不幸發生火警，原有宿舍燒成瓦礫，方解決住戶遷出的問題。另外，警總在撥用地上有幾間倉庫，他們堅持以市區兩百坪空地為遷出的交換條件。這件事由朱部長請國防部高魁元部長出面關照，方順利拆除。中央圖書館王振鵠館長對籌建新館非常積極，公開招標決定最後的建築計畫圖樣，並製成模型，連同建築經費預算等，報經教育部後，轉送經建會審核。

不久，朱部長接到經建會王秘書長來電，告知中央圖書館興建計畫已經審核無問題，但是建築物距離馬路太近，形勢顯得侷促，會影響中山南路一帶的景觀。最好洽請台北市政府增撥土地，讓建築物至少後退六公尺，前庭便覺寬敞。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教育部便邀請台北市李登輝市長、馬鎮方秘書長、經建會俞國華主委、王章清秘書長等舉行一次餐會。由王振鵠館長先做簡報，請台北市政府顧及中央圖書館外圍與中山南路一帶的景觀，再增撥一百三十餘坪，使建築物能夠後退六公尺。李市長當時答應增撥土地，撥出弘道國中的拓寬操場預定地一部分，給予中央圖書館作為後退的用地。教育部除感謝台北市政府外，同時也感謝經建會從旁的支持。

### 九、籌辦空中大學

我國實施空中大學的制度，從民國五十四年開始。起初只是職業學校階層，以電視教學為主，另以廣播、函授及面授等方式配合施教，實施進修補習教育。以後提高到空中專科層次，入學人數很多，要求再向上升到大學階段。民國七十年七月，行政院指示教育部籌辦空中大學。七十一年七月修正「大學法」，增列第七條



「教育部得設立空中大學，其組織暨教育設施以法律定之。」教育部因此開始積極進行空中大學的籌備工作，最迫切的事項，一是開闢電視的教學專用頻道；一是研究擬訂設立空中大學的法規草案。

(一) 增設超高頻率電視頻道：教育部辦理空中教學，一向委託中華電視台負責播放電視節目。華視是靠廣告為主要收入的營利公司。每天播放的黃金時段要安排廣告擁擠的節目，所以教學節目只能排在早晨和深夜。收視的空中學校學生感到時間太晚、太早都不方便，紛紛要求改善。如再增加空中大學的教學節目，必要另闢教學專用的電視頻道，所需經費為數頗大。教育部認為這有實際上的困難，而且是辦理空中大學首要解決的問題。因此，於民國七十一年七月間，於行政院舉行會議商討，由孫院長親自主持。華視先報告增設超高頻率電視頻道的計畫與經費預算，並就此進行討論。最後孫院長裁決：撥發四億元經費，委託華視增設超高頻率電視頻道，兼負公共電視與教學電視的雙重任務。一年後，增設電視頻道工程完成。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一日舉行開播儀式，孫院長親臨致詞頒獎，並按鈕開播大學進修學科的節目，效果良好，為籌辦空中大學跨進一大步。

(二) 研訂空中大學設置條例草案：教育部奉命籌辦空中大學之後，即派員赴日本、美國、英國參觀其空中教學制度、教學方法等，蒐集有關資料。並聘請傳播學科專家，研議空中大學各項問題，如：學生入學條件可否申請兵役緩召、每學期選修學分數有無限制、修滿學分或選修學分及格如何發給證書、畢業可否授予學位等問題，都詳加討論，將結論擬成「設置空中大學條例草案」，報請行政院核定。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行政院審議小組舉行會議，逐條討論。其中有一位政務委員認為空中大學畢業生不應授予學位，但在條文中不做明文規定。民國七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行政院院會通過本案，送立法院審議。五月二十三日朱部長曾往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報告本案要點，並答覆立委質詢。不久，內閣改組，使得本案延至七十四年才完成立法程序，六月一日公布。民國七十五年八月一日國立空中大學正式成立，九月七日開始招生，十一月開學上課。

根據「空中大學設置條例」中的規定：空中大學畢業生不授予學位。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修正「學位授予法」，認為國立空中大學辦學績效已獲得社會之肯定，又該校全修生畢業資格與一般大學相同，所以在該法規中增訂授予空中大學畢業生學士學位，而且此效力溯及過去修滿規定學分的畢業生。這可說是遲來的榮譽。

### 十、研擬大學入學聯考新制辦法

本省舉辦大學校院聯合招生始於民國四十三年，當時只有四所大學參加。因為考生不必多次應試，又試務省力、省時、省錢，參加的學校逐年增加。除大學外，高中、專科、軍校招生，也採行聯考方式。雖然聯考絕對公平，但也有「一考定終身」、「不能按志願分發」等批評。因為大學聯考的影響很大，其改革為各界所關切，也是教育部列為施政措施之一。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朱部長奉命在總統府報告「高中以上學校入學考試的檢討與改進」，會後蔣經國總統又召見朱部長，囑咐對大學聯考要切實研討改進。

教育部前於民國六十五年，報奉行政院核准設置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部長兼任主任委員，聘請公私立校院長為委員。該會任務為關於大學考試的規劃及政策的研究改進。這些年來有過許多的改革與進步，如：舉辦職校畢業生甄試保送入大學及技術學院、數理科資優生保送入學或提早報考、國際競賽獲勝者保送深造等。有了多元的升學管道，頗受社會的好評。

教育部又想在現行大學入學考試的成規外，再研究其他更理想的辦法。於民國七十一年成立一研究小組，聘請師大教授宗亮東先生、東海大學梅可望校長、成功大學夏漢民校長、高雄師院林清江院長、台北建國高中黃建斌校長等五位為委員。請宗教授為小組召集人，開會時教育部次長及高教司長均列席參加討論。在首次會議時，朱部長致詞，感謝委員們能為大學入學聯考的改革殫思竭慮，為幾十萬青年的未來開闢坦途。接著提出幾點要求：

1. 教育部現有改革聯考的文件與研究報告，包括：專家建議、各國大學入學辦法的考察報告、民意調查等，共有二、三十件，請諸位委員先逐一詳加審閱，那些意見和方法可供參考，那些大而無當、或窒礙難行，讓我們通盤瞭解各種說法的利弊得失。
2. 研擬新制度和辦法要兼顧學校招生與考生報考的願望：一方面加強升學輔導，考生根據自己的志願與學力，選擇最適合的學校與科系，方能發揮智能，成材達德，不負平生之志。一方面請學校提出各系研究、教學的基本條件，選擇優秀考生造就學者專家，為學校系所增光。兩方面都能如願，才達成入學考試適所適才的目標。
3. 每年聯考有十多萬名考生參加，聯考辦法要絕對正確可行。絕不能有“姑且試試看的態度”。如有失誤，無法找考生重考來補救的。
4. 本研究小組工作期間訂為一年，明年三月底提出研究報告。四月至五月將改

草案報行政院核定。這是聯考的重大改革，應在一年前，即今年六月間宣布，並訂明年七月實施。

研究小組非常努力，一年內舉行過許多次的簡報、記者會、公證會、研討會，凝聚幾項共識：

1. 聯考科目除國文、英文為共同科目外，分為四個類組。第一類組是報考文法商等學院的考生，考試科目為社會組數學、歷史、地理三科；第二類組是理工學院甲類的學生，考試科目為自然組數學、物理、化學三科；第三類組是理工農學院乙類及醫學院的考生，考試科目為自然組數學、物理、化學等三科；第四類組是農學院甲類的考生，考試科目為自然組數學、化學、生物三科。
2. 考試時間排定三天，以便考生能跨組考試。
3. 由各校科系自行決定計分加權及加權比重等。
4. 考生先考試，再根據成績，參酌志願，填寫所選擇的學校科系。
5. 測驗題閱卷、計分、分發、查卷都以電腦作業。

教育部的聯考改革案先送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討論通過，再報行政院核定後，於民國七十二年六月間宣布聯考改革的新制，定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實施。可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所實行的新制，已是下任部長任內之事務了。朱部長任內定下「先考試後填志願」的方式，仍一直沿用了二十年，直至今年。

## 肆、後記

---

在這次訪問中，我們瞭解許多教育政策的制定與落實方面的過程，那種感覺很特別。因為是經由前人的努力耕耘，才有我們現在周全的教育環境，感恩之情充塞在我們心中。

這次訪問過程中，最令我們難忘的是朱部長爽朗的笑聲與親切的態度，更讓我們這些晚生後輩感受到一位政治家與教育家的風範。



# 時代青年的導引者 — 李 煥

(訪問及資料整理：劉春榮、簡惠閔、陳怡親)

## 壹、生平簡介

---

李煥先生，民國六年生。

###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暨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畢業。

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得到教育碩士學位，並於民國八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膺選為該校傑出校友並獲傑出服務獎。

民國六十年十一月獲頒韓國檀國大學榮譽哲學博士學位。

民國七十年五月十三日獲頒韓國成均館大學榮譽哲學博士學位。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日獲頒中山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 經歷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起任中國國民黨青年部處長。

民國三十九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長與組總幹事。

民國四十年八月任救國團總團部主秘，五十二年九月任副主任，五十七年擔任救國團總部主任。

民國六十八年擔任中山大學籌備處主任。

民國六十九年五月至七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擔任中山大學校長。

民國七十三年六月至七十六年五月任教育部長。

民國七十六年六月至七十八年五月任中國國民黨中委會常委兼秘書長。

民國七十八年六月至七十九年五月擔任行政院長。

民國七十九年六月至八十九年五月十九日擔任總統府資政。

民國七十六年八月至今擔任太平洋基金會董事長。

### 座右銘

教育工作者是國家建設的無名英雄

「中國人有一句話：尊師重道是建國重要的基礎。因為教師是一項很神聖的事業。不論是在現在或未來，國家的建設都要重視教育，重視教育工作其實就是要重視教師，因為教師是教育的靈魂。我認為教育完全是要發自內心的自身功夫，每一位擔任教職者都必須要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自己的潛能。台灣幾十年來經濟發展迅速，推究起來，其實是教育工作者用心培植人才之故。社會的成功基本上是來自於教育，沒有教育就沒有建設，所以，教育工作者是國家建設的無名英雄。我希望未來將擔任教職者，都要體認到自己對於國家社會的重要性，以傳道自任，教育學生。」

## 貳、重要事蹟

.....

### 一、致力推動青年工作

「我在大學時代就讀復旦大學法律系，大學畢業後，我就從事青年工作。尤其是在來到台灣之後，我主持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因此跟青年接觸的機會很多，在這個接觸的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對青年人來說，教育很重要。慢慢的，我的興趣就轉到教育方面，後來我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教育學院，專門研究教育。教育確實是國家一個根本建設的工作，以台灣來說，過去在日據時代，因為日本將台灣視為殖民地，對於台灣青年的教育有許多的限制。我記得在民國三十八年到台灣時，當時台灣同胞大學畢業的很少，大多只是中小學畢業，因為日本是採取殖民政策，不讓台灣人有深造的機會。只有學醫與農的人可以念大學，其他如：法律、政治、經濟等都沒有培植人才，因而造成當時台灣嚴重的人才缺乏問題。舉例來說，當時縣市長選舉時，我們要找適當的人來競選，發現一般同胞都沒有受過大學教育，只好選擇醫生來競選，結果各縣市長都是由醫生來擔任，這是由於缺乏政治人才的關係。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教育是極為重要的，台灣光復後政府很重視教育，一

方面是普及教育，讓每個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另一方面採取低學費政策，使人人有上進的機會。台灣幾十年來經濟建設成功，完全是仰仗人才的培植，台灣缺乏自然資源，經濟的發展要靠的是人才的培植。幾十年來，我們在工業上、農業上、商業上都有很好的成績，都是由於人才的影響，證明教育培植的成功。」

「由於對教育工作很有興趣的緣故，我擔任過中山大學的校長，之後也曾擔任教育部長。我們國家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就是尊師重道，受到孔子儒家文化的影響，大家對於教育都非常關心。孔子的思想就是希望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理想社會最高的原則就是要重視倫理思想與人倫關係。倫理思想部分，孔子認為要由教育來造就，教育中教師是很重要的部分，同時包括言教與身教，除了要豐富的學識外，同時要做青年的表率。」

李煥院長擔任救國團的服務工作，長達二十多年。由於認為青年是國家最重要與寶貴的資產，因此，對於青年工作的推動，一直是不遺餘力。然而，對於青年人來說，教育是一重要的學習過程。因此，李煥院長便開始對於青年人的教育工作賦予極大的助力，使其有更長足的發展。

## 二、教育部長任內，對於教育發展的看法

「回想我過往的政治生涯中，我最喜歡的還是教育方面的工作。在教育部長任內，我最滿意的部分有：促進教育體系的健全，包括生活教育、道德教育與知識教育等方面；另外，對於教師生活的改善，教師待遇的提高；師專改制為師範學院以提昇教師素質。這些都是我覺得在教育上相當重要的部分，也是我自己最滿意的教育工作部分。我在教育部部長任內，對於教育發展有許多的看法，簡單歸納來說。有下列三個方面：」

### （一）對於中小學教育的看法

「我認為我們的教育體系，在國民小學階段應該重視生活教育；在國民中學時代應重視道德教育，以生活教育為基礎建立起教育規範，之後方可發展知識教育。在這樣的觀點之下，我在教育部長任內大力推行小學生活教育與中學道德教育，因為教育的目的在於造就一個現代國民，而一個現代國民最重要的基礎就是生活，能夠非常規矩，重視自己的德行。所以，我認為生活教育與道德教育應該納入基礎教育中的重要內容。」

### （二）對於十二年國教的看法

「現今我們是九年國教，以國家現在經濟條件與力量，是可以將九年國教提升到十二年國教。我曾經在教育部訂定一個『實施十二年國教計畫』，在我的計畫

中，十二年國教與九年國教不同，目前我們實施的九年國教是一種強迫教育；而計畫中的十二年國教是非強迫教育，而是國民中學畢業的學生如有意願繼續升學，國家應該要給他繼續教育的機會，國家應該滿足學生受教的需求。計畫完成後，因為人事變動的關係，我離開教育部，因此這個計畫無法付諸實現，現在仍覺得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 （三）對於高等教育的看法

「大學教育是國家教育非常重要的部分，尤其現在時代進步的腳步極為快速，一般國民生活水平都已提昇，因此大學與研究所的教育工作更顯得迫切與需要。現在大學畢業生可以說是與三十年前高中畢業生差不多，因此要提高大學生的素質。我曾經在教育部做了一個決定，要求國立大學應該加強研究所的教育。現今私立大學很多，一般大學教育可以讓私立大學來辦理，而國立大學應將重點放在研究所。教育經費有限，每年都要增加經費，國家應該多投資在研究所，如此一來，國家可以培植出更高級的人才。」

由李煥院長對於教育發展的看法中，可以知道李煥院長對於教育的發展，有其卓越的見解。即使到今日，以此來思考當今教育現況，亦感到相當地實在。讓我們更加地佩服李煥院長對於教育所展現的宏觀與睿智。

### 三、擔任中山大學首任校長，對學校的規劃

「我擔任中山大學籌備處主任與首任校長，推動南部的高等教育發展。當時，將中山大學規劃成立在高雄，就是希望南北平衡。那時候台北有許多大學，而高雄卻只有一個高雄師範大學，所以，決定在高雄成立中山大學。中山大學的籌畫與建設，我個人覺得是一件相當榮耀的事情，中山大學的成立是要紀念我們的國父。有著這樣重大的意義，我在中山大學建校時，就考慮如何在高雄發展教育理念。經由規劃，除了一般大學教育外，我們特別重視社會大眾方面的推廣教育，不僅讓中山大學學生受惠，更要讓整個高雄地區人民都有受進一步教育的機會。我們辦理了很多進修教育與推廣教育，來實現終身教育的理想。在南部有許多人並非是正式經由聯考進入中山大學就讀，但是他們都到中山大學受過教育，這一點是地方繁榮與提昇文化水準的契機。」

「在學系規劃方面，因為高雄師範大學的學系比較偏重社會人文科學方面，因此，中山大學在學系規劃方面是較為著重理工科系來平衡。由於高雄地區是以工業發展，因此在開始建校之初，我們就規劃以理工學系為主。又，因為中山大學的設立是要紀念國父，所以，我們特別規劃成立中山學術研究所，在中山學術研究所包



括許多人文社會學系，如：哲學系、政治系、法律系等。」

由於李煥院長對於中山大學的規劃，為中山大學的學術與校風奠定良好的基礎，高雄西子灣方有今日的大學城風貌。教育是一百年樹人的工作，前人辛勤的耕耘，使後人方有良好的學習環境。

#### 四、擔任太平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對文化活動的推動

「我自民國七十六年擔任太平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至今，該基金會主要是從事教育與文化活動的推廣，目前更是積極與大陸方面進行交流。」

「在我擔任行政院院長的過程中，我曾提出國家文化建設方案，大力推動文化建設。從事國家建設的過程，我發現國家建設主要有四大項：第一個應以文化建設為主，其次為政治建設，再為經濟建設，最後是社會建設。一個國家假使不重視文化，即使該國家經濟建設很有成就，在社會上亦會散佈著不好的風氣，因此我認為文化建設是最重要的。也由於這樣的原因，我在四大項國家建設中，首重即文化建設，因為文化建設領導著一個國家。假如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成功，卻缺忽略文化建設，社會上會瀰漫著一股貪污、糜爛的風氣，因此，文化建設是國家建設最重要也是最基礎的部分。」

「離開行政院長的職務後，由於對於文化建設的重視，就開始從事文教活動，我擔任太平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已十多年，藉著這個職務來積極推廣我們的文化與教育活動，頗有建樹和心得。」

#### 五、對於現今教育的看法

「現在教育上有一些現象，我個人認為是需要深入的反思及檢討。」

##### (一) 師範教育制度存廢的看法

「現在有人主張不要師範教育，要以普通大學教育來取代，師範學校要合併到其他大學之中。我認為這個問題是很值得重視與研究的。因為我國尊師重道、重視教育，因而有這樣的師範教育體系。過去師範大學有三所，培育一般中學教師；另有九所師範專科學校（即今師範學院）培育小學教師。」

「我在教育部長任內，把九所師範專科學校均改制為師範學院，以往小學教師只要高中畢業的程度就可以任教了，改制之後，將小學教師水平提昇大學程度。中學教師與小學教師不應該在學歷上有所差別，教學對象雖有不同，但是責任與困難是相同的。不論對於兒童或是青年，在教育上都應該提供很好的師資，所以，教師在學歷上應該都一樣，要具備大學以上的品質。除了在知識水平方面的提高，我們

同時也提高小學教師的待遇，在過去中學教師的待遇比較好，小學教師待遇較差，但是我覺得他們的辛勞與貢獻是相同的，因此，我將小學教師的待遇提高到與中學教師相同。」

「師範教育的制度並非每個國家都有的，在我擔任教育部長任內很多國外的教育團體來台灣參觀，都相當欽佩與羨慕我們的師範教育制度，亦向我表示教師的培植是需要像我國這樣的師範教育制度來培植。反觀現在有許多人提倡取消師範教育，這一點是很值得再重新檢討與考慮的。一般大學畢業的學生是否能在學校任教，我想這並不是說一定不能，只是沒有師範學校畢業的學生恰當，因為師範大學對學生的教育與一般大學對學生的教育是不同的，舉例來說：台灣大學有物理系、師範大學也有物理系，但是兩所大學物理系著重的重點必有差異，一般大學中物理系所學習的是物理學，師範大學物理系著重的是如何教學生學習物理。在我擔任教育部長時，曾經對師大校長說過，師大各系的課程內容與一般大學各系所研讀的重點是不同的，師大學生學習的重點是如何教中小學生學習該科目。同時，師範學校學生就讀師範學校是一開始就準備做一位教師來奉獻於國家社會，而一般大學的學生擔任教師是把「教書」當成一種職業而非是一事業，在沒有更適當的工作選擇之下，便先擔任教師，相較之下，師範學校的學生擔任教師是把其做為一生的事業，存著對國家的使命感。」

「我要再提出一點師範教育制度有必要永存的原因。師範學校學生將來一定要教書，因此他們的言行可做為青年的楷模，在師範學校受教於時即有許多言行規範，然而，一般大學教育強調自由民主開放。有許多人表示，在美國已沒有師範教育制度，可是他們並不清楚，美國雖沒有師範教育，但是中小學教師任教後一定要到教育學院就讀，因此，許多美國中小學教師都有教育學位。美國教師在任教後必定要有教育方面的訓練，而我國更是有遠見，我國是在教師任教之前做好職前訓練，這樣的制度是更好的。我認為一般大學教育是不能取代師範教育的存在意義。」

任何一項制度的改變都需要有周密的思量，我國師範教育制度培養出許多優秀的教師。在今日廣開師資大門的時候，相信保有多元的方式，才是最正確的方法，而不是只是一昧地想要將舊有的傳統完全予以摒棄。李煥院長這一席話，對於目前紛擾的師資培育政策，無異是暮鼓晨鐘。

### （二）現今高等教育的問題

「現今教育另有一個問題存在，就是高等教育廣設、浮濫的問題。現在我們台灣就有一百四十多所的大學院校，我認為大學的增設，應該做一個全盤的考慮，因

為太多的大學會造成素質下降的問題。像菲律賓就是因為大學過多，所以有學生畢業後沒有工作機會的現象，造成社會的動盪，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借鏡的。大學的多寡是一個問題，一個大學是否合於大學的標準與要求，是另一個問題，如：師資、設備等，是否合於一個大學的標準，都要加以考慮。」

「現在很多專科學校都改制為科技大學，我認為這樣的政策是值得再研議的，因為專科學校的學生是要擔任中層領導階層的人物，專科學校要培養中層領導階層的機構，如：一般工專畢業的學生就是在工廠中領導工人的工作；大學教育培養的學生是擔任工程師、高級領導階層的工作。不論是中層領導階層或是高級領導階層對我們社會的重要性都是一樣的。各級學校都各有其功能，我認為要成立科技大學可以另外成立，並非是把專科學校全部改制，因為這樣中層領導階級的人才會斷層與缺乏。各級學校的成立一定都有它的目的與意義，一味的改制，這樣的政策是有其危險性存在，應該再做一個妥善的規劃。」

### （三）升學競爭的問題

「一般學生大都是重視知識教育，這樣的現象已經存在於教育中多年，我認為這在教育體制上可做為研究與改進的方向。現在台灣教育仍是以考試的方式來決定學生升學方向，台灣學生長久以來對於升學壓力一直是感到困擾的，其實這個現象也存在於世界各先進國家之中。以美國來說，學生升學也是競爭得相當激烈，因此，這是存在世界中的普遍現象，很值得我們再加以思考。」

## 參、後記

.....

李煥院長與我們分析當今的教育問題之後，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李煥院長已經離開教育部多年，對於教育的關心是從未停止。相信這是一種對於教育的熱愛，引發出其對於教育的執著吧。

# 人文理念化成行動的實踐者

——郭為藩

(訪問與資料整理：鄭玉卿、梁淑惠、吳美玲)

郭為藩先生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三日生於台南。在台灣師範大學取得教育碩士學位之後，又於法國取得特殊教育學博士學位。歷任教育部常務次長、師大校長、文建會主委、教育部部長、駐荷蘭代表、駐法國代表等。在教育部長任內，引領國內教育走向多元化、自由化，是國內教育改革的領航者。先生現為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名譽教授。

## 壹、生平簡介

.....

### 學歷

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畢業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巴黎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專案文憑  
巴黎大學文學院教育學博士

### 經歷

師大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教育部常務次長  
主持教育部教育計畫小組  
膺選美國智能不足學會哲士  
擔任國際傷殘復健聯盟教育委員會委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  
文建會主委  
教育部部長  
駐荷蘭代表  
駐法國代表  
台灣師範大學名譽教授

## 座右銘

郭為藩先生認為他沒有特別的座右銘，但他特別喜歡二句話。分別是老子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與班哲明·富蘭克林的一句話「假使你希望別人喜歡你的話，你必須先要喜愛別人，並使自己可愛。」他說他常在寫文章時，引用這兩句話，作為他自己的人生哲學。

郭為藩先生於教育部長任內，帶領國內教育走向自由化；支持教育鬆綁與終身教育，對日後國內教育發展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如同郭為藩先生自己所形容的：「給我一個職務我總想全心全意去做好！」因此，他一路走來，以其一貫嚴謹誠正的態度，在不同職位上，表現「勇於任事，隨緣盡分，溫柔敦厚，多情守禮」的人文風格，並為國內教育的興革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績。

## 貳、年少歲月

.....

郭為藩先生，民國二十六年生於人文薈萃的文化古城—台南市。父親從事船務的生意，家人常往來安平、廈門兩地。因為環境的緣故，他自小有做航海家，環遊世界的夢想，是促使他日後喜歡到世界各地旅行的原因。民國三十七年，肇因於大陸局勢動盪不安，舉家自廈門遷回故鄉台南定居。

郭為藩先生於協進國小畢業之後，以第一志願進入台南一中就讀。在台南一中期間，他充分展現自己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才華，在校內擔任刊物的主編。於校內、校際間的藝文比賽，更是無往不利。

參加民國四十四年的五院校聯考，郭為藩先生以第一志願進入當年新設的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並因體悟知識的浩瀚廣闊與無垠無涯，選擇能有效利用知識的圖書館組就讀。

## 參、探索與培養教育理論知識的關鍵時期

大學畢業之後，經過在考試院圖書館短時間的實習，郭為藩先生回到社會教育系擔任助教。隨即於民國四十八年考上師大教育研究所，以論文「戰後法國的教育改革」，於民國五十一年取得碩士學位。因為論文需研讀法國第一手的文獻資料，郭為藩先生還特地修讀法文，可見他治學認真、嚴謹的一面。在我們的訪談中，他特別提到當時的情況：

「主要是因為我的碩士論文，我寫的碩士論文要看一手資料，所以就開始學法文，我到震旦語言中心去學，剛好指導我論文的李貴良神父，他是比利時魯汶大學畢業。那時候，他也透過教會買了一些有關的參考書借給我看，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接觸了一點法文教育文獻，後來剛好參加公費留學考試上榜，規定可往英國二年或法國三年，為順利完成博士論文的時間考量，所以我就選擇法國。」

後來，又考取了法國政府獎學金，郭為藩先生決定前往法國留學。

前往法國研讀前，謝徵孚教授為他餞行。建議他一定要跟著當時巴黎大學的 Georges Gurvitch 或 Raymond Aron 等社會學大師學習。他一直將謝老師的話謹記於心，但到巴黎大學時，他卻發現事與願違。首先，是當時的法語程度仍不足以應付課程，另外則是深感自己在社會學理論知識還待充實。但在此時，他卻聽說心理學大師皮亞傑，正在巴黎大學的心理學研究所任教，他自覺對探究心理學較有興趣，因此乃決定轉到兒童心理學的領域。

郭為藩先生提到當時他轉到心理學領域的情況：

「我剛去的時候，法文程度還不夠上課，所以就先念語文，聽聽課。後來，我想跟著 Piaget，他那時在巴黎大學。」但是很可惜的是，「等到正式找指導教授的時候，Piaget 已經離開了巴黎，回日內瓦。」因此，他便在 Maurice Debesse 教授的指導下修讀博士學位，並在巴黎大學心理學研究所攻讀心理學專業文憑，專門從事特殊兒童心理輔導的研究工作。

在教育研究的領域上，由大學時期社會教育圖書館組，到研究所偏比較教育，最後到了法國，由一開始的社會學、教育心理學，最後正式踏上鑽研特殊教育的道路，為日後他在行政領域的專業上，培養專業的根基。

「我曾以兩年時間，先修心理師 (psychologist) 的文憑，偏重在特殊兒童心理測驗方面，幫他們做測驗、並個別輔導。取得文憑後專心寫論文，由於第四年，已經沒有獎學金的補助，所以法國政府就給我一個和獎學金學生同樣的待遇。中間曾

經利用暑假接受「特殊兒童夏令營」輔導員訓練，並到兒童夏令營去做輔導員，有一些實務經驗。」此外，「在學期間我也參加一個學生社團，在 Salpetriere 醫院腦性麻痺兒童部門當義工，每週一次帶病童到公園、到博物館活動，這些經驗使我開始對特殊教育有興趣。漸漸把修課的重點，放在特殊兒童的心理學方面。」

郭為藩先生很欣慰地回憶著：

「那四年是蠻充實的，法國本身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環境，可以隨便到處去聽課，參與藝文活動，所以非常充實。」

從此可知，郭為藩先生年輕時是一位用功的學生，他不但能充分把握優異的學習環境，且因為法國自由、開放的環境，讓他更能徜徉在專業知識浩瀚中，並經由參與社團活動，在實務上印證所學之理論。而在與特殊兒童的接觸之後，也讓他發現特殊兒童的自我觀念尚需有更多人員投入相關研究，因此他選擇了這方面的主題深入研究，並完成他的博士論文。他回憶起當時回國的情形：

「在法國四年之後拿到博士學位，第二天就坐飛機回台北。巴黎大學考試不好安排，教授也忙，到了十一月才安排好，十一月初考完就趕回來了。」

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郭為藩先生甫獲博士學位返國，即應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田培林院長邀請，進入師大教育研究所，擔任副教授。郭為藩先生回國之後，適逢九年國民教育開始實施，推動之前的許多配套措施，急需專業人才的參與。因此，先生在特殊教育上的長才，便受到政府的重用。他娓娓說道：

「民國五十六年回來，剛好國內也開始重視特殊教育。民國五十七年開始九年國教，所以特殊教育相關領域學者，當時頗受政府重視。我當時主持國中益智班教師的輔導，推動特殊教育，並參與教育部進行的國內特殊學校評鑑。」

在講求教育機會平等的基礎下，特殊兒童同樣也應有平等的對待與人格的尊重，更不能否定他們享有受教的權利。這是一個講人權、論平等社會的基本要求。他們需要的不只是同情與憐憫，而是身為一個人的尊嚴與潛能發展。郭為藩先生便秉持著這樣的理念，持續為特殊教育奉獻心力。另外，也因他特殊教育的專業學識，遂於五十九年出版特殊教育的大學教材，為國內特殊教育方面較早的論著。

隔年，郭為藩先生獲中英文化基金會研究獎助金，前往英國倫敦大學研究特殊兒童輔導與福利措施，半年之後回到國內並獲國科會補助，準備前往日內瓦大學研究皮亞傑心理學。郭為藩先生解釋了當時的情況：

「民國六十年，升教授以後，我得到英國獎學金，就到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進修一年。到那邊主要是博士後研究，以參觀考察與自行研究為主。出國不久，即接到國科會的通知，獲知我出國前申請的國科會補助已通過，可以到瑞士日內瓦大學追

隨 Piaget 研究。當時我很為難，因為依規定，師大已給我一年的留職停薪出國進修，第二年，就不能再出去，但是國科會這個計畫放棄很可惜，本來去就是因為 Piaget 才申請的，所以我就提早半年結束英國研習活動，預定返國服務半年以後，再接受國科會的補助到日內瓦去。」

礙於學校規定教授出國留職停薪，不得連續兩年，郭為藩先生提早自英國回國復職，預計半年後再前往日內瓦，完成跟隨當代心理學大師一起研究的心願。次年，就在先生一切出國準備就緒之際，突然接到當時內閣改組就任教育部長蔣彥士先生的邀請，欲延攬他到教育部服務：

「我跟蔣彥士先生一直不熟。當時他找一些學術界的人士討論教育問題，他約我面談，留下了良好印象。」

這項提議使他掙扎許久，如果前往任職，將可奉獻畢生所學，藉由國內教育政策的規劃，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但這卻意味著追隨皮亞傑研究的夢想，將再與他擦身而過，使得他陷入兩難之中。

## 肆、學而優則仕的貢獻

最後郭為藩先生決定留下，為國內教育貢獻一己之力。在與蔣彥士部長的長談之後，由先生擔任教育部次長成為定局。先生憶及當時的情況說：

「蔣彥士部長邀我擔任常務次長，那時候我在毫無行政經驗的情形下進入教育部服務。」

因此，民國六十一年可謂郭為藩先生由學術界轉任仕途的關鍵時刻。當時他放棄前往日內瓦大學的機會，接受教育部常務次長的職務，開始接觸教育行政事務。

於民國六十一到六十六年的教育部次長任內，郭為藩先生推動的幾項對國內教育重大改革方向有三：一為教育計畫小組的設立；其次，特殊教育的推展；最後是大學評鑑的推動。這些教育改革在當時都是很創新的想法，引導國內教育縮短與先進國家的差距。

在教育計畫小組的工作的推廣上，主要有下列面向：

- 一、從事各級各類教育的專案規劃，期使學校培育出來的人才，在數量上能與人力供需相配合，在素質方面能適應國家建設的需求。
- 二、從事各項問題的專題研究，期能透過專家與學者的深入探討，提出多項資料與建議，藉以提供教育規劃的參考。
- 三、編印教育計畫叢書，溝通教育觀念，期使行政與學術一體、理論與實際結合。



四、舉辦教育計畫研討會，期使各級教育行政人員有一個共同討論與進修的機會。

其次，在特殊教育上，郭為藩先生的貢獻更是不遑多讓。先生延續他在就任前，於民國五十九年推動的國中「益智班」教育，以及民國五十九年教育部頒訂「特殊教育推動辦法」的一貫理念，繼續推動國內多項特殊教育政策。在先生的推動下，促使國內特殊教育更制度化。主要推動的項目如民國六十二年召開全國特殊教育研討會。次年，民國六十三年，因應研訂的「加速特殊教育發展計畫」，由行政院提撥一千三百萬的專款，進行特殊兒童的普查及在各師範院校及師專設立特殊教育中心，充實各特殊學校的設備及辦理特殊學校師資的培養與出國考察，厚植我國特殊教育的發展基礎。同年，並研訂「特殊兒童鑑定及就學輔導標準」。六十四年頒布「特殊學校教師登記辦法」，更使得我國的特殊教育開始逐漸步上軌道（林振春，民 72），為今日特殊教育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這五年的行政歷練，讓郭為藩先生在實務中驗證理論，以理論改革實務，因此先生說道：

「那五年對教育有比較實務的了解，所以我感到我運氣好就是說，我除了理論之外，還有很多實務的經驗。」

這段期間先生推動的教育政策，除了將我國的教育制度推向更專業化、制度化，有些政策更成為日後教育推動的基礎，如先生推動的大學評鑑，現在則有高等教育評鑑。至於當時推動大學評鑑的緣由，他在訪談中表示：

「當時常直接引用國外的教育改革政策理念，但是要把一個觀念引進到國內用，很不容易，像美國有大學院校認可制，還有一些專業的機構做評鑑，但是在國內，要有一個專業機構做評鑑很難，所以，要由教育部來做。當初我們開始做評鑑的時候，正好有一些學校出了問題，因此評鑑在當時也算是因應需要產生的。」

民國六十六年，教育部改組，先生主動請辭。經過五年的行政歷練，讓他對於行政決策過程更加瞭解，對於做人做事的態度與想法，也有更深的體悟，再加上本身原有紮實的學術涵養，隨時有再出發的動力。在教育部五年的時間，讓先生厚植實務經驗，奠定日後任公職的基礎。

## 伍、開創師大的嶄新扉頁

---

郭為藩先生在訪談時，敘述當時請辭教育部次長後，回到師大時的情形。他憶及當時，說道：

「回來師大，任教一年餘，因為研究所所長出缺，便接任所長職務，時間很

短，大約只有一個月，後來被遴聘為校長，自民國六十七年到七十三年為期六年，出任校長兩任。」

先生在眾望所歸之下，榮任師大校長。是師大校友擔任校長的首例，深具歷史意義。為不負所有「師大人」的期望，他付出加倍的心血，戮力以赴。

由於除了出國進修的時間，郭為藩先生幾乎沒有離開過師大，可以說是一個對師大瞭解甚深的人。因此，改革師大應從何處著手，他早有定見，且胸有成竹。首先是關於學校環境的整建。當時師大校園狹窄，校內同時充斥著違章建築，此無疑窒礙了師大的發展。因此，他就任師大校長之後，首要之務便是拆除違章建築，還給師大一個乾淨完整的空間。他描述當時校內的情況：

「師大現在的操場，在當時整個都是違章建築，為了整頓操場，那時候拆了四十幾戶違章建築。」

在先生的努力之下，終於還給師大一個煥然一新的校園環境。接下來便是充實校內建築設備的工作。先生積極向上級爭取興建師大的經費，在他的奔走之下，師大校園陸續擴建體育館、音樂館、美術館、圖書館新館、教學大樓、研究生宿舍、理學院大樓，都是在他的任內完成。師大在先生的規劃建設下，重新為校園注入一股活力。在完成硬體設備的更新之後，接下來便是校內資訊軟體的架構。在先生任內，完成電子計算機中心的籌建，以利學生查詢資料，活絡學生研究風氣；裝設完整的國際百科資料庫，以及資訊電腦檢索系統；並添購完善的各類視聽教育系統，這些軟體的充實，不僅是他對師大的重要貢獻，更是其他欲從事教育研究人員的一大福音。

郭為藩先生當時除了對師大進行有形的具體建設，也進行了無形的建設。先生首先希望重新塑造師大新形象，其次為拓展師大對教育界的推廣服務；最後是建立師大人自信的心靈改建工程，此番無形的建設，影響更為深遠綿長。

先生於任內舉辦多場國際性學術性演講，以及學術研討會，讓教育界相關人員進行專業對話，此舉不但可以提昇學術研究風氣，更可藉由國際上的學術交流活動，提昇師大的學術地位，帶給師大煥然一新的形象。

在拓展師大對教育界的服務方面，為擴展師大對整個教育界的服務，如強化國內外校友的聯繫、充實各系所器材設備、充實視聽教育館、成立法國語文進修中心、擴充國語教學中心、設立學生輔導中心、兒童圖書館，並與古亭國小合辦音樂資賦優異學生實驗班等。從此師大不僅是師大人的學校，更是整個教育界的學校。因為當時的社會對師範教育有諸多意見，針對當時社會上不同的聲音，他說道：

「那段時間外界對師範教育有很多意見。」

因此建立師大人的自信、品德、專業等，讓社會對師大更具信心，是他任內的著力處。況且，師大不僅僅是培育中等學校的學府，更肩負培養國內教育與其他專業人才的重責大任，對於國內文化建設的建構，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些因素都讓他總是諄諄告誡學生，在態度上，應：

「莊重而不冷漠；風趣而不輕浮；自信而不傲慢。」

並秉持自信心與自重感，將在學校四年所學之教育專業，奉獻社會，同時殷切地期勉學生以其一貫奉獻的心，堅持對教育工作的熱情與活力，只要盡心竭力堅持下去，必然會有收穫。先生的言教與自然流露的身教，處處展現他在經過多年的教學、行政、研究經驗之後，所體認到教育的嚴肅意義。

郭為藩先生，在師大校長六年兩任的任期內，除致力於整合行政實務與學術研究外，也推動人文教育，對學校多所建樹。師大在其任內，校園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蓬勃朝氣。

任期結束時，郭為藩先生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為期四年，其間曾主持：

「審查大學法修訂案、師專改制為師院等法案。」

隨後轉任文建會。回憶起文建會的工作，先生爽朗地表示：

「我最喜歡做文建會主委，因為那幾年的文化工作對我來講很重要，教育不是那麼容易看出效果，但文化工作有其熱鬧活潑的一面。由行政工作中參加音樂會、畫展，對個人是最好的文化陶冶。工作本身也是一種享受。例如畫展開幕，人家請我講話，就要事前準備，看很多書，便累積很多相關知識，所以我在文建會那四年半，在音樂、戲劇、藝術方面有廣泛接觸，對個人是很好的人文陶冶。」

此階段對郭為藩先生堅持人文與藝術信念的關鍵時期，先生同時也將如此的精神與信念，帶入生活中，影響了後來先生持續投入更多的心力於人文與藝術領域的各種探索。

## 陸、國內教育改革的領航者

.....

民國八十三年，郭為藩先生榮任教育部長，是其發揮所長，一展抱負理想的絕佳時機，也真正成為帶領台灣進行大規模教育改革的領航者。

郭為藩先生首先於訪談間提及，促使台灣啟動教改的動機與原因：

「當時亞洲重要的鄰國，如日本、韓國皆推動邁入二十一世紀應該有的教育體制，積極致力有關的教育改革，韓國直接由總統府，日本由首相主持。所以，我利用跟那時的李總統和行政院連院長見面的機會，建議進行教育改革的構想，希望得

到他們的支持。」

在高層的同意下，他便開始著手進行國內教育的安排。

為讓國內教育改革順利，整合各方意見相形之下顯得極為重要，因此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郭為藩先生說明道：

「當時成立教改會，敦請李遠哲先生主持，是在民國八十三年六月開始運作的。他們的任務就是匯整各方不同的意見，使我比較能充分集合大家的共識與力量，推動教育行政工作，所以教改會的成立是幫助教育部來推動教改的。」

教改會的功能在匯整各方意見，教育部同仁亦得以全心全意於政策性業務的推動上。當時郭為藩先生推動的教育政策有幾大方向，分別是教育自由化、促進教育機會均等與終身教育。

先生以嚴謹的表情，闡述著自己的理念：

「那時候政策方面還是朝幾個大方向，第一個就是，所謂鬆綁。鬆綁是一個社會大趨勢，所以我們強調教育自由化。教育自由化的精神，在充分尊重市場的調節機能；尊重學生、家長應享的選擇權；自由化運動引起熱烈討論，也推動了大學自主，開闢了師資多元管道等。教育自由化的另一些措施，包括課程的改革，尤其是大學軍訓課程、國父思想等的改革。」

「另外一個大目標是促進教育機會均等，以減少地區間教育品質的差異為重點，所以我當初提倡「教育優先區」。其次，減少公私立學校的資源差距，因為從單位教育成本來講，私立學校需要補助，公立學校享有較多資源。還有推廣特殊教育、全面改善國民中小學教學環境、推動國中技藝教育方案這些都是一些推動的方案。」

「還有在緩和升學歷力方面，入學考試多元化也開始在做。另外便是終身教育，目標是在離開學校後，隨時可以回到學校選課，發展終身教育有不少待克服問題，建立終身教育體制的構想，則需從入學制度與「零存整付」的修習方式入手。還有一個就是課程教材的改革，包括修訂高中、國中小學課程，也加強鄉土教學與世界觀教學、落實各級學校資訊教育、倡導現代生活倫理等。」

「另外，曾大力修訂各級學校課程標準，八十二年修訂國小課程標準，八十三年修訂國中課程標準，後來八十四年修訂高中課程標準，所以先後課程標準我都修訂了。而教科書的審定本制，也在那時候配合新課程標準，準備自民國八十五年開始實施國小教科書的開放政策。另外當時一個很重要的措施是邁向十年國教，那時候預計希望把國民教育多延一年，使那些不升學的學生，能多一年時間接受實用技職教育。」

又如

「師資培育多元化也是那時候大勢所趨，師範教育法改為師資培育法，並開放教育學程，就是在民國八十三年制定的。」

至於現今被廣為推動與實施的鄉土教育，也是由先生開始的。先生說到：

「鄉土教學是由我開始推動的。包括鄉土教材、鄉土語言，還有國中「認識台灣」的課程。」

先生早在多年前即首開鄉土教育先河，演變至今，先生當初推行的鄉土教學、鄉土語言，還有所謂認識台灣的課程，早已是學校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教育研究院也是先生推動的目標之一，目的在提昇教育研究的品質，以為推動教育的憑藉。

當時的台灣正處於轉型期，社會大眾對教育改革寄望甚深，相對地，郭為藩先生的壓力可想而知。例如：師範教育的改革，使我國的師資培育從此走向一新紀元。在語言政策方面，雖然他首先開始鄉土教學與方言教學，但在立法院被質詢時卻在使用的語言上，遇到始料未及的狀況。但先生依一貫讀書人的肩膀與風骨，以他的堅持贏得立委諸公們的敬重。他闡述當時的心情：

「在立法院被質詢時，我一直都堅持用國語回答，他們卻要用閩南語答詢，但因基於政府實施國語政策，我始終用國語回答，非答詢場合則視必要與立法委員以閩南語溝通，當時我隨時準備離開教育部，雖有許多我自己的堅持，最後還是受到尊重。我想基本上，你不是為你個人的利益，人家就還是會尊重你，自己要有原則。」

不只是教改的重擔，另外還承受另兩項重大壓力，先生微皺眉頭說道：

「我那時候受到二項重大的壓力，那就是教育部還要管高爾夫球場的開放審查與監督，及管制電動玩具店的經營，兩項政策很傷腦筋。」

郭為藩先生雖然任職其間承受極大壓力，但其在教育部長任內所推動的教育改革，充分展現出對教育自由、多元、公平的理念，開拓我國教育的新世界。所以，過程雖然艱辛，但也開啓了近十年來教育改革的序幕。先生露出一抹滿意地微笑，說道：

「我在教育部三年四個月，時間雖不算長，還好也做了很多事情。」

## 柒、人文與藝術的終身堅持

.....

教育部長卸任後，民國八十六年，郭為藩先生奉命至法國、荷蘭等地，擔任駐

外使節。先生依據在法國觀察到的現象，提到目前英語教育在法國的實施狀況：

「現在慢慢地，法國的小學開始有英語的課程。現在很多法國人講英語，特別是很多企業管理、國際貿易方面的生意人。學校有些課甚至還是用英文開課的，所以，法國人不太講英語的情況慢慢在改變。而且現在法國加入為歐盟，自然覺得外語重要，所以有些小學開始就學外語，英語還是最主要的外語，選英語的人差不多百分之九十。」

至民國九十一年夏天先生才卸職返國，目前主持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事務。他對人文與藝術有許多獨到的見解與經驗。

真、善、美的品質與全力以赴的處事態度是郭為藩先生一向在工作與生活上的要求。講究生活的品質、品味、品德則是他在生活中的實踐。先生認為：

「在文化價值中，有好的音樂、好的什麼，要能夠欣賞，如果有這種口福，就懂得去欣賞，就像喝茶懂得品茗，就比別人更有福氣；比別人更能欣賞音樂，也就比別人更有福氣。」

先生娓娓地說道：

「人文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要表現優雅的，文化上的優雅，除了品德、倫理之外，品味也一樣重要。」

而在工作上，同樣也以人文主義為做事主軸：

「給我一個職務我總會全心全意去做，例如我以學教育的來做外交官，這也不平常，但我在法國四年、荷蘭近一年期間，我自己也有夠水準的表現。雖然，不是專業的外交官，但我從文化角度切入，推動了很多國際文教交流的工作。」

這也就不難看出先生在任何工作上總是全力以赴、無私無我地奉獻。而在生活上，郭為藩先生也是一個將藝術與生活結合的人，這從目前先生辦公室中，舉目所及盡是優美的畫作，便可見先生已將藝術融於生活之中。

至於談到如何將其理念，推廣出去，郭為藩先生首先提到他擔憂的一些社會現象，他說道：

「我自己感受到一個危機，那就是現在人打電腦、看電視的時間實在太多，但是看一些深入的書的時間太少。電腦、電視是比較有吸引力，但是不見得有深度，當然它有它的功能。慢慢地，人的思考方式也會有改變。第二個是大家太過分強調權利，大家忽略當計天下利，只顧慮到個人，沒有顧慮到整體。教育再怎麼改，教育的內涵還是必須要充實，人文的精神要考慮進去。」

先生認為欲提昇國人人文方面的素養，最終必需透過教育。他語重心長地提到：

「基本上先從老師本身人文氣質的培養開始，老師的人文素養不夠的話，雖有大量的教育學程，也不夠完整，單靠制度的改變是沒用的。」

先生對教育推動人文主義有深切的期待，但同時也點出在師資培育法修訂之後，在師資培育的課程有若干盲點，因此提出如此懇切的呼籲。

### 捌、未來計畫

.....

郭為藩先生在闡述人文教育理念方面，有不少相關的論著，如「教育的理念」、「教育發展與精神建設」、「人文主義的教育信念」、「科技時代的人文教育」、「教育與人生」、「教育改革的省思」、「自我心理學」及「成人學習」等書，郭為藩先生雖然平日行政職務負擔很繁重，但總是忙裡偷暇寫作。現在自行政工作退休了，他也有新的寫作計畫，正計畫撰寫一本大學的傳統與新貌的專著。他說明道：

「因為時間有限，必須要有所選擇，接下來我要寫的題材是高等教育，因為大家疏忽了大學的學術傳統，這個題目對目前台灣來說很重要。」

另外，郭為藩先生也計畫修訂以前出版的書，他說：

「我民國五十九年撰寫的「特殊教育」，先後修訂六次，至少有十萬人看過。材料如太久，真的對不起讀者，所以必須經常修訂更新。因此，另一本『自我心理學』也準備修訂。」

相信未來，後學們將可閱讀到更多先生的著作。

最後，郭為藩先生也很有心地表示，他想做一些「終身教育」的實際工作，對退休人員的再學習盡一點心力。他侃侃談道：

「要有機會的話，我想參加對剛退休及即將退休人士的終身學習工作，使這些人力資源獲得最好的運用。現在很多中小學老師，五十幾歲就退休，非常可惜，他們就是到處去做健身，到處去旅行。今後十五、二十年是另一段黃金的歲月，現在大家健康情況都很好，不好好利用是人力資源的損失，從人力資源的角度來看，六、七十歲這十多年比較成熟，可以做很多事情。設一些社會大學、長春教育中心，又或者大學推廣教育部門也可以辦很多活動，也可以讓他們到國外或大陸地區，一面旅行一面上課進修，這是我的心願，但是能不能做得到，要看機會，也要相當資源的支持。這是我的心願，做些有意義的工作，貢獻一己的心力。」

先生從人的價值出發，表示：

「讓退休的人有尊嚴的工作，過著充實的生活，也是一種人文理想。」

此為郭為藩先生希望實踐人文主義的另一個證據。

## 玖、體現人文情懷的教育家

郭為藩先生是以人文教育作為思想主軸的一個教育家。在教育理念上，講究尊重人性的發展，曾致力於特殊教育、終身教育的推動，並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與制度的自由化；在生活上，要求品德、品質、品味兼顧；在處世上，他謹守分際，進退有據，是個修養極佳的謙謙君子。先生以其穩健漸進的腳步，堅持一貫的誠信樸實，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並將始終如一的人文情懷，化為實際行動，真正是一個將理想化成行動的實踐者。

### 主要著作

- 成人學習—心理學的探討。臺北市：心理。
- 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臺北市：文景。
- 快樂與成功：全民教育講座選輯。臺北市：劉真先生學術基金會。
- 自我心理學。臺北市：師大。
- 教育改革的省思。臺北市：天下文化。
- 現代心理學說。臺北市：師大。
- 科技時代的人文教育。臺北市：幼獅。
- 美化你自己：獻給少年朋友。臺北市：正中。
- 人文主義的教育信念。臺北市：五南。
- 教育發展與精神建設。臺北市：文景。
- 特殊兒童的教育診斷。臺北市：正中。
- 教育的理念。臺北市：文景。
- 法國教育及其他。臺南市：開山。
- 特殊教育。臺南市：開山。
- 近代法國教育改革的理論與實際。臺北市：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 參考文獻

- 林振春（民 72）。誠正勤僕的郭為藩先生。台灣教育月刊，387。
- 教育部（民 83）。台灣地區教育發展簡報。台北市：作者。





# 博愛之謂仁

——彭蒙惠

(訪問及資料整理：陳明終、邱鈺惠、蕭佑梅)

## 壹、生平簡介

彭蒙惠 (Doris Marie Brougham)，出生於 1926 年 8 月 5 日，美國西雅圖 (Seattle)。

### 學歷

彭蒙惠老師於 1942 年加入西雅圖青年樂團 (Seattle Youth Symphony) 擔任小喇叭手，1943 年榮獲紐約依斯特曼音樂學院 (Eastman School of Music) 全額獎學金，但彭老師選擇進入辛普森聖經學院 (Simpson Bible Institute)。1946 年進入華盛頓大學 (Washington Univ.) 修習遠東課程及中文。

### 經歷

- 1947 年加入協同會 (TEAM)，並在 1949 年轉往香港，展開宣教的工作。
- 1951 年抵達台灣，前往花蓮服務，並創辦協同廣播中心 (TEAM RADIO)。
- 1960 年搬赴台北，成立「中華救世廣播團」。
- 1962 年「空中英語教室」(Studio Classroom) 開播。其後將協同廣播中心更名為「救世傳播協會」(Overseas Radio & Television Inc.)，成立「天韻詩班」(Heavenly Melody)。製作「天韻歌聲」電視節目。
- 1981 年「大家說英語」開播 (Let's Talk in English)。
- 1988 年受聘中華民國管樂協會顧問。
- 1992 年迄今，受聘為中原大學董事會董事。
- 1994 年成立「彭蒙惠教育獎學金」。
- 1963 年起，受聘為國立藝專管樂教授，其後亦陸續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高級

幹部英文班教授、三軍大學軍官英文班教授、華航空服人員英語進修班指導老師、實踐家專客座教授、台北市政府高級主管英文班教授等，眾多政府機關、學校團體之英語指導教授。

### 榮譽

- 1969年 「空中英語教室」獲教育部頒發「優良廣播節目金鐘獎」。
- 1982年 當選全國「好人好事」代表。
- 1984年 榮獲全國優良教師「師鐸獎」特別獎。
- 1986年 榮獲教育部「推行社會教育有功人員」個人獎。  
榮獲美國加州太平洋大學 (Pacific State Univ.) 頒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榮獲美國 NRB (National Religious Broadcasters) 「傑出廣播製作人員獎」。
- 1987年 榮獲美國加州太平洋大學 (Azusa Pacific Univ.) 頒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 1988年 榮獲美國 NRB 「傑出廣播製作人員獎」。
- 1989年 榮獲新聞局頒發「金鼎獎」特別獎。
- 1991年 榮獲美國西雅圖太平洋大學 (Seattle Pacific Univ.) 頒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 1993年 當選博德衛高中 (Broadway High School) 傑出校友。
- 1994年 「救世傳播協會」榮獲「82 年度興辦公益慈善及推動社會教化事業績優團體」台北市市長獎及內政部部長獎。
- 1995年 當選西雅圖太平洋大學 (Seattle Pacific Univ.) 傑出宗教領袖，於校區雕塑紀念銅像以彰殊榮。  
「救世傳播協會」榮獲「83 年度興辦公益慈善及推動社會教化事業績優團體」台北市市長獎及內政部部長獎。
- 1996年 榮獲 85 年度台北市榮譽市民獎。  
「救世傳播協會」榮獲「84 年度興辦公益慈善及推動社會教化事業績優團體」台北市市長獎及內政部部長獎。
- 1997年 「救世傳播協會」榮獲「85 年度興辦公益慈善及推動社會教化事業績優團體」台北市市長獎及內政部部長獎。  
榮獲內政部表揚績優外籍宗教人士。
- 1998年 榮獲全美基督教大學聯合頒發的「辛普森學院」(Simpson College)和

「西雅圖太平洋大學」(Seattle Pacific Univ.) 傑出校友獎。

2001 年 榮獲 NRB (改於 1986 年) 個人成就獎 (Individual Achievement)。

2002 年 榮獲陳水扁總統親自頒授象徵中華民國文官最高榮譽的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榮獲內政部余政憲部長親自頒發「外僑永久居留證」。

## 座右銘

“Never give up” 不輕易放棄，我們常常在做一件事時，無法馬上看到結果，教育也是一樣。我在這裡已經很久了，所以常常讓自己做些改變。有時看到很多人習慣於某些事情，不肯去改變，但這時不能馬上放棄，再多些時候，慢慢的他們就會變。做事情要有長遠的計畫，不要馬上放棄，要再繼續做，一直努力。所以我感覺到，每一個你真正相信的東西，有目標的話，就不要放棄。

「施比受更有福」，你真的幫助別人的話，你所得到的將會比你所給出去的多。老師們都知道，一直幫忙學生，將來學生的成就，也是老師的榮耀。所以我感覺到這一句話是很實在的。

## 貳、早期的生活與經歷

彭蒙惠老師二十一歲即隻身遠渡重洋，到中國大陸進行宣教工作，隨著時局的變動，在大陸輾轉遷移，民國四十年抵達台灣，回想起過去那段動盪不安、胼手胝足的過往歲月，彭老師說：

「在大陸的那段時間，時局很亂，不斷逃難，當時我只有廿一歲，其實不會害怕。離開甘肅，是因為聽說在菲律賓有許多民眾死亡，只因為這些民眾提供食物與協助給外國人，我們當時在大陸的情形也差不多，如果繼續留在那裡，可能只會連累當地的民眾。所以我們離開甘肅到了香港，並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不想讓當地的人民受到傷害。後來陸續有些宣教士回到大陸，而我當時聽說有個地方叫『福爾摩沙』，那裡也住了很多中國人，我想都一樣嘛，都是幫助中國人，於是就到了台灣。初到台灣發現是個完全不一樣的地方，睡覺都要用蚊帳，肺病、痲瘋病的人很多。後來發現花蓮是當時最缺乏教會的地方，因此決定到花蓮服務，於是就到了玉山神學院教音樂。那個年代在台灣的外國人很少，所以剛到花蓮時，我的高個子、金頭髮顯得很特別。有好幾次晚上睡覺都被嚇醒，因為我發現怎會有眼睛瞪著我？原來是學院裡的學生覺得好奇，圍在我身邊看我睡覺。」

對於一般人而言，這樣的生活是極困頓、不安定的，但彭蒙惠老師始終堅持著對上帝的信仰與那一份為中國人服務的心，樂觀面對，積極克服身邊的困難，盡可能的幫助他人。

### 參、因緣際會製播空中英語教室

.....

在台灣英語教學機構不可勝數，市面上英語學習的工具，無論是書籍、雜誌、錄音、錄影帶、CD、教學光碟……等，亦是琳瑯滿目。然而，對大多數英語的學習者而言，彭蒙惠老師和她一手創辦的「空中英語教室」，無論是年長或年少者，幾乎都曾經聽說過或曾經透過不同管道與方式向彭老師學習英語。許多名人表示過去學生時代，也都曾是彭老師「空中英語教室」的忠實聽眾，收聽彭老師的節目對於他們的英語學習有很大的幫助。對於這個影響台灣人在英語學習上既深且遠的「空中英語教室」，彭蒙惠老師娓娓道來其成立與製播的經過：

「剛開始有廣播電台的時候，在中廣我們就已經有一個每天早上六點的節目。因為當時有很多人需要學習英語，而且當時的社會政治有許多變動。一九六〇年代，當時台灣正由農業社會邁入工業社會，開始需要和外國有所接觸。由於一般人普遍經濟不是那麼寬裕，而學生若想學習新知，不太有出國的機會，也缺乏方法。此外當時美軍顧問團在台，由於語言不通，缺乏相互瞭解與溝通的機會。就政府部門人員而言，雖然有翻譯陪同隨行，但當時許多擔任翻譯的人，自己對於英文也不是完全瞭解。因此，許多誤會與不便就這樣產生。我見過許多政府部門的人員一見到外國人來，就只是站在那兒，也不敢和外國人說話。我看了之後覺得這樣也不是很好，應該自己若能表達。而且有時可能因為一個字，『是』或『不是』就完全改變你的看法。我們感覺到政府也需要，所以我們也幫忙政府機構做訓練。當時林語堂住在台北，且有留學國外的背景，因此開明出版社要他錄製英語教材，可是他一直向出版社推薦：『彭蒙惠的英語發音很標準，一定要她來念課文。』當時我在國立藝專是教音樂，我不是英文老師。而從事英語教學的吳炳鍾先生，也不斷的告訴我，認為我應該投入英語教學工作，他認為我的發音很好，解釋東西又很清楚，應該要教英文，因此開始在復興電台有一個十八小時的英文節目。有時林語堂、吳炳鍾兩位先生也會上我的節目，來節目中幫忙，因為他們感覺到還是要美國老師來示範發音，就好像學法文需要法國人教一樣。由於我過去從來沒有製作英語教學節目的經驗，所以不斷思索一般人在學英文時最需要的是什麼，應該希望能看懂英文報紙，於是就把一些報紙內容拿到廣播節目中討論。又想到若只是我教的

話，所教的東西並不一定符合聽眾的需求。所以又找了一些學生來參與錄音，所以叫“Studio Classroom”——「空中英語教室」。剛開始找了一些外面的學生，早上六點鐘就來參加廣播。廣播節目結束才各自去上班上學。來到節目中他們把自己的問題提出來，我則是現場回答他們的問題。有時候是英文方面的問題，有時候則是觀念的問題，都一一幫大家回答。透過這種方式教學生真正需要的東西，而不是當老師的自己設想學生需要的。有的人很喜歡來，幾乎天天來報到。漸漸的這些參與節目的學生表示，他們對英語有了較為清楚的認識與瞭解。後來有人建議是否再製作一個比「空中英語教室」簡單些的節目，於是就這樣一步一步衍生出三個適合不同程度的節目。」

對於製播廣播節目、編輯英語教學雜誌，彭老師心中自有其不同於一般坊間出版社的堅持與目標，她以堅定的語氣說道：

「我們所做的這一切最要緊的是台灣的需要，不是說我自己想要我就做英文節目。因為真的要做的話，就要做一個能真正幫助人，而不是我個人想要做的東西。現在雜誌一直在變，社會與科技也一直在變。我們希望能將這些新的知識與觀念帶入雜誌中，每個月放一點。所以我們一直在思考現在台灣需要的是什麼？過去幾十年前需要學的可能是 What's freeway? What's supermarket? 可是現在需要的是有關電腦的、科技的、國際的知識與字彙，那麼我們就盡可能的把這樣的資訊帶給讀者。台灣不可能只侷限在這塊土地上，而不去跟外界往來，當你的產品要賣出去時，必須瞭解這些東西用英文怎麼講，如何用英語表達。甚至國際間許多新聞與消息，都要靠英文做為工具才能瞭解。因此我們認為是這裡的人們有學習英文的需要，我們才來教。不是因為自己喜歡教英文，所以教大家學英文。當你要教人時，是教對方所需要的，而不是你想要教的東西。所以『空中英語教室』開始的時候就是因為有很大的需要，再加上有些人肯定我，認為我可以教英文，於是就這樣開始了。」

## 肆、遇到的困難？如何克服？

草創時期的「空中英語教室」受限於經費與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因此歷經了非常艱辛的起步階段，彭老師談起當時所遇到的困難：

「剛開始的時候，沒有什麼錢，所以東西都做得很便宜，也無法做得很精美。而且當時一般民眾也沒什麼錢，所以只要附上回郵來索取，我們都會免費寄給大家。當時沒有很好的印刷廠，常常送去排版回來之後，還有許多錯誤，因此是很辛苦的。另外，為了讓更多人能夠收聽到英語教學節目，在中廣的全國聯播也有我們

的節目，每天早上六點開始，持續了好多年。當時社會比較封閉，因此要考慮節目中所講的事情，不能涉及政治方面的話題。記得有一次講到有關政治方面的話題，其實也不是不好的或負面的批評，結果那些內容都不能播出去，因此時常都要很小心，不可以講錯話。然而，這些外在環境的阻礙我並不覺得是很大的困難，因為最困難的是有沒有想清楚自己到底要教什麼？如何透過廣播教別人東西？因為面對面看你聽不懂我可以再解釋，可是在廣播教學時，你面對的是麥克風，到底那些聽的人有沒有學到東西？因此最大的困難就是在空中到底要教什麼東西，聽眾才能真正的學到。所以我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畢竟在空中教學與在教室中教學是很不一樣的。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不斷的研究改進，或去訪問、請教別人，總之就是不放棄。」

由於彭老師與學生之間是透過廣播進行教與學，這種「空中師生」的關係，與一般教室中面對面接觸的師生關係不同，如何使教學效果更好，如何瞭解學生的困難與需求，彭老師說：

「爲了瞭解學生的需求，以及他們在學習上的問題在哪裡，我們會藉著學生的來信、實地到學校裡與學生接觸、在全台灣各地辦青年活動、讓學生每個禮拜來這裡討論雜誌裡的内容……等等方式，從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我們可以瞭解到學生的困難與需求在哪裡？由於不斷的有讀者意見的回饋，我們慢慢的從中找到比較適合的方式。」

對於在「空中英語教室」工作的外籍老師們，彭老師有一定的要求與期許：

「我覺得要擔任『空中英語教室』的這些外籍老師，一定要喜歡中國人，很願意幫助人，而且本身行爲良好。因為學生在看著我們，會模仿我們，如果我們的老師也喝酒抽煙，或做些不好的事，這都會對學生有不良的影響。此外我們也協助許多政府機關進行人員的英語訓練，就是替國家做點事。」

## 伍、推廣大眾英文的理念與堅持

---

彭蒙惠老師不斷的透過英語教學節目、雜誌、以及舉辦各項活動讓社會大眾學好英語，其中所懷抱的理念與堅持，彭老師說：

「我想若是大家都不需要英文的話，我們就不會再繼續做。因為我還是有許多其他的興趣可以發展，有很多事想做，但是我目前看到在台灣我們真的是需要英文。我覺得如果我真的是很愛台灣，也喜歡幫助這裡的人們的話，就應該按照你們的需要，不是我的興趣。雖然現在台灣的人們英文程度比起二、三十年前要好很

多，算是不錯的，但還是不夠普遍，還是有人要學。例如到新加坡去，雖然彼此同屬中國人，但還是要以英文來溝通。台灣若真要進步的話，從英文方面著手會有很大的幫忙。像現在網路上的資訊如此之多，而大部分是以英文呈現，雖然也有不少資訊是以中文傳遞，但畢竟數量上仍不及英文。況且目前新的知識都必須透過英文進行學習，因此讓我感覺到在台灣仍有推廣英語學習的需要。現在市面上有許多英文雜誌出現，在過去沒有這麼多。原本一種、兩種，現在市面上則有三十多種英語雜誌。因此我便思考到底我們有沒有需要做？因為已有那麼多人在做了。後來我們都會把別家的雜誌買回來，一直不斷的翻，看了他們的內容後，按照我的看法，我覺得他們並沒有真正做到教育，而只是一味的符合學生的興趣，例如：電影、男女交友、甚至是關於性方面的話題。這些當然都滿好玩的，但只能算是流行的事物，因為這些東西不能幫助學生成爲一個成功的人，更不能幫助學生未來在世界上與其他國家的人一同競爭。所以我認爲現在我們應該教給學生的英文，應該不是這些一時流行，新鮮的話題而已。又例如有些片語如果會的話對英文有幫助，可是有些俚語(slang)去學的話不盡然是好事，因爲一旦用錯反而丟臉。我認爲真正要教的英文應該是不論你到那個地方去，都可以講，都合適的英文。其次，現在的台灣已經進入到資訊時代，不再是過去工業時代的社會，所以我們在教英文的方式與內容上也要隨著改變。以我們的教材編選爲例，“Executive Book Summary”會將最近出版的新書做摘要，裡面介紹了各式各樣的書，我就把這些摘要所介紹的新觀念放到我們的雜誌裡，包含經濟、財務、管理、領導、科技……等等各種主題，這樣很多新的知識就會引進來，我想這些才是台灣現在所需要的。不能用十幾年前的東西教給現在的學生。所以當我看到市面上許多英語教學雜誌的內容與方向之後，我想『空中英語教室』還是有它繼續存在的必要，因爲我們的取材範圍比較寬闊。目前台灣還是缺乏比較全面性的英文教學雜誌，所謂全面性就是不僅僅只有教英文而已，還要教讀者許多有用的知識、做人的道理乃至於如何做個管理者……等等。因爲我們的目標是這樣，所以我們編輯出來的雜誌在內容方面，自然也與別人不同。」

## 陸、一般大眾學英文的重點

.....

從事英語教學多年的彭老師，憑藉著她豐富的經驗，對於提升英語學習的成效提出這樣的看法：

「首先老師一定要講英文，有的學校已經採用這種方式，但有的學校還是一直用中文教英文。要教英文而老師卻不講英文，學生怎麼學得會？當然老師可以講一



點中文，但大部分還是要用英文。目前的課程應該再增加會話與小組討論的時間，不要通通都是老師一個人在那兒教課本的內容。一個禮拜一次或兩次，我覺得時間上是很不足的，應該是每天都有英文課，每次半個鐘頭也可以。讓學生每天都有一點點英文刺激。若是真的要加強英文，應該是每一門課都要用英文上課。就像台灣的美國學校學生一般，爲了學中文，從一年級開始，每一堂課都用中文教學。同樣的要學英文，也應該用英文上不同的課，多幾門課用英文上，不是只有一門課教英文。也許有人會質疑學校教學時間不足，但我認爲還是要想辦法，例如教學方法的改變、時間調配等，當然不是說說就可以，一切都需要仔細的研究和規劃，但不管如何都要有這個目標，努力朝向目標前進。如果能這樣做的話，我們的英文一定會好得不得了。」

### 柒、國小英語教學的看法

.....

一向積極投入社會教育事業，積極走入學生群的彭老師，對於當前最受矚目的政策—國民小學實施英語教學有這樣的看法：

「我們已經在大直國小進行了四年，剛開始學校說要不要從三年級開始，我建議他們從一年級開始。因爲我看了很多別人寫的報告，在學習語言上年齡越小越不怕；其次越小學發音越容易接近美國人。不要等到三年級之後，學生已經開始懂得不好意思、害怕才讓他們學英文。所以我們便在大直國小做了實驗，效果不錯。現在在街上看到外國人時，那些一年級二年級的小朋友，也都和外國人打招呼，完全不怕。我們一個禮拜去好幾次，也請他們的老師來我們這裡接受訓練。他們做得非常好。我們就是一個試驗看看效果怎樣。我想就是越小越好，而且時間要多一點。如果有機會的話，最好多用一些外國老師，在發音和會話方面做協助。如果都要請有經驗的外國老師來台任教有實際上的困難，因爲如果硬性要求有一定年資與經驗，很可能符合資格的老師都不來了，因爲通常這樣的外國老師有相當年紀，有婚姻與家庭，且已定居在某地，要求的薪資也較高。但如果可以採用年輕剛畢業的外國老師，則來台任教的可能性比較高。而且請這些外國老師來主要是幫忙本地的老師教學，並非以外國老師爲主。因此若要在目前階段做這麼多事情，還是需要請外國老師來幫忙。至於 teacher quality 這方面是要慢慢來，不可能一下子幾千個老師都是很好的，但你一定要有一個目標就是，我們越來要用英文越多，方法要改變。所有語言學習的順序都是聽、講、讀、寫。這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原則，但是目前在英語教學裡，還是從第三個步驟『讀』開始。學生連聽、說都還不會，就要

唸了。所以爲什麼有很多人學了很多年之後都學不會，因爲你沒有按照次序學。就像是剛出生的小 baby 你要他學『媽媽』，不是拿一枝筆在那邊寫，而是直接跟他講話。我們學語文就要像小孩子學說話那樣，他們會說很多種話，但你要他寫他不會寫。我曾試過好幾次，幫一些比較不會英文的人，讓他們玩遊戲之類的。透過遊戲一點一點的學習，後來他們的英文都變得很好，都是從玩開始的。所以我們開始的時候要用一個小孩子學東西的心態，就是要玩。可是玩還是要有一個目標，不是說隨便玩。所以我們要時常想一想，孩子是怎麼學東西的。就像是你把一個中國小孩和一個美國小孩放在一起，不久他們就可以溝通講話了。但是沒有人教他們寫。所以第一個我們的觀念要改，一開始不要用課本，要用別的方法，等到他們舒服了以後，他們學得好快呀。」

爲了讓學生的學習成效更爲卓著，彭老師建議在課程與教材的選擇上，需注意一些原則：

「剛開始的時候不要學很多，要比較活、比較簡單，多用一些遊戲的方式。也可以增加一些補充的教材。等學生程度比較好之後再增加。老師在教學的時候，不要採用對、錯的糾正方式或者區分老師與學生的角色，要用和學生一起玩英文的態度。『玩』這個字多一點，小孩子才會學。」

## 捌、得獎的感受

翻開彭蒙惠老師的個人經歷，很難不注意到她一連串獲獎的榮譽記錄，對於長久以來政府機關乃至社會各界對她的肯定，彭老師微笑著以極謙虛的口吻說道：

「我感覺到自己好像不配，只是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也不因爲想得到什麼東西。但是我想獎該頒給什麼人，這是很難講的。因爲我看到很多人都比我更應該得到這個獎，我的感覺還是很謙卑的，非常謝謝他們給我這些獎，我感覺到我們做事情也不是爲這些，Just do your best. 很感激大家看重我。我不一定是做得最好的，但我是很熱心的在做。我想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很誠實的做，不是做表面而已。你真的要做，你就要做好，要很用力，全心全力去做的。我想他們覺得我做得好，是因爲我很努力做吧！」

理想、熱心、奉獻、不居功、不放棄，這就是我們從彭老師身上看到的特質，也正因爲如此，彭老師成就了一連串讓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尊敬、感激的事業，一次又一次的獎項正代表了台灣人民對她的肯定與感謝。

## 玖、彭蒙惠教育獎學金

.....

爲了鼓勵青年學子努力向學，彭蒙惠老師在民國八十三年成立了「彭蒙惠教育獎學金」，對於下列三類學生擇優予以獎學金之鼓勵：高中職學生英語成績名列該校同年級前三名且操行成績達 80 分者；大專院校及研究所之「大眾傳播」或「英文」相關科系學生，學業、操行成績均達 80 分以上者。「彭蒙惠教育獎學金」分上、下學期發給，全年發出的金額約二百萬元。談起成立獎學金的動機，彭老師說：

「我們無論在什麼地方，第一想到的就是幫助人，如何幫助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做好。其次，像我們『空中英語教室』，有的時候賺錢，有的時候還好，但是不管怎樣這些 profit 都是學生給我們的，那麼我們就再把它回饋給學生。我們也不是爲這個錢才做，我們不像一般私人公司，我也沒有買漂亮的大房子，跟一般人住的一樣，我的生活中也不需要那麼多東西，所以這些利潤可以多還一點給學生。尤其是當我看到許多學生他們也有困難，因此覺得要多爲他們考慮一點。每次在審核獎學金時，常會看到一些學生原本是要繼續讀書的，但因爲家庭經濟因素，讓他們沒辦法讀下去。我們給他們獎學金其實就是將空中英語教室的 profit 還給學生，就是爲別人著想。我感覺到一個國家若是看重教育，那個國家才能在很多方面都能成功。台灣也就是因爲看重教育，所以才有今天的繁榮發達，像印度或非洲國家，沒有這麼多的經費和資源可以用在教育上，所以接受教育的機會也就很少，人民依然很窮困。中國人過去也曾貧困，但是因爲看重教育，所以有今天的發展與成就。這並不是因爲中國人比起其他國家人民聰明，而是中國人重視教育的結果，所以我們空中英語教室也是看重教育的。有些學生他真的沒有辦法，我們就用空中英語教室得到的錢還回去給他們用。我們獎學金的發放主要是針對英語學系和傳播學系的學生，一年發兩次。這些學生當中很多人將來也都要當老師，也會做很多研究，而他們的研究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採用，有的研究的確寫得很好。其實也可以說是我們和這些學生之間相互幫忙，一起成長、進步。」

基於體諒許多學生在家境上的困難，彭老師每每在審核獎學金資格時，都與工作伙伴發生「拉鋸戰」，不斷拜託大家可不可以再多增加幾個名額，熱心助人的彭老師總希望能多幫幾個學生。談到每年都要發生一次的「拉鋸戰」時，彭老師笑著說：

「因爲研究所獎學金的名額大約只有幾個名額，所以我每次都問工作人員可不

可以多給幾個，因為看到很多學生真的很好也很需要，總希望多給幾個學生，但實在是名額有限，不過這些事情我們都是很樂意的來做。」

只想默默助人的彭老師，對於獎學金用自己的名字，開始是很不願意的，但爲了容易辨認，一目了然，於是她同意了同事們的建議：

「我感覺到做一件事不需要將自己的名字擺出來，因為我們並不是爲了出名或邀功，就像我們的雜誌『Advanced』取中文名字時，我說不要用我的名字，可是其他工作人員認爲，現在外面的英語雜誌這麼多，名字都很像，用我的名字比較能和其他雜誌有所區隔，我想既然是這樣那麼勉強可以用我的名字。同樣的獎學金的名稱也是一樣，我說不要用我的名字，但其他工作同仁堅持用我的名字才不會混淆，一看就知道。」

## 拾、終身學習

談到現代社會極爲重視的觀念「終身學習」，彭蒙惠老師自己就是一個最佳的例子，在她的傳記「愛是一生的堅持—彭蒙惠傳奇」（李文茹，民 90）中提到，彭老師極爲好奇且好學，雖然剛開始對電腦一竅不通，但她經常一個人在電腦前嘗試不同功能，一旦發現新的用法，就迫不及待的告訴其他人。而現在的彭老師不但經常透過網路與電子郵件處理事務，甚至還成爲電玩高手，到處找朋友挑戰。對於自己不斷嘗試新事物、學習新知識，彭老師說：

「人只要活著就要學東西，有很多東西要學，也有很多東西可以學。過去都以爲年紀大了就無法再學習，可是很多研究都告訴我們，年紀大了只是學得比較慢，而不是無法學習。我想只要人不再學習，無論是三十或五十歲，生命就開始變得沒有意義。因爲生命就定在那裡，凍結在那裡，人只要學習對他的身體、心理都有很大幫助。就像我們的一位讀者，他是六十多歲退休以後又才開始學習英文，每天一小時讀兩集，現在他已經八十三歲了。去年去美國看他的女兒，到海關時海關人員問他一些問題，他就用英文回答，那位海關人員很驚訝的稱讚他發音很好，他覺得得到很大的鼓勵。所以人只要學習，一輩子的生命都會很豐富，不管年齡是大或小。」

## 拾壹、對相關人員的勉勵

對於所有正在學習英文的朋友以及擔任英文教學工作的老師，彭老師有這樣的勉勵：

「常看到很多人在學英文的時候，因為覺得很難，於是就放棄了。事實上，有時候是幾乎快成功了，結果自己不能堅持就把它放棄。就好像我們用網路查資料一樣，有時感到很慢，心想乾脆關閉不找了，結果就在那個時候連上線，進去了。有時候學東西也是這樣，正在嘆氣自己怎麼都不會時，再多撐一會兒，結果發現自己會了。所以我想在學英文方面，大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每天都花一點點時間練習講英文，十分鐘也好，但就是要固定每天練習。不要一個禮拜說一次，一次花很多時間。就像運動一樣，雖然不是很厲害，但每天運動一點點，總比都不運動的好。所以家長平時在家，吃飯的時候可以和孩子講一點英文，不要怕講錯，不要怕孩子講的比你不好，怕丟臉。家長可以換個角度想，跟孩子說你教我好了。老師也是一樣，不要擔心發音不標準或講錯，若有些學生說的很好，就對學生說：『很好啊！老師很高興你會了。』當老師的不要一直要求自己完美的，或者認為我是老師，我什麼都知道，學生則是什麼都不知道。不分大人小孩，我們每個人都是學生。英文就是要用，我鼓勵人家多用英文，學英文的時候，每次為自己多增加一點點材料，一本、兩本雜誌慢慢增加，這樣程度就會慢慢提高。學英文絕不要放棄，每天練習，不要認為身邊沒有外國人，沒有說英文的環境，所以學不好。大家可以跟身邊的家人、朋友一起練習，為自己製造練習說英文的機會。光聽別人說英文，而自己卻不說，就好像只看別人打球自己卻不真正練習，結果是只知道怎麼打，但實際上卻不會。」

## 拾貳、到大陸發展

---

近年來，彭老師的英語教學擴展至大陸，且受到大陸民眾、學生極大的迴響與肯定，談起至大陸發展的經過，彭老師說：

「九二年的時候，在四川成都有一個關於電台英文教學的會議。當時有一位大陸的朋友建議我應該到那裡去參加他們的會議。會議中他們非常期待我能告訴他們一些廣播英語教學的秘訣，其實我只是很實在的將我自己的經驗告訴他們，結果受到很大的迴響與認同。在這種因緣之下空中英語教室就在大陸二十七個電台開始播出，隨後雜誌也開始在大陸發行。由於節目與雜誌受到歡迎，我也多次親自到大陸去商討處理節目製播與雜誌發行事宜，或者接受大陸電台的訪問等等。由於大陸即將主辦奧運，對提升英語能力的需求非常迫切，他們很努力，每個禮拜天在公園有 English corner，大家都很喜欢去，包括銀髮族晚上也都在學英文。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而我們也正好有一位老師派駐在北京，於是就協助訓練北京奧運籌備會人員的

英文，所採用的教材就是『大家說英語』，奧運籌備會人員都覺得很新鮮。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之後，當他們用英文打電話交涉事情的時候，對方都以為是美國人打來的電話。因此這些籌備會的人員都覺得很有成就感，收穫很多，認為我們的教材與教法很活潑，很好用。」

透過與大陸出版界的合作，彭老師及她的工作伙伴們已在大陸擁有自己的出版社，彭老師提及這段和大陸出版社人士的因緣：

「德國每年都會辦一次『法蘭克福書展』，在書展的會場我遇到了大陸出版社的人員，當時並沒有想到要做生意，只覺得大家都是中國人，於是就像朋友一樣的和他們聊天，請他們吃飯，因此和他們有不錯的互動。他很喜歡和我們相處，也很信任我們，所以願意與我們合作。」

然而對於在大陸發展這件事，彭老師也談到其中的困難：

「我想透過英文這項工具，慢慢的大陸上的人民漸漸也會知道很多外界的事情。儘管最近大陸學習英語的風氣和需求都很強，但如果真正談到要在大陸做生意，其實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大陸目前的 distribution 和廣告不像台灣做得那麼好。」

爲了能夠讓大陸的人民也能擁有良好的英語學習機會，彭老師親自帶著相關人員赴大陸，舉辦或參與各項英語教學活動：

「我也帶了我們的老師們到大陸去辦很多場的師資訓練研習，教他們如何利用歌唱、遊戲、競賽等等活動進行教學；同時也可以聽聽當地的老師們有什麼問題或困難，提供他們解決的方法。」

在大陸期間所參與過的活動中，赴北京大學演講，無疑是彭老師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談起這段曾讓她事前緊張不安，但結束後大獲好評的演講經歷，彭老師帶著興奮的語氣說道：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出版社安排我到北京大學演講，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剛去演講過。在往北京大學的路上，出版社的人提醒我，北京大學學生的習慣是如果他們聽了不喜歡，或覺得講的沒道理，他們就立刻站起來收起椅子走人。我當時聽了之後心裡覺得非常緊張，所以開始想應該如何讓這些學生接受我的演講。我到會場時，由於離開始演講還有一段時間，因此有很多學生在那裡做功課。於是我就走到學生的身邊和他們聊天，做做朋友。因此當我開始演講的時候，他們感覺到的並不是特殊人物或貴賓，而是他們的朋友在台上演講，所以非常能夠接受。不但沒有人中途離開，反而是結束之後都不走了。演講結束後我鬆了一口氣，感謝主！祂總會幫助我，讓我擔心的事情沒有發生。因為這真的不容易，北京大學學生非常的

挑剔。除了北京大學、上海復旦大學等等，很多學校我們都去過。所以現在常常有大陸的學生會寫 e-mail 給我們。」

除了原本台灣、美加、紐澳、歐洲和大陸的英語教學之外，彭老師的教學版圖更進一步擴及其他國家：

「韓國的電視頻道開始播放我們教學節目，未來韓文版的『空中英語教室』、『大家說英語』也會發行。連巴基斯坦都有學生聽我們的節目，還寫信給我們，告訴我們他的學習與生活。當我們知道他的家境很貧困時，我們寄了一千元美金給他，現在他已經有一個自己的網站了。其實這些就是一種幫助人的心，當我們發現有些人很願意學，我們就給予幫助。所以我想教育是活的東西，不是死的。只有學習才能打開一個人的視野。我想我們教英文不只是教英文，我們是用英文教觀念，教看法，教做人。為英文而教英文就不夠靈活了，沒有什麼意義。」

### 拾參、愛無疆界

.....

來臺數十寒暑，彭蒙惠老師將她生命中大半的歲月奉獻給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總是在別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責任，彭蒙惠老師義無反顧地為台灣的英語教學投入所有心力，因她看到英語是台灣邁向國際舞台必不能缺的工具。不為獲利、不求美名，只希望台灣更好、更進步，這位台灣人民共同的空中英語老師將她的愛無私無我、無差別地奉獻給每一個需要的人。

### 參考資料

- 李文茹（民 90）。愛是一生的堅持—彭蒙惠傳奇。台北市：彭蒙惠英語出版社。
- 李令儀（民 91 年 4 月 11 日）。彭蒙惠獲頒紫色大綬景星勳章。聯合報，第 14 版。
- 李令儀（民 91 年 4 月 28 日）。空中英語教室四十歲歌舞歡度。聯合報，第 14 版。
- 張弘昌、于炎昆、李志德（民 91 年 6 月 11 日）。永久居留證七外僑拿到了。聯合報，第 6 版。
- 董智森（民 91 年 4 月 4 日）。彭蒙惠教英語也教知識。聯合報，第 19 版。

# 兼容理想與實際的 教育實踐家

——黃昆輝

(訪問及資料整理：鄭玉卿、吳美玲、梁淑惠)

## 壹、生平簡介

---

黃昆輝先生，出生於民國二十五年，台灣省雲林縣人。自幼勤奮向學，並憑其堅持與努力，完成初中學業，旋後進入台中師範學校就讀，每一階段皆有優異的成績表現。早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並獲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教育學博士。自民國六十年學成歸國以來，先後於教育學術與教學、教育行政領域，以及政治界，歷經要職，功勳卓越。曾任國立師範大學教授、教育系系主任，以及教育研究所所長，潛心於教學與研究。而在擔任台北市教育局長、台灣省教育廳長期間，對於各項教育政策之推動，竭智盡慮，建樹良多。其後，更貢獻所能於國家政務崗位上，歷任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副主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民黨中央青年工作會主任、政務委員、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內政部部长，以及總統府秘書長。現任總統府資政、台灣師範大學兼任教授、李連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繼續為國家及教育奉獻心力。

###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教育學博士

### 經歷

中小學教師



國立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系主任  
國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所長  
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研究委員  
台灣省政府委員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  
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副主任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國民黨中央青年工作會主任  
政務委員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內政部部長  
國策顧問  
總統府秘書長

### 現職

總統府資政  
李連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國立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兼任教授

### 座右銘

~誠為上策，盡其在我；堅守原則，廣結善緣~

黃昆輝先生的平易親切、央央氣度，是我們初見他時的第一個感受。與他深談之後，更發現自己是何其有幸，能聆聽這樣一位睿智的長者分享他的人生體驗、他的豐富識見。

## 貳、奮鬥的求學生涯與人生觀

.....

黃昆輝先生與我們分享他的生活、求學以及工作經驗時說道，他人生中的每一段經歷，常是出乎意料外的決定或結果。他認為「生涯規劃」的確有其必要性，但未來的不確定性，也往往增加了規劃時的困難，不過，倒也增添了生命的風趣，考

驗了人們的智慧。

## 一、奮發向上的求學生涯

聽黃昆輝先生娓娓道來他年少時代的求學過程，我們感受到的，是一位勤勉向學的少年力爭上游的故事：

「我小學畢業，因為當時家庭經濟不好，所以家父勸我說：『因為你是老大，所以不要升學，留下來幫忙家計、耕田。』但那個時候，因為小學老師認為我功課還不錯，鼓勵我考初中，父親於是答應我，後來便上了虎尾中學。……我初中畢業了以後，家境當時愈來愈困難，所以家父也一再地勸說我，雖然他很疼我，但是他覺得，既然沒有辦法上大學，初中畢業後就幫忙家裡務農、種田。當時我就跟家父要求，請他讓我到台中考兩間學校，如果沒考上，我就種田。這兩間學校，一間是台中師範，一間是台中高工。因為師範是公費的，出來有事做，當時農村子弟能夠考上師範，大家都引以為榮；而考台中高工，是因為當時它跟台電建教合作，有獎學金，出來也可以到台電工作。當時還沒有什麼聯合招生，……，後來這兩間學校都考上了，家父還是覺得念師範好，所以就選了師範。」

黃昆輝先生展現的是一股對讀書求學的堅持，憑著這股堅持，他排除了生命的逆境，完成初中學業，其後進入台中師範學院就讀，從此便與教育結了終生之緣。

師範學院畢業後，黃昆輝先生進入小學擔任教職，並樂在其中，在四年的教書生涯裡，也完成了終身大事，過著自足而愉快的生活。黃昆輝先生回憶起後來萌生繼續求學的意念，進入師範大學完成大學、研究所學業，而後出國深造的經過，他談道：

「後來有些同學，過去在師範學院唸書的時候，功課都不是比我好，都個個考上大學，就跟我講說：『你為什麼不上大學？』後來想一想，跟太太商量好了，就決定念大學。因為是師範學校第一名畢業，所以不用考試保送師大，不是靠自己的本事考的。師大畢業了以後，打算考高考，可以在教育局作教育行政官員。師大畢業成績也不錯，所以分發在台北市當時的萬華女中教書，準備高考，在台北市找資料容易。但是有位學長來看我說：『高考跟研究所一起考，一舉兩得！將來除非是研究所畢業，否則在社會上，如果你要做行政、要做公職，大概要研究所才夠用。』後來，高考、研究所都考上了，就決定念研究所，因為高考隨時可以去行政機關服務，研究所不唸的話，好像會覺得知識各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度。後來上了研究所，又被系主任找去當助教，邊當助教邊唸研究所。研究所畢業了以後，系主任覺得我不錯，把我聘做講師，那時在教育學系當講師，在師大是大家都很嚮往的一條路。當了兩年的講師，留學美國，也是國家國科會公費出去的。當時出去的機會

不太多，太太孩子都要留在國內，一定得完全念完了才能回來，連畢業典禮頒授博士學位時，要接太太去觀禮都不行，那是那個時代的環境。回國之後，就繼續在師大研究所教書。」

黃昆輝先生無論在求學的任何階段，皆有優異出色的表現，也贏得了師長們的讚許與賞識。其後，無論是在教學研究上，或是在職場歷練上，他所展現的優越實力，不僅使他在教育界備受讚譽，也在其他領域有傑出的成就。

### 二、奮鬥的人生觀

黃昆輝先生認為人生是奮鬥的過程，因此，在他的求學生涯中，一直秉持著努力奮鬥的態度，使他能贏得師長的鼓勵，受到同學的信賴。這樣的一種態度，分開來講，即是「實在」、「勤勉」以及強烈「追求成就的動機」三種信念，由先生的一席話中，可以清楚的瞭解他對人生的積極理念：

「我覺得在我的求學過程當中，我讓老師感覺到我這個人是非常誠實、實在，可以取得老師跟同學的信任。在求學過程當中，還是一句老話：『業精於勤，而荒於嬉。』說得更貼切一點，就是『勤能補拙』，還是要勤勞。我一直抱持著一種信念，就是今天希望做得比昨天好，明天希望做得比今天好，能夠一天一天有所進步，有所成長。這在社會心理學講的，就是「追求成就的動機」(desire for achievement)，特別是 strong desire for achievement，強烈地追求成就的動機，就是一個人進步力量的泉源。一個社會也是一樣，一個社會之所以能夠現代化，固然是技術面、制度面，特別是在心理層面，關係最大。這個心理層面的意義就是說，這個社會的成員、這個國家的人民，具有一種強烈的追求成就的動機，這才是國家、社會之所以現代化的動力，推到個人也是一樣。所以，你想要好、你實在、你勤勉，這三個因素加在一起，你會得到同學的信賴，得到老師的鼓勵，愈有鼓勵，你愈有動力去往前進，慢慢地形成奮鬥的人生。我覺得人生是奮鬥的，人就是要追求真善美、追求生活的改善、追求人格的提升，都是在追求奮鬥的過程。」

從黃昆輝先生睿智而堅定的語氣與眼神當中，我們更加堅信成功絕非偶然的道理。成功需要披荊斬棘的勇氣，更需要懂得披荊斬棘的智慧，這些，我們都在黃昆輝先生身上見到了。

### 參、豐富的教育行政歷練

.....

黃昆輝先生對於教育領域的貢獻，不僅只於從事學術研究與著述方面，他在擔

任教育行政職務方面，更是有許多令人津津樂道的作為。他與我們分享了他在擔任台北市教育局局長，以及台灣省教育廳廳長任內的一些施政經驗與心得，我們認為「學以致用」的道理，在黃昆輝先生身上有了最好的驗證。

## 一、擔任教育局長期間

民國六十年黃昆輝先生由美學成歸國，在一次國內舉辦教授之國家建設參觀活動中，黃昆輝先生被推選為團長；後來，國建會邀請海外國人回國參觀國家建設，在教育文化建設方面，由黃昆輝先生擔任教育組的隊長及召集人，時值蔣彥士先生擔任教育部長。黃昆輝先生謙虛地表示，他於這兩次活動當中，在座談會時皆對於當前教育問題提出看法，或許因為如此，而在知名度方面有所提昇，日後有機會為國效力。

「當時林洋港先生要到省府做省主席，邀我做省府委員。省府委員做了之後，後來李市長登輝先生邀我擔任台北市的教育局長。」

黃昆輝先生回憶起這段機緣，語氣裡充滿虛心與感恩。筆者認為，黃昆輝先生所獲得的肯定，應是來自他秉持「誠為上策」、「廣結善緣」的態度，以及努力與堅持的結果。接著，他與我們分享了他擔任台北市教育局局長期間的政策推動、理念與感想。

初踏入公職時的想法，黃昆輝先生回憶道：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這樣的一個職務，是我踏入行政界第一份工作。所以，那個時候老實講，還是一個抱持著一種將學術上所學的、學理上的東西，應用到行政上試驗的階段：我們教育的理念是什麼？這個理念行得通嗎？就把它放在行政上去試驗；行政的方法是這樣，行得通嗎？有效嗎？就把它放到教育行政上去試試看。」

過去所積累的學理知識，如何將其踐行於實際，並有所成效，對黃昆輝先生而言，是磨練，也是考驗。這樣的一種思考方式，也同時提醒了我們，學理與實務並不是相互分離的，而是能相輔相成的，所謂「學以致用」，即是如此。黃昆輝先生接著以他在任內所推動的相關政策，進一步地與我們暢談將理念付諸實踐後的成果，首先是他所創辦的「家長參觀教學日」：

「舉個例子來講，像我們學的：父母親要跟學校老師多聯繫，這樣對一個孩子的教育才可以相輔相成。但是，在都市的話，家長忙家長的，學校忙學校的，所以學校跟家庭間的聯繫，好像斷了線的風箏。除了少數較熱心的家長有主動的聯繫以外，家長、老師要開個母姐會，有些該來的人總是沒來。尤其是孩子特別有問題

的，該來的家長沒來，來的都是那幾位熱心的。所以孩子一早離開了家門，卻沒有到學校，學校認為他是在家裡，家人認為他是在學校，像這樣兩方不接頭。

家庭跟學校一定要密切聯繫、相輔相成，所以我就倡導『家長參觀教學日』，就是定一個週末，家長都有空，辦一個家長參觀教學日活動。這時家長都來，老師在課堂裡頭教孩子，家長就到課堂裡頭去坐、去看老師是怎樣教他的孩子，甚至還可以參與，幫助孩子學習，比如說做勞作、美術。家長到了學校以後，有共同的活動，邀請專家來演講家庭怎樣配合學校教育孩子、家庭教育要怎樣做、怎麼跟學校聯繫等，作親職教育。有親職教育的講演、有實際參觀教師的教學，還有之後跟班導師座談，還可以參觀自己孩子的作業、功課、作品，讓家長們有相當豐富的收穫。這樣的話，每一個學期應該至少作一、兩次，能夠做兩次最好，像這樣用一個週末，大家都有空，可以來。平常老師在教書，家長在做事，哪有時間？所以創造一個讓它能夠結合在一起的活動。這個活動到現在為止還有好多學校在做，……，就是從理念到實際。」

猶記得民國七〇年代，雙薪家庭帶來所謂「鑰匙兒」的問題，黃昆輝先生注意到了這樣的現象，也著手研擬對策，於是推行了「課後輔導」，他回憶起這段經過時說道：

「都市裡有『鑰匙兒』，就是低年級學生，在三、四點鐘放了學回到家，父母親還在上班，他就拿著鑰匙一層門一層門的打開，一個人待在家裡頭。這一方面不安全，二方面孩子在家裡是否作正當的事，或是不是他真的放了學就回了家，還是去電動玩具店、去賭博什麼的，都說不定。都市職業婦女多，尤其是年輕的父母親，孩子還小，還在上一、二年級，三、四點放了學，怎麼辦？所以做一個教育行政主管，就要替孩子考慮，就要替家長考慮，於是便推行了『課後輔導』。課後輔導不強迫，徵求家長同意。如果家長同意讓孩子留到下午五點鐘，這一段時間還有兩三個小時，我們按照學生的興趣來編班，有的是聽科學故事的，有的是專門打球的，還有的是學書法的，讓學生去參與，老師輪流來帶這幾個班。到了五點鐘左右，家長下了班，往學校來接自己的孩子回去。這都是一種理念，我們說教育三要素：孩子本人、學校、家長，怎樣把它結合在一起，這個教育才是好的。」

黃昆輝先生對於教育對象——學生——的關注還不僅於此，他也注意到了學校教育活動帶給學生的影響與觀感。他強調學校教育活動要力求活潑化，以符合學生的心理需求，這一點，從他對於傳統畢業典禮的改革上可以看出，他說：

「我們總希望教育、教學活潑化，教育的活動要活潑，舉個例子來講：畢業典禮。這以前就開始了，尤其是國中，畢業生畢業那一天常常把學校、教室的門窗、

課桌椅各方面都破壞，發洩怨氣，可是照理說，一個學校的畢業生愛護學校都來不及了！這種情況我們的教育就要檢討。所以我說，除了平常教學要懂得學生心理的輔導以外，要先革新畢業典禮。以前畢業典禮還都是威權的性質、還都是成人中心、訓話性質，所以學生一點參與感都沒有。在校生也只有一個人代表去背了一篇文章，畢業生感謝老師，也是一個人代表。這種畢業典禮的方式可以看出，就是成人中心，由上往下，是一種少數人的活動，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倡導革新畢業典禮——要生動活潑！沒有什麼外面貴賓來致詞、演講，就是學校自己，或是請一位老師臨別贈言。在校生送畢業班的學生，每一班至少都有一、二個講話，內容即便很短也無謂，例如：『各位學長、學姊你們離開了，要常回來哦！我們會想念你們的！』或者是：『學長、學姊！你們在學校表現得很好哦！我們將來要跟你們學習。』一班班此起彼落，不要上台，就在會場上，讓每一班都有代表講話，然後請學校的小樂隊出來，就彈起琴、唱起歌來，非常活潑。當然，畢業班也不是只有一個人講話，每一班都有代表講話，也能讓來觀禮的家長致詞。典禮結束了以後，有的學校弄一個好像辦喜事時所用的拱門，一直延伸到校門口，然後校長、老師一個個向他們祝福。如此一來，沒有學生會回來學校打破門窗。所以，只要我們肯動腦筋，誰都可以想得到的！畢竟畢業典禮是大家的畢業典禮，我畢業了，父母親來分享我的榮譽、來感謝學校；學校因為有學生要離開校門，會依依不捨，所以大家都重視這個畢業典禮。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育場合，就看你用心不用心哪！」

黃昆輝先生對於教育、學生之用心由此可見！此外，對於站在教育第一線的教師，他也注意到了他們教學上的需求。他創辦了「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幫助教師們解決教學上的問題，提昇教學知能，他提到：

「因為我覺得，老師不成長，學生就不進步；老師的專業要隨知識的膨脹，不斷地日新月異，學生的學習也會因此而受益。所以有好的老師才有好的學校，有怎麼樣的老師就有怎麼樣的學生，老師非常重要。老師在學校那麼多年，一、二十年，根本沒有進修的機會。所謂進修，一種是到正規學校去念高一層的學位，一種是因為教學上的需要，教學上有困難想要獲得答案，教學的方法想要獲得更新，這個方面，就是一種行動性的、應用性的研習，這就是教師研習中心設立的主要宗旨。所以，教師研習中心現在一批批的，可以說是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都是不斷地在研討教育的專業知識、方法等諸如此類，我想對整個台北市的教育往後的幫助應該是很大的。」

此外，諸如文化、藝術活動的推動、台北市立美術館工程的發包、籌建動物園

的搬遷等，皆是黃昆輝先生在任內的重要成就。尤其是在文化活動、設施方面，由於黃昆輝先生認為有必要提昇現代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在當時市長李登輝先生的倡導下，規劃了一系列包括音樂季、美術季、戲劇季，還有體育活動季等，在當時也受到了廣泛的重視。

### 二、擔任教育廳長期間

黃昆輝先生在台灣省政府擔任教育廳長期間，對於教育也多有建樹，尤其在這段期間內所秉持「教育第一，師資為先」的理念，一方面重視教師在教學各方面能力的提昇，拓展教師進修管道；一方面也注意到了教師心理與生活層面的需求，給予鼓勵與照顧。

在拓展教師進修管道，提昇教師教學能力方面，他提到：

「老師的進修太沒有給機會了！當時我在教育廳創辦『巡迴教育班』，所謂巡迴教育班是指：老師平常忙於教學，沒有時間和機會去進修，能進修的學校，北部有師大、政大，中部有彰化師範學院，南部有高雄師範學院，就只有這幾間，且還不一定有開這麼多班。於是我開始爭取設立四十學分碩士班，跟政大、彰化師大、高雄師大……等幾個師範學院合作，請教授到花蓮、台東、澎湖、新竹、嘉義開班，不然鄉下老師沒有機會進修啊！只有都市才有機會，那不是很不公平嗎？所以，老師課後可以去進修，師專畢業沒有機會拿到學士學位的老師，可以進修學士學位，也可以再進修碩士學位。我的觀念就是所謂的『直接受益原則』。老師進修事實上直接利益是在孩子，雖然看起來是老師來進修獲取學位，對老師有好處，其實主要還是回到孩子身上，所以要多鼓勵老師進修。因為過去沒有給機會，我做教育廳長的時候，就有推動老師進修的觀念，設置巡迴教學班。……第一個觀念就是師資最為重要，老師的素質要好。」

為了體恤教師在教學上的辛勞，鼓舞教師士氣，並藉此達到宏揚師道觀念，強化教育功能的目的，他於是創設了「師鐸獎」，以表揚在教育上有傑出表現的教師。但是隨著時代演變，「師鐸獎」當初舉辦的良善美意也逐漸褪色，黃昆輝先生在談到這一段經過時，帶了些許的無奈說：

「我是覺得，老師要受到尊敬，教育效果才會好。所以恢宏師道尊嚴，看起來好像在尊敬老師，事實上是在強化教育的功能，因此，我創辦師鐸獎。與台北市、高雄市輪流舉辦，三年輪辦一次。每年就辦得熱熱烈烈，感性溫馨，有一份激勵教師向上發展、向前進步的動力，能得這個獎，被認為是教育界最高的榮譽。可是，日子久了，慢慢辦得不是太認真，也不是太感性。後來有一次我被邀去頒獎，感觸

很多，覺得不動人沒感性，有點應付了事的味道。以前辦的時候，連當時的省主席、或是市長，都把自己的老師、校長扶著出來講話，且那時頒獎是請老教育家、或者是請教育工作者典範頒獎。教育工作者典範淡泊名利，學生也很多，有很多學生就因為他們當校長，才受了很好的教育，不像那天大多請做官的來頒獎。師鐸獎從民國七十一年才開始辦的，距今將近二十年，雖然後來就沒有那麼樣的感性，但基本上出發點還是在鼓勵老師啊！」

希望黃昆輝先生今日的一席話，能夠重振社會對於師道尊嚴的重視，給予這些為社會培育棟樑的師長們更多的敬重與肯定！

而除了提昇教師實力，崇高教師地位之外，黃昆輝先生認為教師工作既是任重而道遠，實質上的獎勵自然也不能少，他說：

「我接任教育廳長的第一天，那個時候省府改組，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接台灣省主席，我接教育廳長。……，他（李登輝先生）問我說我做了教育廳長，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我答說：『老師考績獎金發放不平之甚也！一定要發與台北市、高雄市一樣的待遇！』老師這麼辛苦，台灣省各縣市的老師卻只發放半個月，非常不公平。以前我們台灣省經費拮据，老師的考績獎金只有發半個月，有錢的台北市、高雄市就發一個月。同樣是老師，在同一個島上，怎麼會這樣一國兩制？我是覺得再窮、再沒有錢，鼓勵老師就應該要統一發放一個月，且那時國家的財力也慢慢的好起來了。另外，當時規定老師考績甲等的人數不得超過一半，可是一間學校若甲等老師沒有超過一半，那學校就永遠也辦不好，所以我認為應該是核實考核才對呀！如果學校一百個教師中有九十個很認真的老師，那就九十個甲等吧！但這種考核如果做校長的沒有一個周延的辦法、零存整付的辦法、隨時考核的辦法，或者是抱持著不敢得罪人，統統有獎的心態，那就失去了它的意義，其實這應該要名符其實的去做，才能發揮鼓勵的效用。」

黃昆輝先生竭其所能的希望給予教師在各方面更多的鼓勵，雖然他也察覺這當中存在著些許隱憂，但是他不希望因此而本末倒置，對教師處處設限。此外，黃昆輝先生還在台中豐原，設立了台灣省中等學校教師研習會中心，對教師的重視可見一般。

從黃昆輝先生在台北市與台灣省所作的各項推動中，處處可見他的用心，對於最令人感到棘手的經費問題，他也展現了他積極而明快的處理方式。以教師考績獎金的經費爭取為例，他回憶起這段時說：

「……（增加老師考績獎金的經費）大約要再多三億多的樣子，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經費這麼大，一方面向行政院長爭取，一方面教育廳的經費優先順序我來



調。後來李主席跟孫院長報告，同意了之後，教育廳跟著配合。我總覺得花要插在前面，不要等到省議會開會了，省議員又再強烈要求、批評、指責，然後我們才被迫去做。議會都還沒有提，我們就先解決，很短時間就將問題解決了，這樣差別很大。」

審慎思考，立定理念，積極執行，正是黃昆輝先生擔任教育行政職務的經驗中，所留予我們最深刻的印象。也正因為如此，所以能有如此豐碩的成績，打造更優質的教育環境。

### 肆、學而優則仕——吾道一以貫之

.....

黃昆輝先生在歷任教育行政職務之後，轉換跑道從政，對他而言，許多是未曾接觸過的領域，但他卻能處事得宜、遊刃有餘，相信許多人和筆者一樣，敬佩之餘，也想一窺黃昆輝先生在這一路上的心路歷程，他以謙和而懇切的態度回應我們的請教，言語中盡是啓迪我們智慧的寶藏。

黃昆輝先生教育廳長卸任之後，歷任了包括當時執政黨文工會副主任、行政院青輔會的副主委、國民黨青工會的主任，民國七十七年又開始踏入政界做政務委員，八十年兼任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後任內政部長、總統府秘書長等要職，離教育行政領域可說愈來愈遠了。儘管如此，黃昆輝先生認爲人追求學問，以及各種職位的歷練，到了一定程度以後，即便是轉換工作在不同崗位，亦能如孔夫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就他而言，很多事情的道理是相互融通的。他以自己擔任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經驗爲例說道：

「特別是做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那是新成立的部會，旨在推展兩岸的互動交流，其政務涉及範圍最廣、問題最敏感、共識最難建立、最需要協調的。所以那個時候做政務委員兼陸委會主任委員，都在做一種創造歷史的工作，也就是在創造歷史價值。我覺得做教育行政主管，跟做陸委會主任委員，這個中間的差別，論工作的內容相差的確很大，但論要協調、溝通、建立共識、要強化執行力、決策怎樣提高合理性、怎樣減少決策的冒險性、怎樣減少決策的不確定性……等，在這些方面其實就像孔夫子講的『吾道一以貫之』。只是你在做決策的內容、事情性質上有所差別，但是在行政的決策過程與執行要訣，事實上還是多所相通的。

做陸委會的主任委員跟我背景比較近的，就是教育文化的交流方面，經濟方面我不熟，我不是主修這方面，而法制方面，我也不太深入，我也不是學法律的。大陸委員會是委員制的，主席是主任委員，委員都是部會的部長、首長。要協調，要大家的意見能夠合而爲一，套用一個時髦的話叫做是『求最大公倍數』，這個蠻費

時的，但是這些行政的道理有許多是相通的。」

他認為，過去的學術與行政歷練，是幫助他能通曉這一層道理的因素，讓他能靈活運用各種行政策略於各個崗位上，他提道：

「我覺得自己在教育行政工作崗位一些粗淺的經驗，倒是對於我後來像是從事陸委會工作很有幫助。……我在師大曾當過教育研究所所長，以及教育學系系主任，那是學校行政，是著重在教學與研究，學術的領導，就比較單純。後來做了台北市教育局局長、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那就可以說是一個政務官了，這時我原在教育行政領域一些體驗、一些經歷、一些教訓、一些心得，對往後在別的部門做政務或做行政，都產生相當的遷移、類化作用。」

他接著進一步說道：

「很多部門固然有它的專業，但作為政務官的，在政策的決定上，只要你掌握政策的形成，把握這個政策的價值、把握民意、提高決策的合理性，儘管你是學教育的，你一樣可以做得好。譬如，試問有那個科系畢業後就能負責全盤兩岸關係的政務？它包含法律、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等方面的專長，作為領導者，你至少要有一樣專精，可是，你一定要協調，要重視政策的形成，如何集思廣益、博採周諮，以為正確之判斷，所以要歷練。很多日本大公司有一種用人的哲學，叫做是『螺旋式的升遷』，……就是漸進地旋轉上升，歷練好多部門的工作，到時候公司要加以重用，他就是一個綜觀全局、瞭解通盤的人，國家的人才也就是這樣一代代培養出來了。」

黃昆輝先生肯定了在各方面歷練的重要性，也認為要透過這樣的晉升管道，才能培育出能真正為國效力的人才。此外，他也期勉每一位在任何工作崗位上的後進們，想要有所收穫、獲得成功，便要虛心學習，他說：

「人只有不斷學習，人生有涯，學海無涯，要多唸、多學，多借重大家的智慧，而不要只靠一個人的智慧。行政上的道理，差不了太多，只是你接觸的人會不一樣，但你誠懇、虛心、肯學、用心、耐心、鍥而不捨，慢慢就會創造你有利的工作條件。」

虛心學習、潛心問題研究、鍥而不捨，這樣一貫的堅持與態度，黃昆輝先生無論在教育或政治領域都未曾改變，以致於能在各方面皆有輝煌的成果表現，備受讚譽。

## 伍、教育行政理念分享

黃昆輝先生豐富的教育行政經歷，能有如此多的成就展現，其背後的理念，也

是我們這次訪談所欲瞭解的。黃昆輝先生所積累的深厚學術基礎，讓他對於教育總是有宏觀與全方位的考量，他的改革，總是從學生、教師、行政三方面著手，秉持著「學生為中心、教師為主體、行政即服務」的理念，目的在健全整體教育環境；他在教育行政方面，經過踏實的學術與行政歷練，逐漸形成能在各方面通達的智慧，幫助其理念能有效的落實。

### 一、學生為中心、教師為主體、行政即服務

黃昆輝先生表示，「學生為中心、教師為主體、行政即服務」是他經常跟各學校校長們所分享的一個教育理念，他希望藉由這樣一個理念的引導，透過校長主動的力量來建立優質的學校環境。他談到了自己常跟校長們分享的教育理念：

「校長的定位就是領導老師，但老師並不是你的部下，你是引導老師來從事教育工作的。所以，校長領導的方向是應以服務代替領導。我常講，要高倡導高關懷，一方面倡導我們要追求的目標、要達成的工作績效，要為學校、為學生做得更好。但是這些工作是人要做的，人是血肉之軀，是需要你肯定他、重視他、關心他、協助他，如此，他雖然工作很忙碌，但是很愉快，因為在這裡工作，校長重視我；若有困難，同仁會彼此關心。這是一個人性的領導方式，所以你可以倡導得多也可以關懷得多，不會說倡導得多關懷就少。第二個，……我都給他們一個觀念，辦學的基本觀念：學生是中心、教師是主體、行政是服務。因為學生是中心，學校的一些行政都是圍繞著學生的，學校的教學都是圍繞著學生的，都是為學生而來的。行政是在服務老師、服務學生的，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環境，讓教師有更好的教學環境、教學條件，所以行政是在服務。學校是老師做主體，不然，若以學生作為主體的話，學生就不用學了！所以老師做主體，學生是中心，老師還是為了學生，這樣的一個基本觀念來辦學，一直到現在我還深信不移，不論中外，對於教育工作、基本的辦學理念，我是持這樣的一個看法。」

這樣的一個理念，至今還為我們所堅信著，也讓我們更加地佩服黃昆輝先生對於教育所展現的睿智與宏觀！

### 二、能力本位的職業與師範教育

黃昆輝先生認為，每一種教育都有它的教育目標，以師範教育與職業教育而言，師範教育要培養優良老師，職業教育則是要培養基層的技術人才。但是，在師資與技術人才的培育過程中，要如何確保學生於在學的年限內，真正學到應學的東西？如何能夠確實地瞭解學生學習的情形？是否學生應該有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都已在求學的各階段中獲得、養成？基於這些想法，能力本位的師範與職業教育政策因運而生。

他首先以法國的技術中學為例，闡明了他提倡能力本位職業教育的要旨：

「譬如說，我參觀過法國的技術中學，每個學生在四年當中，要經過十六個 workshop，學生由易而難，每個學生每學期都要會做二樣成品。比如說，要做螺絲釘，那要你自己真正能夠做得出來，做出來後，老師評鑑通過了，通知你的家人，然後進入第二個、第三個，都比原先的成品要複雜一點，一層層地來考核。四年到了，經過了十六個 workshop，十六件成品你都會做了，這叫做『零存整付』。這樣，高級技術中學畢業的學生，知識技能都有一定的水準，這就是能力本位 (competence-based) 的基本精神。……我們的職業學校也一樣，講求能力本位，三年的高職到底要讓學生會做什麼？國家花這麼多錢、資源在上面，我們講績效責任 (accountability)，就是每一塊錢要發揮最大的功能。政府花這麼多經費、人力在上面，來培養這些學生，那他們到底學到什麼？有沒有按照我們的課程標準或大綱都學到了？不要說三年高職畢業什麼都不會！國中畢業了連自己的名字斗大的三個字都寫不好，這怎麼行啊！所以基本上來講，職業的、就業的這種專業性質的工作，就是要能力本位。」

黃昆輝先生的教育理念，乃是以學生為中心，以提供他們最優良的教育環境為第一要務，而師資素質的良窳則是關鍵。他認為教師應具備專業能力，因此，有必要規劃完善制度以充實、強化教師在各方面的能力。他在這一方面有精湛的見解，他談到：

「拿師範教育來講，中、低年級大部分都包班制，所以老師的知識、技能一定要有專業水準，態度那就更重要了。譬如你會板書、會彈鋼琴、教低年級學生唱唱歌、會帶團體遊戲等這些，做老師的，要有些基本能力，不要說上了講台，寫起板書龍飛鳳舞的，學生看不懂，大學生、高中生無所謂，小學、初中學生就不一樣了。師資的養成，不能忽略這些嘛！所以我覺得老師應該有的，例如怎麼寫教案、教學過程怎麼把握、還要試教，……實習就是要他養成做老師的那些能力。」

黃昆輝先生最後與我們闡述了所謂「能力本位」教育的內涵要義，他說：

「我想，當時我在台灣省推動能力本位的師範教育、職業教育，就是回到最剛開始的一句話，實實在在的學，真正不虛此行。學生實實在在的學，真正能夠學到東西，將來在社會上能夠自己謀生，又貢獻國家、經濟各方面，說起來於公於私，對自己或社會，都是有好處的。所以我是覺得要秉持能力本位的精神，至於怎樣的作法，都不一定是千篇一律的。只要有能力本位的精神、行為目標 (behavioral

objectives) 可以評鑑教學成敗，將各級的、各年的、各學期的教育，各單元的教學，定好目標要怎樣來做，然後真正能夠評鑑它。……除了知識技能的評鑑以外，還有態度影響的評鑑。……我是覺得精神上，能力本位是一種教育精神、一種教育理念，但是怎麼樣達到這個目標呢？可說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可以有各種的辦法，沒有統一的一套模式。」

因此，倡導能力本位，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實在的學習，習得應有的知能。另外，黃昆輝先生提到能力本位所指的「能力」，不僅包括知識技能層面，還包括了態度層面。由他的話中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理解，能力本位是一個精神，隨著時代的改變，每個人應有的能力是不一樣的。我們在不同的時代裡，可以先去瞭解這個時代中，或是一位老師、或是一個接受職業訓練的人，在符合社會分工的原則下需要什麼樣的能力，依此規劃課程，讓他達到目標。並且，要能針對能力本位來給予適當的評量，因此，評量不能夠只停留在細節、專門技術的層次，還要注意態度與信念方面。

儘管能力本位教育政策的立意良善，但是最後卻也無疾而終，黃昆輝先生感慨地表示：

「我覺得政策的推動，連貫、繼續是很要緊的。政策一旦決定了，那麼政策的推動，除非是發現有不可調整、或不可改變的缺點而放棄掉，否則的話，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令人遺憾。但是，教育百年大計，是一棒接一棒的。常態的話，只要是對的政策，這不是某人的政策，而是教育行政部門、國家所執行的教育政策，是整個教育的政策，所以變來變去，在教育上來講，大家總覺得可惜了點。」

教育百年大計，應是一個永續發展的機制，因此，希冀黃昆輝先生今日的一席話，能給予國內教育界更深的反省與自覺。

### 三、Language Power

黃昆輝先生在擔任台灣省教育廳廳長期間，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研究，體察當時教育問題與需求，於是提出了「生動活潑的小學教育、適性發展的中學教育、能力本位的職業與師範教育、主動敏捷的教育行政」的施政藍圖，對於這樣一個教育總體目標的營造，黃昆輝先生簡要地闡述了當時的情形：

「這種總目標還形成了一個方案，提到省政府委員會議做簡報，讓省政府的委員、各廳、處長都聽了，讓整個省政府各部門建立了這樣的一種共識，然後再一步一步的，例如生動活潑的小學教育，怎麼做呢？所以當時就有國民教育五大革新措施，就是根據這個總目標來的。」

黃昆輝先生當初所持這樣的一個施政理念，他藉由自己最近所閱讀的書籍，做了更為深入的闡述，他談到：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叫做是『Leaders to Leaders』，意思就是領導者傳承給領導者。那本書是美國 Drucker Foundation（杜拉克基金會）出的，杜拉克基金會專門編領導管理方面的名著，他們邀請全美最有名的學者寫文章，裡頭就有一篇寫到美國的幾位總統的領導風格，怎麼領導，各有千秋。這裡頭提到甘迺迪總統藉助語言的力量，提出號召，引起共鳴，也就是你要提出理想、訴諸理想，用『Language Power』發揮影響，建立共識。在教育部的政策底下我們怎麼做？小學走那個方向？中學走那個方向？職業跟師範走那個方向？大目標先訂出來，並加以倡導，……。這個目標如果是對的，那要達到這個目標，殊途同歸，好多辦法都會達成。所以說採用『Language Power』，就是把我們明確的目標宣示出來。領導理論有一個叫做『途徑—目標理論』，行政領導要有效，就是要讓被領導的人知道目標在哪？要達成這個目標的途徑在哪裡？那麼領導效果就會好，不會讓被領導的人自己摸索，浪費時間。」

「我記得很清楚，當初的理念是生動活潑的小學教育、適性發展的中學教育、能力本位的職業教育、師範教育，行政方面則主動敏捷的教育行政。校長、教育廳、局行政人員更要主動敏捷，祇要那裡有需要，就不要拖泥帶水，要趕快去做，行政是服務，要主動而敏捷地來支援學校教學。所以生動活潑、適性發展、能力本位、主動敏捷這樣架構出去的話，就做不完了。」

黃昆輝先生當時的施政方法，即是將正確的總目標確立了，再進一步思考問題解決方案，由此架構起完善的教育政策，這樣的一種政策推行的方式，至今仍為學術與實務界所肯定。

#### 四、相輔相成的理論與實際

黃昆輝先生認為，理論與實際之間或許存在落差，但是透過不斷反饋的修正機制，一方面能促進理論建構日臻完善，一方面改善現況漸趨理想之境，因此，理論與實務之間，不是對立的關係，而是相輔相成的，他說：

「只要有個教育理論基礎、有個教育理念在，你就會根據理念去衡量現況。跟你的理念與目標不合，就是有問題，接著再去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麼會這樣？有解無解？能不能合理改善？有沒有方法改善呢？沒有方法，那暫時不說，改革的時機還沒有成熟，這是決策的藝術。著名管理學者巴納德講的決定的藝術在於：第一、時機未成熟時不做決定，第二、沒有比較有效的辦法時不做決定，第三、多做一些

目標導向的決定，第四、不做別人應做的決定。」

「理論跟實際總會有落差，但好的理論沒有不合用的，不是說我們從事教育行政的都不用談理論。所以我常鼓勵我們學教育的，理論基礎是有，就怕你不會用，好的理論，一定是合用的。但是理論只是一組暫時的假設，我們要把這些理論用在教育行政實際上去試驗、去驗證，雖然它是一個暫時的假設，但是經過我們的驗證，如果是行得通的，實施的結果就會豐富這個理論的內容，然後再又根據驗證的理論觀點，去指引未來的行動。我於民國六十年自美國學成回師大教書，那個時候教育行政制度、教育法令的課都沒有講理論，於是我便開始把教育行政理論研究慢慢加以推廣。博士班、碩士班學生就拿理論觀點去作論文，驗證理論是否可行，慢慢發展出我們自己的教育行政理論。」

透過理論與實際的相互驗證，從而促進教育在各方面的進步，他以當初在台灣省就任教育廳長時，創立高中入學聯合命題為例，來闡述這樣的一個觀點，他說：

「升學競爭在這個時代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怎麼考會影響怎麼教。如果學生們都認為：考物理化學不用做實驗，都可以作答了，那麼為什麼上物理化學課要做實驗呢？所以只要上補習班，就能考得很好。試問，這樣的教育正常嗎？那時補習班從來不作實驗，實驗器材都沒有，這就是有問題。我們教育改革有一種策略叫做『漸進』的策略，有人叫做『個別累增』，是個別累積增加的策略。也就是說，如果一下子沒有辦法打破升學競爭、升學主義的話，那麼，怎麼考就會影響怎麼教，所以，我就想辦法讓考試的方法、考試的內容變得更好，從而來帶動教得好。在這個情況下，命題應該結合一些懂得心理測量的心理學專家、學科專家、國中、高中職的各科的老師、各方面的專家，形成一個 team，入闈場，好好討論怎麼樣把試題命得難易適中，非常合理、靈活、非常好，還要找學生進去做試題鑑別度的試驗。」

「考試不要考學生死背的東西，應該是考觀念通不通。以前常考的例如：某文作者生於那一年、死於那一年。考這個有何用呢？像英語，一定要考單字愈長、難度愈高的，最常用的反而不考。所以要改善命題的技術，試題的功能要能測量學生的記憶、理解、分析、綜合、評鑑的能力，而記憶、理解及應用這三個最基本的層次要會。出題目不要說正好出自某一課，而是要課連課、上冊連下冊，觀念是要打通了的。所以只要學生上課好好聽，不用補習自然就會了，……這也是一個嘗試。這聯合命題的做法，還相當受到肯定。」

黃昆輝先生總是如此，體察教育現況的同時，也有將理論付諸於實務面去嘗試的決心與魄力，從而讓許多良善的教育理念能有機會在實際中踐實！

## 五、做決定與執行的藝術

黃昆輝先生認為，身爲一個領導者，主要從事的活動有二，一類是作決定的活動，一類則是將所作的決定付諸實施的活動。這兩個活動要做得好，實是一門藝術，而透過黃昆輝先生精闢的言論，使我們能初步地去體會這當中所蘊藏的深奧道理。在做決定方面，他談到：

「這就談到了你怎樣能夠找到適當的人，能夠選對輕重緩急的問題，借重這些有經驗、有學識、有智慧的人來貢獻意見、凝聚共識、能夠擷取意見的精華，然後形成政策。你要做決定，要讓這個決定付諸實施，一定得讓將來要執行的人能有機會參與這個決定。這個決定爲什麼要這樣做？目標宗旨在哪裡？緣由在哪裡？將來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執行的人在執行上有沒有什麼困難？所以你在做決定，不單只爲做決定而做決定，而是爲它能夠改善教育，能夠有效執行來做決定，所以你在做決定的時候已經考慮到執行性，執行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一個決定只是少數人關起門來閉門造車，然後一只公文下去，可能窒礙難行。一定要讓將來執行決定的人能參與作決定，考量到這個決定做了對現狀的改善會不會有幫助，能不能有效執行。」

接著，在執行方面，他談到：

「執行的要領之一，就是『鼓勵以方』，要鼓勵他們去執行，其次，協助他們解決問題，要想辦法提供資源、協助，減少他們在執行上的困難。第三，要盯得緊，follow-up，這樣三方面同時並進，在執行方面就較容易了。另外，執行最重要的，一個政策要付諸實施的話，一定要讓執行的人有充分的溝通機會。以前我在教育廳服務的時候，每一個學期都到各縣市去開中小學校長會議，一個縣市接著一個縣市，上午在彰化，下午在雲林，常常只能在車上吃便當。開會的時候，所有校長討論我們要做的事情：爲什麼要做？怎麼做？大家做得來嗎？大家有這方面知識、能力、意願做嗎？這要溝通。這件工作不會增加你太多困難，只是改變一種作法，經過大家一起溝通，建立共識。大家有共識，覺得做起來有價值，做起來困難不會太大，將來做了遇到什麼困難，上面會幫忙。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做事一定要循阻力之最小』，阻力很大不行，而凝聚共識就是在化解你的阻力。」

因此，在做決定方面，絕不是由上而下的盲目進行，而是要有所有相關人員的共同參與，集思廣益，才能作出理念完善、具有可行性的決策。在執行方面，給予執行人員鼓勵、加以視察，並以協助增強執行力、以溝通建立共識，藉此尋求阻力之最小。



## 陸、對教育改革的省思

近年來，國內教育改革的腳步急劇加速，面對一連串的汰舊換新、政策更迭，黃昆輝先生由多年學術研究與行政經驗所累積的心得，對於教育改革在理念與做法上，都提供了我們更深入的思考層面。

### 一、改變不一定保證進步

對於改革，許多人視其為進步的象徵，因此未經通盤思考、審慎權衡，便以大刀闊斧之勢，求新、求變。黃昆輝先生對此提出了強烈的質疑，他語重心長地說道：

「無論是歐美任何一個國家，或是我們國家過去的文化演進，事實上，教育系統它是一個 supporting system，一個支持的系統，也是一個基礎。教育工作不單是涉及到制度面，還涉及到技術面，更涉及到價值觀念、心理層面，而且它涉及的範圍擴及每一個家庭，可以說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這個系統要有所改變，那我們就要特別去認清這一點。第二，我們也相信，沒有改變就不會有進步 (No changes, no progress.)，但是，改變不一定保證進步，改變有改進，也有改退。教育改革有它的理想性，但也有它的現實面，因此有人說教育系統會不會保守了點，這個是由外人來看的，我們不予置評。不過，……我想這個涉及的是程度的問題，而不是類別的問題，這不是全有全無的問題。」

由此可知，教育改革的結果，可能帶來進步，也可能遭致更大的損失與傷害。他接著提到了進行教育改革的艱難處，他說：

「教育改革最難的，就是過猶不及的問題。比如，你覺得這裡做得不夠，然後要改，可是卻拉到另外一端，就變成『過』了。『過』猶『不及』，都沒有踩到正當的位置。就像鐘擺一樣，像過去的教育思想那樣，由成人中心的教育變到兒童本位，從一端又拉到另外一端了，就像鐘擺那樣擺來擺去，擺到左邊後，又擺到右邊，而沒有停在中間的位置上。所以，有人說，師範教育系統都是封閉的、保守的，我認為這句話不是事實，也不太公道。就拿師範教育來講吧！現在講師資培育多元化，這種倡導是一種開放的，廣開進才之路，可是如果沒有把專業化放在多元化的上面，就變得『人盡可師』了！教育改革要成功，就是老師要有熱誠、專業素養夠、具有愛心，師資水準不但是不要下降，而且要提高，教育改革才有效。所以，『教育第一，師資為先』，老師這一關都沒有辦法管制好的話，只有多元化而

沒有專業化，或把專業化放在多元化的底下，這個教育改革，我們沒有什麼理由抱持樂觀態度去看它。」

過猶不及的改革皆非教育之福，因此，教育改革實是一艱鉅之任務，由此也提醒了我們，對於教育改革，應為抱持更為謹慎的態度，力求更充分而切實的準備才是。

## 二、祇有綿延不斷的革新，沒有跳躍躁進的革命

國內以往教育改革或教育政策的推動，有許多是來自於他國經驗，但因國內外的國情差異，也使得政策或制度在轉移的過程中，往往面臨良法美意，卻落實不易的窘境。針對此一問題，黃昆輝先生表達了他的看法：

「我覺得，特別是教育文化的工作，要轉移是要經過一番相當的過程的。純粹像技術的轉移，待知識水準、技術水準到了，就容易轉移了；但是教育文化的改革，就會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教育的改革跟其他的改革不太一樣，教育的改革只有在自己的土壤、在自己的文化基礎上，綿延不斷的革新，而沒有跳躍躁進的革命。它是在既有的基礎上一步步地改革，而不是說自己的基礎不要，用跳躍的。移植一棵國外的蘋果樹，硬栽到我們熱帶的土壤上，是栽不活的！所以，沒有說外國一種制度，全然的可以移到我們國內，包括教育制度方面、文化方面，可以一成不變的移在我們的土壤上。田培林先生是一位相當有學問、有經驗的老師，他曾批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中學為體』沒有什麼錯，但是『體』、『用』是一件事情的兩面，要根據這個『體』來『用』，所以若以中學為體了，西學要怎麼用呢？光講『西學為用』也沒有什麼錯，但把『中學為體』與『西學為用』這兩個連在一起就錯了。在自己的土壤、在自己的文化基礎上，我們有自己教育文化的特性，如果把外國東西搬來，就要馬上建立制度、立即付諸實施，這恐怕是不太瞭解教育文化的改革、革新的性質。」

透過黃昆輝先生精闢的言論，讓我們瞭解到雖「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但是更應避免盲目地引進國外的政策、制度，而忽略了自己本身的條件、特性。他更進一步地提醒我們：

「人家美國是這樣辦，所以我們為什麼不跟著那麼辦！這種比較研究無可厚非，但是人家那麼辦，有人家的條件跟背景，我們為什麼要那麼辦，有我們的條件和背景。但是如果人家的比較好，那麼我們應該要想辦法見賢思齊，要跟人家一樣好，甚至超越人家，但是至於怎麼個作法，這倒不一定，有哪兩個國家的做法是完全一樣的？沒有的。所以，自己就要有自己的制度，這種教育文化的改革，躁進的

話，難以成事，穩健比較容易成就事情。」

的確如此，黃昆輝先生的話讓我們體悟到，在廣開戰場的同時，我們更應該去考慮這些制度、政策之於我們的必要性、可行性，不一味地隨波逐流，而是要以穩健踏實的步伐，為我們自己規劃一條最適切的教改之路！

### 三、人生體驗與心得

從黃昆輝先生的言談中，處處能感受到他用「心」經營生命的認真與執著。尤其，對於教育事務，無論是從事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或是擔任行政職務，都是全心投入，滿懷熱情，但求竭其所能，為教育貢獻心力，築構更好的教育環境。這樣的理念與態度，不僅讓他能順利度過每個人生的轉捩點，更讓我們看到了生命裡所蘊藏的豐饒與價值。

### 四、做人處事的原則——誠實、堅持、結善緣

黃昆輝先生在為人處事上對於自我的要求，支持著他在人生各個階段，無論求學或工作，皆能有傑出的表現。他以「誠實」、「堅守原則」以及「廣結善緣」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並且身體力行。對於「誠實」，他這樣說道：

「我個人覺得，無論求學做事，還是『誠』為上策：『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因為一個人不管是在什麼崗位上，是唸書還是工作，只要你是誠誠懇懇地待人，實實在在地工作，就會立於不敗之地，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礎。任何一個人，如果能做到誠懇待人、實在做事，這就是『誠實』嘛！我想我自己過去在任何崗位上，都信守著先人這樣一個智慧的結晶。」

他接著談到了「堅守原則」與「廣結善緣」的重要性，並且闡明兩者間的關係，應是相輔相成的：

「同時，我也覺得在做人上，應該是相輔相成，中國人做事離不開做人，做人離不開做事。所以，做事要堅守原則，是對的原則就應該堅持，對人則要廣結善緣，而堅守原則應該要放在廣結善緣之上，不要為了人際關係而犧牲了做事的原則，而是要廣結善緣做好人際關係來支持你、幫助你堅持你的原則。只要合理的、可行的原則你就要堅守，做事情才不會隨風飄搖、朝秦暮楚、左顧右盼，你才會有一個堅確的方向、道理去做。」

從黃昆輝先生的言談中，可以見到他對於事理思維之清晰，也使我们更加肯定他對於這些道理的深切體察與奉行，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得出這般智慧的箴言！

## 五、熱愛教育，樂在其中

黃昆輝先生有豐富的人生閱歷，也有傑出的成就表現。在教育界，他從事學術研究、著述以及教學的工作，也貢獻他在教育行政領域的專長，擔任教育局長與教育廳長職務；在政治界，他身居要職，也建設良多。這樣一路走來，黃昆輝先生認為，他最鐘愛的，依然是在教育工作方面。在教育崗位上，他最熱中的是從事教學與研究的工作，其次則是能有機會擔任教育廳長、教育局長職務，為教育界奉獻心力，他用開心而堅定的口吻向我們表示：

「因為教育的事情是利他的，沒有利害關係的，更沒有利害衝突的，因為都是為了人家孩子好！並不是說像商業界，這筆生意我搶到了，而你沒有，我得你失，這當中有怨。因為教育是國家建設的基礎工程，教師是無名英雄，所以它是非常清高的！你看政界，你在位的時候往往車水馬龍、門庭若市，但你一旦離開，門可羅雀，那是很現實的。但是做老師，教很多學生，尤其在我們文化裡頭，老師跟學生還比較有聯繫。我離開政界的時候，有學生講：『老師啊！你以前忙，我不敢來看你；現在你比較有空，我才來看你。』這就是不一樣，老師就是老師，學生就是學生，這個關係特別深刻。所以當你看到你的學生在社會上做事做得不錯，你心裡很安慰，雖是他有成就而不是你，可是心想：『我教過的學生，我對他的成長有影響。』這有多令人高興！其他的行業，你爭我奪，是非多、衝突多。教育呢？教育下一代，學生原先沒有價值觀念，讓他有價值觀念；原來沒有是非觀念，讓他有是非觀念；原來沒有知識，讓他有知識；原來沒有能力，讓他有能力，由未成熟慢慢走到成熟，讓他將來成為有用之才。我覺得教育非常有價值，能夠創造歷史的價值，這是教育的工作。」

正因為如此，黃昆輝先生認為，倘若來世還有機會，他依然會選擇教育工作，並樂此不疲！有這樣一位滿懷熱忱、充滿智慧的長者投入教育領域，對教育界而言，真是一大福氣！

## 六、對教育工作者的期勉——勤於耕耘，就會有收穫！

在黃昆輝先生眼中，教育是極具價值、有意義的一項工作。他認為教育是一個國家國力基礎的來源，國家興衰、社會振靡，關鍵就在教育。因此，他最後也藉此機會，向我們表達了他對於每一位從事教育工作者的期許與勉勵，他說：

「提供大家參考：我覺得，教育工作者是社會的工程師。我們人與其他動物不同，人能昇華人格，社會文明才會更進步。所以，教育工作是利他的，只要勤於耕

耘，必有收穫，只要勤於工作，必能創造歷史的價值！我覺得做這份工作，是最能夠心安而理得，我相信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好好體會這一點，就會非常喜歡教育工作！教育工作者就是淡泊名利，能很有尊嚴的、很有意義的，去從事很有價值的工作，這個就是最好的。」

勤於耕耘，創造教育的意義與價值。這是黃昆輝先生一生的堅持，也是他提供予我們最寶貴的體驗與心得，望大家一起共勉之！

### 柒、擇善固執，築夢踏實

.....

教育是塊築夢地，融匯了許多人的夢想，以及各種學理思潮的理念；教育亦是個粹鍊場，許多的夢想與理念，在此受到嚴酷的檢視與考驗。透過此番機制的運作，教育的理想與實際，因而不斷地去蕪存菁、豐碩內涵，黃昆輝先生深信，這是條通往教育至善境地的必經之路。他將這股信念化為實際行動，一方面窮究學理以擷取理念之精粹，一方面以穩健踏實的步伐將理念踐行於實際，黃昆輝先生用生命寫下了一頁頁不凡的成就，也為教育開啓了一條通往希望與美好的康莊大道。

### 主要著作

中外教育行政制度（合著）。台北市：中央文物供應社。

教育投資問題研究。

克伯屈的教育方法。台中縣：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教育行政原理（主譯）。台北市：三民。

教育行政與教育問題。台北市：五南。

教育行政學。台北市：東華。

# 開啓教師在職進修大門 的先鋒

——葉學志

(訪問與資料整理：劉春榮、陳怡親、簡惠閔)

## 壹、生平簡介

.....

葉學志先生，福建省晉江縣人，民國十四年生。

## 學歷

- 民國二十年就讀於縣內著名私立小學
- 民國二十六年就讀福建省立晉江中學初中部
- 民國二十九年就讀省立福州高級中學
- 民國三十二年就讀中央政治學校，主修法政，獲得學士學位
- 民國四十六年獲得美國田納西州畢堡德師範學院碩士學位
- 民國五十三年獲得美國芝加哥聖保羅大學教育專士學位
- 民國五十六年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教育博士學位

## 經歷

- 民國三十六年分發到福建省政府教育廳服務，任委任督學兼股長
- 民國三十九年任縣立鹽水初級中學教師
- 民國四十年任台灣省教育廳科員及股長
- 民國四十九年任行政院秘書，承辦文教業務
- 民國五十六年任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 民國五十七年任高雄師範學院教授兼教務主任。
- 民國六十年回政治大學任教，先後任教授兼學術合作委員會執行秘書，教育研究所所長及教務長
- 民國七十二年任國立台灣教育學院校長

民國七十八年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長

### 勉勵後進的話

#### 終身規劃

葉校長勉勵後進的話是：「大學生應有終身規劃」。想一想自己的最終人生目標是什麼？自己適合就讀什麼科系？想要讀到什麼學位？想要從事何種職業？什麼條件可以達到人生理想？我的溝通能力、健康情況又是如何？人生除了追求快樂外，也要追求意義，能夠作到終身規劃，人生才會充實、有意義。而教育剛好可以培養知識和能力，讓我們有條件達到我們想要的目標。葉校長也指出，教育是事業，不是職業，教育工作者應秉持服務的態度。「做事容易做人難」，我們的社會太強調升學主義，升學主義培養不出完善的人，一般家庭、社會不重視生活教育，所以人要學會過較完滿的生活，例如：美國大學生、研究生雖然功課繁忙，但會抽空運動、休閒、參與藝文活動，因此，我國大學生要多多參加社團，可以培養學業外自己所興趣的音樂、文藝、體育等專長外，而且在與同學組成的社團活動中，增加學會良好人際關係的溝通能力，以及學著領導他人以及被領導。從事學術工作要靠自己努力研究，但行政工作除了靠自己專業行政能力之外，還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

### 貳、重要事蹟

.....

葉學志校長民國五十六年學成歸國後，應聘回母校—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所任教。次年，應邀南下高雄，出任臺灣省立高雄師範學院教授兼教務主任，並一度兼代理院務。民國六十年，重返國立政治大學任教，其間曾兼任學術合作委員會執行秘書、教育研究所所長及教務長等職務，並先後訂定修習碩士程度之四十學分課程、增設教研所博士班，並在政大校長領導之下創建附設空中大學行政專科進修補習學校，造福全國公務人員。

民國七十二年，葉校長應教育部敦聘，擔任臺灣教育學院校長，葉校長在校長任內，除積極加強教師素質及提高學術水準外，並特別重視學生的生活教育，強調愛的教育，以期能培養出以身作則的師資。對於葉學志校長在其擔任行政工作時所推動的重要事蹟，及其教育理念將分別敘述於后。

## 一、教育研究所四十學分班

民國六十三年，葉學志老師於政治大學改兼教育研究所所長後，首創我國研究所層級的教育人員進修制度，提供全國教育行政人員與中等學校教師進修機會，訂定修習碩士程度之四十學分課程，最初於暑期提供國民中學教師進修，其後各師範院校亦陸續仿照此制，開放進修管道。進而擴展到提供中小學教師進修，先後增設週末及夜間班、週末或夜間時段進修。四十學分班的特點在加強社會學科的基礎，授課教師不限於教育領域的師資，目的在擴大進修人員的社會科學知識範疇。談及這一項對於教師進修的重大福利措施，葉校長表示：

「我接續劉真先生擔任政大教研所所長時，政大教研所只有碩士班，當時我就想辦理博士班跟 40 學分班。辦理 40 學分班是想要提高教育人員的素質，且讓非師範院校畢業的人可以有進修的機會（當時很多教育人員、校長，都不是師範院校畢業的），因為教育改革的成效要提昇，首先要提昇教育人員的素質。當時的作法是參考清華大學辦理的「數學進修班」，四十學分修畢，薪水可加四級，相當於碩士畢業。因此我便與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商量，教育部一開始不很贊成，但我說這很重要，讀完 40 學分班，可以加 4 級底薪，這對中小學老師是很大的鼓勵，後來經過不斷地爭取，教育部才贊成。」

「當時因名額限制之故，讓校長優先就讀，辦理行政、輔導各一班，報名情形非常踴躍，甚至連當時有一位縣長也想要進修，我說不行，這是開設給中小學教育人員進修的。當時的教育廳長及臺北市教育局長非常支持，願意負責學費，讓就讀 40 學分班的人免繳學費。就讀的人素質都非常高，因有名額限制，訂定積點辦法，學校行政主管積點較高，我們優先開放給校長就讀，然後才是主任跟老師。」

「因為進修的校長、老師不是師範院校畢業的，所以我的想法是：當一個校長要懂的事情非常多，除教育外亦應包含政治、經濟、財政等等，因此，為求課程內容可以達到科際整合的目標，我便延請政大相關各系系主任、各系最好的師資開課，當時政治大學在社會科學方面已有深厚的基礎。」

「有一件插曲，當時有一位女中校長跑來辦公室找我說：『我來四十學分班就讀，我學校的教務主任也來讀，如果校長期末成績不及格，但是主任及格了，怎麼辦？』。我的回答是：『當學生就是要擺脫校長的身分，要忘記年齡、社會地位』。」

「當時 40 學分班的師生間感情深厚，學生的反應是對工作很有幫助，有些校長也鼓勵學校裡的老師繼續來念，但當時他們曾向我反應『為什麼修完四十學分後沒有學位呢？』。我的回答是，因教育法令規定要有學位的話一定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是要辦理入學考試，第二是要寫碩士學位論文，所以要授與學位是不可能的，後來的權宜作法是將來若進入碩士班就讀可以抵免學分。」

「隔年，師大教育研究所看政大辦理的四十學分班成效不錯，也想辦理，經彼此商議合作，但爲了與政大作區隔，所以，另開設心理、哲學各一班，但兩年後師大也想辦行政班，就不作區分了。當時教育廳認爲教務主任、教務處各組長在暑假就讀四十學分班，會影響學校招生工作，因此便增設夜間上課。40學分班發展到後來，各師範院校都仿照辦理了。40學分班對這些修課同學的幫助不只在生計方面可以提高薪水，同時也對很多原本不是師範院校畢業的教育人員很有幫助，再加上教育廳、局都很支持，造成進修之風日盛。」

### 二、政大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葉學志老師接任政大教育研究所所長後第一件事就是爭取政大教育研究所設立博士班，培養出眾多的學術菁英，使得六〇年代的臺灣教育水準向上推進一層。回想這一件事，葉老師說到當初設立與推動政大教育博士班的背景。

「政大教研所之所以會設立博士班是應同學要求的，當時我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反應時，其回答是『師大已經設博士班了，你們就不要設了』，但我的想法是教育博士班應該要普及，單靠師大一校辦理是不夠的，辦理博士班是一個今後必然的趨勢，目的在提高教育水準。」

「爲了讓碩士班畢業的學生有出路，我爭取到可以增設博士班。當時的招生是開放的，沒有本位主義，以招收優秀人才爲主要考量，而且不限制考生大學、碩士班時就讀的科系，碩士畢業者皆可報考，這個作法的優點是可以達到科際整合。我當時還有一點堅持的原則就是，教授博士班課程的老師一定要有高學位（博士學位），沒有高學位的話只好調到大學部開課。」

### 三、附設空中大學行政專科進修補習學校

當時人事行政局局長陳桂華先生見政大辦理四十學分班成效卓然，特別親訪當時校長李元簇先生及葉學志老師，希望透過聲望日隆的政大協助辦理公務員的行政進修班。空中行專教學制度在老師的用心規劃、推動下，建立了良好基礎，造福了許多公務人員，並提昇我國公務人員的行政素質。

「空中行專辦理的目的，是要讓資歷深、但因爲沒有專科學位以致不能升等的公務人員有進修的機會。當時是朱匯森先生擔任教育部長，教育部與國防部、人事行政局聯合辦理空中行專，委託政治大學辦理。當時我擔任政大教務長的工作，並

兼空中行專的校務主任，在政大校長領導下實際負責辦理，『政大附設空中行政專科進修補習學校』之所以要命名為『進修補習學校』（不命名為「附設專科學校」），是因為法令規定大學與專科要分開之故。」

「『空中商專』與『空中行專』有一點不同：第一是，當時的『空中商專』，有很多學校辦理，但空中行專只由政治大學辦理；第二是，當時空中商專兩週面授一次，而空中行專則是利用寒暑假面授。空中行專採用電視教學（由華視電視公司辦理，在星期天上午及平時晚上播放教學影帶）是為了解決教師不足的困境，因為學生有幾千人，延聘教師有困難，但是採用空中教學有其利弊，優點是可以請到最優秀的教師，且傳播範圍很廣，缺點則是不能面對面，以致師生間沒有互動、學生沒辦法發問。所以後來增加面授，請主講人編寫教材，再加上考慮學生（軍警人員、公教人員）與教授要上班的原因，於是決定利用寒暑假集中面授。」

「空中行專因為不能每個縣市都設立，所以交通跟食宿問題就必須要克服，以方便遠道學生進修，當時的作法是給中興大學、成功大學、花蓮師範學院補貼經費，讓進修的學生住大學宿舍，此外還請國防部、救國團提供軍毯、睡袋等民生用品。問題就這樣一步一步解決。當時學生反應就讀空中行專沒有學校生活的感覺，學生們上完課就走了，因此，我便抽一個晚上舉辦晚會，由學生籌備晚會節目，讓師生聯繫感情，順便加強生活教育。一般對空中行專的反應是認為其效果好，不但可以增進新知識，還可增加升遷機會，當時很多澎湖、花蓮、台東等縣市的政府科長、科員都是空中行專的學生。同一縣市中，行政、地政、財政、教育各局同仁又同在空中行專進修，彼此私人與公務聯繫方便，無形中增加行政效率，是附加的收穫。」

「藉由空中行專這樣的非正式教育，我們協助這些公務人員達成目標，讓他們有成功（升遷）的機會，讓他們因為工作之故，需要進修的願望得以實現。人為希望而活，只要有機會，再苦都願意努力。這段期間我的奉獻與服務，也讓我覺得很有意義。」

經由以上的談話，可以發現一位教育家的卓見與智慧。現今推動的終身教育，其實葉老師很早就推動「終身教育」！

#### 四、擔任國立台灣教育學院院長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長

葉學志老師接掌台灣教育學院院長之初，全心提昇學校學術地位，此外，也積極規劃新校舍的興建，及教學設備的擴增。

彰師大改制後，葉老師更加努力爭取經費，自 78 學年度後陸續興建明德館、

學生活動中心、研究生宿舍、立體停車場、體育館；在第二校區則完成水土保持、校區景觀工程、教師宿舍、機械大樓、學生宿舍、污水處理設施等。在提昇學術地位方面，除增設新學系、研究所外，並每年舉辦多場次之國際學術研討會，尋求國際學術交流的機會，並積極與外國著名大學訂定學術合作，提供全校師生研究進修機會。葉老師對於彰化師範大學的建設，相信是有目共睹的。對於該校的規劃，葉老師說到：

「我接任臺灣教育學院院長其實是計畫外的事，因為那一年我休假，要前往美國的事宜也早就辦妥了。但朱部長的誠意打動了我，讓我改變原先的計畫，南下彰化，接任臺灣教育學院院長的職務。對於我的決定，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反對的原因是認為臺灣教育學院不值得去（當時很多人不知道這所學校在哪？）再加上它是成立不久的學校。此外，臺灣教育學院原為省立學校（後改為國立），因此經費不足、師資也匱乏。我在臺灣教育學院擔任院長時有幾點作法：」

### （一）改善師資

「我接任教育學院院長時還算年輕，因此就請教幾位老前輩：『辦理一所學校，什麼是最重要的？』，當時獲得的答案是『改善師資』，因為老師跟學生接觸的機會最多，而且有好的老師才有好的學生——所謂『名師出高徒』。為了改善師資，我有兩個構想。第一個構想是增設班級，因為增設班級便可增加很多新進老師，而新聘的老師如果沒有高學位（博士學位）的，各系系主任不需跟我談，系主任跟我談過後，我還要與新進教師個別面試，看他的品德、風度如何，因為甄選老師就像討媳婦一樣——『進來容易出去難』，當時有些外界人士介紹的教師因為素質不良，我只好婉拒。第二個構想是針對現任老師的，我規定助教要升任講師必須有碩士學位，講師要升任副教授需有博士學位，當時也遭遇很多阻力，但我一直堅持下去。當時很多現任老師都沒有博士學位，因此我便鼓勵年輕老師進修，並與國外大學締結姊妹校，以免收學費為手段誘導教師進修，提高教師的進修意願。現在有很多老師感謝我當年鼓勵他們繼續深造，因為這不但對學校好，對教師個人的發展也大有幫助。教師要升等，除了有著作外，我還規定要有高學位。」

### （二）帶領學校成為一流大學

「校長對學校的影響力真的很大，我一直戰戰兢兢。除了改善師資外，辦理一所學校還要有理念、有政策，我想讓臺灣教育學院變成一所一流大學（當時還不是大學）。因此，我提昇研究風氣，努力爭取國科會補助，積極辦理各種研討會；此外，師範院校與其他一般大學最大的不同就是，師範院校的學生日後是要為人師表，因此生活教育要加強（這方面當時張植珊前院長已作得不錯）。加強生活教育

的作法有：工讀學生到餐廳幫忙、成立山地及農村服務隊等。我自己本身也以身作則，例如學生看到校長不會打招呼，那我就主動向他們打招呼；爲了可以增加師生互動，我也常到學生餐廳吃飯。」

「我一直主張『愛的教育』，『愛的教育』就是鼓勵與教導學生要愛自己、愛學校、愛國家。愛自己就是要注意健康、增進知識及培養道德感；愛學校就是要尊敬師長遵守校規、維護校風及校譽；愛國家就是要忠於國家、服務社會、擁護政府。」

### （三）學校不能像象牙塔

「學校不能關起門來辦教育，學校要多多服務社會。這點見解與現在大聲疾呼的『學校社區化』不謀而合。因此，學校不但加強在職進修，並且推動成人教育。例如：由電腦中心辦理電腦補習班，招收校外人士，且進修資格不限制；由工教系推動建教合作，與企業合作，設計洗蛋機等；由成人教育中心與彰化各鄉鎮合作，推動成人教育；又由各系辦理各種進修班，提供中小學教師進修的機會。」

### （四）營造和諧的學校氣氛

「我每個月輪流到各系與老師們座談，問問他們對學校有什麼問題，座談完後吃自助餐，所以每個老師都認得我，我也認得學校裡的每位老師。我秉持著『人和才能團結』的理念，務求平易近人、服務他人，這也是我運氣好、阻力少的原因。很多人當完校長後就不敢留在原校教書，但我跟同事感情很好、像朋友一般，我從81年校長任期屆滿後，在彰化師範大學任教至今。」

### （五）加強硬體建設

「彰化師範大學的硬體建設多半是在我任內完工的，如圖書館、活動中心及第二校區等。說來也是我運氣好，當時適逢立法委員批評中央政府之教科文經費不到憲法規定的最低限—百分之十五，當時是毛高文先生擔任教育部長，教育經費因此擴充，東華大學、暨南國際大學也都是此時籌備的，因此便有經費興建硬體建設。」

「第二校區整地時歷經一些波折，當時的非法居住者不肯搬遷，於是我請縣政府地政科幫忙解決補償事宜，地政科勉強答應；因爲學校並非營利機構，經費是公家預算，沒有經費補償居民，所以我對當地居民訴諸以情，告訴他們，他們的搬遷可以造福彰化子弟，是幫國家的忙，因此，住戶陸續搬出，最後只剩下一戶始終不肯搬出，後來是打官司才解決。」

「所以，彰化師範大學的硬體建設、教學設備、第二校區，都是在我任內規劃、建設的。擔任校長的九年裡，我深切體會，這樣的成就絕非校長一個人的力量

可以達成的，需要有一些人幫忙，大家同心協力，學校發展才會快速，才能把學校辦起來；彰化師範大學之所以會有今日的成就，實在是同仁共同努力達成的。」

### 參、教育理念

---

#### 一、對終身教育的看法

葉老師曾指出他對終身教育的看法：認為我國學制較缺乏彈性；我國在加強科技教育外，亦應重視職業道德的薰陶，加強對人文教育的重視；職業教育更應列入終身教育的範疇，以維持各種職業於適當水準之上；此外，正規、非正規及非正式教育要具有統整性，並互相連貫配合。

「我認為終身教育須依靠在職進修及成人教育。終身教育是必須的，因為社會變遷快速，學校所學畢竟有限，且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人類的認知發展是不受年齡限制的。記憶力可能會下降，但理解能力並不會隨著年齡增加而降低；心理學上所謂的固定智力，是以學習過的經驗為基礎的認知能力，此種智力不因年齡增加而降低，甚至有些人還會隨年齡增加而提高，因此，成年人（甚至是老年人）也有學習的能力。現在資訊取得普遍便利，也使得成人教育、終身教育更加可行，但儘管如此，教學時面對面的接觸與互動仍很重要，是無法完全被空中教學取代。由於傳播媒體的便利、網路的發達，使得終身教育變成世界的趨勢，科技的進步可以解決時空的問題，使得「處處是教室、處處可學習」；雖然如此，我們仍要思考如何利用科技使終身教育的成效更好。」

#### 二、對師資培育的看法

葉老師曾在民國八十三年師資培育法公布前，指出他對我國師資培育政策的看法。他認為師資培育政策的規劃要做到推估所需師資，以均衡師資供需結構；縮減班級學生數，以減輕教師教學負擔，並改善教師教學品質，加強教師負擔輔導學生思想與生活的任務；最後，加強教師在職進修，鼓勵研究所畢業生多擔任高中與高職教師，以提昇教學效果也是必要的。

「我國過去的師範教育仿照法國，法國的師範教育是公家辦的，待遇優，學生在一年級就開始領公費，所以法國的師資很優良。我國過去實施師範教育法的時期，師範教育有三個特點：1. 因為有公費及職業保障，所以可以招收到優秀學生；2. 必須修習教育學分（包含心理學、教學法等科目），可使教學專業化，並加強教

育理念及專業精神的培養；3.公費的機制可以均衡師資供需（如推估所需師資、提供偏遠地區及特殊類科所需的師資）。」

「民國 83 年師資培育法公布後，師資來源多元化，各大學都可開設教育學程，學生只要修完教育學程便能實習、獲取教師資格。它的優點是：過去師範院校的規模並無法包辦所有科系，如今開放給各大學辦理，師資來源就更為多元；但其缺點為：一般大學不重視生活教育、沒有教育理念的薰陶，可能導致師資素質下降；此外，師資供需不平衡、供過於求，以致產生惡性競爭，這是今日師資培育的問題所在，也是我們應設法克服的。」

### 三、青年工作與青年問題

葉老師曾指出他對青年工作與青年問題的看法，他認為在解決青年升學問題方面要做到以下幾點：學齡青年如有接受大專教育的潛能，應酌予進大專就讀的機會，採取稍微放寬入學名額之限制；各級學校容納學生數應顧及政府財力及學校本身有關條件；學生數量擴充應配合社會人力需求，以免造成失業問題。在解決青年就業問題方面要做到以下幾點：調查各方面所需的人力資源；然而人力預測無法完全正確，因此學校課程設計應有廣泛的基本能力訓練，學生才能配合社會變遷需要，具有轉業能力；加強辦理職業教育與訓練；學校及社會應加強職業平等觀念，使學生不受士大夫與升學主義傳統思想影響。

「幫助青年首先要瞭解青年的心理發展，以及青年的問題在哪裡，就好比醫生要先知道病患的症狀所在，才能下處方。熟讀發展心理學，可以對青年的心理發展有深刻的瞭解，人在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心理特質，如學前孩子特別愛模仿家中父母或其他人；國小階段孩子特別崇拜老師；到了國中階段，學生面對最大的衝擊是「性」的問題，開始對異性產生興趣，這些都是心理自然發展的情形。青年問題最顯著的，有下列各種情況。」

「第一是『性』的衝擊問題，產生苦悶與失調；第二是國中生面臨了生命中的狂風暴雨期，自我意識提昇，開始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此時期的孩子是自己想作主但又不成熟。第三，青年人缺乏對生涯的規劃，容易無所適從，看別人有錢也想當王永慶。第四，此時的孩子最需要同伴，可望同儕的支持，因此會屈服於同儕的壓力。」

「從事青年工作首先要瞭解青年心理，才能在面對親子或師生間的衝突時，瞭解問題癥結所在，進而解決問題。心理學的目的在瞭解個體的發展，只有瞭解個體的發展，才能預測及引導個體的行為。」

「舉例來說，今天青年飆車問題嚴重，為了解決此一問題，當局可以設立安全與管理的飆車場所，給青年合法滿足其需求的機會，青年才從不正常的反應走向正常行為，這是我個人的一點見解。」

### 四、美國求學生涯對人生的啓示

葉學志老師與我們分享了他在美國求學時的經驗。

「我大學時讀的是政治，後來一直在教育界服務，所以想要繼續進修教育。我在美國田納西州畢德堡師範學院攻讀碩士，田納西州畢德堡師範學院在美國被譽為是第二個哥倫比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在教育方面很有貢獻，南部的畢德堡師範學院貢獻亦很大，只是規模比哥大來得小。當我唸完碩士後，又到芝加哥聖保羅大學工讀，以工讀來維持學業費用，白天在餐館打工，晚上才上課。當時留學生多在三館打工：圖書館、餐館及洗衣館；中國女同學多到圖書館工讀，但圖書館薪資少；美國因為廣東人多，因此中國餐館多，所以中國學生有很多機會到餐館打工。除了少部分讀理工的學生外，大家都要靠工讀賺取學費、生活費。」

「我在芝加哥聖保羅大學獲得教育專士學位（博士與碩士間的學位），芝加哥聖保羅大學是一所天主教學校，當時之所以會念專士是為了要籌錢念博士。那時發生了一件事，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有一天我從餐館回來，很疲累，那天又下大雪，路面很滑，我不小心摔了一跤，造成左腿骨折，因為腿傷，所以出院後只好在家休養，那段時間無法打工、無法上學，便利用休養期間我看了很多哲學及其他教育方面的書，奠定了更深厚的學業基礎。這是我人生的轉捩點，腿傷康復後，獲准進入密蘇里大學攻讀教育博士學位，並順利完成學業。」

「回國後幾十年來，從事於大學教學及教育行政工作，以實踐我的理想與抱負。我深深地體會年輕時，努力求學雖然經歷許多辛苦，但卻增加一生的成功機會。」

### 肆、後記

.....

訪問葉學志老師的過程中，充分體會到「一個人的成功絕非來自偶然」。唯有經過不斷地努力與學習，即使面臨艱苦與挫折，依舊堅持到底，方能享受成功的真正喜悅。相信葉老師對於教育的堅持正是造就其教育家風範的來源！

# 愛與真理信仰的標竿

——賈馥茗

(訪問與資料整理：鄭玉卿、梁淑惠、吳美玲)

## 壹、生平簡介

賈馥茗老師民國十五年農曆五月一日生於河北省青縣。在台灣取得教育碩士學位之後，陸續於美國取得美國奧立岡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學位與美國加州大學心理與輔導博士學位。歷任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考試院考試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等，並在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任內，首創國內教育研究所博士班，是引領國內教育學術環境國際化的關鍵性人物，其所編輯之教育大辭書，更為研究教育之學者與後進，不可或缺之工具書。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名譽教授。

### 學歷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  
美國奧立岡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心理與輔導博士

### 經歷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  
考試院考試委員  
總統府國策顧問  
教育大辭書總編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名譽教授



## 貳、無憂無慮的青城年華

賈馥茗老師誕生於河北省青縣，是家中排行最小的女兒。民國十五年初夏，一聲嘹亮的嬰兒哭聲，劃破了天際，賈家誕生了一個新生兒——賈馥茗。賈老師在家中排行最小，上面有二個哥哥與兩個姊姊，因為與二哥的年齡相仿，只相差五歲，所以她最常與二哥一起玩耍，玩的遊戲不是一般女生常玩的辦家家酒，而是一些男孩子常玩的遊戲。

賈老師的父親當時任承審一職，在其眼中，父親並不是一個高高在上、嚴肅威嚴的人，而是與其特別親密，可以開玩笑、可以討論問題、可以互相辯論的朋友，更是可以一起閱讀的同道。父親是她最親愛、敬重的，也是最能與她心靈相通的人，因此，她上承父親作學問的態度與精神，受父親影響極大。而母親在她的印象中是最能幹的人，由於父親工作忙碌，長年在外，致使母親必須一肩挑起照顧整個家庭的重擔。母親照顧每一個子女無微不至，讓她永遠感念母恩。更重要的是，母親自己勤儉儉實，對待他人卻慷慨大方，而且為人的態度公正、理性，在母親潛移默化的身教，是其奉行不渝的信念。賈老師是家中最小的女兒，自小備受呵護是可想而知的。在童年記憶中，盡是無憂無慮、自在遊戲的時光，以及一家人和樂融融的生活，因此對家人深切的情感與依戀，在她的心中占據一個重要的角落，並支持著她，成為她日後在人生道路上，毅力與勇氣的主要來源。

到了五歲的時候，進入河北省青縣女子國小。就讀國小的日子，對先生來說，是輕鬆而無負擔的。每每在功課完成之後，剩下的時間就是她快樂的遊戲時光。小學的時候，功課屬於中上，父母親留給她很大的發展空間，讓她盡其在我，無憂無慮。民國二十五年，自國小畢業，順利考上天津河北省立女師學院附中。這是她第一次離家，住學校宿舍，與同學過團體生活。但她一點也沒有畏縮懼怕，反而因從小跟隨二哥遊玩，練就一身膽量，幫她順利度過離家獨自一人的日子。在中學時代，表現極其傑出。在生活上，自動自發，守秩序規矩；在成績上也非常優異。方過一年的順利的中學生活，七七事變即告發生。戰爭的發生，瞬間毀滅所有人原本平靜安逸的世界，也一下子扭轉了原本的世界（王萍，民81）。

## 參、多舛艱困的求學之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階段

賈馥茗老師一家，因為七七事變的發生，便決定到鄉下親戚家避難。在離家不

久後，隨即傳來青縣已經失守的消息。一家人便決定繼續往南行，前往尚未淪陷的濟南。但突破重重困境，抵達濟南時，才知道濟南早已淪陷。先生的父母親認為既然同為淪陷區，不如回到家中。當時國內處於兵馬倥傯之際，如欲復學，簡直難如登天，而先生初中就學甫一年，便因戰事而輟學逃難，加上當時局勢動盪不安，國共日夜進行大大小小的戰役，先生的復學之路，看似遙遙無期。

當時在淪陷區，如果要繼續上學，就得上偽敵學校，讀日文。賈馥茗老師基於愛國心，拒絕接受日本教育。但學習的欲望從不會在她的心中停止，除了將兄姐以前初中到師範以及高中的書讀完，更遍覽家中所有的藏書。談到這些往事，她微笑說道：

「事實上，我文學的書唸了不少，因為我初中只唸了一年，就發生七七事變，事變以後，我就沒上學了。」

接著，她慶幸地說道：

「在抗戰八年中間，舉凡是家裡有的書，我通通都唸。好在家裡什麼書都有，因為我兩個姐姐唸師範，哥哥唸中學、唸大學的，他們的書我都唸。我父親學法律的，他的法律書，我也唸。那個時候唸了不少的書，把史記、漢書、後漢書，通通看了，有關於文學的，名家的文章，也通通都讀了。」

對於這樣的小女兒，父親給了她一個「手不釋卷」的評語。雖然這段期間桎梏了賈馥茗老師的行動與生活範圍，卻束縛不了她遨遊浩瀚書海的心靈，反而因此厚植其哲學、文學與日後參與學校考試的實力。

等到抗戰勝利，已然經過八年的光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賈老師進入政府設立的中學進修班，就讀高三，其後取得北平中學進修班的結業證書，並以此資格報考大學。

「所以，等到抗戰勝利，我就去考大學。」

民國三十五年復原後，大學重新展開招生。因為抗戰當時，讀遍家中的藏書，甚至包括父親的法律書，因此賈馥茗老師以其在家中自修的深厚實力赴考。就考北師大時，一題「什麼叫死後行爲？」的題目，也沒有難倒她。

彷彿再度回到考大學的時候，她記憶猶新地述說著選擇教育系一開始的初衷。

「我從小就想當老師，所以當我考大學的時候，其他的系一律不考慮，只有填教育，因為對教育不是很懂，就覺得唸教育就一定可以當老師。所以我考完大學回家，我父親問我，你考什麼系？我說教育系。我就這樣唸了教育系啦！」

另外，她還以優異的成績，分別錄取南開大學哲學教育系、北師大教育系、天津女師院學院教育系，最後她選擇北師大就讀。

當時國家才經過一年安定的時光，在賈馥茗老師升上了二年級時，共產黨又經常策動罷課、遊行，讓校園瀰漫一股詭譎不安的氣氛。賈老師當機立斷，決定南下，追尋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當時已是民國三十七年。賈老師離開父母親的身邊，開始流亡學生的生涯。此段生命歷程，就像充滿荊棘的道路，一路上艱險阻礙，但卻反而淬礪出她堅定不移的意志，在她心中堅定的理想與信念已然成形，憑藉著一股過人堅持與信念，一路由濟南、上海、湖南、廣州，最後隻身輾轉來到台灣。

### 肆、停泊台灣實踐理想—根留台灣

---

賈馥茗老師之前顛沛流離的流亡學生生涯，總算在台灣找到停靠的港口。但上天似乎有意一再磨練她，總是不斷地在她的生命中安排一道又一道的難題。歷經萬難來到台灣的她，卻在此時發現入境證明發生問題，使得她無法順利入境。幸好，隔天經過協商之後，終於獲得許可，得以入境。她在無限的激動之下，踏上台灣的土地，繼續她的求學之路。幸運的是，在此時，報紙上刊出了師範學院招考轉學生的消息。她以實力通過台灣省立師範學校的轉學生考試，並於民國三十九年順利畢業。畢業之後，隨即分發至台北女師服務。經過兩年的教學，發現如欲在教育中更上層樓，出國留學是必經之路。但在健康檢查時，卻發現罹患輕微的肺結核，只好暫時擱置出國計畫。民國四十四年，師大成立教研所，由田培林先生擔任所長，賈老師於此時考入研究所攻讀。兩年後，以「朱子教育思想」論文，順利取得碩士學位（王萍，民 81；林振春，民 71）。

### 伍、探索教育本源的堂奧—負笈美國

---

賈馥茗老師希望進入教育系所研讀之後，能探究出教育的本源。但經過長久的探索，她自覺仍然無法找到滿意的答案。因此，先生憑藉著一股追求真理的熱誠，出國深造的意念自心中萌芽，希望藉由國外較進步的教育研究環境，找到教育真正的定位。民國四十六年，賈馥茗先生終於通過身體檢查，獲得通知可前往奧立岡大學進修。在留任師大教育研究所講師一年後，於民國四十七年，前往美國進修。延宕多時的留學深造理想，終於在此刻實現。

賈馥茗老師緩緩說到這一段心路歷程：

「唸到教育系三年級了，還沒有辦法對教育做出解釋，無法解答『教育到底是

什麼？』『教育從何而來？』『教育的本源是什麼？』等這些問題。所以，那個時候在北京師大，我就問四年級的學長這些問題，他們說：『唸到四年級就知道了』。等到我在台灣四年級唸完了，也還是不知道。畢業後，進女師專當老師，經過五年，也還不知道，所以我再來唸教育研究所，但是，唸了兩年教育研究所仍然不知道，因此就想出國。那時候師大的外國書籍不太多，所以想到外國去找資料。在美國唸六年，唸了許多科目，但是沒有專門從事教育專題的研究，就算有專題也沒有關於我的問題的解答。所以，我希望自己遍尋歐美這個系統的研究，研究他們的思想，探討他們怎麼樣界定教育，教育的本源是什麼。」

先生在奧立岡大學進修時期，每日孜孜不倦地讀書，無一刻浪費光陰，遍覽圖書館中有關教育的書籍，以她聰穎過人的天賦，對於教育，自有一番新的體悟。

賈馥茗老師於民國四十九年通過碩士論文。待論文通過之後，計畫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最後，決定前往教育科系師資陣容堅強的加州大學研讀。在奧立岡大學主修教育心理學，偏重教學應用方面；在加州大學則決定主修輔導。進加州大學時，對於她的求學歷程來說，又是另一項考驗。因為到加州大學時，已經是下學期，為了避免延後一年，便開始修課，有些必修課也只好先從下學期先修。但如此卻讓課業負擔異常沉重。然而她再度以她堅強的毅力和不可計量的潛力，通過這一次的挑戰。

等到快畢業時，賈馥茗老師和大多數的留學生一樣，面臨留下或回國的抉擇。在先生的心中，早就已經暗自下決定。她認為將所學奉獻於國內的學生，才是她最終的理想。她表示道：

「我在美國時，台灣還很窮，那時候好多從台灣到美國的留學生，到美國都改行，多半都改學圖書館，待在美國不回台灣了。所以，有人勸我學教育沒有辦法留下來，因為不是美國公民是不易找到工作的；也有人勸我學圖書館學；也有人勸我學心理學。可是我還是不想放棄我的教育，就是這樣，又笨又固執。」

她笑著繼續說：

「當然，我畢業以後是有機會留在美國工作，但是那個時候，也不是心理沒有矛盾。在美國工作待遇好，而且美國只要肯努力，就能出頭。但回來台灣，在這個環境，我的理想不見得能夠實現，所以也是很苦惱。」

停頓了半晌後，露出寬慰的笑容，繼續說到：

「不過有一天，田老師寫信給我，叫我畢業後即回來，讓我覺得很光榮。我也知道我們所裡需要人，我認為，與其畢業留在美國教育人家的孩子，不如回來教育自己的孩子！因此，我回來了。我回來的時候，研究所裡連我只有兩位專任教授。」

在收到田培林先生的信之後，基於將所學奉獻台灣學子的想法，與一貫對教育的熱誠，賈老師當下便決定回國服務。

### 陸、掌握教育本源——任教師大時期

---

賈馥茗老師由心理學跨足哲學領域，是在回國後擔任師大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的時候。當時所上缺乏哲學領域任課教師，在經過與田培林先生商量過後，田先生說：

「你教吧！反正你也學過。」

先生便開始教授中國哲學史。

先生首先提及哲學與教育的關係，她首先說道：

「哲學本來是要了解人生的學問，在這門學問裡頭可以獲得知識。所以，哲學剛開始的時候，叫做愛智之學，是啓發人智慧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其他如歷史、博物、社會、物理、數學也都在哲學裡頭。後來所謂的形上學，談的是一種本源的問題，許多哲學家都談這個問題。從泰利斯起，說宇宙的本源是水，後來就有的哲學家說是火，有的說是水火土氣，一直到原子論，所以那時哲學是統攝百學的，心理學那個時候也在哲學的討論之中，像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他們談心理，也談教育。教育隸屬於哲學，假如你瞭解了哲學史，也就同時瞭解了教育史。所以，田老師不主張開教育史的課，因為用不著，而且教育史容易偏重到教育實際上去」。

哲學之於教育，賈老師進一步做了註解：

「真正的事實不在事實的收集，而是在思想，思想關係到如何教導學生。」

在開課前的備課過程中，賈馥茗老師廣遊浩瀚書海，在通透古今之後，終於找到一直以來欲探究的問題——教育的本源。換言之，因為開設中國哲學史的機緣，解答了許久以來深藏在心中的疑問。

賈馥茗老師憶及這段歷程，滿足地笑著，說道：

「爲了準備中國哲學史的課程，我得把自己讀過的書重新細心的研究許多遍，在這個過程裡頭，我發現了教育的本源，那便是在中庸裡的『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首先確定的是，若生而爲人，只是具有人的形骸，那麼他不能真正稱作是人。要到具有人的品格，表現人的作爲，這才能算是人。這就是我們儒家所說的『人道』，也就是中庸裡面所說的『人之道』。所以，人必須奮發向上，一方面求知識的通達，一方面練習你做事的才能，用世俗的話說，要自己作一個好

人，才符合人道。」

「在中庸裡頭的『至誠』，就是說自己盡量作到誠的地步，是人改善自己的一個大原則，這就確定了教育。『誠者，天之道也』，可以說天道生物，是根源於抽象的道。這個『道』，我們用今天的解釋，就是最高的原理原則。要發揮這個原理原則，就要秉持一種精神，這個精神就是『誠』，所以，天道生物，天生萬物所秉持的就是一個『誠』字。如太陽按時升起，按時落下，四季輪流遞轉，始終如一，稱為『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有這個精神才化生萬物，但是光這一點還不夠。必須還要推究到《易經》。《易經》裡頭認為天道生物，基於兩個元，一個是『乾』，陽性的；一個是『坤』，陰性的。陰陽化合生物，所以《易經·繫辭》裡有『一陰一陽之謂道』，於是生成萬物。天道生物由於要陰陽化合。這兩個不同的元怎麼會化合呢？是由於不停運轉。在運轉之中接觸，接觸到恰好，才生物，在這裡不得不引用我們實際的經驗了。實際的經驗裡，生物界都是兩性生殖，植物要雌雄性接觸才開花結果，動物和人，也是要兩性結合，才生育下一代。所以，推行到最初道的精神，兩元之化合接觸，融合在一起，是一種吸引力。互相吸引才能夠接近，這個吸引力是由於愛，絕不是由於恨，愛才互相吸引，接觸才融合，人是這樣，動物不也是這樣嗎？」

「這個愛字，要怎樣界定呢？我相信你們都有過愛的經驗，什麼叫愛？愛，我用最實際的解釋，這是美國的心理學家經由動物實驗之後得到的結論，說愛就是一種溫馨的感受，兩個對象都有溫柔親近的感受，一個發出這種情感，一個接受這種情感，這就是愛的力量。印證希臘一位哲學家恩皮多克利討論宇宙形成的觀點時指出，宇宙萬物的形成，就是因為愛的力量，也可以說是吸引力。他說宇宙本來有水、火、土、氣四種元素，由於愛的力量，把這四種元素吸引在一起，結合而形成萬物。不過，他同時也說，這宇宙之間還有另外一種力量，叫做恨，是一種排斥的力量，能把元素分離，因此，宇宙也有毀滅的時候。因為愛和恨這兩種力量互為消長，愛的力量大到極點，讓萬物結合，生成萬物。在愛的力量達到極點之後，逐漸消弱，恨的力量便逐漸的增長，到恨的力量達到極點的時候，又將分裂成水、火、土、氣四個元素。」

「就此道理加以理解，愛不單是宇宙本源，也是教育的本源。所以，老師教學生，是教育，父母教孩子，也是教育。絕不只是學校教育，才是教育。父母由於愛才教，愛，是人與生俱來的情感。人有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慾，達爾文說過，動物有三種基本的情感—愛、恨、懼。Watson 也以小孩做過實驗，發現嬰兒也有這三種情感。到成年以後，才有一些複合出來的複雜情感，比如說羨慕、

嫉妒。愛既然是與生俱來的，只是一種原始的衝動。這些衝動，在心理學看來，強度太大時，很可能愛得過分，而讓接受者受不了。愛太多也不行，所以需要理性調節一下，讓它剛剛好，這就是我們儒家所說的『仁』字。所以天道生物是秉持『仁』、『誠』，也就是教育的本源。教育就是比較年長、成熟的，來培植幼稚、不成熟的。於是，我把教育的定義找到了，教育的根源也找到了。」

賈馥茗老師清楚有條理地勾勒出教育的本源，將許多人的論點，加上自己的融會貫通，建構出教育之於國家、社會乃至於對人的定位，其中充分顯示出學貫中西的智慧。

賈馥茗老師也分享了這段窮究教育根源過程的箇中心得，她認為：

「如果你真正想走學術的話，聰明的人怎麼做，我並不知道。但像我，就認為從事學術的工作沒有捷徑。常常會花好幾十年，沒有那麼容易一下子就得出結論來，因為等你把所有的說法都結合起來看，想說的能不能成立，你自己先要很虛心的，一想再想，想到最後，才可以得到一個較滿意、合理的答案。」

賈老師以一貫穩紮穩打、求真求實的態度，提醒後學。因為教授中國哲學史，不僅讓師大學生獲益匪淺，更讓她找到教育的本源。

## 柒、引領與世界接軌的教育研究環境

---

賈馥茗老師在擔任師大教育研究所所長時，深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因此竭盡所能為所上爭取經費，擴充圖書、設備，提供學生良好的研究環境：

「那時一方面買書，一方面增加新的設備。當時也還沒電腦，用的是計算機，現在你們大概也看不見了。統計啊，計算的時候要打出來，我都給學生買最新的，只要有新器材上市，像是複印機，凡是方便學生研究的工具，就買最新最好的。」

賈老師體恤學生，對學生表現出的無微不至的愛與關懷，例如：對於每晚留下來讀書的研究生，也細心地在所上準備電鍋，讓同學蒸飯。在任職師大時，凡事皆以學生的需求為最先考量，但面對教育的專業精神，先生有她一貫的堅持與理念。例如民國七十八年左右，學校實施學生評鑑教授的事件來說，即可顯見她對教育學術專業的堅持。她認為：

「要學生能給老師打分數，乾脆就不用當學生，直接當老師就行了，而且在打分數的項目裡頭，有一項『爲了上這個課你每個禮拜要準備幾小時？』老師能替學生備課嗎？這是沒有道理的，學生準備幾小時，是學生的事。幫老師打分數，這個

動作就是不合理的，學教育的應該『是非分明』。而且，上課時間可以進行師生溝通，如果學生對老師的教學方式或是內容有意見，可以提出來，老師可以做修正。因為我上課每次都會先問學生有什麼意見或問題，有些老師也許不喜歡學生問問題，可是我不是，如果學生不提問題出來，做老師怎會知道學生的想法，因為就是要這樣和學生溝通，教學才有效。上了一個學期的課，學生不提問題不發表意見，到了學期結束，學生給老師打分數有什麼意義？如果要到下個學期再改，這一學期不就是浪費了嗎？這在教育上說的通嗎？」

賈老師讓學生瞭解必須尊重學術，尤其是到研究所階段，更應該如此。

不僅以學生為中心辦學，在研究所的目標規劃方面，心中早有定見，期望將研究所提昇至國際水準，除致力於圖書設備的擴充外，對專業的師資陣容也極為要求。在賈馥茗老師任內，首創國內第一所教育博士班。此舉不僅是師大的大事，更是整個教育界的一大盛事，將國內的教育研究推向另一個高峰。她微笑著說道：

「我認為本所最終目的是培養進入學術領域的最高學位人才，否則碩士畢業之後，還得出國深造。而學了外國的理論之後，移植到國內並不一定合適。有鑑於此，我著手籌設博士班。」

老師詳細地說明當時的狀況：

「博士班是民國六十一年設的，早就醞釀了一段時間了。我從美國回來時，觀察到我們所裡的圖書不夠，那時候田老師以自己的名義，捐了很多教育方面的書，放在圖書館裡，特別闢了一間屋子，叫教育資料室，可是那也多半都是舊書。我便問田老師，我們的所上有沒有經費，田老師說有：『有，每年十五萬』。我繼續問田老師說：『這些經費都做什麼用？』田老師說：『除了一些事務方面的費用之外，就是讓總務處隨意去開銷。』我又問：『那我們能不能拿過來用？』田老師說：『能啊！』那時田老師是院長兼所長，當時稱為主任，他所說的話，校長都非常尊重，因為那時候教育學院在師範大學是首院，教育系是首系，那麼設的所就是首所。在我的堅持下，經費挪過來不做任何開支，所有的經費光買書，開始蒐集教育方面必須的書，新出版的書，還請各位老師開書單。我選了三套書，第一套是 Dissertation Abstracts，美國博士論文摘要；第二套是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也收集全套，我現在還在訂；第三套是 Psychological Abstracts，這些都是研究的工具書。那個時候，我們國內還沒有什麼國外的書商來，所以都託美國朋友買書的。這三套書是陸續買的，我們一年只有十五萬，那時候十五萬，不做任何用途，通通都買書，還好那個時候國科會，每年補助研究所十萬圖書費，所以可以大量買書，對當時的研究幫助很大。」



由於深知添購教育專刊與圖書，才能提昇校園內的學術研究風氣，跟得上世界教育潮流趨勢。在當時，賈老師汲汲營營運用各種方法，爭取各項經費補助的管道，盡力充實圖書，可說是研究所莘莘學子們的福氣。

另一方面，賈馥茗老師也在博士班設立後，擬定幾項計畫。如邀集師大教研所畢業學生每月聚會一次，提出讀書報告；將博士班與碩士班貫穿起來，讓學生和老師做研究。師大教育研究環境在賈馥茗老師的帶領下，展現出一番充滿活力與研究風氣的新氣象，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更因此拓展國內教育研究環境的新視野。

### 捌、編纂教育巨著—教育大辭書

---

自民國八十一年起，賈馥茗老師擔任教育大辭書主編，開始編纂此一教育巨著。由於主任委員劉真校長誠摯地邀請，同時也認為此著意義深遠，便決定開始著手進行。

賈馥茗老師說起這一段經過：

「教育大辭書不是我要編的。有這個想法是很久的了，伍振鷺老師，幾年前曾說要編。但這是件很難的事，因為編教育大辭書，需要兩個條件，缺一不可，第一要有人，第二要有錢，人和錢少不了。後來，出資編纂教育大辭書是國立編譯館，他們是教育部的三級單位，計畫必須經過教育部認可，再送到行政院，行政院編列入預算，再送立法院通過後，才能夠實行。所以我知道這是很不容易的。一段時間後，劉真校長打電話給我，說國立編譯館要編教育大辭書，請他做主任委員，設一個編輯委員會，主編這個工作非我不可。我知道伍先生跟劉校長關係是很密切的，而伍先生老早就有這種想法，因此我建議他找伍先生負責。但劉校長說伍先生是做副主編的工作，於是我沒再推託，一口就答應了。」

編纂教育大辭書終究是一個浩瀚艱鉅的工程，從尋找撰寫人、編列辭目，處處充滿了重重的困難與阻礙。

賈馥茗賈老師陷入沉思，說道：

「編譯館有他們的想法，所以他們提出來若干名單，加入編纂行列。但他們提出的人數不夠，必須要增加人手。因此，我只有跑書店，看看哪些人，有哪一方面的著作，根據著作來選合適的人。最後編譯館聘了大概五十位人員參與這項工作。辭目都是編纂委員去找，先找來一些重要的辭目，大家討論，確定了再分頭去寫稿。編纂委員，或者是編纂委員自己去找人幫他寫稿，寫稿子的人有幾百人，工作人員催稿催不動，就找我。所以那些經過的步驟很繁瑣的。另外，就是錢，他們一

開始說撰稿人的稿費，一千字七百五，我說不行，普通寫書的價格最高是一千，這個比寫書還不容易，因為這個寫出來就成為經典，要好好的寫，我認為稿費要提到最高，但他們說根據行政院的规定，稿費不能超過一千零五十，所以這一部分也是很花腦筋的事情。」

如以當時教育界參與的人數，與所花費的經費來說，編纂教育大辭書可說是教育界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

因為編書的關係，賈馥茗老師必須常至國立編譯館。也由於需要經常到國立編譯館，賈馥茗老師還獲得一個「行走」的稱呼。她說道：

「那個時候我每天都要跑一趟國立編譯館，有時候一天要去兩次。由開始確定辭目，開會討論辭目，到最後看看他們的實際作業，所以當時他們的館長稱我為編譯館行走。」

說到這，她露出慈祥的笑容，調侃自己說：

「原來的一間屋子，只有我客廳差不多大，伍老師擔任副總編，楊深坑副總編，他們坐那裡，我也坐那裡，裡面還有一間，放兩張書桌，那是給主任委員的。我的原則是光負責編，至於經費、款項、其他事務，就由他們行政人員負責。」

由此可知，教育大辭書的完成所耗費的心力與其間的種種困難，是我們很難想像的。

前後歷時四年的時間，先生將所有的稿件審定完畢，編纂教育大辭書的工作才告一段落。十年後教育大辭書交由文景出版，其間已經歷任三任館長，如今想來，賈馥茗老師的投入與始終如一的工作態度，是其完成編纂教育大辭書的關鍵。

## 玖、只能贏不能輸——對未來教改的期許

對於現今的教育，賈馥茗老師以「下賭注」來形容。不過，先生表示這個賭注必須是經過深思熟慮且計畫周延，只能贏不能輸的賭注。她對此侃侃而論道：

「我堅信教育一個措施，就等於在賭城下一個賭注，別的方面下一個賭注無所謂，頂多損失點錢，但是教育這個賭注要是輸了，輸的是下一代、下無數代，不能輸，教育是不能輸的，只能贏。所以，一個措施要千思百慮，而且不是光想好，要想可能的壞，如此才能把可能的壞都預防了，這是多麼慎重的一件事。」

賈老師對於教育改革有其深切的期許。她露出嚴肅的表情，語重心長地說明教育趨向的重要性，說道：

「從小孩出生到長大成人，至少二十年，教育起碼要到十五歲，他是一天天長

大的，從出生到長大到每一個階段，是一個整個的連續，所以應該從教育他開始，就有一個固定的方向，也有一個正確的引導、適合發展的步驟」。

賈老師一開始便提及，因為一個人受教育的時間極長，所以教育應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在確定教育的方向之後，接下來，則必須探究出教育改革的真諦。賈老師接著繼續闡述道：

「首先確定的是『改革』是什麼意思，改革是因為有缺點，所以要改。教育跟著人類的進步，也是要不斷的「改進」，「不是改革」，時代變了，生活狀況變了，教育當然也應該有些改變，但是我們必須知道，教育的對象是人，是人在生活，人要生活就要適應環境，所以原則就是適應。不過，我相信教育有一個確定不移的方向，那就是要『教育人成爲一個人』，所以我認爲提昇人的品質，是教育確切不移的方向。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好人，才能有好的生活。我們可以去看看從國小到國中的課本，有多少人提到有關人的品質的教材？教材確實有缺陷。但是，別忘了，教材是死東西，要靠老師來活用。」

她清楚地指出，教育應先確定改革的中心意義，找出教育確定不移的方向，也就是「教育人成爲一個人」。同時，她也坦誠地指出，可惜的是，時下教材並沒有強調這一面的素材。另外，她繼續說道：

「最明顯的是學校的營養午餐，這是最反對的，老師的責任不是準備孩子的午餐，那是他父母的責任。而且老師還要給他們分飯分菜？父母生了孩子，便有先天的義務，撫養他們。如果是學美國，便應該探究美國的社會狀況。因爲美國除了都市之外的郊區，居民分散地很遠，所以才有 school bus 要載學生到學校，也因此學生中午沒有辦法回家，才需要安排營養午餐。美國的學校是因為有經費、有人員，不會剝奪老師的教學時間！想想看，現在的孩子大多挑食，學校營養午餐怎麼可能適合每一個孩子，學生回家向父母抱怨營養午餐不好，又成了老師的罪名，對不對？從前學生自己帶便當的日子，不是也很好嗎？」

對於台灣教育的觀察，可說完全是出自於五十多年以來對台灣教育的透徹瞭解。對於時下的教育實況，賈老師懇切地分析道：

「我自民國三十八年來台灣，已經五十多年。這五十多年來，我所知道的狀況是，家長干預學校，干預教學，不尊重老師，老師失去了自尊，失去了自信，對於他自己的教學失去了信心了，如此遑論教學的效果。而更糟糕的一點，教師的觀念落伍，老師仍然用十八世紀的觀念，來教二十一世紀的學生。十八世紀的觀念，老師認爲你們上我的課就應該都學會，考試就應該都考一百分，有多少人從小上學每

科都能考一百分？忘記現在是民主時代了，小學生所知道的可能比老師還多。」

針對國內目前流行援引國外教育政策，造成國內學生、家長、教師諸多疑義的情況，先生論道：

「如果只知道美國一點皮毛，就要全國統一施行，這是我們教育最致命的一點。美國有實驗的精神，要開始一項措施，一開始要試驗，試驗得可以才推行，不是一聲令下，全體執行，但我們從來並不試驗。」

她舉例說道：

「就像教改標榜小班小校，但是，教改的人有到偏遠的地方去視察過嗎？我在無意之中，看見在基隆市外的一個小學，還不算偏遠，全校六班，共四十多個學生，校長老師十多個，分六個年級，你能說他不是小班小校嗎？上課時教師坐著，像日本的和室，進了脫鞋，地板打的光亮，然後老師學生圍在一個桌子，一班能有幾個？教育經濟是這樣的嗎？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一班就只有三、五個學生，缺少團體刺激，學生和學生之間互相的刺激能有多少？他們只看台北市，沒到外縣市去看，像東部，花蓮、台東，地廣人稀都是小班小校，要找大校還找不到呢！」

至於目前的九年一貫課程，賈老師分析道：

「目前的九年一貫，培養國小與國中的老師就無法一貫，師範學院培養小學老師，國中老師培養則歸師範大學，比如現在台北、彰化、高雄，再加上很多普通大學的學程，老師沒貫，課程怎麼貫起來？十二歲的孩子和十五歲的孩子，他的心理生理都一樣嗎？小學老師和國中老師如何貫？當初師範學院有師專生，我曾經跟教育部的官員建議，師範學院不能分系，因為小學老師還是包班制，分了系，師範學院語文系畢業，到時候，學校要老師教數學，老師可能理直氣壯不教，不過現在還好，沒聽說有這種困難。數理系學微積分，那高中都不學微積分，師範學院學了微積分到小學有用嗎？所以，由師範晉升為師專，再晉升為師院，名稱改了，內容呢？」

賈老師根據在美國多年的經驗，以及持續的觀察，說道：

「如果學美國，美國哪個師範學院有研究所，有博士班？college 相當於專業學校，是培養專才的，不是做學術研究的，學術研究是大學的事。我在美國六年，這我很清楚。就算美國大學，也有三六九等，好的大學才有好的學術研究成就，學術水準不同。台灣教育希望能培植出人才來，但能培植出多少 elite？精英只是少數，要靠這些少數，才有高明的見解啊！教改改到現在，多元入學比聯考，哪個的負擔重？為什麼聯考演變到今天，成了過街老鼠？五十年我看得清清楚楚。」

賈老師依照其對台灣教育行政、實務、課程教學等的透徹觀察與研究，針對國內教育環境，對台灣的教育提出她的精闢見解與呼籲。

## 拾、追尋真理，實踐教育愛

.....

因為信仰真理，賈馥茗老師毅然到台灣，尋找自由的天地；毅然隻身到美國，探究教育的本源。因為秉持教育愛，堅持將所學奉獻台灣學子；堅持以學生為最終考量。在此次訪談過程中，讓我們無時無刻皆能深刻感受到她待人的妥貼細膩，即使面對初次見面的我們，也是以溫柔敦厚的情懷，真摯地對待，令人印象深刻，與賈老師初次見面的感動，至今仍縈繞不去。依循愛與真理的信仰是賈馥茗老師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堅持，也應該是每一位在教育崗位上的人，應長存於心中的圭臬。

### 主要著作

- 論教育。臺北市：五南。
- 先秦教育史。臺北市：五南。
- 人格教育學。臺北市：五南。
- 心理學史概要。臺北市：師大。
- 中庸釋註。臺北市：五南。
- 教育與人格發展。高雄市：復文。
- 教育的本質。臺北市：五南。
- 人格心理學概要。臺北市：三民。
- 教育心理學。臺北市：空中大學。
- 全民教育與中華文化。臺北市：五南。
- 教育與成長之路。臺北市：師大。
- 教育原理。臺北市：三民。
- 教育哲學。臺北市：三民。
- 教育與人格發展（上）。高雄市：復文。
- 英才教育。臺北市：開明。
- 教育概論。臺北市：五南。
- 心理與創造發展。臺北市：台灣。

### 參考文獻

- 林振春（民 71）。求真求實的賈馥茗女士。台灣教育月刊，383。
- 王萍（民 81）。賈馥茗先生訪問紀錄。台北市：中央研究院。

# 播植台灣教育根基的教育家

——劉真

(訪問及資料整理：劉春榮、簡惠閔、陳怡親)

## 壹、生平簡介

劉真先生，字白如，安徽鳳臺人，民國二年生。劉校長是我國數十年來，具有教育智慧與卓見的教育家，他的青年時代經歷戰亂與顛沛，因而孕育出無私的大愛。秉持這種大愛的精神，一生奉獻教育，功在國家，重視人文教育，培養學生誠正勤樸的品格，不斷地為台灣教育做努力。因此，在民國七十八年，獲頒行政院中華民國文化獎，以表彰其對教育文化的卓越貢獻。

目前劉校長雖已是九十二歲高壽，仍致力於教育文化工作，現任中國語文月刊發行人、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及「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長一職，持續為教育文化工作奉獻其心力。

## 學歷

民國二十四年於安徽大學哲學教育系畢業

民國二十四年年赴日本東京高等教育師範研究，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爆發返國，民國四十二年赴美國賓州大學從事教育研究一年，連同在日本東京高師研究，共為期三年。

## 經歷

民國三十七年擔任立法委員。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日至今民國四十六年八月間擔任台北市立師範學院院長，民國四十四年六月五日師院改制為臺灣師範大學後，繼續擔任校長（即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民國四十六年擔任臺灣省教育廳廳長，至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交卸教育廳廳長之職。

民國五十二年至八十一年於國立政治大學授課，擔任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

民國五十六年起擔任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委員兼文化組主任，共長達二十四年。

民國七十八年擔任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民國八十一年擔任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 座右銘

#### 有愛無恨

劉真校長的座右銘是有愛無恨，對任何人都秉持著愛與寬容，以這樣的精神對待週遭的人事物，這樣的胸懷相當令人感佩。在現今紛紛擾擾的社會中，這樣的精神更是值得我們學習。

### 貳、生平際遇與重要事蹟

---

初見劉校長，感佩之意溢於心中，那種氣度與笑容，在在展現出教育家的慈愛。劉真校長爽朗健談地與我們分享他的生平經歷與教育行政歷練經驗，訪問完後還與我們在他親手寫的書法「行者常至、為者常成」前合照，並和我們握手、不斷勉勵我們要認真做人做事，讓我們見識到一個大教育家及政治家的風範。

劉真校長首先和我們談論到他的生平及際遇，繼而說到他從事教育工作中的經歷。在一連串的說明後，我們可以瞭解做出一個教育政策背後隱含的思維與熱忱，更讓人深刻的體驗到教育是一種神聖奉獻的精神事業。以下就劉廳長的生平與重要事蹟分別做一說明。

### 參、以勤補拙、以誠取信的青年時代

---

「從小我就是在充滿教育與宗教的家庭環境下成長，因為我的父親在我的家鄉—鳳臺—創辦了一所小學，我的父親一生熱心教育，學校經費一有問題時，他總是變賣家產來補助學校；同時，他也是為虔誠的天主教徒，經常向人傳布天主教教義。」

「我的第一位啓蒙老師是父親，他由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等書籍開始教我。慢慢進入孝經、論語、孟子、古文觀止等書，這些過程奠定我未來的語文基礎與興趣。」

「在民國十四年，我開始進入中學就讀後，豫東魯西一帶就不斷有戰禍發生，我的初中時期也在停課多、上課少的情形下結束，在停課時間，我便在家中自習，這時期在父親的引導下，我開始研讀爾雅與說文等書。」

「在這段戰禍頻頻的時期，我又不幸的腿部生瘡，約有半年之久，我都躺在床上，無法外出。心中感到相當的迷惘與痛苦，還好那時父親爲我請來一位老師教我老莊、史記、漢書及昭明文選等著名文學作品。現在想起來，臥病在床的期間，奠定我的國學基礎與寫作能力。所以，我想告訴現代的年輕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困境中要堅持努力，不要消極悲觀。不斷的努力與蓄積，往往可以得到意外的收穫。」

「民國十八年，我以中學肄業證明書考取了安徽大學預科，後二年，我進入文學院的『教育哲學系』就讀，會選擇這一科系，是由於我認爲教育與哲學的關係最爲密切，因爲教育是哲學理念的實踐，這大學四年對我未來的教育生涯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

「民國二十四年夏天，我自安徽大學畢業後不久，即前往日本考入東京高等師範教育研究科，主修心理學。在這一過程中，除了教育專業上的學習，在外語能力上亦有所進步。在日本留學的期間，經濟上相當拮据，我以投稿、家教來賺取學費與生活費。經過這次留學過程，我更堅信決心與勇氣，努力堅持一定能克服困難，達到目的。」

「我常以我青年時代的生活和年輕人分享。年輕人不必顧慮太多，躑躅不前，因爲只要你的目標光明正大，並能腳踏實地，盡其在我。即使遭遇挫折失敗，亦決不應消極沮喪。因爲年輕人來日方長，有許多重新開始的機會，這也是我常以「樂觀奮鬥」四字與青年朋友共勉的最大用意。」

和劉真校長一段談話下來，他以堅毅的神情訴說著屬於他的青年時代。除了瞭解那時讀書的辛勞與戰爭的顛沛流離外，更叫我們感動的是：劉老師爲理想而堅持的勇氣與努力，不禁讓我們感嘆：有爲者當如是。

## 肆、從事教育行政工作的歷程—從台灣師院、師大到教育廳

「在一個動亂的時代背景下，我卻十分幸運的在台灣連續擔任教育行政工作達



十四年之久。這段過程讓我覺得在社會上服務，正如爬山一樣。我想把這些經驗跟你們分享，因為爬山的人不一定每一位都能到達頂峰，但是若能把所經歷過的途程告訴以後爬山的人，那便會使以後爬山的人多少節省一點摸索的氣力。」

「這樣，一個人今天的失敗，可能是另一個人明天的成功。」

「社會上任何一方面的成就，都是前人一點一滴不斷努力所累積的結果。即使在失敗的累積中，也往往奠下成功的基礎。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這種累積更屬必要。現在我就將我過去所累積的經歷做一扼要敘述。」

### 伍、在台灣師院服務

---

「我在台灣教育界服務，是從民國三十八年四月開始的。」

「當時我是立法委員，一天，突然接到台灣省政府的電報，要我立刻到台灣來。」

「因為當時省立師範學院正在鬧學潮。因為省府希望讓學校趕快復課，於是我便在毫無準備的情形下匆促接下這一職務。」

「那時省立師範學院的學潮，我們稱之為四六事件。處理學潮的過程中，我秉持著我的座右銘從『有愛無恨』的原則來處理，沒有解聘任何一位教職員、沒有開除任何學生，因為我相信只有愛，社會才能安定。學潮時，學生曾經毆打憲警，為了保護學校人員安全，政府在學校四周佈置憲警人員。我認為這樣的措施不妥當，便向警備副司令彭孟緝表示：千萬不要在師院四周佈憲警人員，本著相信學生的態度，終於在兩個多月後，圓滿解決了轟動一時的『四六學潮』。」

「學潮解決後，我便開始建設學校。當時師院是沒有自己的校地，為解決這一問題，我便將臺北高中在當年暑期結束（當時省立師範學院與臺北高中共用一校地），以便師院能好好利用這所校舍。即使如此，師院校地仍過於狹隘，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問題，若不解決的話，省立師院便永遠沒有發展的希望。很幸運地，在師院對面的一大片稻田恰巧是公產，我馬上帶著公文與地籍圖到省政府向陳主席報告，得到陳主席的贊同，而終於解決了校地過隘的困境。」

「接下來便是聘請教授與修建宿舍兩工作了。我認為要聘請最好的教授來滿足學生的求知欲，像牟宗三、陳大齊、梁實秋、楊亮功、田培林、劉季洪、沙學浚等人都應聘來校任教。之後，我調動了九個系的系主任，我認為系主任很重要，有了好的系主任，才能聘到好的教授。我請這些名教授來師院任教，中華日報社社長盧冠群先生還問我：「這些大教授你能伺候得了嗎？」我說愈是好的教授愈容易相

處，他們專心研究與教學，對學生是最有益的。學校對教授最重要的是禮貌與尊敬，相信教授都會願意與學校密切合作的。」

「其次，關於修建學生宿舍的問題。當時許多在教育界有聲望的長輩見我積極準備建校舍，都略有微詞，表示要我審慎考慮。因為他們認為大學生住宿舍，容易聚眾滋事，過去大陸常有學生在宿舍議論校務，遇有不平，便發起學運。尤其當時師院剛發生學潮，學生心理較為浮動，實在不宜興建宿舍給學生聚眾的機會。當時我究竟年歲較輕，脫離學生生活環境較短，恰對學生心理與思想瞭解較為清楚。我認為學校領導學生不應以消極防範為主，採取積極的辦法才是上策。為了學校的安定，必須先使學生生活安定、飲食起居方便，如此一來學校自然會在安定中不斷進步。師院有了學生宿舍後，學生大都住校，我同時規定住校生每日須參加升旗典禮與健身運動，而我擔任校長期間，沒有一天不到校主持朝會與升旗典禮的，因為我認為身教是最重要的。跟你們分享一件趣事，當時我擔任省立台北師院校長時，有天下大雨了，學生都猜校長不會來，但是校長還是風雨無阻的準時參加升旗典禮，讓學生相當佩服。因此，教師以身作則很重要，要實事求是，不能光講口號。我想要提醒未來要當教師的人，我觀察到今日很多中小學教師的程度不錯，但是，很可惜的是：不愛唸書，沒有做到以身作則的基本功夫，當老師的人教育別人先要教育自己；要學生唸書、自己也要喜歡唸書，為人師者一定要謹記『以身作則』的重要。」

「在學校運作一切漸漸上軌道之後，我開始思考到師院由於學校成立歷史較短，沒有校慶，也沒有校訓。為指導學生品格修養與樹立優良校風，民國四十年，我特別選定『誠、正、勤、樸』四個字做為師院的校訓。我曾經就此四字校訓對學生做解釋，所謂『誠』就是『不虛偽』、『不欺枉』；『正』就是『不偏私』、『不枉曲』；『勤』就是『不怠惰』、『不因循』；『樸』就是『不奢靡』、『不浮華』。我認為如果大家能夠做到誠正勤樸的校訓，便不難實踐禮義廉恥的共同校訓了。」

「此外，在師院期間，我認為還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訂九月二十八日為教師節。記得在民國三十九年八月時，師院舉行教師節慶祝酒會。我在致詞中，曾經表示每年八月二十七日為國定教師節，但此時由於正值暑假期間，師生聚會不易，勉強舉行慶祝會，實在是有失尊敬教師的本意。當時在座一位對曆法有研究的國文系陳發軔教授指出：政府於民國二十三年所公布的國曆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誕辰，但是根據曆法推算，乃是國曆的九月二十八日才是正確的孔子誕辰。陳發軔教授同時把精確的考證向會場同仁說明，請我以師院院長身分將曆法改正。有些同仁認為茲

事體大，不宜冒然提議。我向同仁表示，只要考證是正確的，就應該向中央建議。於是，我們便向教育部呈請核辦，後教育部又轉報行政院，行政院請董作賓與高平子等曆法專家共同考證，大家都認為陳發軔教授的考證是正確的，最後，行政院會通過，在民國四十一年一月明令公布：以九月二十八日為孔子誕辰及教師節。我認為這也是我在師院期間所做的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

「回想起來，我在師院（今師大）服務的八、九年中，學校的客觀條件固然相當困難，但當時由於大家的團結合作，好像從來就沒有困難的感覺。尤其時間久了，自己和學校中好像產生一種分解不開的感情，彷彿學校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常感覺到，在師院與師大這一段時間，可以說是我前半生中最愉快的一段生活。許多我以往所仰慕和從不認識的教育前輩和學者，都因為共事關係，成為忘年之交與莫逆之交。」

聽著劉真校長對省立師院建設的用心，對學校經營的努力不懈、對學生品格陶冶的重視，方造就今日臺灣師範大學在師資培育上的卓然地位。「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今日臺灣師範大學有健全的師資培育體系，都要感謝劉老師的擘畫。

### 陸、在教育廳服務

.....

「民國四十六年八月，教育部張部長打電話給我，說省政府新主席周至柔先生向他表示，要請我擔任教育廳廳長。我當時深感意外，便在電話中懇切地向張部長表示：以我能力、經驗與志向，都不能接受這一新職務，請他將我的意思轉達周主席。張部長回覆我說，他恐怕不能代我向周主席拒絕，最好是我自己向周主席說明。在與周主席說明後，他說願意將我的意見轉報中央，只要中央同意我個人的請求，他絕不勉強我擔任我不願意擔任的工作。當天下午，我以口頭與書面向中央決策當局，說明我不能擔任教育廳廳長一職的原因，請他們諒解，不要決定這一項人事的任命。這一天，真可說是我多年來精神上最感沉重的一天。」

「結果沒想到，兩天後的中央決策會議，還是決定了我要擔任教育廳廳長一職。我不得不離開我所敬愛的師大同仁與同學，開始我的從政生活。」

「當時的我很不願意從事教育廳廳長一職，我學教育的志願是在於教書與辦學，尤其在師大服務多年，對於要離開苦心經營的事業，心中有百般不願。」

「最後，教育部部長張曉峰先生與考選部部長陳雪屏先生兩人都向我說：教育廳的業務固然繁重，如果用心努力去做，也許比辦一間大學更能造福大眾。幾經思考後，我開始承擔這個從未預料到的工作。」

## 一、創立教師福利制度

劉校長很令人稱道的是：對於教師福利的重視。所以這麼重視教師的福利，探究其原因是受到其家庭環境的影響。劉校長回憶到：父親的職業是教師，因為以往對於教師福利的忽略，因此劉校長的童年生活是相當樸實的。這樣的生活經驗讓劉校長一上任教育廳廳長，即開始推動教師福利制度。

「我接任廳長後，即向省政府周至柔主席表示：教育廳首先要做的事情為改善中小學教師待遇。如果教師的待遇無法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怎能要求他們專心教學？這樣的看法得到周主席的贊同。經由研議討論後，決定發給教師新台幣一百元的研究費。當時的小學教師待遇才三百元，等於是提高了三分之一的待遇。我記得那時恰值颱風過境，為了爭取這項教師福利，我在風雨中，由教育廳在霧峰趕至中興新村往返奔波，最後提案終於通過，覺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很值得的。」

「繼而，在民國四十八年四月間成立『臺灣省公立中小學教職員福利金籌集委員會』的組織，積極為教師謀福利。福利會首先舉辦助學貸款，凡中小學教師、職員、工友子女就讀大專院校者，每年均可貸助學金三千元，規定於畢業後，分六年無息償還。」

「另外，我又改訂教師兼課辦法、增加導師職務加給費、健全退休補助金制度等。有一次我到省立嘉義中學視察時，多位大陸來台的教師向我表示：因為教師待遇偏低，所以同事的禮金是一項很大的負擔。同時，自己隻身來台，倘若不幸病逝，更沒錢辦理後事。聽了這番話，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值得重視。回教育廳後，便訂定『省立中等學校教職員婚喪互助辦法』，結婚互助旨在提倡節約，以消除送禮宴客、鋪張浪費的積習；喪亡互助旨在推己愛人，惠及孤寡，以發揮教育人員患難相扶持的精神。」

「福利會另一項重要措施便是興建『教師會館』。當時台灣名勝以日月潭最著名，許多人到此遊覽。許多教師也至此地遊玩，但由於薪水低住不起旅館，往往要一天往返，相當辛苦。所以，我們決定興建教師會館，藉著教師會館的建立作為提升教師地位的一種象徵。」

「經過當時教育界同仁的支持與共同努力擘畫，終於建立起我國教師福利制度，我認為這是教育界的一個大進步。」

## 二、初中入學考試免試常識的推動

「在我擔任教育廳廳長時，有一件頗受爭議的措施，那就是初中入學考試免試『常識』一科。以往在初中入學考試時，學生須考國語、算術、常識三科。因為入

學考試的競爭，當時惡性補習的情形很嚴重，家長與民意代表為維護學童的身心健康，均要求教育廳要減低惡性補習的風氣。我基於教育的觀點，也認為初中入學考試科目不宜過多，因此若能取消常識一科的考試，相信對於學生惡性補習的風氣能有所消除。」

「選定不考『常識』一科的原因，是由於常識類的課本共有十六冊之多。學生由於內容龐雜繁多，往往不得不死記書中之人名地名與年代等。這些機械性記憶的背誦，費時耗力，又極易遺忘。另外，一般教師切望學生能順利升學，對該科的教學方法僅採取填鴨的方式，要求學生反覆背誦課本上的知識，完全未依據實際教學目標來實施教學。這樣的措施構想得到許多教育專家與中小學教師的贊同，因為國語與算術屬於工具學科，常識是內容學科，入學考試應該側重工具學科能力的培養，常識科目入國中後均須一一學起，因此，就中等教育方面而言，免試『常識』一科，並不會違背入學考試的目標。」

「免試常識一科，在理論上是站得住的，但是仍有些民意代表公開質詢。探究其原因是由於很多書局在常識免試後，他們出版的常識補充教材便銷售不了，因此，便委請民意代表出面質詢。最後，幸賴總統與各方人士的支持才使這新政策得以順利推行。」

### 三、創辦實用技藝訓練中心

「我一到教育廳服務時，便曾接獲『改進國民教育』、『發展職業教育』、『充實高等教育』為今後台灣省教育施政重點。」

「在發展職業教育方面，深感職業教育缺乏彈性，不切實際，因此，思考如何不受現行職業教育法令規章之限制，另行開闢一條職業訓練之途徑。在民國四十七年，我特別提出實用技藝中心的名稱，並說明名為『訓練中心』，可以不受現行職業教育法的限制；名為『實用技藝』，即指出係訓練內容注重技術而不專重理論。我這個想法的目的是想要訓練在職青年與成人提高其技藝水準及教導其學習別種技藝，使其增加生產技能或便於轉換行業。在實施方法方面，重視的是社會需要，即視當時社會需要來辦理，且上課是有彈性的，並以建教合作的方式輔導就業。」

「實用技藝訓練中心在民國四十七年二月創辦以來，至五十一年十一月底止，全省已有四十餘所學校設置訓練中心。一般青年參加受訓者極為踴躍，每年約有五千名學生結業，且就業率達百分之八十，可以說為補習與職業教育開闢了另一新途徑。」

聽完劉校長的教育構想與實現過程，深深感受到前人的每一步一腳印為我們後代

所創造的無限福祉。做爲一個教育家必須要有劉校長的奉獻精神與高瞻遠矚的胸懷。

#### 四、倡導人文教育與重視語文教育

「倡導人文教育是我從事教書、辦學與行政工作這四十多年來一貫努力的目標。我所指的人文，即所有關於『人』的問題，所偏重的是精神層面，大抵涵蓋了文學、哲學、歷史與美學等方面的教育。我之所以特別倡導『人文教育』乃是對於社會演變下的一種使命感，以往過於重視科學與科技教育，而忽略了在心靈層面的人文教育。這樣重視科學的風氣之下，往往學生的品格與道德教育是受忽略的部分，也造成社會風氣日益萎靡的負面影響。」

「重視語文教育是由於語文是一種基礎學科、是工具學科，而不是學問，若是基礎工具都沒有一定程度，如何做學問呢？強調語文教育的重要是：因當時學生的語文程度嚴重，我記得曾有位學生寫信給我，信封上寫著『○○○老師敬啓』，要老師恭恭敬敬的將他寫的信打開。這種工具學科沒有學好一定會鬧出許多笑話，做爲一個現代人一定要提醒自己要注意語文程度方面的加強。」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我擔任臺灣師範學院院長，鑑於師範學院是培養師資之所，教師必須是一位人格健全的人，方能爲人師表。因此除了當時教育部所規定的課程以外，我利用課外時間，特別加強學生人文科目的教學。」

「舉例來說，我在師範學院設立了國學講座，請當時國文系主任潘重規主持，專門爲學生講說四書五經。台灣的歷史背景是曾受日本殖民教育五十年，因此，本省學生對於中國歷史與文化的了解有限。設立國學講座的目的是在於希望師範生能多多接觸國學，進而了解中華文化的淵源。同時我認爲歷史也是很重要的，特別請陳致平教授，以講故事的方式講述中國歷史，從古代一直講到現代的歷史，連續講了三年之久。哲學方面，則由牟宗三教授主講。以這些方式來推廣人文教育。」

「師範學院同時也成立了人文學社，這個學社是由教授、學生聯合組成，一直到現在還是師大重要社團之一。還來師大校友會成立了『劉真先生學術基金會』，這個基金會定時舉行人文講座，來推廣人文教育。回想我三十八年舉辦這些講座時，有些人還批評我宣揚儒家思想是開倒車的行爲，直到後來蔣公倡導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與孔孟學會，大家才不再認爲推行人文儒家思想是違背時代潮流。」

「另外，我在語文教育方面，也對教育部規定的國文課程做一番調整。本來大學國文只僅教學一年，但是我認爲一年不夠，便將國文增加一年，而且採分組教

學。因為國文課程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寫作，教授更要認真批改，因此，將國文課程採取程度分組的小班制，老師教起來容易，作文批改也方便。國文與國語是最基礎的工具學科，所以，每一學期舉行一次測驗，不及格者仍需努力，參加下一學期的測驗，倘若四年大學讀完仍不及格者不得畢業。每一學期終了，將學生的作文簿公開陳列，了解學生的作文程度，間接的考核教授是否有用心批改。在我擔任師範學校校長期間，學生的國文程度大致上都不錯。此外，我也鼓勵學生參加各種考試，以測試自己的程度。師範學院設有國語評審委員會，因為師範生畢業教書必須用國語來教學。我希望全校的畢業生都用國語來教學，國文系的學生除了能教國文以外，也能教國語。英文系的學生除了主修英文以外，也需輔修國文系課程，因為單單只有英文好而國文不好的話，將來在教學語言課程上，都很難有優良的成就與表現。畢竟國文與外文都是一種工具，所以應該在學生時代就打好基礎，後來很多學生在社會服務或擔任大學教授，都對我說，我們有很好的國文與外文能力都是我當校長時逼出來的。」

「我到教育廳服務後，就規定師範學校定時舉行國文與國語統一考試，以提高師範生的國文程度，規定師範生結業時必須參加由教育廳統一命題的國語文考試，不及格者不予分發擔任小學教師。很多學生知道有這項規定後，都很緊張，很怕會考不及格。例如：現在政大國文系教授李威熊就說，他當時正在台中師範學校就讀，知道有這項規定，心理上有很大的壓力，不得不加緊努力學習國文。但是如今回想起來，若沒有這項規定他們就不會重視國文，一旦重視後，開始鑽研後便發生興趣，也使得他後來走上研究國學之路。」

「經過這一連串的政策實施經驗，我認為政府的政策只要是對的就應該要認真執行，不要顧慮太多外界的批評，我始終認為師範生如果國文程度太差，如何能做一位稱職的教師呢？學生在青年時期如果能把語文工具打好基礎，將來從事任何工作都不會遭到運用文字的困難。我仍要期勉未來將要為人師者，好好打好語文基礎，這是做一位教師基本必備的條件。」

## 柒、主持中國學制改革工作

.....

「民國七十二年四月間，有一天中午，我與教育部次長施金池共進午餐，他告訴我，下午教育部有一場會議，朱匯森部長希望我一定要參加。那幾年教育部的會議很多，因為我認為教育問題錯綜複雜，各方面意見是見仁見智，所以往往發生爭論，結果都是以議而不決，或是決而不行收場。之後，有關教育方面的會議，我總

盡量避免參加，以免浪費時間。但是，這一次由於施次長是師大校友，奉朱匯森部長之命相邀，於是我下午便準時到教育部開會。」

「朱部長表示教育部欲成立一個『學制改革研究小組』，希望在座者均能應聘為小組委員，不過為便於工作進行，必須先推定一位召集人。當時朱部長和應邀出席者一致推定我為召集人，我以種種理由再三婉辭，朱部長與其他與會人士認為學制改革關係重大，我思考後允任為召集人。」

「我從不輕易接受一個新工作，只要我答應接受新工作後，必定全心投入，負責到底。第一次開會時，為『正名』起見，我即提出國人翻譯外國術語，常多歧異，應加以統一。學校制度當時有學者翻譯為『學校系統』、『學制系統』、『學校制度』、『學制』等，我期望將名稱統一。並說明學制，乃是國家對於一般未成熟的兒童與青年實施各種教育時所劃分之確定的學習進行階段。這些以年度為單位的學習階段，上下左右協接聯繫起來，便構成一個完整的學校系統，亦即所謂學制。大家均同意我的看法，於是我們便將這個研究小組定名為『學制改革研究小組』。」

「我國的新式學校制度始於前清末期，當時列強侵陵，國勢危急，於是朝野上下均認為唯有廢科舉、興學校，始可救亡圖存，因此，慌亂之中開始了新式學制，採取了『六三三四制』，此一學制完全仿自美國，加上實施時未能發揮此制的原先基本精神，以致衍生許多缺失。胡適、梁漱溟、傅斯年等學者都曾提出該學制缺失，期望能發展出中國本位的學制。」

「學制研究小組討論後，歸納出現行學制需要加以改進的部分有：幼兒教育的質與量均不足、國民教育重視升學忽略教育目標、高中以升大學為主，但是許多高中學校均無學生考進大學、職業教育未納入學制、推廣教育缺乏、大學修業年限缺乏彈性、師資培育制度應加強、全民教育與終身教育的目標要繼續加強。」

「學制研究小組認為現行學校制度與社會需要有脫節之處，應該予以改進，教育是百年大計，所以有關學制改革的建議，需特別考慮到以下幾點：可行性、前瞻性，並且希望改革後的學制具備：創新的精神與彈性的制度。」

「經過多次的討論，商訂出十項改革原則如下：

- (一) 學校制度應按學校性質，以『幼兒教育』、『國民教育』、『技藝教育』、『學術教育』、『師範教育』、『社會教育』、『特殊教育』等，作為分類的依據。
- (二) 學制應採取『單軌多支』的型態。
- (三) 各類教育規劃，應配合國家人力供需計畫，以提高教育投資的效益。
- (四) 各類學校制度的訂定，應根據『創新』、『彈性』的原則做多元化的規劃。



- (五) 學制需力求『上下銜接』、『相互溝通』的便利。
- (六) 師資與專業人員養成與進修制度的建立，以適應社會進化的需要。
- (七) 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應做密切配合，以實現『整體教育』、『終身教育』的理想。
- (八) 特殊教育在各類各級學校方面應有制度與課程上妥善規劃。
- (九) 幼兒教育與成人教育，應分別建立制度，並與各級學校教育密切聯繫。
- (十) 各類學校修業年限與課程內容應參考世界教育的趨勢，不斷做調整與修訂。」

「學制研究小組根據以上原則，在民國七十三年四月規劃出學制改革方案，朱部長完全同意，後提報行政院核定，那知適逢行政院人事改組，因此這個學制未能形成政策，以付諸實施。」

「學制問題只是整個教育問題的一環，在為期一年的小組討論中，小組委員均按時參加會議，各抒己見，達成共識，完成一套具體的學制改革方針。雖未能見諸實施，但仍出版『中國學制改革之研究』一專書，可供後學參考與研究。」

劉校長在學制改革研究小組中所提出的學制問題與改進原則，現在看來，仍是相當適合解決我國當下的學制問題。不禁對改革小組對我國學制改進研究之用心，雖然未能實施落實，亦不能不對學制改革小組的用心與高瞻遠矚表示由衷的敬意。

「分享完我少年時代的讀書過程、教育行政的經歷，最後，我要期勉現代的年輕人五個人生原則：用功做事、用功做學問、不講空話、實事求是、以身作則。秉持著這樣的精神去經營你的人生，相信回首時，你會肯定自己曾做過的一切努力。」

## 捌、後記

.....

訪談劉校長的過程中，對於劉校長的氣度與笑容，在在展現出教育家的慈愛與智慧。在從事教學與教育行政的過程中，這樣的慈愛與智慧，引領著我國教育發展邁向成熟與進步。相信劉校長對於教育事物的盡心與奉獻，永遠是教育界的最佳典範。

# 竭忠盡智為教育 — 潘振球

(訪問及資料整理：陳明終、邱鈺惠、蕭佑梅)

## 壹、生平簡介

---

潘振球先生，出生於民國七年七月九日（農曆六月初二日），江蘇省嘉定縣人。

### 學歷

- 民國三十二年 國立師範學院教育系畢業。
- 民國三十四年 國立政治大學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畢業。
- 民國四十九年 國防研究院第二期畢業。
- 民國五十六年 韓國建國大學榮譽法學博士。

### 經歷

- 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 青年遠征軍二零七師政治部科長
- 民國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 江蘇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講師、訓導處長
- 民國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 國防部預備幹部局特設杭州青年中學校長
- 民國三十八年 國防部預備幹部訓練團第一總隊副總隊長
- 民國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 臺灣省立臺中第二中學校長
- 民國三十九年至四十五年 臺灣省立臺北成功中學校長
- 民國四十五年至五十三年 臺灣省訓練團教育長
- 民國五十三年至六十一年 臺灣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
- 民國六十一年 臺灣省政府委員兼法規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 民國六十一年至六十七年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民國六十八年至七十六年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  
民國七十四年至七十六年 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兼任）  
民國七十六年至八十四年 總統府國策顧問  
民國八十四年至八十九年 國史館館長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委員會第一屆候補委員、委員（第二、三、四、五、六、七屆）委員（43.4-59.9）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委員會（第八屆）評議（59.9-61）  
中國國民黨（第九、十、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57.8-77.7）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委員會主任委員（67.1-68.2）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工作會主任（76.2-76.11）

### 座右銘

我常常用「愛國家、求進步」這兩句話來鞭策自己，也以此勉勵學生。此外，民國四十三年春節，蔣經國先生曾親書「存良心，做善事，以盡爲人之道。」幾句話示勉。數十年來，銘記於心，幸未違背！

### 貳、刻苦儉樸的農家子弟

.....

認識潘振球先生的人都知道，潘先生的個性中帶有刻苦儉樸、秉性忠厚、不畏艱難的特質。而這種特質是來自於農家生活的薰陶，回憶起幼年生活的影響，潘先生說：

「我出生在江蘇嘉定東門外戩濱鄉的農家，一般說來農家子弟較爲純樸勤勞，由於我的祖先世代務農，因此我的性格中也帶有這種農家子弟的特質吧！」

談起小時候當過牧童的經歷，高齡八十五歲的潘先生眼神嘴角充滿了掩不住的笑意：

「小時候要幫忙放牛，所以照顧牛隻、帶牛去吃草，這些工作我都做過。不但如此，我還會不少牧童們唱的歌！一直到後來，在我孩子小的時候，我還曾教他們唱過這些牧童的歌呢！」

#### 一、戰事頻仍的少年時代

民國創建初始，國內軍閥割據，彼此間相互爭伐不斷。當時仍年幼的潘先生，正值中小學求學階段，由於受到軍閥間戰事的影響，潘先生的求學過程也充滿了波折：

「我的曾祖父尚是個佃農，家境並不好。祖父的時候，家庭經濟狀況才比較好轉。到我父親的時候，他已經開始讀書識字，也會算術。所以在我約莫五、六歲時，父親便開始教我識字、讀三字經。民國十三年，我七歲的時候，進入鄰村『潘氏初級小學』就讀，這所學校雖然稱為初級小學，但實際上是正在轉型中的私塾。才進入學校不久，同年九月『江浙戰爭』爆發，當時齊燮元、孫傳芳等屬於直系的軍閥，攻打皖系的盧永祥。因為這個戰事，我們全家避居到寶山縣的包家樓舅公家。民國十四年，『江浙戰爭』稍微停息了些，因此全家回鄉。但是我並沒有跟隨父母回鄉，一個人繼續留在包家樓舅公家，到當地私立新民初級小學就讀四年級到羅店羅陽小學寄宿就讀了一年。民國十八年回嘉定，進入嘉定縣城內之奎山中心小學，重讀四年級，一直到民國二十年在奎山中心小學畢業，完成了我的小學教育。」

## 二、祖母的影響

潘先生幼年時的生活，因為受到戰禍的影響，小學就換了好幾所，且出生農家，父母為一家生計忙，所以受到祖母的呵護比較多，祖孫間有著深厚的感情，這對於潘先生產生很大的影響：

「無論是日常生活或是待人接物都可以發現，我的祖母是一位非常有能力，而且能幹的女性，這一點讓我對她十分敬佩。對於我的學業與品格行為，祖母也是非常注意，而且嚴格管教，從不寵溺放縱。雖然祖母對我的教育極為嚴格，但絕不苛刻，應該說是『嚴正』，因此為少年時期的我塑造了良好的品格行為；同時祖母的智慧與能幹也成為我學習的榜樣。」

## 參、沐雨櫛風話二中

「本校在日據時期，稱臺中州立第二中學，光復之初曾一度停辦，將原有校舍撥給省立臺中農職，設備亦分別由農校、一中接管。三十五年秋復校時，借用第二高等女校校舍，就是現在的校址。當時二女高的設備也沒有了，僅存幾棟舊木屋，所以在復校初期，校舍設備都很簡陋，比辦一所學校還困難。」

「我是三十八年七月下旬到學校接任校長的，當時校舍是二層木造房屋、圍牆是竹子做的，有很多缺口，操場到處積水，雜草很多，連升降旗時學生站的地方都沒有。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耕牛在操場中吃青草的情景，令人迄今難忘，校歌中有『沐雨櫛風』之句便是當時的即景，後由全校師生利用課餘假日，大家一起動

員，勞動服務，先把草除掉，還在操場中間和四周做了簡易的排水系統，還做了一條兩百公尺的跑道，學生方才有了比較大的活動空間，而且是自己開出來的，心裡都很高興，也充滿了自信與自尊。」

「那年十一月教育廳長陳雪屏先生，到二中來視察，與全體教職員深談，於聽取我的簡報後說：『今天能到二中來和各位見面，感到非常愉快。臺中二中，是全省有名的校舍破爛的學校，過去學校的風氣也不好，凡是以前在這裡任教的先生都知道，本學期在短短三個月終於把學校的風氣和師生的精神都轉過來了。』」

當時的臺中二中，雖然校舍設備非常不好，但也有許多特色，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很有趣，茲就記憶所及略舉數事如下：

### 一、男女合校

民國三十八年的二中，有高中、有初中、有男生、有女生，男女生合校，分班上課。當時不僅分班上課，就是週會也是分開舉行的，我到了學校就把它改過來了，高初中男女學生一千三百多人在一起開週會，高初中男生分站兩邊，女生站在中間，當時互相一鞠躬禮時，女同學很不習慣，所以男女合校合班，男女合校分班，一直是我國教育上的課題，直到今天仍有人在討論這個問題。

### 二、博物標本

二中的設備雖然簡陋，但博物標本卻是各中學中最完整的，有位周愷老師以校為家，把標本室整理得非常好，有很多人來參觀。

### 三、家事教室

普通中學並無家事課，但二中有女生，所以有家事教室，有位女老師王文華女士，她教女生家事課，教學生做點心，常常送給我試嚐，有時友人來參觀招待用的點心，也都是家事老師帶著學生自己做的。

### 四、國家意識很強

二中同學的國家意識很強，曾舉辦和參加許多愛國活動，為反共抗俄音樂晚會、愛國敬軍運動、響應購債運動、獻糧救災運動、女同學縫製短褲勞軍，全體同學都熱烈參與，做得有聲有色，這不僅是當時的一種良好的教育，也使二中的聲譽和社會地位，有了顯著的提昇。

## 五、家庭訪問

在那一年中，還有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那就是家庭訪問，實施的方法與其他學校不同，全校教職員一起動起來，分別到各被訪問的學生家去訪問，除了假日以外，有空就出動，幾乎每一個學生家裡都有人去過，訪問的目的，除了瞭解學生家庭情形和學生在家中生活情形，去訪問的人也帶著學生資料告訴家長，做得很徹底；也有一些班利用班會邀請家長來參加，因此學校和家長對學生的動態彼此都很瞭解，對輔導工作很有幫助。

## 肆、成功中學的歷史精神

臺中二中的教育環境、教學設備，雖然有待改善與充實，但師資不錯，學生素質也很好，而學校與學生間、老師與學生間、學校與家長間、學校與教職員間、學校與社會間的關係，都非常良好，可惜在那裡只服務了一年，潘先生至今猶有責任未了的遺憾！

潘先生原本擔任臺灣省立臺中第二中學校長，當時的臺中二中沒有運動場，爲了讓學生多運動，維持身體的健康，潘先生在物資經費缺乏的情況下，親自帶領師生修建學校操場。此外，在潘先生的帶領之下，學校不但加強學生的課業學習，更重視學生在品格行爲與精神思想的陶冶。經過潘先生的大力整頓之後，臺中二有了極大的進步，聲譽鵲起。有了如此成功的治校經驗，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長陳雪屏先生於是邀請潘先生北上至成功中學擔任校長，希望借助潘先生的能力將當時各方面表現皆不甚理想的成功中學重新改造。三十九年七月，潘先生奉調到臺灣省立臺北成功中學任校長。成功中學是一個有特殊歷史的學校，他說：

「民國四十年五月十七日是成功中學的校慶，由桃園學生家長捐款興建了一座民族英雄鄭成功紀念碑，碑高八台尺（基高四台尺）、寬二尺七吋（台尺）、厚一尺七吋（台尺）。紀念碑正面請 蔣總統頒題『民族英雄鄭成功紀念碑』十字並豎立於校門右側，以啓發學生的愛國思想。」

潘先生談起初到成功中學時所瞭解的學校狀況：

「成功中學是在日據時期，民國十一年由地方父老捐資興辦的，原名臺北州立第二中學，是臺灣子弟就讀的學校。過去桃園楊梅以北地區的優秀青年大多投考成功中學，培育了許多人才，光復後許多地方領袖就是成功的校友。民國三十九年七月，我擔任成功中學校長。當時學校裡有軍隊借住，也有臺灣省立法政專科學校

（即前中興大學法商學院，今國立臺北大學）籌備處在此設立。由於這些單位各有特性，大家擠在一起，對於學校行政及校風有許多影響。爲了讓學生有個良好的學習環境，我積極協調讓這兩個單位遷離，遷離之後就開始進行學校各項校務的整頓。」

在成功中學恢復成單純的教育場所之後，潘先生開始他改造學校的計畫，首先便是讓學生無論在生活與學習上，皆有一個明確的努力目標：

「民國三十九年十月六日，我主持就任校長後的第一次開學典禮。當時每個學校都有一道校訓『禮義廉恥』，但我心想，是不是在這個共同校訓之外，再給我的學生們更明確、更直接的努力方向。於是在開學典禮上，我提出了『愛國家、求進步』兩句話期勉我的學生。當時成功中學學生對這兩句話個個耳熟能詳，在畢業多年之後，有時候這些校友們在某些場合遇見我，還是會大聲說：『校長好！』然後再加上一句：『愛國家、求進步』。看見這些學生個個有成就，而且心中還深深記得在當時我對他們的勉勵，內心感覺到非常高興。」

潘先生給予學生「愛國家、求進步」的努力方向之後，更積極的改善校園環境和加強民族精神教育：

「接任校長後，我在建設校園上花了很多功夫，像是闢建小花圃、四週人行道植樹，希望將校園徹底美化，給學校師生一個美好的學習與生活環境。現在成功中學校園中有棵很茂盛的大樹，就是當時種植的。另外，我們也將運動場重新整建，這樣學生也才有適當的運動空間。此外我們也鼓勵老師、學生一同自製教具。除了這些硬體的充實之外，我們也特別加強民族精神教育。」

經過兩年的努力，成功中學在潘先生的帶領之下，校譽蒸蒸日上，而學生在各方面都有優異的表現，與臺北其他著名省中並駕齊驅。

### 一、生活中心教育實驗

潘先生在成功中學校長任內，對於教育實驗工作非常重視，生活中心教育實驗就是其中之一。他說：

「成功中學從事生活中心教育實驗，是在尋求教育改革所選擇的途徑之一，其特點有四：（一）注重生活的適應，以矯正偏重分數與升學的準備。（二）注重實用的知識，以矯正偏重課本死知識之記憶。（三）注重由教學活動中的學習，以矯正偏重從符號中學習。（四）注重經驗的完整，以矯正偏重零碎知識的灌輸。接受生活中心教育的學生，不僅大多能獲得良好學業成績，尤其特出的是人格較能圓滿發展，對生活的適應能力也比一般學生要強得多，一般來說，生活中心教育實驗是

很成功的。」

## 二、軍訓教育與童子軍教育

成功中學有高中部也有初中部，高中實施學生軍訓，爲了文武合一教育的整體發展，所以就加強初中學生童子軍教育。潘先生說：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後，積極推動文武合一教育，具體行動之一，乃爲恢復學生軍訓。在軍訓教官尚未到校前，即先行試辦，以培養學生對軍訓的觀念，提高學生對軍訓的興趣。試辦軍訓工作，由訓導處管理組負責規劃，管理組長徐煦衡兼總教官，軍訓教官由具有預備軍官資格之老師兼任。當學生看到平日教國文、教英文、教數學、教理化學科的老師，居然穿上軍服帶隊出操，既感驚訝，又覺有趣，試辦結果比預期還要好。

爲了配合高中實施軍訓，特別加強初中學生的童子軍教育，使兩者連貫起來，形成文武合一的完整系統，所以還特別加聘了兩位童子軍教員。

民國四十五年成功中學校慶，有一很大的特色，即爲舉行軍訓檢閱及童子軍檢閱，這在當時也是一項創舉。」

## 伍、省中桃園分部

臺北五省中一建國中學、成功中學、師大附中、一女中、二女中，合作得非常好，有很多事情都是聯合舉辦的，所以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如：學生制服聯合招標、聯合畢業典禮、聯合招生、五省中聯合分部等。潘先生特別提到五省中辦理聯合分部的事。他說：

「民國四十四年爲配合政府防空疏散政策，五省中成立聯合疏散委員會，決定五省中疏散下列地點並先設立分部：建國中學在中和，成功中學在桃園，師大附中大溪，一女中在新店，二女中在汐止。各校分部，分別接收在此一地區之五省中新生。同年二月，成功中學在桃園創設『臺北市五省中桃園分部』，簡稱『成功分部』。爲了使分部能夠迅速發展而且給學生們有較好的教育環境，特請教務主任薛光祖，成功中學校友會總幹事章連終老師，桃園縣議會吳文權聯合拜訪桃園地區熱心人士及成功中學校友、家長，很快就籌集了建校經費一百餘萬元，建築校舍、購買儀器，很快就開學上課了，數年之間，即具相當規模，乃於民國四十七年夏，奉令獨立設校，定名爲『臺灣省桃園武陵中學』。」



## 陸、擔任臺灣省教育廳長

潘先生於民國五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就任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當時即提出四大努力目標：

- (一) 樹立誠樸的教育風氣。
- (二) 重視完整的教育功能。
- (三) 配合經濟發展、提高人力素質。
- (四) 改善教師福利、發揚尊師美德。

經過八年的努力，以上這些目標大多實現了，而且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創新的工作，這不僅在潘先生的教育生涯中留下珍貴的一頁，也為臺灣教育留下輝煌歷史紀錄。

### 一、惡補問題嚴重

潘先生擔任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時，與前幾任廳長相同的是皆面臨一項由來已久的教育沉痾—小學「惡性補習」問題。潘先生認為「補習」原本不是一件壞事，然而後來卻演變成「惡性補習」，甚至與「惡性補習」劃上了等號。潘先生對此特別將這兩者的差別做一說明：

「每個人的天賦資質原本就有差異，所以學習的能力和速度也都不一樣。而老師如果為程度比較不好的學生補習，增進他的學習與理解，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如果補習補過頭了，一味的只在考試分數上努力，而忽略了體育、群育，甚至德育的發展與培養，戕害了學生的身心健康，和教育原本應有的正常功能；或者是以增加老師收入為目的，連不需要補習的學生也強迫他參加。像前面這些我所講的情況，就是不正常、不合理的補習，也就是『惡性補習』。

對於當時「惡性補習」為小學學生所帶來的煎熬，潘先生回憶道：

「民國五十三年我到教育廳服務時，由於臺灣土地改革成功，經濟也開始快速發展，所以一般家庭在經濟生活獲得改善之後，希望自己子女繼續升學的意願也隨著提高，因此初中考試的競爭就越來越激烈，許多兒童為了升學，不得不遭受『惡補』的煎熬。當時的補習除了學校裡面補，學校外也補。我到學校去訪視，一個班六、七十人算是常態，有一次竟然發現有一班學生多達一百人！每個學生都緊緊的挨著坐，連出入都有困難。那些學生數高達六、七十人以上的班級，其教室環境，不但空氣非常不好，連燈光也是嚴重不足，對學生、身體健康真的很不好。」

小學生飽受「惡補」之苦，無論報紙或社會輿論都不斷呼籲重視，並希望解決此一問題對學童帶來的傷害：

「對於『惡補』所造成的問題，各界責備教育之聲，不絕於耳。因此，我到教育廳服務時，各界早已紛紛要求改革。而新聞媒體對於這個問題的督促與責備尤其嚴厲。印象很深刻的是，當時有一份晚報上登著一幅漫畫，畫中坐著一個打瞌睡的學童，在他頭頂上懸了一個冰裘，蹙額皺眉的母親在一旁一面手執女紅，一面搖醒兒子說：『孩子！不要睡了，你明天要繳的作業還沒有做完喲！』畫中的時鐘，時針正指向十二點。當天下午下班的時候，我和一位新聞記者朋友同車從霧峰到臺中，在途中談起這張漫畫。這位記者感慨的告訴我，如果現在有人真正能夠解決『惡補』的問題，那麼他就是神仙了！可見當時問題的嚴重，實在是到了讓人無奈的程度。」

潘先生認為當年小學「惡性補習」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其形成原因應從下列幾個方面來探究：

「從社會的角度而言，臺灣光復初期到民國五十多年左右，人口迅速增加，國民學校的學生數也大量增加；其次，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了，希望繼續升學的人數自然也增加。但是學校的容量，並未隨著學生人數增長而成比例增加。另外，一般家長和學生都希望進入公立學校或進入有名的學校就讀。如此一來，僧多粥少的情況下，自然造成升學競爭。從學校的角度而言，國民小學的教室不夠，許多學校採二部制教學，因此有些功課難免需要補習。其次，當時教師的待遇較差，有時藉著補習增加收入。此外，當時中學的設備、師資、水準不一，為了進入好的中學就讀，所以許多學生參加補習。還有一點涉及試題，就是初中入學考試偶有難度超過國小教科書範圍的現象，因此許多國小便以此當藉口進行補習。從家庭方面而言，有些家長誤以為教得越多就越好，因此要求教師為他們的孩子補習，甚至強迫孩子參加補習。有的家長則因為孩子國小畢業後只有十二歲，還無法就業，所以希望孩子繼續升學。」

分析了「惡性補習」可能的形成原因之後，潘先生接著說道：

「剛剛談到的，都是『惡性補習』可能的原因，當然還有其他很多的因素啦！不過大致以這些為主。從這裡可以看出，『惡性補習』和升學競爭是彼此相關，而且是由各方面原因所形成的。因此，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單憑政府一張公文就可以奏效。」

### 二、國校畢業生志願就學方案

初擔任臺灣省教育廳長的潘先生，獲得當時行政院長嚴靜波先生的召見，並指示日後臺灣省的教育工作，要先從國校畢業生免試升學做起，逐漸達成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的目標，此即成為潘先生與教育廳同仁研訂「國校畢業生志願就學方案」的啓示：

「當時教育廳裡的同仁對這個方案的研訂，都抱持著高度的使命感，大家日以繼夜的努力，希望能讓計畫儘早實施。由於志願就學方案的內容很廣泛，舉凡發展初中、齊一初中水準、加強職業教育、輔助私立中學、增建教室、新設學校、師資培訓、編印教材等等，特別是經費籌措與概算，都經過了周詳的考慮，並且有切實可行的計畫，所以等到 蔣公宣佈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的時候，只要將『國校畢業生志願就學方案』稍加擴充調整，就成為推行的藍本。因此，『國校畢業生志願就學方案』對於九年國教能夠順利實施，有著極大的貢獻。」

### 三、初中入學加考體育

潘先生擔任臺灣省教育廳長後，無時無刻地思考如何杜絕「惡性補習」的問題。當時各界對「惡性補習」一片批評，然而卻沒有人真正提出具體的解決策略，因此潘先生上任後提出了一項創新的計畫：

「當時規劃初中入學加考體育這項制度的目的，在於讓國民學校的德智體群四育均衡發展，促進教學的正常化。這項制度的草擬人是我的老師，也是當時臺灣師範大學教授—江良規博士。這項計畫在民國五十四年就開始構想，選擇多所高中、初中、小學進行實驗，針對許多體能項目，例如：三十公尺、立定跳遠、爬竹竿、伏地挺身、握力測驗等等，進行測驗，瞭解學生普遍的體能狀況後，再訂出日後考試時通過與否的標準。民國五十五年進入試辦，當時有人說，如果初中入學加考體育，那麼大家不是又要惡補體育？其實，當時國小學生的身體健康狀況並不理想，近視的學生也不斷增加，如果學校能為學生補習或加強體育，不也是一件好事？原本這項計畫預計五十七年正式實施，結果，過不了多久就開始實施九年國教，所以初中入學加考體育後來並沒有實施。」

雖然初中入學加考體育的計畫並未在民國五十七年付諸實施，但回憶起當時負責規劃的江良規先生無視自身病痛，仍然戮力以赴，潘先生語帶感傷的說：

「民國五十五年開始試辦的時候，江良規先生的身體已經不太好了，但還日以繼夜，對每一個項目都詳加研判。有時甚至忍受身體的病痛，親自邀集一些體育學

界的朋友在他病榻前模擬表演。他曾經告訴我，此刻唯一的意念就是『替孩子們爭回遊戲運動的權利』。他病故前數日，獲悉這項辦法在五十六年初中入學考試試辦成功，他立刻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滿足，並說出『死亦瞑目』的讖語。如今回想起來，對江先生除了滿懷的敬意之外，還有做爲他學生的無限哀思。」

#### 四、九年國民教育

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先總統 蔣公在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上，宣佈自五十七年起實施九年國教計畫。這項劃時代的決定，改變了臺灣國民教育的發展。當時擔任教育廳長的潘先生，身負推動九年國教的重責大任，因此對這項政策瞭解最深。潘先生首先針對九年國教實施的背景加以說明：

「當『國校畢業生志願就學方案』正準備開始分期實施的時候，由於考慮到在經濟方面，國家如果要工業化，就要有科學的基礎與科學的技術人才，這些科學的技術與人才就需要從提高國民知識水準著手。而且當時老總統收到一些建議，像是吳大猷先生以及由國外回來的經濟學者，都曾建議延長義務教育，而且認爲是必要的措施。其次，在國防方面，一個士兵必須具有初中以上的程度，才能使用現代化的武器。尤其老總統對於當時小小的以色列竟然能夠以少勝眾，擊敗阿拉伯六十萬聯軍，印象非常深刻；而且羅友倫將軍也曾和我談過，現代士兵非有初中以上的知識程度不可的看法，因此從提高軍隊素質與戰力的觀點來看，當然需要提高國民教育水準。再從當時的教育現象而言，老總統看見許多學生的身體不好，視力也一直惡化，於是認爲過去的教育方式，只是在製造書獃子；許多大學畢業生不能學以致用，使教育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因此必須辦好國民教育，改善教育上的問題。在政治方面，如果一個國家要實行民主政治，讓人民投票決定國家政策，人民必須具有一定的知識水準。如果沒有初中以上的程度，很不容易判斷是非，自然無法達到選賢與能。最後在社會方面，一個人受的教育越高，就業的機會也隨著增加，如果人人都有事做，社會自然會趨於安定。我去參觀高雄工專的時候，看到學生當中有窮家的子弟，也有三十歲以上的社會青年，他們都很認真的在學習，有的學生還沒有畢業就已經在工廠找到了工作，這都是因爲有機會接受更高的教育所帶來的優勢。」

潘先生將民國五十六年，宣佈實施九年國教的時代背景說明清楚後，接著又說道：

「由於當時國內外整體發展所帶來的衝擊與啓示，因此老總統覺得延長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在總統府國父紀念

月會上宣佈實施九年制國民義務教育。」

當先總統 蔣公宣佈實施九年制國民義務教育之後，隨即召見潘先生等教育單位首長：

「五十六年七月五日的中午，我接到總統府的電話，要我下午三點和當時臺北市教育局副局長劉先雲先生，以及教育部長閻振興先生，一同到陽明山別墅去見老總統。我們三人到達陽明山別墅之後，當時老總統的秘書秦孝儀先生，與侍衛長郝柏村將軍，已經在門前等著，還告訴我們說，總統在等。進了客廳之後，只見老總統穿著夏布長袍，在客廳內踱方步。很特別的是，茶几上除了茶之外，居然還擺了一些茶點！我們三人入座之後，總統對於設校用地、師資、課程與教材、以及經費籌措等準備情形一一詢問，並逐項指示。可見老總統對於推動這項政策的決心與重視。」

### 五、籌備九年國民教育的過程

面對此一龐大的教育工程，所有教育工作人員均動員起來，從中央到地方，按步就班，逐項完成準備工作：

「推動九年國民教育，有許多準備工作要進行。首先，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要先統計出應增幾班？無法再增班時，應新設幾所學校？還要劃分學區，讓小學畢業生能依照他所居住的地區，就近上學。其次，爲了因應增班和新設學校的需求，必須先找到校地。這些新增的校地主要來自公地，也有的是來自私人捐贈。有了校地之後，就要開始興建校舍。由於當時時間緊迫，因此在 蔣公的指示之下，所有公地一律無償撥用，而且協調後立即興建，建校後再辦理法定手續。讓各縣市在最短的時間內，就興建了不少國中。最後，還有很重要的經費問題。政府對於九年國教的投資非常龐大，除了當時的中美基金、省政府補助款，各縣市政府的預算編列也充分予以配合。」

### 六、籌備過程的甘苦

整整一年密集而緊湊的籌備工作，潘先生對所有投入工作的相關人員，那份公而忘私，不畏辛勞的精神最爲難忘：

「這是一項龐大的計畫，光是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推行委員會所擬定的辦法、規定、計畫與各種文件，總字數在百萬以上；所牽涉的單位與人員不可勝數。再加上九年國教必須在短短的一年之內完成，所以相關人員都是兢兢業業，全力以赴。在準備期間，臺灣省政府主席黃達雲先生除了親自參與策劃領導，還到各縣市一一視察。每當相關人員向主席進行報告時，主席總是摒除其他事務，仔細聆聽。若發現

有困難，則盡力為大家解決。每一次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推行委員會開會，都是黃主席親自主持，許多棘手的問題都能在主席明快的裁示之下獲得解決。此外，像是國教小組每個月舉辦一次的定期工作會報，時間都是在晚餐之後進行。往往因為待解決的問題太多，所以臨時加開的工作會議比定期工作會議還多。每次召開工作會議時間都至少四至五小時以上，中間連休息時間也省了，大家忙得連水也忘了喝，結果經常是工作到午夜過後，回到家時已是凌晨，小睡之後又展開了第二天的工作。雖然大家在身體上是很勞累的，但在精神上卻是很充實、很振奮的，因為我們知道，此刻在做的是一件關係國家社會與眾多莘莘學子的重要改革。然而我們這些身負公務的人，盡忠職守，努力完成工作是應該的，但一些民間人士，他們也為九年國教出錢出力，熱心奉獻，這樣無私的精神又是從何而來？後來我曾和幾位出錢出力的人士談過這個問題，他們都回答我：『自己覺得心安』。凡事心安了，人生便有無限的憑藉與樂趣，這樣的精神十分難得。」

回首這段臺灣教育史上重大創舉的產生，潘先生說：

「九年國教能在一年內實施，當年 蔣公明確指示此一政策一定要成功，並且對這項政策非常專心關注。除了教育界總動員之外，財政部門、地方政府、民意代表乃至於地方仕紳都非常支持，那種上下一心，共同為一個目標努力的團結精神，真的很感人！」

## 七、教育廳長任內其他重要政策

潘先生擔任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長期間，除了推動九年國民教育以外，還以全副的精力和心力，致力於教育改革，他說：

「教育事業為國家建設的根本，其進展是永無止境的，而教育建設的主要任務是『建人』，及培養生動活潑、健全有用，對國家民族高度榮譽心與責任感的現代國民。年來本省各級各類教育雖有若干進展，但距離理想尚遠，今後自當遵照中央決策，在主席領導及各位先進的匡助下，督導全省教育工作同仁，隨著時代的進展，繼續致力本省全面的教育革新。」

### （一）強化地方教育行政組織

強化地方教育行政組織最具體的工作是縣市教育科改為教育局，自五十八年七月一日實行改制。潘先生說：

「新制縣市教育局的組織，與過去最大不同的地方，過去是按學校層級分股辦事，今後則循九年國教一貫的精神，按業務性質分課辦事。這是一種新的行政組織方式。」

### (二) 調整教育結構

在此所謂調整教育結構，是指高級中學學校教育結構的調整。我國過去，由於「輕工重仕」傳統觀念的影響，一般人多崇慕白領階級而輕視技藝工作，學生升學高級中等學校，以報考普通高中佔大多數。所以，經實施新教育以來，高級中學在學學生數，原比高級職業學校學生數為多。即以五十學年度為例，前者約佔百分之六十，後者僅佔百分之四十，但經過幾年努力後，高中、高職學生比例發生了很多的變化。以六十學年度為例，高級中學在校學生數降為百分之四十八點零五，高職在校學生則增至百分之五十一點九五。這是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促使教育體質改變的具體事證之一。

### (三) 辦理新型建教合作實驗

新型建教合作實驗班，與過去普通建教合作班是不相同的：舊型的高級職業學校和大專院校所辦的建教合作實驗班，大都是企業機構或政府機關委託學校辦理某一類科人員的訓練。有關教育的實施，不論學科、技能科的實習，大都由學校負責，至於教育和訓練，合作機構所負的責任很少。

新型建教合作實驗班，是學校與企業機構（工廠）共同辦理教育，合作班的學生，一半的時間在學校上課，一半的時間在工廠作業訓練。學生除免繳學費外，由合作工廠發給津貼，第一學年每人每月最低二百元，第二學年三百元，第三學年四百元。並由工廠給予學校教育補助費每年每人一千二百元。學生修業期滿成績合格者，由學校發給高工畢業證書，由工廠訓練協會發給技能訓練結業證書，經技能檢定合格者，發給技能檢定合格證書。此項新型建教合作實驗班試驗情形良好。

### (四) 改進特殊教育

1. 盲聾分校：為適應「盲」、「聾」學生個別的特殊需要，將盲生、聾生分別設校施教，於五十七年八月，將省立豐原、臺南兩所盲聾學校，改制為省立豐原啓聰學校、省立臺南啓聰學校，另在臺中后里新設省立臺中啓明學校一所。
2. 設置省立彰化仁愛實驗學校，地址在彰化和美鎮，於五十六學年起招收肢體傷殘兒童，小學、初中兩部學生四至五班，施以技能訓練，希望能做到殘而不廢。
3. 盲生就讀國校計畫：世界各國強調讓身心障礙學生到國民小學就讀的「回歸主流」(Main Stream)，我國早在民國五十六年即開始實施，只是當時不稱「回歸主流」而稱為「盲生就讀國校計畫」。潘先生談到當時此項計畫的實施背景：

「民國五十六年，美國海外盲童基金會（American Foundation & Overseas Blind，簡稱 AFOB）在世界各地積極推展盲生就讀普通國民小學，當時該基金會亞洲區的負責人白立奇到臺灣之後與教育部接觸，實施盲生就讀普通國民小學的計畫，結果教育部同意實施，於是交由教育廳負責編列預算及執行。並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協助，試辦『盲生就讀國校計畫』。」

當時有多位省議員認為，盲生的生理、心理都與一般正常兒童不同，讓他們接受正常的教育，恐怕難以適應；況且盲生就讀普通國校，也增添了學校方面很多的困難，應從長考慮。對此潘先生並不贊同，他認為「盲生就讀國校計畫」有其重要的教育功能：

「『盲生就讀國校計畫』的優點在於真正達到學齡兒童接受教育的機會均等，同時還可以促進教育的普及，以往國民教育的就學率總是無法接近百分之百，大部分原因在於許多身心障礙的學齡兒童並沒有到學校接受教育，因此我認為實施『盲生就讀國校計畫』對我們國民教育入學率的提昇有很大幫助。其次，盲童在長大成人之後必定要進入社會，如果將盲生與一般學生分開單獨給予教育，在施教上雖然有它的優點，但盲生始終只與盲生接觸，一旦進入社會後這些盲生將會與社會格格不入。所以當盲生在接受教育的階段，就應該讓他們與一般兒童在一起，與其他兒童多做接觸，培養盲生服務社會的健全心理。最後，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讓盲生與一般學童一同受教育，共同生活，可以鍛鍊一般學童仁愛助人的精神。所以我認為『盲生就讀國校計畫』是教育上進步的趨勢，也是值得努力推動的工作。」

4. 智能不足兒童教育實驗：智能不足兒童教育實驗，是指在基隆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台北縣、宜蘭縣、彰化縣等七縣市首先辦理實驗，第一個智能不足兒童實驗班，設於臺北師專附小。

#### （五）大量興建校舍

1. 實施九年國教前三年需新建教室六千七百餘間，新建工藝教室、特別教室、圖書室、辦公室、樓梯間、廚房等三千八百餘間。
2. 消除國小二部制教學，增建教室三千六百三十四間。
3. 拆除國小危險教室，新建教室二千八百四十六間。
4. 增建國小廁所四千二百三十三間。

#### （六）照顧偏遠地區學生

1. 免費供應山地及離島國民中學學生教科書。



2. 蘭嶼國中學生全部給予公費。
3. 臺東綠島、蘭嶼兩鄉學生，升學農業、水產、護理助產三類職校，准予申請公費待遇。
4. 山地離島就讀大專院校者可以申請獎學金。

尤其對於照顧弱勢族群的政策，潘先生更是不遺餘力大力爭取經費。因此，這些政策在當時嘉惠了許多的人。如在為蘭嶼學生爭取公費方面他說：

「我曾到蘭嶼進行視察，在視察的過程中，深刻體認到當地居民生活非常困苦，學生也無法接受良好的教育，非常希望能協助這些學子就學。因此在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教育廳公布一項新規定：『臺東縣綠島、蘭嶼兩鄉學生升學農業、水產、護理助產三類職校，准予申請公費待遇。』透過給予公費的方式，讓更多蘭嶼和綠島的學生，有機會繼續升學。」

## 柒、優秀的領導者

---

潘先生多年來推動過許多重大的教育政策，談起他在教育行政工作上的信念，潘先生說：

「我一生遵從孔孟學說及三民主義的思想，從這當中也體認出我們中國新教育的特質應該是：（一）全民的教育。一面為全體國民共辦的教育，一面為全體國民共享的教育；而教育的總收益也應當歸國民全體所共享。（二）全人的教育。各級各類教育都應該以造就健全的國民為共同目的，因此德、智、體、群四育必須並重，不能有所偏廢。（三）全生的教育。本著『教育即生活』的主義，與『學到老學不了』的銘言，教育除了應關照人類生活的全部之外，更應關照到一個人一生的全部生命歷程。因此我在從事教育行政和擬定教育計畫時，都以前面這三項原則為本。」

成功的帶領許多機關與學校的潘先生，在部屬眼中是一位尊重專才，充分給予部屬發揮空間的優秀領導者。潘先生談到自己在領導方面的看法：

「身為領導者，首先要做到嚴以律己，誠以待人。自己的生活 and 言行一定要非常嚴謹，以身作則。對待同仁，要用一顆誠心與他們溝通。記得我在教育廳的時候，有一位同仁平時脾氣就比較大一點，有一次為了一件事，怒氣沖沖的跑到我的辦公室與我理論。當時我見他正在氣頭上，只是不斷的用和悅的態度和語調與他溝通，並且加以適當的說明。不久之後，這位同仁走出我辦公室時，一點火氣都沒了。這就是用誠懇態度與同仁溝通的結果。其次，要訂出具體明確的目標，讓所有

的學生或同仁有一個清楚的努力方向。一旦目標確定了，大家的方向就會正確。此外，身為領導者要懂得善用人才。借重不同人才的能力，千萬不要妄想『與眾人比智慧』。當部屬有困難時我們要幫助他，有缺失時就要督促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領導者的包容性要大。畢竟個人利害事小，貢獻團體事大，因此面對所有共事的人，不論你是誰，只要你有長處，儘管拿出來；至於短處自己就收斂收斂吧！所以領導者一定要根據相關的辦法、規定，充分進行授權。否則部屬在做事，結果身為長官的天天插手，那麼部屬是絕對做不好的。這或許是過去的同仁們認為與我共事的時候，有很大揮灑空間的原因吧！談了這麼多，總而言之，民主的領導應該是最重要的。」

## 捌、對於當前各項教育議題

潘先生雖然已離開教育行政工作，但憑藉其過去完整而豐富的教育工作經歷，對於當前各項教育措施及改革，潘先生有其獨到的看法：

### 一、延伸國民教育

「教育是一長期的事業，有其歷史背景和時代因素，在發展過程中可以說天天在改。民國五十七年二月十日，先總統 蔣公頒發的手令：『革新教育注意事項』中曾明確指示：『此次國民基本教育的延長，不僅須視為國民教育水準之提高與擴充，而尤應視為整個教育重建與革新之起點……』可見 蔣公是將國家教育作一整體考慮，希望能研訂長期計畫，在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之後，未來逐步延伸至十二年。但由於新的觀念與新的精神還在形成階段，而且人事異動頻繁，以致於繼續延長國教這項計畫在當時並未定案。如今想來，還是深覺遺憾！」

### 二、多元入學

「孔子在教育上的貢獻之一，是重視學生資質、個性之不同而因材施教。他說：『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又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是孔子重視啓發與個別適應的例證。今日多元入學的基本精神應當也是如此。只是在計畫時，必須注意到教育的連貫性。而且教育上任何一種措施，都必須慎之又慎，因為所涉及的是所有接受教育的人。如何能發揮整體教育功能？我想目前推動教育改革的諸位君子必定已經注意了，我不再贅言。只是個人有一點深切的期望，就是要重視各方意見的融合，如此才能避免偏

頗之弊。」

### 三、九年一貫課程

「國家教育本來就是一貫的。九年國民教育的實施，還有很多後續的工作要做。因為九年國教，僅把國小、國中的打通了，還有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路，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實際需要，也應該逐漸打通。九年一貫也好，十二年一貫也好，一步一步向上延伸，這條路終必是要走的，所以對於長期教育計畫研訂，也就十分重要。」

### 四、對於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勉勵與建議

從中學校長到臺灣省教育廳廳長，潘先生與教育工作的關係都至為密切。因而現雖已離開教育工作，潘先生對於目前仍在教育工作崗位上的教師們仍有這樣的期許：

「一、效法孔子的精神：好學不厭，誨人不倦；安貧樂道，不怨不尤；仁民愛物，力行實踐；文武合一，六藝兼修。二、復興中華文化：今日教師最大責任，為復興中華文化，端正社會風氣，培養健全國民，以建設現代化之國家。三、在變中要能持恆、守常：世事都在變，唯有教師的責任仍是不變—不僅傳道、授業、解惑，而且要能在大時代中繼續持恆、守常。而能砥柱中流，以師道自勉。」

### 五、國教躍升的工程師

回首九年國教教育的點滴，潘振球先生參與了這段中華民國教育史上的重大突破。為了替萬千學子開創更美好的學習空間，潘振球先生公而忘私，戮力以赴完成國家社會交付的重任，實為「愛國家，求進步」的具體展現。

### 參考資料

巫錦源（民 61 年 6 月 10 日）。看潘振球的成就。中華日報，第 2 版。

陳德人（民 56 年 5 月 15 日）。潘振球廳長談西德的職業教育制度。中華日報，第 2 版。

黃慶南（民 55 年 4 月 19 日）。兩年來的臺灣教育—潘振球出任教育廳長的成就。臺灣新聞報，第 2 版。

黃慶南（民 61 年 6 月 10 日）。潘振球在臺灣教育。臺灣新聞報，第 2 版。

潘振球（民 54 年 3 月 29 日）。自立自強、中興復國。徵信新聞報，第 9 版。

- 潘振球（民 54 年 9 月 28 日）。發揚尊師重道的精神。中央日報，第 10 版。
- 潘振球（民 54 年 10 月 25 日）。二十年來臺灣教育的發展。中央日報，第 10 版。
- 潘振球（民 54 年 11 月 3 日）。發揮完整的教育功能。青年戰士報，第 3 版。
- 潘振球對臺灣教育的新構想（民 55 年 1 月 25 日）。臺灣日報，第 2 版。
- 潘振球（民 56 年 1 月 1 日）。質量並進的臺灣教育。中華日報，第 11 版。
- 潘振球（民 56 年 10 月 25 日）。我們對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的準備與展望。中央日報，第 10 版。
- 潘振球（民 57 年 9 月 9 日）。緊張興奮的一年—慶祝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特刊。青年戰士報，第 3 版。
- 潘振球（民 57 年 10 月 10 日）。九年制國民教育籌備工作的甘苦談。中央日報，第 14 版。
- 潘振球（民 57 年 10 月 10 日）。九年國民教育之實施與檢討。中國時報，第 2 版。
- 潘振球（民 59 年 10 月 30 日）。一項意義深長的展覽—九年國教展覽的意義與目的。中央日報，第 4 版。
- 梁伯群（民 61 年 6 月 12 日）。八年杏壇留去思—潘振球對本省教育的貢獻。臺灣新生報，第 2 版。
-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民 62）。潘廳長向青年文教年會講「當前升學競爭問題及其解決途徑」全文。載於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主編），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大事記，（頁 6-9）。臺中縣：作者。

# 深耕童軍在台灣

——謝又華

(訪問及資料整理：陳明終、邱鈺惠、蕭佑梅)

## 壹、生平簡介

謝又華先生，出生於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江西省崇仁縣人。

### 學歷

廈門大學畢業。

### 經歷

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期間曾任青年軍 209 師政治部少校訓導員、國防部預備幹部局青年職訓班中校教官、國防部預備幹部局嘉興青年中學教官兼訓導組長、陸軍幹訓團第一總隊上校組長等軍職。

民國三十八年來台後曾任台灣省立台中二中教員及台灣省立台北成功中學教員。

民國四十一年至四十七年擔任救國團總團部副組長、組長等職務。

民國四十九年至五十五年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總幹事。

民國五十五年至六十五年任教育部總務司長及社教司長。

民國六十五年至六十七年擔任中華電視公司總經理。

民國六十七年至六十八年任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

民國六十八年至七十一年擔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

民國七十一年至七十九年擔任救國團副主任。

自民國三十四年起至七十九年退休，計服公職達四十五年。其間除參加青年軍及奉調任中華電視公司總經理各兩年外均係從事青年教育工作。民國四十五年，復應中國童子軍總會理事長張其昀先生之邀參加總會工作，先後擔任總幹事駐會常

務理事及國際委員逾廿年，以義務服務員身份負責會務推展。任內確立「青少年志願參加」及「成年人義務服務」兩項工作原則，並將童子軍運動定性為教育性的社會事業。同時積極參加國際童子軍活動，使中國童子軍成為國際組織中極具建設性的一份子。先後獲得美國、日本、菲律賓、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及世界童軍總部頒贈榮譽獎章。對提高中國童子軍國際聲譽，不無貢獻。

### 座右銘

#### 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事實上，隨著人生的發展，每個階段會有每個階段不同的準則。我個人在年輕的時候，因為我是基督徒，念的是教會學校，對於做事的標準，我始終記得這八個字「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對於一個年輕人不管從事哪一個工作，努力工作最重要。至於能有多少收穫？這是不一定的。有的花的力氣少，而可以有很大的收穫；有的你花了很多的力氣，結果變成白費力氣都有。如果計較收穫的話，則耕耘努力都會不夠。所以我一直記得這八個字「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這是一個青年離開學校以後，或在學校之中，都可以用來做為一個座右銘。只問努力了沒有？不要斤斤計較究竟有多大的收穫。現在功利主義往往過份計較，從事教育工作很難這樣計較，而且幾乎不可能這樣計較，說在學生身上花了很多心血，這個學生一定成材嗎？不一定。有時候一兩句話影響一個學生的終身，有時候苦口婆心而學生頑石不點頭，這樣的情形都是有的。我在年輕直接從事教學工作的時候，都一直謹記這句話。

#### 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隨著自己到社會上工作，年紀漸長，所做的事情慢慢地影響越來越多人的時候，開始體會到「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這句話。你做任何影響很多人的決定，不可能個個都做的好，不可能個個都很滿意，但是你自己要捫心自問，這個決定是為了什麼、目的是什麼，這裡面有沒有偏？有沒有私？有沒有為自己打算？還是說是為了工作？尤其擔負的責任愈大，恐怕愈要體認這句話，不然你將惶恐終日，這樣做不對，那樣做也不對。

### 貳、家庭的影響

.....

談起謝先生平日待人處事所秉持的原則，是否受到父母家庭的影響，謝先生以

長者的口吻說道：

「以我們這一代的人來說，能供給你們甚至更年輕一輩做參考的經驗其實不多，以我來說，今年八十二歲，抗戰開始那年我差不多十五、六歲，就開始離家一個人到外面生活，為什麼我對當時政府發津貼給流亡學生的『貸金』印象如此深刻，因為沒有『貸金』我們根本不可能進學校升學！我的家庭在當時還算是富裕的，在十五歲以前還享受到一些家庭生活；十五歲以後，幾乎就是自己一個人在外面，這與目前台灣大多數青年的生活經驗是很不一樣的。所以我們這一群八十幾歲上下，從大陸過來的人，大多成家比較晚，我直到工作比較穩定了，三十四歲才成家。這和現在年輕人二十幾歲服完兵役，就工作、成家是不一樣，多半經歷過一長段苦難的歲月。」

隨後，謝先生笑著說：「你說哪一樣經歷比較好？很難說，因為碰上那個時代，這不是我們個人能選擇的。現代年輕一輩講究生涯規劃，我們那一代，講通俗一點，就是努力讓自己活下去，根本談不上規劃，只是順勢盡力而已。」

經歷過戰亂、流亡的生活，曾經身處在動盪不安的時代，謝先生的語氣不帶絲毫怨憎或自憐，只有為自己人生奮鬥的務實與努力。

## 參、世界上雖沒有完人，但仍有值得尊敬的人

在謝先生的心目中，有許多位人物讓他覺得敬佩，足以為表率，但他一再強調，即使如此，這些值得尊敬的人物，仍然沒有一個是完人，因為天底下原本就沒有完人，再傑出的人，也都會有缺點；同樣的，即使是極具爭議的人物，也有可能做出令人敬佩的事：

「從人的觀點來看，天下沒有完人。若只從完人的角度去看一個人，那麼優點還沒看出來，就已經先看出他的一大堆缺點。換句話說，人都有許多的缺點，但是有缺點的人並不代表他不會做出一件好事或幾件好事。所以我認為，談談有哪些好事比較具體。陳立夫先生是一個有爭議的人，三十剛出頭就當教育部長，他在國民黨、在政府當中負了很多很多的責任，我本身對他也有很多批評，這個我們不談，我想談關於他的一件事情。你們可能不知道，我是正好抗戰開始的那一年念高一，當時抗戰才開始不久，我們大片的土地都丟了。換句話說全國到處是流亡學生，流亡學生就是年輕人離開了家，跟著政府不斷的向後方移動，也沒有學校進。那時候正好陳立夫先生當教育部長，他在中央推動了一個『貸金制度』，就是說如果你家的所在地區淪陷了，而你考進了學校之後，政府就給你貸金。每個月到學校的主計單位去蓋章簽字，就可以領一份伙食，儘管伙食不是很好，但至少不會餓肚子。現

在去問問年紀約八十上下從大陸過來的人，很少沒有享受過這個貸金。也正因為有這個貸金制度，使得原本許多沒有辦法繼續學業的學生，變成國家有用之才，因為經過學校的學習之後，畢業後他就具有工作的能力，而這些都是國家的資產。如果沒有這個制度，可能就有成千上萬的青年人沒辦法上中學或大學。所以當年的『貸金制度』，不僅是造福了許多青年，讓我們國家的青年學子有接受教育的機會。當時一所大學裡，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學生都是依靠貸金。當時規定是要還的，但事後大部分的人都沒還，我們都欠了政府一筆債，另一方面也是政府不曉得到哪兒去要這些錢。」

謝先生接著談到其他幾位值得效法與尊敬的前輩們：

「梅貽琦先生，他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前後有幾十年，從抗戰前，到抗戰，到勝利復原，政府播遷到臺灣，清華在新竹復校。後來出任教育部長兼中國童子軍總會理事長，我有幸追隨。他是位典型的『彬彬君子』。講話輕聲細語，要言不繁，平易近人，他告訴我說：『擔任行政工作太久，專業學識早已落伍，祇能欣賞年輕人，知才善任。』我體認出一個偉大教育家的風範，這才是平凡的偉人。此後歷任教育首長都有他們自己成功的地方，也都有其缺點，畢竟沒有人是完人。像陳雪屏先生、劉真先生、潘振球先生、朱匯森先生，這幾位是教育界當中，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幾位，倒不是因為他們比我年長，主要是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上，都表現出令人敬佩的風範，可以做為後來的教育工作者學習模仿的對象。」

## 肆、投入童軍活動的因緣

.....

謝又華先生參與童軍的時間極長，從年少時只覺得新鮮有趣，到後來成為童軍界推展許多活動的重要人物，地位尊崇。談起小時候加入童軍時有趣的回憶，謝先生笑著說：

「我投入童軍活動將近七十年，民國二十三、四年新生活運動發起的時候，我已經是童子軍了。其實那個時候沒有所謂幼童軍，而我唸的是教會學校，教會學校因為學費收得較高，通常都是比較有錢子弟唸的，教會學校的制服也比較漂亮。因此雖然我實際上還只是小學生，但我已經是童子軍，印象中童子軍是另一種制服，和學校制服不同，但也是很漂亮。記得老總統在江西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時，我正在江西南昌唸六年級，那個時候沒要讓一些警察、憲兵站在台上，而找一些童子軍站在台上，我當時就是被找去站在台上。說是保護老總統，但一個小孩子能保護什麼呢？但對我卻是個很有趣的經驗。還有當時參加童軍的時候只是小孩子，對童軍



活動的內容與精神其實並不瞭解，只知道『準備』、『日行一善』的銘言，那是我對童軍最深的印象。其他的就是童軍活動很好玩，可以去野外活動、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做很多的事情，日行一善，每天躬身實踐。到民家去教平民識字班等等，就覺得滿有意思的，甚至畢生難忘。到抗戰發生，我唸高中、大學就和童子軍沒有接觸。」

民國三十八年來台之後，原本於救國團任職的謝先生，在因緣際會之下又重新投入了童軍活動，此時的謝先生是將童軍活動推廣至校園及社會的重要人物：

「我是民國三十八年到台灣來的，雖然我原來是童子軍，但已離開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民國四十一年，救國團成立，那個時候國民黨中央又通過一個決議，要將所有青年組織通通都交由救國團統一領導，這個決定在當時政治環境來看也許是沒錯的。不過對童子軍就有礙難之處。因為童子軍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它有世界總部，有亞太區的總部，國內還要歸另一個組織，這樣就不太對啦！有人向中央反映這樣不對。當時擔任駐會常務理事的政大教育研究所所長吳兆棠先生就代表童子軍總會去和救國團接洽，於是經國先生就把吳兆棠請到救國團做副主任，還要從救國團中找一個人去幫忙，因此就找了我。為什麼會找到我？因為救國團的高階主管當中，只有我比較年輕，同時我做過童子軍。而我到了童軍總會之後，沒有擔任總幹事，免得擠走總幹事，所以我堅持做副總幹事就好，這樣就不會讓原來的總幹事失去工作。」

重新進入童軍活動，憑藉著多年救國團服務經驗的累積，讓謝先生在新工作的推展上，很快便受到各界的認同與稱許：

「其實我最不會帶大家做活動，到現在還沒辦法帶大家做個遊戲、唱個歌。我想大家說我帶領童軍活動的能力很強，主要關鍵是因為那時救國團本身活力很強，救國團的人並不多，救國團工作的第一個對象就是學校。由於我們和校長有很多接觸，所以我們就有較多的機會把童子軍介紹給他們。在我任職期中，很多校長來參加童子軍的活動乃至於訓練，所以這樣就讓童軍的力量增加了。」

## 一、童軍活動的萌芽與發展

基於謝先生與童軍之間如此深厚的淵源，因此對於童軍活動出現在中國及其後續的演變，謝先生如數家珍地道來：

「民國元年嚴家麟先生在武昌中華學校創立童軍團，武昌又是中國革命起義聖地，到抗戰時期在重慶正式確認嚴先生為中國童子軍的創始人。其實童子軍並不只是由嚴先生一個人在武漢發起。因為童軍這種社會活動在通商口岸都易冒起，就如同鳥飛過灑下的種子容易到處生根發芽，所以當時在武漢、上海、廣東等地都有。在民國十六年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到民國十九年才正式成立了全國性組織。」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播遷來台之後，台灣地區的童軍活動也在政府的推廣之下逐漸開展：

「抗戰勝利之後，張忠仁先生被派至台灣從事教育工作，擔任臺南師範學校校長。由於張先生早在民國十三、四年時就參加了童子軍，因此隨著張先生到台灣工作也就把童軍帶到台灣了。但是由於張先生在臺南師範當校長，因此主要的影響力在南部，對於全面的影響還是很少。加上那時政局不安定，其中還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等等，因此童軍在當時談不上很大的發展。真正開始在台灣推動童軍活動，應該是在陳雪屏先生擔任教育廳長時期，蕭忠國先生受聘作童軍的省總幹事，成立省理事會開始，蕭先生當時在師範大學做訓導長。而當時的教育廳長就是當然的省理事長，教育部長就是當然的總會理事長，換句話說，一切都還沒有法制化。童軍在民國元年就已經引進中國，而台灣在日據時代也有童子軍，但那很少，屬於特權性質，少數的小孩、少數的學校可以參加，而且是日本童子軍。直到民國三十七、八年，從陳雪屏先生當教育廳長開始，中國童子軍台灣省理事會才算成立了。」

回顧從民國元年乃至於到台灣之後的早期童軍發展史，謝先生特別澄清在過去時代背景及環境因素影響下，由於對童軍活動瞭解的不夠清楚而產生的不正確觀念：

「從民國元年到三十八年，整整三十八年的時間，很少人真正瞭解什麼是童子軍，即使當權者也不瞭解。當然我們也不能怪當時的人不努力，或是學問不夠，只能說都是因為戰亂，所以大家沒有餘暇發展。大家看待童子軍，覺得這個活動很受歡迎，因此在民國十三年，國民黨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時代，就成立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司令部，因為有個『軍』字就想到用司令部。張忠仁先生是第一任司令，第二任才是何應欽先生。就這樣一直到民國十七、八年，廣州政府已經慢慢統一全國，到了南京。因為當時覺得稱為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司令部，好像把小孩都編到軍隊裡面去，不太妥當，因此就成立童子軍總會，推請老總統作會長。但老總統的觀念當中，還是把童子軍當成預備軍訓。所以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就特別提到成年的國民應受軍事訓練，未成年的國民應該受童子軍訓練。嚴格來說，這是對童子軍的誤解。未成年要受童子軍訓練這句話是大有問題的，因為童子軍活動當中最重要原則是要自願參加，通通都要受訓就不叫自願參加了，所以未成年國民應接受童子軍訓練，是因為誤解了什麼是童子軍運動。」

謝先生緊接著說明童軍活動的真正精神，及參與這項活動人員應有的正確認知：

「事實上，對於童子軍來講，青少年一定要自願參加，自願參加才会有榮譽感。因此他要自行履行童子軍的規律、銘言、誓詞。如果是被動要這樣做，大家都

要這要做，就沒有這個榮譽感了；對於在童子軍運動中的成年人一定要是義務服務，不能夠受酬。而少數受薪的專業人員是為義務人員而服務，受薪的專業人員人數極少，他們服務的對象是義務服務員，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總會或理事會辦一些必要的業務，一定要把這之間關係弄清楚。童子軍運動是個人主義的產物，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是從西方文化衍生而來的，是承認有神的。和共產主義的集體主義和無神論是不同的。所以共產國家幾乎沒有一個有童子軍。」

## 二、難忘的國外童軍交流經驗

多年來，謝先生參與過無數次國內外的童軍活動，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在國際童軍界享有盛名，並於民國五十九年至六十三年擔任了世界童軍委員會亞太區副主席。在多次遠赴國外參與活動的經驗中，謝先生談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外蒙古之行：

「當時外蒙古剛脫離蘇聯的控制有意展開童子軍活動，世界童子軍總部要求亞太地區各會員國，贊助舉辦外蒙古第一屆服務員訓練，派遣訓練人員前往烏蘭巴托。我體認到外蒙古同我國歷史淵源，又深知日本人對外蒙古野心和積極介入，所以建議總會我們應該不要放棄這個機會，向總部承諾我們願意組織訓練組來承擔這個任務，為外蒙童子軍做播種工作。本來我不擅長訓練，在國內我也沒有辦訓練的經驗，可是亞太總部也許覺得我曾經擔任過亞太區副主席，在國際上較具知名度，就指派我擔任訓練主持人。一共有十二、三個人到外蒙烏蘭巴托辦訓練的人員，包含香港、菲律賓、巴基斯坦等地的人員，但除了一個巴基斯坦人之外，其餘通通是中國人。那一次的外蒙古之行，雖然他們是以國際友人的身份特別招待我，但是在那裡的日子還是很艱苦，我們一般人到了那裡實在沒辦法過，但卻是很有趣的經驗。我們為他們訓練了第一批一百多位義務服務員，灑下了義務服務員的種子，特別是前一陣子外蒙古還邀請我們和其他國家的童子軍參加了他們的全國童軍大露營。」

瞭解童軍活動真正的精神之後，國內童軍界的相關人員於是開始到國外接受訓練，謝先生談起這段受訓的經驗，及在國外所得到的啟示：

「吳兆棠、陳忠信、劉元孝先生到英國童子軍參加了 1957 年五十年世界大露營，大露營之後特別為各國的童軍領袖辦了一個木章訓練。當時吳兆棠他們全都去受訓了，進一步瞭解義務服務員訓練狀況。而我就帶著另一個隊伍到美國，由於美軍顧問團在台灣有一個眷屬童軍組織，和我們聯繫的很密切。當時他們正在舉辦一個『空中交換訪問』他們有飛機在日本、韓國、台灣之間往返，美國方面則派了三隊童子軍參與交換訪問。我帶了六個人的交換訪問隊到美國去，後來我留在美國考察美國童軍組織，也參加專業服務員訓練學校，前後半年，也因為這樣才弄清楚整

個童軍活動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我剛才強調童軍的兩個觀念『志願參加』、『義務服務』是磨了這麼多年才磨出來的。而『義務』的觀念，以當時我們社會的發展而言，還不太容易被社會接受。平時每個人都是辛辛苦苦的努力工作，週末還有家庭的責任。現在我們社會較為富裕，許多社會團體乃至政府都有義務服務的人員，這表示我們的社會已經逐漸進步，所以很多社會學者把義務服務的人數多寡，當作社會進步的指標，這是很有道理。」

在美國接受了充分的訓練，也深刻瞭解到童軍活動中「志願參加」與「義務服務」兩項最重要的原則之後，謝先生不斷嘗試將這兩種觀念帶到社會上，並且引導社會各界瞭解童軍活動真正的性質與精神：

「當年要介紹這個觀念不容易，我想了很久，發現祇有一種組織勉勉強強可以算是義務服務，就是義勇消防隊，但仍然不完全一樣。那麼難道我們中國傳統都是不幫助別人，沒有服務精神嗎？當然不是。我們傳統所謂義務服務完全是個別的，例如修橋、鋪路、施藥，自己有錢就做，不需要動員別人，也不需要組織力量。這種在農業社會是可以的，進入到現代社會，一切都要有組織的，才有力量。那年我到美國去，訪問了很多地方，其中特別訪問了一個組織叫做『志願服務協會』，現在台灣也有了。當時美國人口剛剛到兩億，而他們的會員就已經有六千多萬。我簡直不敢相信。但是現在如果我們把所有宗教、農會、工會、各級政府、教育和社會團體所有義工都加起來，也可能有兩三百萬了。童子軍運動創立之初，基本上並不是打算嘉惠每個青少年，而是嘉惠於願意成為童子軍的青少年，而我們一開始就弄錯了。以為既然這個活動這麼好，就讓每個青少年都做童子軍好了，當時的邏輯是這麼簡單。現在說它錯，好像有點殘忍，但我們還是必須承認當時的方法是錯的，因為那樣並不能真正發揮童子軍運動的功能。」

長期以來參與童軍的活動，就謝先生而言，對他的人生有著極大的影響：

「我參與童子軍以後，自己感覺到對我本人有很大的幫助。這又呼應到我的座右銘『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因為當時做的時候也就是接受任務的心態去做，而努力做的過程，自己無形中就會獲得很多進益，也開拓了眼界。」

### 三、推動童軍獎章制度的緣由

國內童軍獎章分為青松、翠竹、臘梅三種，對於當時推動童軍獎章的緣由，謝先生說：

「貝登堡在設計童軍活動時，有一項徽章制度。所謂徽章制度聽起來似乎太嚴肅了，其實就是用設計得比較漂亮的徽章來表示不同的成就。例如：對其他技能或

社會服務的成就分別用不同的徽章來表示，能在野外露營兩天，表示你已經有這個經驗可以獲得了一個露營徽章，成年服務員同樣喜歡、需要。所以有時候我們會看到有些服務員掛了多種不同的徽章。至於松、竹、梅三種勞績徽章，如果我記憶沒錯的話，是專為義務服務員，特別是團長設計的。因為童軍運動裡，團長直接領導童子軍最為重要，所有成年人都是義務來服務。只是工作上有區分，地位上沒有高低。原來我參加總會工作的時候，只有童子軍，後來我發展為行義童子軍、羅浮童子軍、幼童軍。原來的徽章也只有幾種，後來才發展成為多種，這些多半是國外參觀、交流，受到影響而發展出來的。徽章一定要依照制度來頒發才有徽章的價值，如果不做團長而掛團長的徽章，就沒有意義了。也就是因為團長對實際的童軍活動付出最多，投入的時間也最多，不同於一般理事或會員祇是開開會而已；再來是因為看到國外有這種突出團長的制度，覺得人家這樣做很有道理，所以就開始推動。其實這種就是童軍徽章制度的實踐，用之於青少年和用之於成年人一樣有效。」

#### 四、童軍活動與教育之間的關係

童軍在國民中學曾經被列為課程的一部分，謝先生並不完全贊同，對於這個問題，他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把童子軍教育列入初中的課程，九年國教時也一樣，對於這件事我一直認為不妥，因為童軍與學校教育雖然可以相輔相成，但畢竟是不同的兩件事，而師範大學還專門設童子軍專修科培養為專業師資。如果突然說要改，培養了這些老師結果學校不聘，那培養教師做什麼呢！要改變這個很難。於是我出了一個主意，讓童子軍運動歸運動，而學校童子軍課程由教育單位去管理，不是我們童軍總會的工作。童軍總會可以做為教育單位的顧問，提供必要建議，但是該如何聘老師、如何上這個課是教育行政和學校的事。當時教育部和童子軍總會都接受我這個說法，因此，我負責的那一段時間都盡可能把這兩樣東西隔開。教育部還特別頒訂一個初級中學童子軍教育實施辦法。我把初級中學童子軍教育就做高中的軍訓。一方面跟老總統所寫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當中，所說的未成年國民受童子軍教育的原則不抵觸；另一方面童子軍運動可以解脫許多束縛，積極向社會和各級學校發展。同時童軍運動也靠著學校，才有發展的著力點。協助各種社會團體主辦童子軍團，吸收各行各業社會人士來參與作為服務員。」

在謝先生的心中，童軍運動終究不等同於學校教育，把它化為課程更不適當，因此童軍之於學校教育應該是輔助的性質，是教育性的社會事業，而不應完全屬於教育事業：

「童子軍的活動與學校教育之間，由於對象的年齡層相同，因此看起來似乎是有些重疊。一個健康的社會，一定有很多教育性的活動，來提昇社會的朝氣和活力，例如：體育活動、藝術活動、文化活動、宗教活動等等都是。而這些活動也大多是有教育價值。童軍運動就是以青少年為對象的一項社會活動，是教育性的社會事業。可以發揮補助教育的功能，可以充實青少年的社會生活，促進群育的發展。」

強調童軍活動的意義與價值，但卻不將童軍活動視為無所不能的神話，學校教育與童軍活動各有其本來的目的，可以相輔相成，但不能混為一談。釐清這一層關係之後，謝先生進一步說明參與童軍運動對青少年在日常生活與人格陶冶方面所帶來的正面影響，並語重心長的點出現代社會缺乏服務精神所面臨的危機：

「童子軍提倡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務為目的，這不是口號。童子軍活動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要啓發青少年想到別人、幫助別人、為別人著想。那怕是小小的一件事，例如：清除一堆垃圾、搬開一塊石頭、到社區服務等等。讓青少年在服務中成長，透過服務訓練養成青年服務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不祇靠老師教給學生的，一定要親身體認，他才瞭解其中的意義。童子軍活動就是將社會服務這個部分縮成青少年可以勝任的層次，讓他去幫助鄰居、幫助街坊。今天社會最大的危機是不想到別人，只想到自己，能夠想到別人，這個觀念對於青少年，對於社會都很重要。這應該是最核心的價值所在。」

### 五、童軍和救國團兩者間的關聯

由於謝先生在救國團與童軍兩個組織中，都有極豐富的經驗與資歷，而這兩個組織的主要對象也都是青年和青少年，但就謝先生而言，這兩者之間有若干差異：

「我認為救國團是一個階段性的組織。事實上，到現在救國團成立時的階段任務已經結束，雖然任務並沒有充分完成。因為當年成立救國團的理由，現在已經不存在了。社會也有了大的變化。救國團必須開新的窗，針對青年和國家新的需要，設計新的工作才有存在的價值。而童軍運動卻是永久性的組織，只會有時候發展得很好，有時候會發展的差一點，它會永遠存在且沒有階段性的問題。它經常在青少年教育功能中會發生一些作用。所以救國團和童子軍之間的差異應從這樣的觀點去看。」

## 伍、投入教育工作的機緣與體驗

.....

謙稱自己非教育科班出身卻進入了教育工作的領域，曾經擔任教師、教育廳長、教育部總務、社教司長的謝先生，談到教師、家長在孩子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

及應有的態度：

「我不是學教育的，但是誤打誤撞認識了一些從事教育的朋友，到臺灣就走進教育這個領域。後來長時間在教育行政服務上，勉強可以算半個內行，不是真正內行。我總覺得對教育工作者來說，如果沒有興趣，只是為了生活，那最好不要從事教育這一行。因為這樣是誤人誤己，你在工作上得不到樂趣，又耽誤了受教育的學生。所以我一直強調想做英雄事業就不要做教育工作，缺乏對教育關懷的也不要做教育工作。這跟生性有關，不完全是後天培養的，也不完全是理性的要與不要。有的人就是喜歡年輕人，並對他們產生影響，有些幫助；而有的人是看到小孩就厭煩，我自己的小孩也曾遇到這樣的老師。做為一個家長我常常講，如果你自己都不在意、疏忽小孩子，你如何要求老師特別在意你的小孩子？老師要照顧幾十個學生，你的孩子只是其中一個。所以我說你自己要在意，要從這個角度去思考。雖然我的小孩也曾遇到那種不適合擔任老師工作的老師，但經過我以家長身份多次的接觸之後，至少我的小孩還沒有受到嚴重的影響。」

## 陸、對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勉勵與建議

謝先生認為教育工作者並非英雄，而是成就整個偉大教育事業的一份子，因此想成為英雄者，不適合擔任教師：

「我一直認為我自己只是一個教育工作者，不是教育家，在我從事教育工作這麼長的時間裡，我發現教育本身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這個工作對國家社會的重要，比經濟建設、文化建設都更重要。但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不是英雄，是平凡人。想做英雄的人首先我會勸他不要念師範，如果他念了師範，我會勸他換一個行業，因為老師的工作滿足不了他的英雄慾望。各行各業都可以產生出類拔萃的人物，但教育的事業卻最需要善盡本分的人。所以我在教育廳的時候，特別對師專應屆畢業生說：『教育工作是一個平庸人所從事的偉大事業。』」。

謝先生朗聲笑著說：「如果了不起的人才，留在學校繼續做一個一般的教師，也很可惜。我覺得他最好往另外的路去發展，尤其是天生就有領袖才幹的人，天生就會經營事業的人，甚至於具備學術研究雄心的人，這些都不適合留在學校，特別是中小學裡面。」

謝先生接著收起了笑容，以嚴肅的口吻說道：「人總是平庸的比較多能安於本位，平凡的人較為適合從事教育工作，傳道授業解惑是一個教育工作者神聖的責任，所以平庸也可以不朽。」

對於所有從事教育工作者而言，「專業精神」是一種必備的素養，而「教育愛」則是基本的信念。針對教育的「專業精神」和「教育愛」，謝先生有其獨到的詮釋：

「教育工作不能斤斤計較，付出和收穫往往不相等，老師的苦口婆心，有時候可以影響一個學生一生，有時候也會盡付流水。做一個教育工作者不要對學生失望，懷著希望工作，會使你『樂在其中』。」

### 柒、對教育改革的想法

.....

謝先生曾經擔任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因此與學校教育工作有最直接的關係，也有最清楚的瞭解，對於今日諸多教育改革措施，謝先生有這樣的看法：

「另外對於教育改革方面的問題，我個人研究不深，所以不敢多做評論。只是我有一點想法，我認為教育是需要不斷的求變，不能求急功，要求急功的改變，往往是功未見，弊已先現。該是一點一點的變，慢慢累積，最後形成整個教育的轉型。這不能只憑理想，更不能照抄外國的作法，不只要是在教育體系內的配套，還得和社會文化、經濟發展配套，不論如何創新，都不能脫離傳統文化。所以如果有那一位部長想在任內就要教育換一個面目，成就豐功偉業，我不認為辦得到。對於那些具有學術光環的朋友們，我特別願意提醒，在專業學術的範圍內，也許你是位權威，可是在教育改革的工作中，你祇能是一個提供意見的人，不要作一個指揮者，你也許是一位智者，可是別忘了許許多多受教育的人，卻是平平凡凡的人，我們的教育，必須為這些人著想。」

### 捌、童軍精神的發揚

.....

鑑於童軍活動對青少年及社會的助益，謝又華先生仔細探究童軍活動的真正精神，積極參與國內外童軍活動，並建立童軍獎章制度，使童軍活動在這塊土地上有更多熱心的成年人來參與，必能為更多的青少年服務，造福社會。

### 參考資料

教科書中如有錯誤教師不能將錯就錯：教育廳長謝又華昨表示鼓勵教師協助校正課本（民 67 年 11 月 2 日）。聯合報，第 2 版。

謝又華（民 73）。良師興國。載於張植珊等（主編），台灣省教師精神修養專輯第十一輯—師道尊嚴（59-69 頁）。台中縣：台灣省政府教育廳。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教育家的話／林天祐主編；國立教育資料館編.--初版.--臺北市：教育資料館, 民92  
面；公分

ISBN 957-01-4888-8 (平裝)

1. 教育 - 臺灣 - 訪談錄

520. 98

92016205

教育家的話

發行人：許志賢

委託單位：國立教育資料館

主編：林天祐

出版機關：國立教育資料館

台北市大安區(106)和平東路一段181號

電話：(02)23519090

電子郵件信箱：rs@mail.nioerar.edu.tw

出版年月：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版次：初版

電子出版品說明：本書同時登載於國立教育資料館網站

網址為 <http://www.nioerar.edu.tw>

工本費：新台幣180元

印刷者：益盛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電話：(02)2222-4910

展售處：三民書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2號

五南文化廣場：台中市中山路2號

新進圖書廣場：彰化市光復路177號

青年書局：高雄市青年一路141號

國家書坊：台北市八德路三段十號B1

GPN : 1009202683

ISBN : 957-01-4888-8